

# 教育

# 愛

*Educational  
Love*

## 台灣教育人物誌 III

石川欽一郎 · 趙連芳 · 蔣復璁 · 洪耀勳 · 黃金鰲 · 徐傍興 ·  
鄧火土 · 羅光 · 孫邦正 · 高慈美 · 鄧玉祥 · 姚一葦



國立教育資料館

台灣歷經了數十年社會文化的變遷更迭，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裡，無數優秀而偉大的教育工作者，各自在不同的教學領域中奉獻、發光，他們的行誼事蹟，不只樹立了教育專業的典範，同時，也對台灣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留下深遠影響。

審視教育先賢們的教育實踐，最重要的共同特質是—「教育愛」。「教育愛」(Padagogische Liebe)源於希臘文中的agape，指的是精神之愛(spiritual love)、憐憫(compassion)與慈善(charity)，是一種無私的愛，沒有條件，沒有智愚貧賤的差別待遇，同時，更是一種創造的愛，使學生從無知到有知、從沒有價值到深富價值，因此，「教育愛」可說是人類最聖潔、最需要發揚的一種愛。

有鑑於此，本館自民國95年(2006年)起有系統地記錄畢生為台灣付出「教育愛」的前輩先賢，製作一系列「台灣教育人物誌」短片及傳略，這些教育典範人物涵括了美術、農業、圖書館、哲學、醫學、水產、音樂、戲劇、宗教、中小學教育、語文、文化、化學、經濟、地質學、新聞學、法政學、行政學、幼兒教育等領域。

本(98)年延續執行「台灣教育人物誌IV」紀錄影片製作計畫，本輯除記錄新聞教育學家曾虛白、史學家錢穆、地質學家林朝棨等共十一位教育家以外，特收錄了張箭、鄧玉瑛及林靖娟等三位為教育而奉獻生命的老師，並邀請長期對教育史志鑽研有成的學者專家們分別撰寫傳略，深度呈現他們的思想行誼。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要特別感謝協助策劃「台灣教育人物誌」紀錄影片的整個製作團隊，以及辛勤審查與撰寫傳略的學者專家，他們在忙碌的教學及研究之餘，提供本館最大的協助，謹此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

王世英 謹誌

民國98年10月

# 教育學

## 目 錄

### 序

- 7 董作賓（1895~1963）  
甲骨文研究的權威／鍾柏生 撰文
- 23 曾虛白（1895~1994）  
新聞教育的領航者／朱立 撰文
- 41 錢 穆（1895~1990）  
史學泰斗／王吉林 撰文
- 57 薩孟武（1897~1984）  
法政教育的推手／劉恆姘·劉后安 撰文
- 85 張金鑑（1902~1988）  
行政學巨擘／雷飛龍 撰文
- 95 梁實秋（1903~1987）  
英語教育的大師／莊坤良 撰文

## Contents

- 121 潘 貫 (1907~1974)  
化學教育的先進／歐素瑛 撰文
- 137 林朝榮 (1910~1985)  
地質學教育的先驅／周瑞燉 撰文
- 153 張漢裕 (1913~1998)  
台灣農業經濟學的奠基者／葉淑貞 撰文
- 169 賈馥茗 (1926~2008)  
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林逢祺 撰文
- 193 張 箭、鄧玉瑛 (1922, 1956~1977)  
為教育奉獻生命的師表／涂欽鴻·劉金英·王永誠·陳杰燕  
葉銘恩·呂至全·彭松英·張大鵬 撰文
- 207 林靖娟 (1960~1992)  
幼教界的烈士／林月琴 撰文

Educational Love

# 石川欽一郎

1871  
~1945

臺灣西洋美術教育的啟蒙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蔡秀美 撰文



石川欽一郎（1871～1945），終身致力於繪畫創作，尤其是水彩畫，積極參與美術團體的活動，是近代日本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其兩度前來臺灣任教，不僅盡心盡力從事學校美術教育，並利用課餘向社會大眾傳授西洋繪畫知識和技法，鼓勵學生籌組美術團體，展開近代臺灣美術運動。其結果，不僅啟發社會大眾認識臺灣之美，推廣近代西洋美學和文化風尚，並培育許多第一代臺灣人西洋畫家，對臺灣近代美術的發展，影響十分深遠，實可說是臺灣近代西洋美術教育啟蒙者、近代臺灣美術運動的導師。



▲ 石川欽一郎獨照  
（圖：楊孟哲先生提供）

## 勤習西畫，活躍畫壇

石川欽一郎，別號一廬，1871年8月8日生於日本靜岡市。其父石川直是德川時代的藩士，受過良好的漢學教育，雅好謠曲。其母早逝，欽一郎為長子。父親再娶後，生下一女。1891年，其父去世後，欽一郎負責撫養繼母和同父異母的妹妹。

1883年，欽一郎入學靜岡縣立中學校；1886年，離開家鄉前往東京，1888年，入學遞信省附設郵便電信實技學校。由於早年受到父親的薰陶，欽一郎自幼即喜愛謠曲和繪畫，尤其是繪畫。在郵便電信學校期間，其對繪畫課情有獨鍾，隨西洋畫家小代為重教授（1863-1951）習西洋繪畫。小代為重早年隨被譽之為



「日本近代西洋畫先覺者」的百武兼行習畫，其後，歷任千葉師範、千葉中學校、千葉女子師範學校教諭。1888年轉任東京電信學校助教授，翌年，參與創組近代日本最早的西洋美術團體「明治美術會」，1896年進而參與創立「白馬會」，可說是近代日本西洋畫界頗為活躍之畫家，欽一郎在其指導下，發揮其繪畫才能，奠定西洋畫之基礎，並經常利用課餘至上野公園的美術館尋找最新的英國繪畫出版品，研究其構圖與色彩搭配，反覆練習；同時，勤習英文，而奠定紮實的英文基礎。

1889年，欽一郎自郵便電信學校畢業後，成為大藏省印刷局工生，在雕刻科工作，參與製作錢幣上的銅板圖案，該科藏有許多西方繪畫名作的銅板或照片複製品；同時，與日本畫家石井鼎湖之子西洋畫家石井柏亭（1882-1958）成為同事，兩人均喜歡水彩畫，時常利用假期相約旅行寫生。1891年，參加「明治美術會」，認識淺井忠（1856-1907）、川村清雄（1852-1934）等著名西洋畫家。1892年，隨即以「田舍」、「老人的肖像」水彩畫作參與第四回「明治美術會」展覽會，成為被公開認可的畫家。

1897年拜川村清雄為師，接受其指導，並加入川村清雄學生所組成的「自來集」。川村清雄係欽一郎之父石川直在幕府的舊交，於明治初年隨川上冬崖、高橋由一習西洋畫；1871年，赴美深造，其後，轉法國巴黎、義大利威尼斯遊學作畫；1881年返回日本，轉而醉心於日本趣味，畫作題材表現日本特色，並開設畫塾；1889年參與「明治美術會」之創立，擅長日本人物畫及歷史風俗畫，其畫作具有威尼斯派繪畫的明麗風格，被視之為義大利威尼斯派畫家，畫作風靡一時，影響許多畫壇新秀，欽一郎亦深受其影響。

1898年起，欽一郎和石井柏亭開始拿自己的畫作向有「近代日本西洋畫巨匠」之稱的淺井忠請益。同年，以「漁村」、「閑江」等油畫參加明治美術會創立十年紀念展。1899年，英國著名風景水彩畫家伊司特（Alfred East, 1849-1913）到日本，接受「明治美術會」之邀發表演講，說明其創作心得，並以其在日本完成的三件水彩畫寫生，參加第一回該會特別展覽會，對當時倍受日本傳統美術復古風潮（國粹派）排擠的西洋畫界，頗具鼓舞作用。伊司特旅居日本旅行寫生期間，欽一郎擔任其導遊兼翻譯，並隨其習畫，對風景水彩畫更具心得。伊司特返國後，欽一郎仍時常寫信向他請教作畫技巧。1906年伊司特出版《油彩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 in Oil Colour）一書時，欽一郎將之翻譯成日文，連載於水彩畫刊物《みづゑ》（水繪，即水彩畫）上。要之，欽一郎在上述名師的指導下，



努力學習和精進自己的繪畫技巧，尤其是著重於風景水彩畫。

1890年代後期，日本不少畫家紛紛前往歐洲，開啟赴歐遊學作畫之風氣，他們往往攜帶畫作前往歐美拍賣，作為漫遊的資金。受到此一風氣之影響，1899年欽一郎亦辭去印刷局工作，於1899-1900年前往歐洲遊學。1901年返回日本，一方面與石井柏亭及其他印刷局愛好美術的舊同僚等五人，組成西洋畫研究會小組織「紫瀾會」，並於1903年在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俱樂部舉行「紫瀾會同仁習作展覽會」，發表其向來的創作成果。另一方面，1901年適「明治美術會」解散，其中堅會員川村清雄倡組「巴會」、小山正太郎（1857-1916）等成立「太平洋畫會」，兩者分庭抗禮，欽一郎則參加「巴會」，並以畫作參展。此一時期，正逢日本水彩畫全盛時代的來臨，1901年大下藤次郎（1870-1911）出版《水彩画の栞》（水彩畫入門）一書，一年內即發行十五版；小林鍾吉、中村勝治郎、三宅克己（1874-1954）等西



▲ 石川先生教學用教材-圖畫帖  
（圖：楊孟哲先生提供）

洋畫家紛紛出版水彩畫專書；1905年欽一郎與大下藤次郎首次會面，大下乃是日本近代水彩畫普及運動的推手，先後參與創組「太平洋畫會」（1901年）、「春鳥會」（1905）等水彩畫研究團體，兩人一見如故，均有志於推廣水彩畫，遂成為至交。其後，當大下藤次郎於同年首創水彩畫專門雜誌《みづゑ》時，欽一郎亦共襄盛舉。該刊不僅是水彩畫家的同仁刊物，也是向初學者介紹各種繪畫新知的園地；欽一郎經常在該刊發表文章，例如翻譯英國水彩畫家伊司特最新的著述、介紹繪畫基本技法、個人寫生創作心得、各項展覽會評論，以及其他雜文等一百餘篇文章。1909年，欽一郎進而與丸山晚霞、鶴澤四丁、大下藤次郎合著《最新水彩畫法》一書；1912年出版《洋畫印象錄》（東京：岩田僊太郎）；1914年出版《寫生新說》（東京：日本美術學院）一書；另與白幾之助、石井柏亭、高村真夫著《洋畫講義》一書（東京：日本美術學院），其中，欽一郎撰〈風景畫の發達と構圖の變遷〉一文；1921年出版《泰西名畫家傳》第9—コンステブル（John Constable, 1776-1837）（東京：日本美術學院）一書；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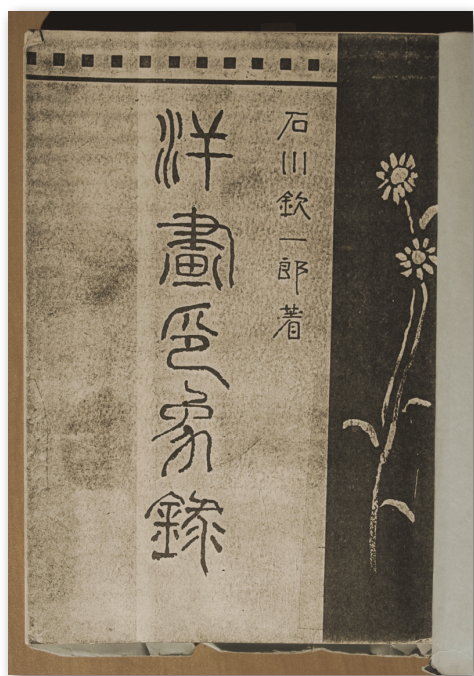
年出版《アトリエ叢書第2水繪の第一歩》  
（東京：アトリエ社）一書。

此外，值得一提的，1913年6月，欽一郎與石井柏亭、丸山晚霞、河合新藏、真野紀太郎等人發起創立「日本水彩畫會」，為近代日本第一個水彩畫家團體，並年年舉行畫展，該會對日本水彩繪畫之盛行有推波助瀾之功。欽一郎經常有作品參展，例如1916年的「滿洲」，1926年的「町中の小川」、「生蕃の女」、「川岸」、「耶穌會堂」、「朝鮮の女」、「木影」，1927年的「支那福州」、「山の男」、「田舎道」、「小さき流水」、「山の女」等均是。

由上顯示，欽一郎長期十分活躍於日本的水彩畫界，除了個人持續不斷創作新畫外，積極參與美術團體的活動，並勤於著書和撰文，介紹西洋繪畫，尤其是水彩畫的新知、技法、動態及評論。無怪乎，欽一郎與木下 太郎、森田 之助、岩村透等人被稱之為大正初年「美術介紹者」的代表人物。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欽一郎與山本芳翠、北蓮藏、東城鉦太郎、小杉未醒等西洋畫家，以及寺崎廣業、村田丹陵、久保田金僊等日本畫家，以新聞雜誌通訊員身份從軍，在戰地從事戰爭畫之創作及以繪畫報導戰爭。該年，欽一郎加入滿洲軍總司令部，隨著戰事之進展，其足跡遍歷中國東北遼陽、營口、旅順等地，在戰地完成二十多件素描，其後，於1906、1907年分別以「遼陽城土人攤販」、「滿洲風景」兩作品參加「巴會展」、「東京勸業博覽會展」。

就欽一郎的畫作觀之，1901年自歐洲返回日本後，欽一郎可說勤於創作和發表。1902年巴會成立後，每年均舉辦展覽會，迄至1909年，欽一郎每年均以作品參加「巴會展」。其間，1903年「紫瀾會同仁習作展」、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展」等，欽一郎均有作品參展。1907年起，日本文部省在上野公園之美術館年年舉行「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文展」），可說是近代日本美術史上劃時代的創舉，第一回展覽會欽一郎以「森の道」（40円）入選，第二（1908）、四（1910）、七（1913）回展覽會又分別以「小流」（百円）、「市



▲ 洋畫色象錄  
（圖：楊孟哲先生提供）

街」(百円)、「臺北の郊外」(百円)等作品入選參展。1912年春，中澤弘光、山本森之助、三宅克己、杉浦非水等人倡組「光風會」，並年年舉行畫展，其中，欽一郎於第二回展覽會(1913)，以「淡水港」(20円)、「臺北の町外れ」(20円)、「臺北城外」(20円)，第三回(1914)展覽會以「郊外」(20円)、「曇り日」(30円)、「田舎家」(30円)，第七回展覽會(1919)以「淀川の夕」(45円)、「冬の野」(40円)、「大磯の近く」(45円)，第十二回展覽會(1925)以「休憩」、「浜辺」、「沼のほとり」、「埠頭」，第十三回展覽會(1926)「支那閩江の滯船」(120円)、「福州大橋橋畔」(60円)、「福州河岸の廟」(80円)、「福州の河岸」(70円)、「支那福州蒼前山」(百円)，第十四回展覽會(1927)以「支那廈門港」(百円)、「支那廈門鼓浪嶼」(120円)、「支那廈門港泊船」(120円)、「支那廈門龍頭山」(70円)、「支那潮洲田舎」(70円)、「支那汕頭の街」(70円)、「支那潮洲韓江」(70円)，第十五回展覽會(1928)以「並木道」(250円)、「水溜り」(200円)，第十六回展覽會(1929)以「田園」(60円)、「農村」(60円)、「林間の家」(130円)、「驛路」(60円)，第十七回展覽會(1930)以「峠路」(150円)、「溪流」(150円)、「田舎の街」(120円)、「街道」(百円)等參展。

由上顯示，1902至1930的二十餘年間，欽一郎無論其身在日本，或在臺灣，



▲ 石川欽一郎繪畫作品 秋色  
 (圖：翻拍-台灣近代美術誕生 播種者石川欽一郎  
 《美術園丁倪蔣懷》一書 出處於台灣創價學會)



均積極地參與日本國內重要的畫展，幾乎一無間斷，每年均有數幅創作公開參展，尤其是1920年代後期為其創作之高峰，有時一年參展的作品即多達十餘幅，前後累計作品至少六十餘幅。其為當時日本水彩畫界活躍的畫家，殆無疑義。就其畫作題材觀之，其題材深具寫實性，反映其足跡和記錄實景，例如日俄戰爭期間，其在戰地從事戰爭畫之創作，足跡遍歷中國東北遼陽、營口、旅順等地，即完成二十多件具史畫性質的素描作品。又如當其於1907~1916、1924~1932年間前來臺灣任教時，深被臺灣美麗的自然景觀所迷，認為臺灣的風景堪稱日本第一，於是，經常到各地旅行寫生；1920年代後期，進而前往中國福州、廈門、潮州、汕頭等地旅行寫生。欽一郎將所見所感的景色透過畫筆記錄下來，例如其筆下的臺北風景是紅簷、黃壁搭配綠竹林，色彩效果強烈；翠綠的相思樹似乎搖曳在湛藍的青空下，極具飄逸之美感；空氣中的水氣有如薄絹一般，輕覆著山野，極其柔和溫雅；至於雲彩和陽光亦均展現臺灣特有之美。可以說欽一郎的作品除了具有藝術之價值外，其畫作反映歷史實景，具有影像史學研究的價值。

就畫作的價錢觀之，其早期作品大多屬於小幅的畫作，加以畫歷尚淺，因此，每幅約20~40円，有時大幅的畫作亦可達百円；迨至1920年代，欽一郎在畫壇已具有一定的聲望和地位，因此，其小幅畫作的價錢已提高為60~80円，是早期的二至三倍，至於大幅畫作則有高達250円者，顯示此一時期欽一郎的畫作已頗受畫壇及收藏家的肯定和喜愛。

## 貳 來臺任教，啟發後進

欽一郎曾兩度旅居臺灣，第一次為1907年11月至1916年8月，第二次為1924年1月至1932年4月。

1907年，欽一郎以臺灣總督府陸軍部幕僚附陸軍通譯官身分來臺。因其在畫壇已有一定的造詣和名氣，總督府當局乃特地委請其繪製有關日軍征服臺灣的重要歷史畫和原住民部落景觀圖，例如1909年3月完成長7尺寬9尺的「北白川宮殿下御奮戰圖」、7月完成「蕃界圖」等即是，前者懸掛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後者則由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呈給明治天皇。1915年12月，總督府委託其繪製油畫二幅作為總督府博物館陳列架之背景裝飾。1921年9月，儘管當時欽一郎已返回東京，準備前往歐洲旅行，但總督府土木局仍委託其擔任囑託一職，負責調查室內裝飾之事宜，為期約一年，足見總督府當局對欽一郎頗為器重。



欽一郎來臺之初，臺北中學校及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即借重其長才，趁機延攬其擔任囑託（按：約聘老師），教授圖畫課程。欽一郎利用課餘，指導中學校學生社團寫生班，另開辦西洋畫研究會「紫瀾會」。中學校學生社團寫生班在欽一郎指導下，學習寫生創作，並經常舉行作品展覽會，欽一郎則利用其在日本畫壇豐富的人脈，不時邀請日本國內有名的畫家提供作品參展，讓學生觀摩學習，例如1910年4月2~3日該寫生班與國語學校學生、紫瀾會舉行聯合作品展覽會，這次是寫生班學生作品第一次公開展出，展出作品中，計有紫瀾會員作品60幅、中學校和國語學校學生作品10餘幅，以及欽一郎作品40餘幅。同年10月8~9日該寫生班舉行第二回水彩畫展覽會，展出欽一郎作品8幅、學生作品72幅，並邀請太平洋畫會、白馬會、東京紫瀾會畫家提供作品約20餘件參展，其中，大下藤次郎、藤島英輔、石井柏亭、磯部忠一、丸山晚霞、中川八郎等名畫家均有畫作參展，觀賞者均認為此次展覽較前次出色，尤其是有二三位學生的作品表現十分卓越，當時美國領事歐康諾（オーコンノル）前往觀賞時，讚不絕口，對學生們的進步程度感到十分驚訝。不可否認的，此次展覽會之成功，實應歸功於欽一郎指導有方。至於西洋畫研究會「紫瀾會」，係於1908年2月在國語學校宿舍開辦，開放臺、日人自由參加，每



▲ 1912年台灣洋畫研究會展覽會-前排右三為石川先生（圖：楊孟哲先生提供）



▲ 石川欽一郎(左立者)在台灣繪畫研究所指導學生洪瑞麟(右一) 陳植棋(右三)等人研習情形（圖：翻拍-《台灣近代美術誕生》播種者石川欽一郎《美術園丁倪蔣懷》一書出處於台灣創價學會）



週授課一次，講授水墨、素描、水彩及油畫等課程，例如在室內使用石膏、人體模特兒教授鉛筆、炭筆之素描，以及水彩畫、油畫，或者是在戶外寫生。同年5月，該會在臺北第二小學校舉行第一次師生聯合寫生展覽會，共展出數十件寫生畫作品，可說是臺灣第一次美術團體公開發表會。其後，由於會員不斷增加，以致原來的教室空間不足，於是，先遷至欽一郎的住宅上課，暫時停收新會員，同年11月再遷至西本願寺別院，會員人數仍有一定的限制，迨至遷至位於府後街的臺北學院後，始繼續開放新會員入會，臺灣人入會者為數不少；同時，將課程改為白天到戶外寫生，夜間則以臺灣人作為模特兒，教授人像畫。1915年12月，該會為了繼續培養有志於研習西洋畫者，進而改革組織，設置研究所，每週開例會三次，課程亦從鉛筆、炭筆、水彩等繪畫技法依序講授；會員分為特別、一般及地方會員等三種，對有意入會的學生則給予特別優待。透過此一研究會，欽一郎致力於向一般大眾和學生教授西洋畫的基礎技法，尤其是該會課程一開始即安排戶外寫生，其美術教學方法可說是理論與實際並重，室內與戶外練習兼而有之。

1922年，欽一郎之子滋彥就讀中學校時的校長志保田銈吉出任臺北師範學校校長。1924年，在其力邀下，欽一郎再度前來臺北任教，擔任該校的囑託，應聘之初，月薪即高達250円，幾乎為一般囑託的兩倍。1927年，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成立時，原臺北師範學校改稱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欽一郎同時兼任兩校之囑託。此一期間，欽一郎除了在課堂上教授西洋美術之外，課餘時間先後組織學生寫生班及「芳蘭繪畫部」，芳蘭繪畫部乃是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校友會之學藝部，該校友會於1928年將繪畫活動單獨設為一個部門，命名為「芳蘭繪畫部」，辦理相關的繪畫活動。欽一郎經常帶領繪畫部學生到戶外寫生，返回學校後進而向學生講解技法，或與學生討論，此一教學作法頗能激發學生對美術的興趣，例如1930年北二師畢業的蘇秋東表示，那時他只是臺北師範學校的新生，看到寫生班學生每天出去寫生，儘管自己並非會員，但也興致勃勃地跟在別人後頭看他們作畫，因而逐漸對美術產生興趣。此外，欽一郎亦配合學校需要，接受學校的委託繪製圖畫，例如1926年臺北師範學校為了



▲ 1909年師範學校水彩畫展會場  
(圖：楊孟哲先生提供)

紀念創校三十週年，並迎接第二皇子秩父宮雍仁親王殿下視察該校，乃特地請欽一郎繪製新高山的水彩畫，由校長志保田銈吉呈送給雍仁親王。

欽一郎不僅指導學生作畫，並認為圖畫作為一般學科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觀察力、養成縝密的思慮及培養審美的趣味，因此，十分注重學生心性和人格的培養。1913年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倪蔣懷指出欽一郎非常愛護學生，盡心盡力指導，並非盲目地指導學生以畫家作為目標，學生中若有志於成為畫家者，欽一郎往往分析其天分、家庭狀態及當時的趨勢等，並提供參考意見，讓其斟酌考慮，以免耽誤學生的前途。對於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則介紹給有心的實業家，因而獲得進修資金的學生不少。同時，學生請欽一郎協助繪畫以外的事時，只要其能力所及，欽一郎總是盡力奔走，一點也不厭倦。此外，欽一郎鮮少責備學生，因此，學生們都十分佩服他的道德和修養。倪蔣懷的一生即深受欽一郎的影響，蓋1920年倪氏本來打算前往東京美術學校深造，但在欽一郎的建議下，轉而投身煤礦界，經營瑞芳金山煤礦和基隆炭礦會社，以個人的資金支持和贊助臺灣近代美術運動。就倪氏後來的發展觀之，他與其作為一名畫家，無寧作為藝術的贊助者更為適合，可見欽一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由於欽一郎的指導和鼓勵，國語學校及其後的臺北師範學校（1927年易名為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成為臺灣近代美術人才的主要搖籃。

其任教國語學校時期，畢業生倪蔣懷、陳澄波、顏水龍、張秋海、陳承藩、郭柏川、王白淵、廖繼春及李梅樹等，其任教臺北師範學校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時期，畢業生楊啟東、李澤藩、陳植祺、張萬傳、葉火城、陳日升、蘇新鎰、黃振權、李石樵、蘇秋東、洪水塗、鄭世璠及吳棟材等，畢業後或進而赴日深造，或持續作



▲ 1929年7月台灣美術研究所成立餐會-右起藍蔭鼎、陳植祺、陳瑛聲(站立者)、石川欽一郎、倪蔣懷、洪瑞麟、陳德旺(圖：翻拍-《台灣近代美術誕生》播種者石川欽一郎 美術園丁倪蔣懷一書出處於台灣創價學會)

畫，成為活躍於畫壇的畫家。隨欽一郎在臺北洋畫研究所中習畫而成為畫家者，則有陳英聲、藍蔭鼎、洪瑞麟及陳德旺等人。1920年代當臺灣美術運動勃興時，



他們紛紛籌組「七星畫壇」、「臺灣水彩畫會」、「赤島社」等美術團體，成為美術運動的中堅份子。另一方面，具有良好的美術基礎之畢業生長期在公學校任教，獻身臺灣美術教育，推動學校美術展覽會，對啟發兒童美術的興趣及普及美術教育功不可沒；同時，課餘仍持續作畫，經常有作品參加畫展，在近代臺灣畫壇亦有一席之地，其中，較著者有楊啟東、李澤藩、葉火城、蘇秋東、吳棟材、洪水塗、鄭世璠等人。

## 參 推廣西畫，促成運動

欽一郎抵臺之初，臺灣傳統的藝文圈係以傳統文人詩書畫創作及附庸風雅的媚俗娛樂活動為主。然而，欽一郎一面積極打入臺北的上層統治圈，一面深入社會致力於西洋繪畫的推廣，透過教授臺灣青年素描、水彩畫，引發臺灣社會對西洋繪畫的興趣和關心。

欽一郎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水彩畫作品，讚揚臺灣的優美風景，並介紹素描、水彩、油畫等西洋美術，例如1908年1、2月，其開始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其過去在滿洲戰地的水彩風景寫生作品，以及〈水彩畫と臺灣風光〉、〈寫生の趣味〉等文章，以充滿熱情的筆觸介紹近代美術創作水彩寫生與優美的臺灣風景。又如1926年以降，欽一郎陸續在該報發表其在臺灣各地寫生的水彩素



▲ 石川欽一郎1922年繪畫 池畔之家（圖：翻拍-《台灣近代美術誕生》播種者石川欽一郎 美術園丁倪蔣懷一書出處於台灣創價學會）



描作品，其中，大多數是臺北近郊的風景寫生畫，略作統計，至少有146幅，每幅作品均附有詩歌和簡單的說明，其簡筆淡彩頗有水墨之意趣，充分展現臺灣自然景色與農村風光。影響所及，不僅有助於一般人瞭解臺灣的「山水」之美，並有助於促進西洋繪畫在臺灣的普及。值得注意的，欽一郎亦敏銳地觀察臺北的社會文化情況，在該報刊上發表一些雅俗共賞的寫生漫畫，紀錄當時街上日本人和臺灣人的活動，例如〈人のすきずき——柳城画伯展覽會場所見〉（人各取所好——柳城画伯展覽會場所見）一圖即是，可作為研究當時社會風尚的素材。餘不備舉。1932年，欽一郎離臺返日之前，將其旅臺期間投稿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的詩畫匯集成冊，以單色印刷出版《山紫水明集》，作為紀念。

欽一郎推動舉辦美術展覽會、座談會，倡組美術團體，可說不遺餘力。1908年1月，欽一郎在臺灣總督府臺北國語學校舉行第一次個展，邀請學生及社會大眾共同欣賞，獲得各界之佳評。其後，其經常在臺舉行個人展覽，安排日本有名水彩畫家的個人展，舉辦紫瀾會寫生展覽會、中學校寫生班作品展覽、團扇畫展等。1913年2月起，欽一郎發起「番茶會」，每月定期邀請總督府官員、商人、學者、藝術家、記者等在臺日人菁英聚會，舉行輕鬆高雅的座談會，或邀請日本國內畫家來臺展覽和座談。無疑的，這些活動乃是向殖民地臺灣中上流階層宣導近代西方藝術，有助於近代臺灣美術文化活動之推廣。無怪乎，1909年《臺灣日日新報》社論讚揚欽一郎在公務之餘，致力於西洋繪畫之研究；同時，為了青年子弟，經常開辦展覽會和演講會，使不少人受到鼓舞和啟發，而向欽一郎致上最高的謝意。1927年起，欽一郎受邀前往新竹、淡水、南投等地之講習會，講授圖畫和西洋美術；1930年應邀擔任臺北J.F.A.K廣播臺舉辦的「美術鑑賞講座」，負責主講八次。

1927年欽一郎與鹽月桃甫、鄉原古統、木下靜涯等人共同向總督府當局建議舉辦「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由臺灣教育會主辦。此一展覽會乃是總督府官方唯一認可，相當於日本國內「帝國美術展覽會」的性質、具有地方性權威的美展，展覽內容分成東洋畫與西洋畫，其中，欽一郎與



▲「水彩畫會」成立大會 右三為石川欽一郎（圖：翻拍-《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一書出處於雄獅美術）

鹽月桃甫擔任臺展第一～六屆的西洋畫審查委員。臺展不僅培養許多臺灣近代優秀的畫家，並肯定臺灣新秀畫家的藝術成就，例如李石樵、李梅樹、林錦鴻、呂鐵州、陳清汾、顏水龍、劉啟祥、楊三郎等均是臺展重要的新秀畫家。要之，臺展成為第一代臺灣美術家表現的舞臺，對近代臺灣美術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在欽一郎的鼓勵和策動下，其學生先後成立「七星畫壇」、「臺灣水彩畫會」、「赤島社」、「亞細亞畫會」、「一廬會」、「臺陽美術協會」等美術團體。1924年，以倪蔣懷為首，加上陳澄波、陳英聲、陳承藩、藍蔭鼎、陳植祺、陳銀用等七人共同創組美術團體「七星畫壇」，每年均在臺北博物館舉行同仁作品聯展，該會雖然僅舉行三回畫展即告解散，惟作為第一個推動臺灣近代美術運動的團體，可說具有特殊意義。同年，另有「臺灣水彩畫會」成立，其目的旨在協助會員互相觀摩研究繪畫，會員除了欽一郎之外，有倪蔣懷、陳英聲、藍蔭鼎、李澤藩、李石樵、張萬傳、洪瑞麟等人，活動經費則由倪蔣懷一人負責，每年舉行同仁作品展覽會，並邀請「日本水彩畫會」會員提供作品參展，使臺灣的畫家有機會觀摩日本國內畫家的水彩作品，對臺灣近代西洋畫壇頗具啟發和激勵作用；該展覽會持續至1936年11月第十回畫展始告結束。1927年「七星畫壇」解散後，倪蔣懷、陳澄波、陳植祺、陳承藩等人以留日學生為主，成立美術團體「赤島社」，其存在為時雖僅六年，但每年均舉辦同仁畫展。「亞細亞畫會」亦是倪蔣懷在欽一郎的鼓勵下與日人的業餘畫家所成立的美術團體，其可說是臺灣水彩畫會的外圍團體，亦致力於推動地方美術的發展。1932年，欽一郎返回日本前夕，其學生為了感謝和紀念欽一郎多年的教導，乃以欽一郎的別號「一廬」（在畫作上提名為「欽一廬」）為名，成立「一廬會」，每年舉行畫展。此外，1934年李梅樹、陳清汾、廖繼春、顏水龍、楊三郎、陳澄波、李石樵等人共同倡組「臺陽美術協會」，其中，有不少發起人均是欽一郎的學生。由此可略窺欽一郎對臺灣美術運動影響深刻之一斑。

如前所述，1908年欽一郎曾創辦西洋畫研究會「紫瀾會」，開放臺、日人自由參加，指導會員素描和寫生，並經常舉辦作品展覽會，其教學和成果頗受肯定。為了讓社會大眾有研習美術的機會，在欽一郎的鼓勵下，1927年倪蔣懷在臺



▲ 1938年攝於日本 左為倪蔣懷右為藍蔭鼎與石川欽老師合影（圖：翻拍-《台灣近代美術誕生》播種者石川欽一郎 美術園丁倪蔣懷一書出處於台灣創價學會）

北大稻埕斥資籌辦「臺灣美術研究所」，請欽一郎、陳植祺、藍蔭鼎等人擔任研究所的指導老師，研究所分成上午、下午、夜間三班，供學生自由使用設備作畫。該研究所雖僅持續至1931年即宣告關閉，惟其顯然對西洋美術之普及有促進之功，洪瑞麟、陳德旺及張萬傳等知名的畫家均是該研究所中堅成員。

1930年11月，臺灣教育會為了紀念「天皇下賜教育勅語四十周年」，特地舉辦對臺灣教育有特殊功勞者表揚大會。欽一郎以擔任臺灣總督府中學校教務囑託前後長達14年4個月，致力於發展臺灣中等教育美術教育，尤其是盡力推廣及提升美術思想；1927年臺展成立以來擔任審查委員任勞任怨，並在學校內外提倡美育，鼓勵參展，功績卓著，而名列受表揚者的首席，可說實至名歸。

## 肆 創作不懈，死而後已

1932年欽一郎返回日本後，雖已年屆六旬，仍持續創作不懈，經常應邀以新作品參加日本國內重要的畫展。如前所述，1907年起，日本文部省開始舉辦「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文展」）；迨至1919年，文部省成立帝國美術院，並制定全國性美術展覽會規則，於是，行之有年的「文展」改名為「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1937年，文部省廢除帝國美術院，改而設立帝國藝術院，於是，「帝展」改由文部省主辦，而再更名為「文展」（又稱「新文展」）。1936年，欽一郎應邀以作品「河畔」（300円）參加文展招待展；1937年以降，其幾乎每年均獲邀提供作品參加「新文展」或文部省的特別展覽，第



▲ 石川欽一郎1922年繪畫作品 倫敦街景（圖：翻拍-《台灣近代美術誕生》播種者石川欽一郎 美術園丁倪蔣懷一書出處於台灣創價學會）

一～四回「新文展」其作品均獲「無鑑査」展出，分別為第一回（1937）「戶隱高原」（400円）、第二回（1938）「櫓路雨霽」（500円）、第三回（1939）「穗高朝晴」（650円）、第四回（1941）「奧信濃路」，而1940年則以「白馬山下の春」參加「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展」，第六回（1943）獲邀展出畫作



「梓川平野」，1944年舉行的「文部省戰時特別美術展」中，展出畫作「稔の秋」、「奧武藏野」二幅。其次，1934年，京都市舉辦「大禮記念京都美術館美術展覽會」，欽一郎獲邀提供「漁村——臺灣新竹州の海濱」（200円），而迄至1941年止，其經常在東京銀座、大阪舉行個人畫展，或與石井柏亭等畫家舉行聯合畫展。此外，1937年石井柏亭、山下新太郎、石川寅治、田邊至、御厨純一等畫家發起成立「海洋美術會」，年年在東京舉辦畫展，欽一郎自1939年起亦經常獲邀提供作品參展，例如第三回（1939）「（題不明）」、第五回（1941）「紅海より見たる埃及の一角」、第七回（1943）「昭南島の一景」、第八回（1944）「（題不明）」等。由上可見，欽一郎晚年創作更加旺盛。此時，其已是日本資深的代表性畫家，因此，其作品經常以「無鑑査」或「招待」的資格參展。無疑的，欽一郎在當時日本水彩畫界的成就已普獲肯定，並有崇高的地位。其能勤勉不懈，持續創作，執著的專業精神，實令人感佩。1945年9月10日欽一郎去世，享年75歲。

綜觀欽一郎的一生，其終身致力於繪畫創作，以及近代西洋美術，尤其是水彩畫之推廣。作為一個畫家，其無論身處日本國內或前往臺灣、福建等地，均善用其畫筆，將其所見所感生動地呈現；其自年輕時即參加各種畫展，或倡組或參與美術團體，並成為當時日本活躍且具代表性的畫家。作為一名美術教育者，其不僅盡心盡力從事學校美術教育，並利用課餘向社會大眾傳授西洋繪畫知識和技法，鼓勵學生籌組美術團體，展開近代臺灣美術運動，其結果，不僅引進近代西洋美術知識、技法和觀念，啟發社會大眾認識臺灣之美，推廣近代西洋美學和文化風尚，並培育許多第一代臺灣人西洋畫家，對臺灣近代美術的發展影響深遠，自不待言。無怪乎，戰後受其教誨和影響的畫家李石樵讚揚欽一郎乃是「臺灣美術界的恩人」，指出欽一郎係向世界介紹臺灣農村之美的第一人，稱揚其人格高潔、生活態度充滿慈愛，使得學生乃至一般民眾對之敬佩有加，而直稱其是「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教育者」。總之，謂欽一郎是臺灣近代西洋美術教育啟蒙者、近代臺灣美術運動的導師，似洵不為過。

## 參考文獻：

- 山本良一編（1981）。臺灣への架け橋。大阪：蓬萊會關西支部。
- 王白淵（1955）。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文物3：4。
- 太田博太郎、山根有三、河北倫明監修（1999）。原色図典 日本美術史年表。東京：集英社。
-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集部編（2000）。人物レファレンス事典——明治・大正・昭和（戦前）編。東京：日外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
- 多木浩二、藤枝晃雄（2007）。日本近現代美術事典。東京：東京書局株式會社。
- 吳文星（1983）。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8)。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 李欽賢（1992）。臺灣美術歷程。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岩瀨行雄、油井一人編（1997）。20世紀物故洋画家事典。東京：株式會社美術年鑑社。
-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2002）。大正期美術展覽會出品目錄。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2006）。昭和期美術展覽會出品目錄(戦前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 浦崎永錫（1974）。日本近代美術發達史(明治篇)。東京：東京美術。
- 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記念祝賀會（1926）。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記念誌。臺北市：芝原仙雄。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 謝里法（1978）。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市：藝術家。
- 顏娟英（2001）。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臺北市：雄獅。
- 顏娟英（2005）。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臺北市：雄獅。
- 顏娟英編著（1998）。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市：雄獅。



# 趙連芳

1894  
~1968

農業教育的實踐者

國史館協修 歐素瑛 撰文



 家世與求學

趙連芳，號蘭屏，1894年4月2日生於河南省羅山縣，世代書香，半耕半讀傳家。祖父鼎彝公，於家鄉設帳課徒，就讀者眾，趙連芳八歲時，亦隨父親鴻文公、叔父天佐等開始讀五經。父親且耕且讀，捐監生，嘗應鄉試考舉人，未中式，伯叔亦然。1907年，趙連芳十四歲時，考入羅山縣立高等小學校，每逢老師講述史地，談論甲午戰爭後，朝政不綱，至庚子賠款，尤耗民脂民膏，頗感憤憤不平，遂加入同盟會。小學四年級時，毅然剪去髮辮，以示革新。迨至武昌起義，油然而生投筆從戎、置身革命之念，於是瞞著家人，偕同盟會友羅勤修等投奔武漢，頗蒙江西都督李烈鈞嘉許，遂參加革命軍。繼入江西援鄂護衛軍，歷任下士、中士、上士。後選入江西陸軍講武學堂軍士班，梯升將校班。甫畢業，任長江總司令部少校參謀，參加二次革命，轉戰九江、湖口、吳城、南昌、臨川一帶。是役失敗後，即偃武修文，重回學校，先後畢業於武昌私立英算專科學校、武昌博文書院。

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因文科學長陳獨秀不允其改入理科，憤而投考清華學堂。1918年夏，考入北平清華學堂理科。翌年，五四運動起，北平八大學學生反對巴黎和會決定，群情激憤，圍攻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宅，趙連芳亦率領「清華義勇軍」參加攻城。在清華學堂求學期間，曾發起組織「農社」、「世界語學會」，集合有志於農學者，為將來留美深造作準備。1921年夏，臨畢業時，適值學生運動又起，北平八大學均罷課，趙連芳等因拒絕參加畢業考試而遭到退學處分，經向外交部陳情後，特增辦大學班，留讀至下一年通過考試後，始於1922年6月畢業。

1922年7月，以公費赴美，入愛荷華州立農學院（Iowa State College）攻讀作物學和土壤學。兩年後，1924年6月，以〈美國農業教育試驗與推廣配合論〉獲學士學位。同年夏，入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研究院，專攻遺傳學和育種學，1925年6月獲碩士學位，並獲校方同意，免繳論文。又兩年，1927年6月，以〈水稻連鎖遺傳研究〉之論文，獲哲學博士學位，並將論文摘要改寫為短文二、三篇，發表於美國遺傳學雜誌《Genetics》，大受國際學術界之讚譽，以水稻遺傳研究蜚聲學術界。

1927年夏，又入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研究，與沈宗瀚為同



學，主要研究細胞學，並參觀美國各大學、農業試驗場、推廣部等，對於美國之農業設施，考察極為周詳。1928年3月，離美赴歐洲，歷遊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及德國、俄國等國，一一考察各國農業情形，尤重於農業試驗機關之業務、狀況及有關生物科學之研究場所，藉供改進中國農林事業之參考。同年秋，經西伯利亞返回中國，抵東北時，又參觀日人所經營之農林事業，頗為日本人員所扼。惟此行對歐美各國之農業和農政，已有相當程度之了解。

## 貳 致力中國農林技術行政

1928年7月返國後，趙連芳最先接受河南省政府委令，調查輝縣百泉農事試驗場，策劃發展計畫。8月，河南中山大學聘為農科教授，兼農事試驗場主任。同月，經沈宗瀚介紹，任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農藝系副教授，講授作物學、農藝學。其教材豐富新穎，講解條理分明，口若懸河，聲若洪鐘，教學極為認真，甚受學生歡迎。未幾，又赴廣西，任農務局農藝部主任兼技師，主持廣西稻作改良事宜，奠定稻作育種基礎。1929年秋，應國立中央大學之聘，任農學院教授兼技師，又兼農藝墾植科主任，主要講授稻作學、育種學、細胞學及生物統計學等課程，前後約六年時間。其授課，一本研究所得，材料豐富、條理分明，且治學謹嚴、誨人不倦，務期於研究試驗工作中培養實際服務人才，故中央大學農學院學生咸敬而畏之，「趙老虎」之名不逕而走，流風所及，國內學農者，莫不尊崇。同時，趙連芳亦接受美國庚款會之託，主持稻、麥、棉改良試驗，親自從事水稻遺傳與育種之研究。之後，並將有關水稻育種之田間技術成果，著為〈水稻育



▲ 趙連芳先生與湯文通合編作物學上冊及下冊  
(圖：攝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圖書館)

種之田間技術〉、〈水稻育種之理論與實施〉、〈水稻成熟期之研究〉、〈水稻育種〉、〈水稻育種之田間技術〉等文，均為精心研究之作，為全國稻作育種場所仿行，對於水稻育種猶在啟蒙階段的中國農業界，實乃奠定中國作物育種及品種改良之科學的基礎。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北，中日戰爭一觸即發，中國為積極準備對日抗戰，乃竭力推動經濟建設，藉事充實物力。1934年1月，趙連芳出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處長，為其從事農林技術行政之始。該會組織甚為龐大，下設水利、公路、衛生及農業等處，委員達七、八十人。其中，農業處主要業務為東南各省之茶業發展、西北畜牧事業之擴展，以及皖、贛、湘、鄂四省農村合作事業。然而，民國以來，政治紛擾不安，農業建設極為落後，是故，趙連芳乃本其研究和國內外考察所得，悉心擘劃，以求改進。在職二年半期間，分赴東南、華北及西北各地考察農業設施，足跡幾遍全國。同時，就各省自然環境和國家需要，釐訂各項農業建設計畫，從事大量改進生產，除協助棉產改進、蠶絲改良外，並提倡西北羊毛增產、東南茶業改良，以及農業產銷等研究推廣工作，均獲致極大成效。此外，復創辦江西農村服務區、陝西農林合作局及安徽茶葉產銷合作社等項，對農村經濟之復興，貢獻殊多。

同時，鑑於日本侵華日亟，國民政府為充實戰力，竭力爭取時間，從事糧食增產建設，乃於1936年春設立全國稻麥改進所，下設稻作組、麥作組，並調趙連芳任監理處長，主持稻作組，推動米糧增產、自給工作。當時全國缺糧省份以廣東、廣西及浙江最為嚴重，於是乃以廣東作為推動增產之首站，親赴廣東考察各地改良稻作情形，並決定與中山大學合作，以其稻作試驗場培訓人才。接著，應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由粵入閩，考察週餘，以閩省部分縣份已設有農業試驗場，且設有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惟尚乏一全省性之機構加以統籌，由是建議成立福建省農業改進處以總其成，並對往後之糧食增產工作提出具體建議，陳儀皆予以接納，旋即付諸實行。嗣後，又以湖南、四川為中心，將全省分為若干個小區域，利用現有農業試驗場人才，積極推動稻米增產事宜，皆取得良好的成果。

1937年，實業部成立全國稻米檢驗監理處，任命趙連芳兼任處長。除主持各項稻作育種試驗外，亦舉辦稻米檢驗人員訓練班、籌劃稻米分級制度，以及舉辦全國著名稻種比賽，以為擇優推廣之先聲。其次，創辦地方稻種檢定與純化平行法，逐漸推行至皖、贛、湘、川、桂、滇等省，復創辦安徽、江西、湖南各省稻米檢驗所。此外，又輔助地方政府設立稻米及農業改進機構，如江西省農業院、



福建省農業改進處、湘米改進委員會，以及四川省稻麥改進所等機關，均係趙連芳倡議協助所設立者，對於軍精民糧之供應，物價經濟之穩定，貢獻極大。

## 參 擘劃戰後農業復員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國民政府為長期抗爭，乃於1938年春西遷重慶，全國稻麥改進所併入經濟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趙連芳改任該所簡任技正，兼技術主任、稻作系主任及四川工作站主任，復兼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統籌全省農業機構事業之全盤改進工作。趙連芳自任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起，即根據四川省之農業環境、配合抗戰建國需要，釐定農業建設四大方針：(一)增產糧棉生產，充裕軍精。(二)改進外銷農產，爭取外匯。(三)改進農村副業，穩定經濟。(四)培養復興資源，供應建國需要。在五年任期中，趙連芳即根據此方針，精心擘劃，盡力實施，軍精民糧乃得供應，尤以棉種、麥種、稻種及蠶種之改良，以及牲畜疫病防治、病蟲防治及川南區雙季稻之推廣等，最為農民所感戴，故委員長蔣中正以其「辦理四川農業，成績甚優」，傳令嘉獎。抗戰勝利後，政府為獎勵有功，於1945年10月10日特授與趙連芳「勝利勳章」。

1943年初，趙連芳奉調回農林部工作，任該部業務工作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旋奉國民政府派赴美國任出席聯合國糧食及農業會議代表，以財政部常務次長郭秉文為首席代表。在大會中，趙連芳曾草擬「戰後中國農業建設備忘錄」，文中闡述中國農業對世界和平和經濟貿易之重要性，甚為各國代表所重視。會後，復遍遊美國二十一州之農業，考察其農林漁牧之研究機構和經濟設施，至為詳盡，並將參加會議之心得，撰述為〈世界糧食農業會議與中國農業建設〉一文，對於戰後中國農業生產政策之釐訂、農業資源利用之改進、農林生產效率之提高，以及國際農業生產與消費之協訂等，均有極為精闢的建議。返國後，就實地觀察之結果，編著〈美國農業改進之機構與功能〉、〈美國農村建設概觀〉、〈美國農業資源之保持〉、〈美國集體租佃制度〉、〈美國戰時農產之動態〉及〈美國農會組織之工作〉等文，以為農業建設者之參考。

1944年，趙連芳奉命任農林部參事，主持全國農林設計考核及農業善後復員事宜。是年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代表來華研討戰後善後救濟事宜，趙連芳被選為行政院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農業復員專門委員會主席委員，當即確定基本原則，認定戰後農業復員期間之中心工作，除採取資源保持政策，避免各



區之牲畜、林木、土壤繼續濫砍、濫伐、沖刷外，首須補充戰時損失，恢復生產能力，故應集中力量於少數核心工作。第一，應力謀食糧（包括穀類蔬菜與漁牧等）生產之合理自給；第二，應力謀衣被原料（包括棉花絲麻等）生產之適當恢復；第三，應謀外銷農產之增進，以期換取外匯及外國物資；第四，應救濟農家副業，以期恢復農村經濟，俾農民得以自力更生，並藉以奠定戰後農村工業之基礎。該項政策，立謀精深，深得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稱譽，亦獲中外各國代表所接受，旋即草擬漁業復員、種子供應、肥料供應、牲畜供應、獸疫防治、植物病蟲害防治、農具及機械、農村副業、黃泛區復員等專業計畫，幾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全部接受。嗣後，農林部設置農業復員委員會，趙連芳獲聘為兼副主任委員，為配合國外物資供應和利用計，復竭半年之力，草擬戰後農業復員之全部計畫方案，凡十萬言。

## 肆 主持台灣農林重建

1943年底開羅會議之後，台灣的收復已可預期，國民政府為求順利接收，立即展開接管計畫之擬定與接收人員之培訓，於1944年4月，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下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以陳儀為主任委員，隨後又在重慶開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趙連芳任農林漁牧組主任導師，訓練收復台灣行政人員。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在台五十一年之殖民統治，國民政府旋於9月1日於重慶成立特殊化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台灣之接收與重建事宜，趙連芳奉派為農林部台灣區特派員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處長，並兼台灣農林公司董事長及台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及糖業公司董事，凡一年有半，擘劃戰後台灣農林事業之重建事宜。

1945年10月，趙連芳率同農林專家15人隨軍艦抵台視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設民政、財政、警務、交通、農林、工礦、秘書及教育等處。其中，農林處下設農務、耕地、水產三科及技術等室，辦理有關農林行政、公私企業機構、試驗研究機構之接收管理，以及策劃農業復員生產事宜。然而，台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遭受嚴重破壞，戰後初期農產銳減、百廢待舉，於是農林處一方面接收並改組日治時期所遺留之農林機構，重新建立農政制度，包括將總督府農商局耕地課改組擴大為台灣農田水利局；將糧食部及其所屬糧食事務所改組為糧食局等。另一方面，確立農業政策，恢復及增進農業生產，以及發展外銷特產等，藉



以改進人民生活。

經過一年餘的努力，成效頗為顯著。尤以蔗糖復興、米穀增產、漁業恢復、茶葉振興及水利復舊等五項最為重要。其中，甘蔗為台灣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戰時遭到嚴重破壞，亟待恢復，於是農林處乃二度邀集各縣市農林水產科長、蔗農及糖業公司代表等召開蔗糖復興會，由行政長官陳儀出席大會，宣布收蔗價格政策，蔗農之心理始趨安定，蔗園面積、單位產量與年俱增，台灣農業始逐漸奠立復員基礎。而米穀增產、漁業恢復、茶葉振興及水利復舊等項。



▲ 高粱聯合收穫機田間收穫示範  
(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提供)

1947年2月，台灣因查緝私煙事件而爆發二二八事件，台北市參議會為反應民意，乃邀集國大代表、省參議員、人民團體，以及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學生代表等共同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後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獲行政長官陳儀同意。3月1日，陳儀派民政處長周一鶚、農林處長趙連芳、工礦處長包可永、交通處長任顯群及警務處長胡福相等5人為官方代表，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3日，處委會召開改組後第一次大會，因陳儀已電請國民政府調派軍隊來台，公署官員不再出席。7日，處委會發表處理大綱四十二條，但陳儀知援軍將至而拒絕接受。8日，處委會代表至長官公署謝罪，不再提任何要求，然而軍事行動已如箭在弦上。9日，國府軍隊整編二十一師抵台，立即展開緝捕行動，行政長官公署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捕、被害或失蹤之知識分子、學生為數不少。同年5月16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陳儀去職，趙連芳亦隨之離職，重返農林部工作。

1947年7月，趙連芳轉任農林部技監，兼糧食增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策劃全國糧食增產技術事宜，並起草糧食增產計畫綱要。該計畫係由中央省方和地方機構共同擬訂，將全國分為八大增產供應區，以供應人口稠密及都市所在區域之缺糧區。其內容分為增產區域、增產對象、增產方法、增產數量、經費預算及計畫實施等六大項，預計自1948年起，第一年增產糧食八百萬擔，第五年增產

五千七百萬擔。首年經費需一千三百億元，由農林部特設技術委員會主持之。

## ⑤ 擔任立法委員，制定農林法規

1947年12月，中華民國憲法頒布，青年黨人入閣，左舜生任農林部長，力邀趙連芳任技監，指導戰後農業重建工作。1948年，趙連芳獲農業界人士之推薦為中區農會立法委員候選人，膺選為立法委員，5月辭去農林部技監職務，改聘為農林部高級顧問，並自同月起，就任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期間，仍繼續設計和推動農林事業，一面在立法院農林水利委員會審核各種農林水利農會及墾殖方案，一面協助農林部往平、津一帶指導各農業機構，一面前往滬、杭一帶參加各項農林建設會議。12月，攜眷來台，定居後，再返回南京。

1949年春，因國共戰局逆轉，其見政治變化靡常，遂決定赴台講學，在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和農學院長陳振鐸的力邀下，於同年5月任該校農學院教授兼農藝系主任，講授稻作學。同年年底，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立法院重行集會後，乃改任台灣大學兼任教授，講授「農業概論」、「專題討論」兩課，作育後學。其中，「農業概論」一課為農學院一年級生的共同必修課，上課學生逾百人，乃借用當時台大右側之新建大型教室授課。每諄諄囑咐兩事，一為務必注意聽講，不許左顧右盼或竊竊私語；二為務必作筆記。由於趙連芳聲音宏亮，授課內容充實，故教室雖大，學生雖眾，而秩序井然。在主持「專題討論」課時，最初總是仔細聆聽學生報告，繼而鼓勵其他同學發言，最後才提出他個人的意見，扼要而中肯，使學生們衷心折服。期間，因支領立法委員薪資後，即停支台大薪俸，連鐘點費亦分文不取。1954年因公私事務繁忙，實在無法分身，乃不再開課，惟因其積存之鐘點費已為數不少，乃悉數購買圖書捐贈農藝系圖書室，留作永久紀念。

1950年代，政府為發展經濟，乃於1951年推動土地改革政策，先後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領政策，並擬出售公營事業機構及資產，作為補償地主地價之用，台灣肥料公司亦在擬出售之列，惟趙連芳鑑於肥料乃農業生產重要資材，關係農產成本甚鉅，為求廉價供應農民生產需要，提高農家收入，應以公營為最適當，乃在立法院代表農民反對將台灣肥料公司出售民營，政府尊重民意，台灣肥料公司方得保留公營至今。同年7月，趙連芳曾領導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農村復興工作考察團至各地考察，自屏東開始，沿西海岸北上，以迄於北



部各縣市。該項考察範圍甚為廣泛，舉凡農業生產、水利工程、鄉村衛生、土地改革、森林、畜牧、農會組織、水產漁業、漁港設施，以及美援物資分配暨與農業相關之各地工廠設施等，均為考察對象，共計考察六十八個單位，並將考察所得編成專文報告。該項報告不但為立法院之重要紀錄，亦為農村復興委員會推動農業施政之重要參考。之後，農村復興委員會特設宴招待上述農村復興工作考察團全體團員，對其所提建議各點均表示接受，並致謝意。

在擔任立法委員、兼任台大教職之外，1953年1月趙連芳編著之《現代農業》一書由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出版，分上、中、下三卷，全書計十四章，彙集近代農業技術之發明，闡明現代農業發展之趨勢等，立論精闢，內容豐富，為士林所推崇。同時，亦特別協助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審查農民運動指導方案、協助農會改進、幹部訓練等工作。1954年，鑑於台灣林政積弊頗深，政府和社會各界皆思改革，曾親自參加立法院林產問題研究小組，並率領經濟委員會林政考察團考察台灣東部有關縣市林政問題，了解各地國有林經營得失，以謀改進。

1964年12月，中華農學會暨各農業專門學會舉行聯合年會，趙連芳提議研擬農業基本法草案，送請行政院採擇施行，以期加速農業發展。經該會同意後，乃於1965年4月組織「中華民國農業法草案研擬委員會」，公推趙連芳主其事，分設農業、特產、林業、漁業、畜牧獸醫、糧食營養、農民組織、農業經濟、農業教育、農業推廣等十個專業小組，參與研擬工作之專家學者計有八十餘人，經一年時間，終於完成「農業基本法草案」，計十一章四十二條。經提交同年12月的中華農學會暨各農業專門學會聯合年會討論，全體一致同意將各會員意見列入紀錄，並委請中華農學會理事會再予研擬修正，然後送請政府完成立法程序。繼於1966年3月，由中華農學會暨各農業專門學會將該項法案呈行政院暨經濟部。之後，中華林學會、中國農業推廣學會、中華水土保持學會等，先後接受經濟部之委託，分別研擬「森林法修正草案」、「農業推廣法草案」、「水土保持法草案」等，於1966、1967、1968年完成，由主管及相關部會研究中。農業學術團體研擬農林法案，趙連芳首倡之功，實不可或忘。

## 陸 參與農業援外工作

1955年9月，趙連芳受聘為聯合國糧農組織農務官員，兼稻作生產專家。在技術援助方案下，派為伊拉克王國農業顧問，於同年10月由羅馬出發抵伊拉克首



都巴格達，指導協助水稻改良、改良品種及訓練人才等，前後歷時三載。伊拉克位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的大平原，東鄰伊朗，左毗敘利亞、約旦，右接土耳其，南臨波斯灣，為中東國家之中心，土地面積約444,442平方公里，主要糧食除大麥、小麥外，稻米居第三位，但因技術落後，產量不高，亟待增產。經過一番調查設計後，乃於伊京巴格達南郊設置示範稻田，面積約四十餘公頃，指導三十餘名伊國大專農校出身之技術人員，共同工作。公餘之暇，亦曾赴中東各國訪問，如土耳其、伊朗、約旦、黎巴嫩、埃及等國，並協助約旦王國設計稻作改良事宜，深受國際人士敬重，為台灣以農業技術援外之嚆矢。

1958年7月，結束伊國稻作改良顧問工作，於10月返台，旋獲聘為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台糖公司糖業試驗所評議委員及教育部大專畢業自費留學考試委員、台灣省農會設計委員會委員等。1959年6月，趙連芳轉任經濟訪問團團長，以寮國經濟考察團團長身分率團飛往寮國考察，以促進中、寮兩國友好關係、加強經濟合作及貿易發展。期間，趙連芳曾赴寮國農林部、財政經濟部、計畫部等部會訪問，聽取技術官員說明寮國一般農業情形，並赴各地參觀園藝試驗所、農業試驗所、咖啡苗圃、鳳梨果園等，最後則提出具體建議，包括加強農田灌溉排水措施、實施作物病蟲防治、改良農用機具、保持並增進土壤生產力，以及強化牲畜和家禽瘟疫防治等，極具成效。同年8月，寮國政府即派遣官方代表團來台，繼續洽商友好合作之具體措施，惟因寮國局勢不穩，以致協議事項無法一一實施，甚為可惜。

1960年秋，政府鑑於世界局勢之演變，為促進國民外交、研究海外發展之必要，特組織「中南美農業技術友好訪問團」，由趙連芳任團長，團員有湯惠蓀、劉淦芝、沈百先、顧元亮及郁英彪等人，於是年11月初，依次訪問中南美洲之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秘魯、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及巴西等八國。此行任務為加強國際關係、交換技術知



▲ 報紙報導-趙連芳博士參予迎接寮訪華團抵臺  
(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 報紙報導-趙連芳博士協助多明尼加改良稻作獲得讚揚(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識、促進民間瞭解，以及拓展貿易的可能性等。由於拉丁美洲地廣人稀，尚未脫離農村社會狀態，但因國民教育低落、生產技術落後等因素，以致農業發展緩慢，糧食生產趕不上人口增加之速度，國民所需之基本糧食尚賴輸入，亟應發展農業，致力糧食增產。經我駐美大使館偕同美國國務院及國際合作總署特約舉辦三次座談會，由我團員報告訪問觀感，繼由雙方參加人員交換意見，收穫甚豐。

1962年5月，復應中美洲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之聘任為農業顧問，主持稻米增產改良事宜，並籌劃中、多農業技術援助，派遣國內技術團前往協助，指導改進農業生產，前後歷時兩載。由於多國缺乏試驗研究基礎和技術人員，需要組織農民及鼓勵生產之措施，於是乃建議成立「發展稻米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之對等計畫，包括由台灣選派稻

作改良有關技術人才來多國、補助改良種子及農機具等，經提交中、多、美三方獲得同意後，於同年11月正式簽訂「中多兩國技術合作協定」及所附「有關農業技術合作換文」，其重要任務在改良稻種、栽培技術暨應用其他必需之科學方法等，以增進多國稻米生產。不過，因當地缺乏訓練有素之工作人員，以致預定計畫未能完全配合進行，而其他困難亦多，但稻作生產已有顯著進步，為該國奠定稻作改良的基礎。多國政府為感戴其助績，曾擬於1968年5月授與大十字最高勳章，詎料其竟先期溘逝，讓多國農業界人士悼念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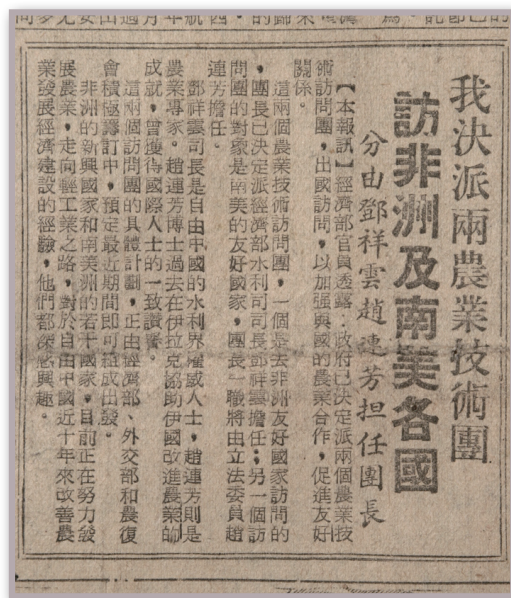


## 推動農業研究計畫

1955年，趙連芳獲中華農學會等學術團體之推薦，獲得教育部中華學術獎。1958年4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59年2月，台灣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由中央研究院評議員、教育部長及相關主管組成，以中央研究院院長為主席，教育部部長為副主席，全體委員會為該會最高機構，每年2月及8月各開會一次。2月1日，第一次成立大會中，提案聘請楊樹人為執行秘書，推舉王世杰、錢思亮、李濟等人為執行委員。同時，為執行學術任務，又設置數理科學、生物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個專門委員會，其中，生物科學組之召集人即為李先聞和趙連芳兩人，負責推動暨審查各項農林事業研究發展計畫。1960年，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1961年9月，台灣舉行保護牲畜宣傳週，趙連芳因係中華民國牲畜保護協會理事長，乃於中央廣播電台發表廣播，主張應普及國民愛護動物及牲畜之社會運動，包括改善公民讀本、加強大眾科學教育、擴充各縣市牲畜保護支會等，再配合農業學校、農會、四健會及其他基層推廣工作，以期普及愛護動物之宣傳教育。同年12月，台灣省農業教育學會在台中舉行年會，趙連芳應邀作專題演講「中華民國農業與農業教育的新境界」，指出農業教育應與時推移，以求日新月異的發展。當前農業教育應積極訓練技術人才、著重新農業師資訓練，以及利用農業技術協助爭取友邦同情，促使經濟、文化交流，並藉以滿足青年海外移墾的宏願。

1965年3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學術年會，趙連芳復應邀作學術演講，其指出今後農業發展的中心工作有五，一是鞏固台灣糧食增產，改善農民生活；二是發展農產外銷，增加外匯收入；三是充分供應工業原料，擴大農產加工企業；四是加強國際農業合作，促進外交、經濟、文化關係；五是積極培植光復後農業復興的資源，尤應特別注重「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以達成「重建大



▲ 報紙報導-趙連芳博士帶領農業技術團隊訪非洲及南美各國 (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陸，復興農村」的目標。同年9月，趙連芳應中興大學之聘為兼任教授，講授農業概論。10月，中國文化學院聘為名譽教授，並為高級班農學門「高級育種學」研究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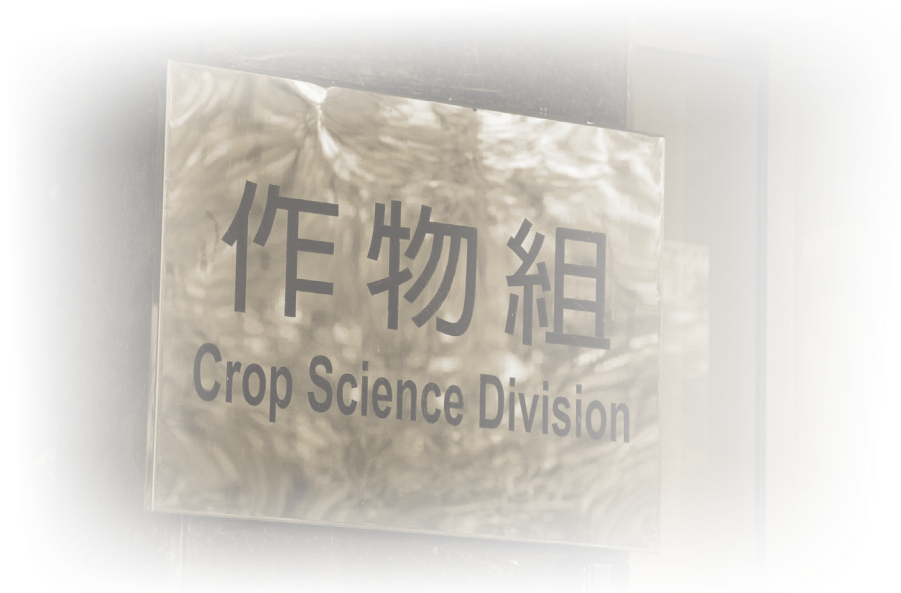
1966年12月，中華農學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暨各農業專門學會聯合年會，總統蔣中正特指示研究「光復大陸後農業建設實施方案」，提供政府採行，當於1967年4月成立光復大陸後農業建設實施方案研擬委員會，推舉趙連芳為主任委員，毛離為副主任委員，先後研擬「畜牧獸醫實施方案」、「漁業實施方案」、「農業教育實施方案」、「蠶絲發展方案」、「植物保護建設大綱」、「農民組織重建方案」、「園藝建設方案」、「農經實施方案」等，至1968年4月業已完成大半。同年5月初，趙連芳至高雄市海港考察漁業，偶感不適，即赴省立高雄醫院診治，詎以心臟病突發，於同月7日病逝於省立高雄醫院，享年75歲。總統府特頒贈「績學揚芬」輓匾，多明尼加共和國駐華大使魏維諾氏亦代表多國政府頒贈「大十字最高勳章」，以酬報其勞績。

趙連芳性情剛直，治學謹嚴，平日生活儉樸，教研不倦，向為世人所景仰。民國以來，中國農業落後，民生困苦，其諄諄而道，孜孜不倦，於授課之餘兼理技術研究，一面培植人才，誘掖後進，一面實地進行稻作育種工作，奠定中國有關稻作研究基礎。接著，投身農業行政工作，擘劃戰後農業復員事宜，研擬農林事業相關法規，促使農業不斷進步，實功不可沒。之後，投入國際農業援助事宜，協助落後國家推動糧食增產工作，為世界人類的生存發展，貢獻心力，厥為「農業教育的實踐者」。



### 參考文獻：

- 章子惠（1947）。台灣時人誌，第一集。台北市：國光出版社(1947年3月)。
- 趙張肖松著（1970）。趙連芳博士回憶錄——一個奮鬥的人生。台北市：編者。
- 趙先生論文選集編輯委員會編（1954）。趙連芳先生論文選集。台北市：台灣省政府印刷廠(1954年4月)。
- 趙永洺（1996）。趙連芳先生傳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5輯。台北市：國史館。頁592-597。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作物組  
（圖：攝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 蔣復璁

1898  
~1990

圖書館與博物館教育的推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名譽教授 王振鵠 撰文



蔣復璁先生（1898-1990），字美如，號慰堂，浙江海寧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赴德留學，研習圖書館學。返國後奉派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民國29年（1940）任首任館長。先生服務中圖32年，勞勞不息，猶如一日。抗戰期間潛赴淪陷區蒐購善本古籍，以充實館藏；修訂出版法，以徵集全國圖書文獻；並輯印四庫珍籍，以宣揚中華文化。對館務規劃推動，貢獻良多。

民國54年（1965），先生奉派故宮博物院院長，歷時17年餘，於民國72年（1983）退休。任內對院廈之擴建、組織之修訂、以及文物之整理展覽，屢創新制，蜚聲國際，使故宮躋身於世界一流博物館之列。先生篤信天主，潛心宋史研究，因其在學術文化方面之卓越成就，迭獲國內外學術與文化界之表彰，譽為臺灣圖書館及博物館事業之奠基者。

## 生平

蔣復璁先生，字美如，號慰堂，浙江海寧人。清光緒24年（1898）11月12日（農曆9月29日）出生於海寧縣硤石鎮，民國79年（1990）9月21日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92歲。

慰堂先生先世經商，家素殷實。曾祖光照公喜儲古籍，精於校勘，家藏圖書甲於浙右，曾就所藏珍籍五十餘種輯刻為《別下齋叢書》，世稱善本，學者珍之。前清道咸間有海寧蔣氏為東南藏書家之譽。先生日後致力於圖書博物館事業，可謂淵源有自。

先生幼時體弱多病，七歲始入私塾就讀，十二歲負笈杭州，入錢塘縣立高等小學，十六歲考入青島特別高等專科學校。民國3年（1914）8月歐戰爆發，專校停辦，轉入天津德華中學。民國6年（1917）以同等學歷考取北京大學文預科德文班，兩年後升入大學本科哲學系，民國13年（1924）畢業。

民國9年（1920）冬，梁啟超先生自歐購回大批圖書，與先生令叔蔣百里先生興辦讀書俱樂部，慰堂承命協編德文圖書，是與圖書館發生淵源之始。民國11

年（1922）讀書俱樂部改組為松坡圖書館，聘為兼任編輯，掌管圖書採編及閱覽業務。並參加北京圖書館協會，推為協會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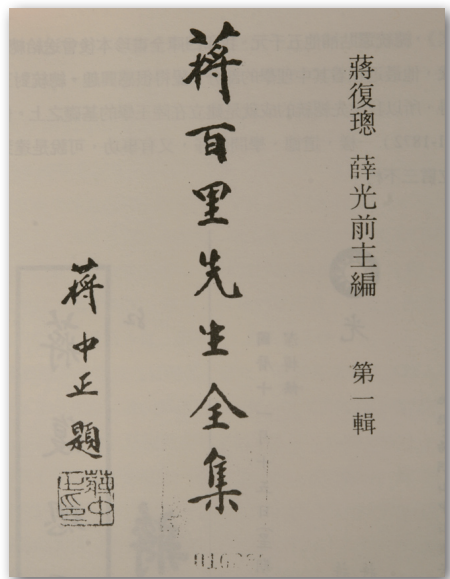
民國15年（1926），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建立北京圖書館，聘請梁啟超先生為館長，袁同禮先生為圖書部主任，慰堂先生聘為幹事，編纂兼中文編目組組長。在職期間研讀歷代公私簿錄，有志於中國圖書分類之改革。認為四部分類現不適用，而西洋分類於中文典籍亦不盡合宜，擬將中文圖書按類集中編為集目，再詳細分析，釐訂分類表，各類採類名及屬目名稱首字作為類名標誌，同類著作則依著作時代先後排次。其主張曾發表於圖書館學會季刊。

民國19年（1930），浙江省政府擬建省立圖書館，慰堂先生經朱家驊及陳布雷兩先生推薦，獲浙江省政府選派，赴德國研習圖書館管理。是年8月抵達柏林，先於普魯士邦立圖書館以客座館員身分在東方部及參考諮詢處見習，嗣獲洪博基金會獎助在柏林大學哲學系研修。兩年後見習結束，轉入德國學術協進社交換處工作，並於柏林大學與普魯士邦立圖書館合辦之圖書館學院研習，民國21年（1932）7月卒業後，赴英法等國參觀圖書館設施，歷時月餘，於同年11月返國，任國立編譯館編審。

民國22年（1933）元月，國民政府擬在首都創設中央圖書館，先生適學成返國，教育部遂派為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委員。3月間，籌備處組織大綱通過，復派為籌備處主任。是年4月21日租定南京沙塘園7號為館址開始辦公，並以該日為中央圖書館館慶日。

中央圖書館之籌設，早在民國元年（1912）蔡元培先生出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際即有此議，並在臨時政府公報中刊登廣告收購古籍，預為儲集館藏圖書。惜時局多變，籌辦之議，未能實現。

民國16年（1927），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翌年大學院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會中王雲五先生等提案在京籌辦中央圖書館以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之庫藏，並為其他地方圖書館之示範。提案建議中央圖書館建築設備費定為一百萬元，另由政府核撥二五庫券及其他的款二百萬元作為基金，以其利息作為常年購書費及行



▲ 蔣中正為《蔣百里先生全集》封面題字  
（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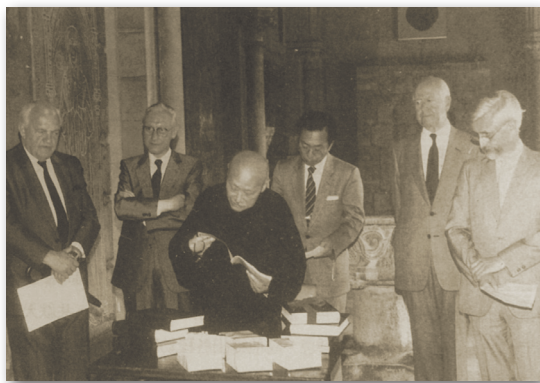
政費。有關館藏之收集，建議採出版品呈繳、國際交換及搜購徵存等方式為之。至於圖書館組織則在館長、副館長之下，設圖書、研究及出版三部。以上建議，經大會通過呈請政府辦理。

民國18年（1929），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南京金陵大學召開第一次年會，會中蔣一前先生等再度提案，促請政府從速籌辦中央圖書館。惟以當時百端待舉，直至四年後始行實現。

中央圖書館籌創之初，教育部撥交遜清學、禮兩部圖書檔案四萬六千餘冊，及國學書局印刷設備作為發展基礎。據先生自述，當時籌備處並無固定預算，人員經費均感不足，幸而朱家驊先生兼長教育、交通二部，暫由交通部按月補助二千元支應一切，直至22年（1933）7月，行政院始核撥正式預算，推展各項業務。在此艱困環境下，先生一本振興圖書館事業，發揚中華文化之初衷，以自立更生之精神謀求發展。籌備期間，以下舉措，為其後之中央圖書館奠定未來發展基礎。

### 一、接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促進文化交流

出版品國際交換制度始於1886年各國在比利時訂定之一項國際協定。各國



▲ 1984年7月14日蔣復璁先生贈送比利時漢學院《四庫全書》影本一部  
(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約定設立交換中心，推動出版品國際交換事宜，以促進文化交流。民國14年（1925）北京政府設置「出版品國際交換局」負責其事。民國17年（1928）該局劃歸中央研究院辦理，更名為「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民國22年（1933）4月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成立，經慰堂先生協洽，並獲中研院及教育部同意，交換處移由中央圖書館接管其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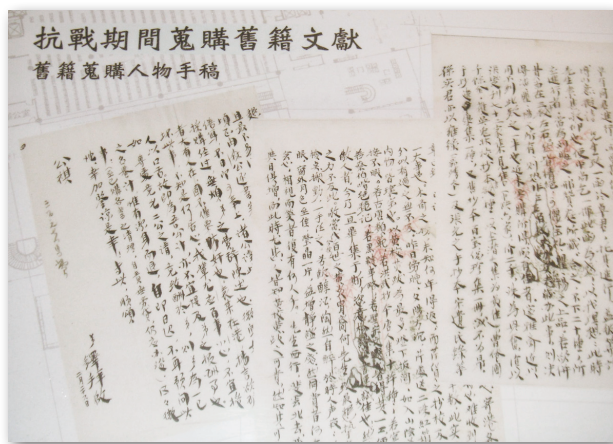
▲ 民國三十年元旦國立中央圖書館全人合影  
(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務。七十餘年來，中央圖書館與一百卅餘個國家建立起出版品交換關係，對等交換各國書刊，對於館藏之發展，大有裨益。

## 二、修訂出版法，徵集全圖圖書文獻

圖書呈繳制度為國家圖書館徵集全圖圖書文獻之必然手段，歐美各國行之有年。我國圖書呈繳制度始於民國3年（1914）臨時政府公布之「出版法」，規定凡出版之文書、圖畫，應以一份送主管官署，另一份由主管官署轉內政部備案。此法因執行不力，效果不彰。民國16年（1927）大學院公布「新出圖書呈繳條例」，規定圖書出版後兩月內送繳大學院三份，否則禁止發行。民國19年（1930）教育部公布「新出圖書呈繳規程」，規定送繳四冊，其中由中央圖書館保存一冊（中圖未成立前由教育部暫存）。以上兩法令因未受地方政府重視，缺乏有效配合措施，未達預期要求。

民國24年（1935），行政院召開「出版法」審查會，慰堂先生代表出席，力主在「出版法」中增列圖書送繳條文，各地出版之書刊均應送繳中央圖書館一冊，俾國家圖書館得以完整典藏全國出版品，有益於文化之保存與傳承，該一建議獲各方支持通過。政府遷台後，「出版法」屢次修正，呈繳條文依舊。民國88年（1999）出版法廢止，出版品送繳條文納入「圖書館法」內，其辦法多依舊制。近年來，國際圖書館界倡導各國建立出版品呈繳制度，以配合國家圖書館之發展，並作為編製國家書目的依據，慰堂先生之先見令人敬佩。



▲ 抗戰期間蒐購舊籍文獻-舊籍蒐購人物手稿  
(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 三、影印四庫珍籍，發揚中華文化

四庫全書集圖書之大成，成書於清乾隆47年（1782），收書3,461種，36,300冊。該書繕錄7部。分儲內廷及江南七閣，歷年戰亂多有毀損，學界屢有影印出版，廣為流傳之議。22年初（1933），先生接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適文淵閣四庫全書移存上海，乃建議政府選擇其中珍本影印，以弘揚文化，並可利用版稅贈書與國外交換，充實館藏。本案經行政院通過，並延聘目錄學者襄助選目，委由

商務印書館進行攝印。共選印231種，計二千冊。皆流傳稀少者，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自民國8年（1919）以來，影印四庫之議，凡歷五次，皆以卷帙浩繁，所費不貲而未成事實。至是在先生主持推動下，得告實現。對中華文化之發揚與傳布，實功不可沒。

政府遷台後，四庫珍本賡續印行，共出版十五集，得書1,872種，15,832冊，已逾全書之半。民國54年（1965），先生出長故宮博物院後，曾提報故宮常會通過，續交商務印書館影印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以竟全功。

民國74年（1985），適政府推動文化建設計畫，慰堂先生向教育部李錫俊部長提出續修四庫之建議，經教育部同意並資助編製《四庫全書續修目錄》，就台灣圖書館現藏四庫未收古籍加以調查，編成專目初稿作為續修之準備。同時，慰堂先生並擬具續修計畫，建議由部邀聘碩學鴻儒參與其事。惜以行政院經費所限，未能核定辦理。

以上三事，對於中央圖書館館藏充實，以及國家圖書館文化功能之發揮影響綦甚。至今，中央圖書館在國內或國際上受到重視，當與其具有中華文化內涵與特色的館藏有關。

中央圖書館館藏圖書逐漸充實，蒐藏日增，但館舍問題因建地及經費所限一時尚難解決，以致籌備處場所雖租用民舍仍感侷促。當時中央研究院適新舍落成，而有出售舊廈之議，籌備處經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以八萬元購得遷入，各項閱覽參考及報章期刊服務得以暫行開展，惟仍未盡符合業務需要。慰堂先生有鑒於興建新廈之必要，積極尋覓館址，籌措建築經費，希早日完成建館計畫。經多方努力，獲得中英庚款董事會同意比照中美庚款運用之先例，在補助文化息金項下撥款一百五十萬元用充中央圖書館建築費用；並於26年（1937）徵得天主教會同意以市府用地交換該會土地作為館址。當年3月，教育部進



▲ 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教育部長張其昀為蔣復璁先生服務中央圖書館25週年紀念（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而組織「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委員會」，聘請戴傳賢先生為委員兼委員長，朱家驊、段錫朋、何廉、錢端升、羅家倫、梁思成、袁同禮、雷震諸先生為委員，慰堂先生為當然委員，籌劃建館事宜。繼而在3月及5月間先後召開委員會議，決定徵選藍圖及有關建築事項。正當一切準備就緒，開始徵圖興工之際，無奈事與願違，七七變起，日軍入侵，建館計畫因而被迫中止。此亦為先生終生一大憾事。

民國26年（1937）9月政府派蔣百里先生率歐洲經濟考察團赴德義諸國訪問，慰堂先生任秘書隨行，籌備處事務委由岳良木先生代理。11月籌備處奉命西遷，乃就館藏珍善圖書選裝130箱疏運入川。經武昌、長沙、岳陽、宜昌，抵達重慶。27年（1938）1月慰堂先生結束考察團工作返國，旋即前往宜昌督導疏運事宜。2月，疏運圖書抵達重慶，籌備處商借川東師範學校禮堂辦公，推展採編工作，並成立參考閱覽室以供民眾閱覽，另以業務需要於五清寺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並於昆明設分處，專司圖書交換事宜。28年（1939），敵機侵襲重慶，籌備處再疏散至江津縣白沙鎮，借用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新建房舍，設立閱覽室，對外服務。

民國27年（1938）4月，籌備處遷渝之初，鑒於中央政府移駐後，重慶成為全國政經中心，且為西南文化薈萃之地，但缺乏完善之圖書館設施，先生乃計畫籌建重慶分館以應需要。經呈請教育部核定，特組織建築委員會進行規劃。建築基地由重慶市政府指撥兩浮支路第一苗圃處，建築經費則由中英庚款補助十七萬元支應一切。計自27年（1938）8月起歷時兩年許，重慶分館建築完成，於30年（1941）2月1日正式開放閱覽。此後，舉凡圖書展覽及文化學術活動多在此館舉行，當時有「戰時文化宮」之譽。

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雖遭次顛沛，寇氛熾烈，仍奮力不懈積極拓展館務。遷渝後曾制定「非常時期工作大綱」及「非常時期圖書館服務大綱」，以應戰時服務需要。29年（1940）7月，籌備處奉令結束，8月1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國立中央圖書館，任命慰堂先生為首任館長。10月，國民政府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規定該館任務為：掌理圖書之蒐集、編藏、考訂、閱覽，以及全國圖書館事業之輔導事宜。館長下設總務、採訪、編目、閱覽、特藏五組，兼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至此中央圖書館之組織始正式確定。

民國29年（1940）間，淪陷區藏書家因生計困難，時有出售家藏珍籍情形，上海文教界人士感於中華典籍如流散域外，將為國家文化一大損失，函電政府亟應及時收購。慰堂先生奉教育部指示，利用中英庚款補助而未用之建築經費進行

搜購，於30年（1941）1月初化名經香港潛赴上海，先後與香港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葉恭綽、上海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密商，委請主持收購善本事宜。1月20日離滬，轉港返渝，日憲聞悉，緹騎追捕，幸安全脫險歸來。計自民國30年（1941）起至抗戰結束，先後購得江南藏書家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風雨樓等家藏珍籍萬餘冊。其他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吳縣潘氏旁喜齋，江安傅氏雙鑑樓所散出之精善版本亦蒐羅不少。民國31年（1942）該館曾選擇若干孤本，影印發行《玄覽堂叢書》，先後出版三集，皆為當代重要史料。

民國34年（1945）8月14日，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政府宣佈復員，教育部派先生任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兼滬區教育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轄有蘇浙贛閩皖五省，並負責接收京滬敵偽高等教育文化機關學校。35年（1946）1月，中央圖書館工作人員分批返回南京，接收敵偽機關圖書及陳羣澤存書庫藏書。重慶分館建築設備移贈新成立之國立羅斯福圖書館。10月，國民政府修訂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除增加編制人員外，並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正式納入圖書館組織；另圖書館事業輔導委員會改稱圖書館事業研究委員會，得延聘專家三至七人為委員研究圖書館改進事宜。此時中央圖書館藏書已達百萬冊，而各項工作次第展開，規模日宏。原擬繼續進行戰前建館計畫，因戰亂未止，興建之議再度擱置。

民國37年（1948）秋，徐蚌會戰，首都感受威脅，中央圖書館奉令精選珍藏圖書疏運來台。計裝運圖書三批，包括善本古籍121,300冊，金石拓片5,600種，及甲骨殘片、寫本經卷、公報雜誌等多件，運台書箱暫存於台中糖廠倉庫。38年（1949）8月，教育部為精簡人力物力，將同時遷台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四單位組成「國立中央博物圖學院館聯合管理處」，中央圖書館縮編為該處之「中圖組」。是年4月，適先生應聯教組織之邀，赴歐研究圖書館事業，並出席組織會議，10月間束裝返國，當時中央圖書館已經合併，遂暫留香港任教。翌年應台灣大學之聘返台執教，並皈依天主教，課餘研治宋史及天主教義，屢有專論發表。

民國43年（1954）8月，教育部恢復中央圖書館建制，9月間先生復任館長原職，即行接收聯管處中圖組保管之圖書文物，暫於台北市中山南路教育部內辦公。44年（1955）春，先生應省府教育廳之邀聘，兼任省立台北圖書館館長，後以本身業務繁重，未遑兼顧，推薦王省吾先生繼任。44年（1955）9月，商得省教育廳同意，撥借南海路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用充中央圖書館館舍。該址原為日



治時代建功神社，房舍狹隘，未盡符合圖書館之需要，先生乃進行改建計畫，利用有限修繕設備費及美援機構與國內外基金會補助，逐年修葺添建，館舍始具規模。先生曾自撰楹聯懸掛於閱覽大廳，感慨中圖之境遇，並藉以自勉。聯曰：

「百萬冊辛勤搜集，多付秦灰。今屈指數來，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瑯環秘笈，歷劫不磨。努力好古敏求，堪喜斯文猶在。」

十餘年慘澹經營，盡成陳跡。又重頭做起，粗備歐美典籍東西輿圖，是智識寶藏，開卷有益。效法知難行易，必教失土重光。」

復館後，先生以館為家，致力於館務之經營擘劃，多年來勞勞不息猶如一日，其於國際文化之交流，古今圖書之藏輯，為中外人士所稱頌，並時時關注國內外圖書館事業之發展。

民國54年（1965），先生感於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圖書乏人照料，曾呈請教育部核准與美方協商運台保管。緣以民國23年



▲ 蔣復璁先生於台北市海南路國立中央圖書館時期  
（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1934）日軍侵華，華北局勢動盪，政府下令文物南遷，國立北平圖書館特選善本圖書六萬冊，連同敦煌寫經、明清輿圖、金石拓片及重要西籍裝箱運滬，寄存於公共租界處。嗣因30年（1941）12月8日珍珠港事變，上海租界岌岌可危，該館顧及存書之安全，經駐美大使胡適之先生協助，並徵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同意，於年底將存滬精善本圖書102箱交商輪運美保管。國會圖書館並延聘平館前館長袁同禮先生為書目專家，就近照料一切。54年（1965）2月袁先生病逝，慰堂先生感於該批圖書在美乏人照顧，虞其散失，而台灣學術研究風氣日盛，需求善本古籍至殷，乃報請教育部核准，轉請外交部與美方商洽，由中央圖書館派員將該批圖書運台暫管，寄存於故宮書庫。55年（1966）3月，先生撰有《運歸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美善本概述》一文，刊於《中美月刊》11卷3期，詳述其經過。

民國54年（1965）8月，行政院召開第一次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通過在台北市外雙溪恢復設置國立故宮博物院。9月，行政院聘請先生為復院後首

任院長，任期兩年。先生於20日接篆就任，即行辦理前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之結束與接收事宜，仍暫兼中央圖書館館長職務。一年後感於院館公務繁忙，難以兼顧，懇辭中央圖書館館長職務，教育部乃借調台灣大學屈萬里教授接任，於55年（1966）9月21日正式交接到職。

回顧先生自民國22年（1933）籌創中央圖書館，以至民國55年（1966）交卸館長職務，前後凡三十二年餘。誠如教育部黃季陸部長於先生服務卅周年時頒發獎辭所云：

「自籌備以至成立，重歷播遷，而底恢復。其主持擘畫有如一日，而締造經營者，不啻四數，用見石渠日益擴充，而門分類別，綱舉目張，雖劉歆七略，紀昀四庫，無以過焉。其於國際文化之交流，古今圖書之藏輯，致力彌多，闕功甚偉。且於公餘之際，敷教上庠，講授既勤，造就亦眾。揆茲此述，殊屬難能。」

此述實為先生盡心竭力奉獻圖書館事業之寫照。

慰堂先生接長故宮後，殫精竭慮，謀求院務之發展。故宮博物院成立於民國十四年（1925），管理宋元明三朝宮廷及清朝集藏。民國20年（1931），九一八事件爆發，22年（1933）政府決定將故宮文物南遷上海，以策安全。計運出文物13,491箱。連同附帶遷運之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及國子監三單位文物6,066箱，總共19,557箱。民國25年（1936）12月，該批文物轉運南京朝天宮庫房存貯。民國26年（1937）7月，七七事變，故宮博物院先是選擇文物精品80箱裝輪疏運四川巴縣。10月間淞滬戰起，繼又運出文物16,000箱，分由水陸兩路撤運至內地。

抗戰期間與故宮博物院相繼西遷之機構尚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該院於民國22年（1933）籌設於南京，26年（1937）11月間，該院選擇文物852箱疏運至重慶，28年（1939）再遷至四川南溪。

民國34年（1945）8月日本投降，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故宮博物院等機構疏運之文物相繼復員還京，不及一年局勢又形惡化。37年（1948）9月，故宮奉令選擇文物精品2,972箱，連同中央博物院852箱託海軍軍艦運台，存貯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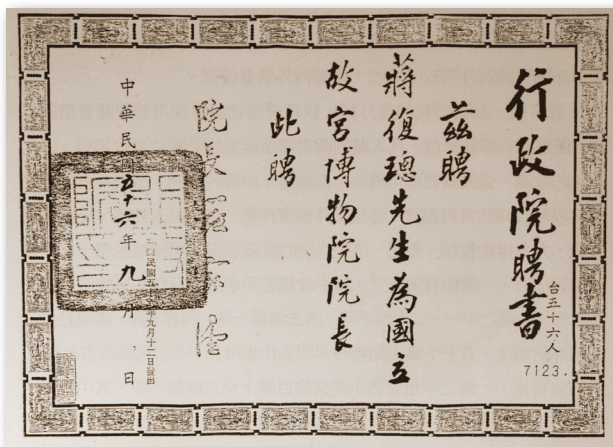
▲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蔣館長屈館長交接  
（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台中糖廠倉庫。兩院業務及文物併由教育部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管理。

民國54年（1965）11月12日，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之故宮新廈落成揭幕，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以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同時並舉行遷台文物首次大規模展覽。展出精選之書法、名畫、銅器、織繡、瓷器、玉器、珍玩、圖書文獻等文物1,573件。開放後，觀眾如織，據統計一個半月內參觀人數多達十五萬餘人。

故宮新廈落成後，貯存台中之箱件相繼北運存放於外雙溪山洞庫中。圖書部分，因庫內一時無法容納，直至翌年二月始賡續北運，暫存於鄰近物資局倉庫。



▲ 蔣復璁受聘為故宮博物院院長聘書  
(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至此，北溝文物全部運至台北，聯管處業務遂告結束。

故宮文物遷至新院舍後，在慰堂先生主持下進行各項業務規劃及整理工作，其重要措施有以下幾項：

### 一、院廈擴建與組織擴編

故宮新廈陳列場館僅1,100坪，不僅無法配合展出之需要，亦難以容納院藏圖書檔案，為適應當前及未來發展需要，乃有擴建計畫。故宮館廈之擴建在慰堂先生任內共有三次。第一次於55年（1966）底興建圖書館一座，使院藏圖書文獻有一典藏及閱覽空間。第二次擴建係遵奉政府發展觀光事業之政策，於58年（1969）4月就前次擴建之兩翼向外延伸用充閱覽場所。經兩次擴建，全院面積增至4,700餘



▲ 蔣復璁友人所繪-蔣復璁與故宮博物院  
(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坪，展品由三千件增至八千件。

第三次擴建為故宮發展史中重要之里程碑，自二次工程完成後，各組業務日漸拓展，參觀人數倍增，原有場所又感不敷，管理委員會乃通過第三次擴建計畫，擬於正館右側增建行政大樓，同時並整修全院安全設施。此一計畫於71年（1982）7月報請行政院核准分年編列預算實施。新建大樓自71年（1982）9月興工，三年後竣工，為一地下三層，地面二層建築，落成後專供辦公、庫房及圖書館使用，所餘正館空間則用於展覽場所。

故宮院舍之擴建影響到管理單位之人員編制，56年（1967）8月，故宮第一次擴建完成後，即着手研究組織編制之修訂問題。故宮業務單位原僅設有古物、書畫、出版三組室，慰堂先生有鑒於圖書文獻展覽及登記等業務之重要，呈准修訂組織規程，增設圖書文獻、展覽及登記三個單位。59年（1970）再增設科學保管技術室，負責文物之保存、維護與鑑定之研究工作，至此，組織始臻完善。

## 二、文物整理與登錄

故宮收藏之文物包括器物、書畫、圖書文獻等項，性質龐雜，名目繁多。在昔文物南遷時，雖大體分類裝箱，並未區分細目，遷運台北後，始規劃分類裝箱儲存。每一器物均編製卡片，並附照片，詳細登錄其字號、品名、形制、紋飾、銘文、尺寸、重量等，以供查檢，建立起嚴密之管理制度。



▲ 民國七十二年蔣復璁先生於故宮博物院院長任期  
(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故宮書畫之保管原以木箱貯存。一箱之藏，自數十至百餘件不等，提存皆感不便，後改製鋁箱，採櫥櫃式開啟提取較便。又書畫處增設裱畫室，負責書畫揭裱及修復工作。

有關圖書文獻之整理，故宮於第二次擴建完成後，在圖書文獻處下設有圖書館，陳列歷史考古、藝術、清代史料及目錄版本之類書刊，供備國內外研究中國藝術史人士利用研究。

故宮檔案運台有204箱，包含宮中檔、軍機處檔、清史館檔、實錄及起居注等項，共26,920件，迄未詳加整理。圖書文獻處成立後，進行登錄編號，摘由製卡，歷時十四載，於71年（1982）全部竣事，編成《清代文獻檔案總



目》，供備參考。經此整理，故宮文獻增至393,167件，尤便於研究清史學者利用。

慰堂先生到任後特別重視登記組之設置。先生自稱係以辦理圖書館方法，經營博物館。以為圖書館設有採訪單位，總司圖書之出入，圖書經登錄後始分送相關單位以供特藏、編目、閱覽、研究，具有制衡作用。故宮及中博文物，過去只有裝箱號及宮殿編號，確實件數難以查明。因此遷台文物亟宜建立登記制度，掌管所藏文物之登記與分類事項。自60年（1971）起，故宮開始建立各類文物統一編號系統，訂定文物檢索制度，於61年（1972）進行藏品之點檢工作。歷時三年之努力，至64年（1975）8月兩院運台文物3,824箱，全部點查編號完竣，故宮藏品由原粗略統計之24萬件，遽增至60萬8千餘件。

### 三、文物展覽與推廣

故宮文物展出工作雖由典藏單位提供陳列，編製說明與目錄，但有關展出佈置，燈光路標之設計，導覽人員之訓練與管理等工作，則是由展覽人員負責。遷台之初，一切規模章制均欠完備，直至57年（1968）修訂組織規程始正式設置展覽組，建立導覽制度。展覽組之首要工作為招訓導覽人員，其資格要求除容貌端莊，語言流利外，並應具有基本歷史藝術素養，另需參加短期訓練，增加對中華文物之瞭解，方能勝任工作。優秀之導覽人員並獲有出國研修機會，擔任高級行政職務。先生復與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設藝術史組，培養中國藝術史研究人才。

展覽組除對一般遊客服務外，尚肩負推廣教育之責任。自60年（1971）3月起免費招待台北縣市中、小學生，由導覽人員引導參觀，介紹中華文物。外縣市學校則利用文物複製精品與各種透明片，送至學校及文化中心巡迴展出，並派導覽人員在場解說，甚至在海外僑居地作巡迴展出，對文化之闡揚具推廣意義。

推廣工作與出版品之編印有關，故宮文物遷至台北，於整理編目之同時，也展開編輯出版與研究工作。民國64年（1975）政府補助出版基金一千萬元，使故宮出版業務更呈蓬勃。目前，故宮發行之定期刊物有：故宮週刊、故宮學術季刊（原名故宮季刊，72年（1983）更名）、故宮文物月刊、故宮通訊（英文雙月刊）、故宮英文半年刊等。非定期出版品有故宮叢刊，以及專著如《故宮名畫三百種》、《歷代法書全集》等數十種。其他書刊畫錄尚多。

另故宮收藏宋金元圖書逾兩百部，其中不少孤本秘笈。59年（1970）起為響



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特選孤本論語、孟子等書依原式影印出版，深受社會人士珍視。民國71年（1982）初更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續就故宮所藏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普遍發行。此書卷帙巨大，全部精裝一千五百冊，成為出版界一大盛事。此外，在檔案出版方面，影印有舊滿州檔及康熙、雍正、乾隆、光緒四朝宮中檔，每套達一百五十鉅冊，為研究滿清之重要史料。

此外，故宮為推廣文化，曾與國外著名印刷機構合作精印院藏書畫珍品。如59年（1970）與日本東京學習研究社合作選印「故宮文物選萃」共出版五輯二十五冊，內容包括故宮收藏之各類文物，迄今發行已在百萬冊以上。又與二玄社合作，選印名家書畫一百件，精印複製，其成品不遜真蹟。

慰堂先生在故宮連任八屆，前後歷十七年五個月。民國71年（1982）6月4日，先生身感不適，經送榮民總醫院診斷為輕度中風，經近兩個月之治療始痊癒出院。先生深感年事已高，於72年（1983）第八任院長任期屆滿時堅持退休，經政府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頒授二等景星勳章，以酬五十年來對中國文化之貢獻，仍膺聘為故宮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民國79年（1990）9月21日，因罹患白血球症，療治無效，終與世長辭，享壽九十有二。

先生在職期間，歷經兩院文物箱件北運，各項業務次第開展。其間三次擴建館廈，增加展覽空間。多次修訂組織規程、增設圖書文獻等單位，使管理及服務日益完善，職掌合理分明，尤其大力培育專才，更奠定故宮之良好發展基礎。先生之貢獻實不可沒。

綜先生一生，獻身文化，盡忠職守，在館院服務五十年間未嘗攜眷以隨，廉儉自奉，不以為苦。先生精研目錄版本及宋史，曾兼任各大學教職，公餘嗜好崑曲為樂。自故宮退休後，雖年逾八六仍勤於研究著述，並在國內外訪問講演。民國78年（1989）3月，先生以九一高齡仍於中央圖書館開授目錄版本講座，每週一講，長達三月餘，圖書館界及學界聽講學員對先生之敬業精神極為感動。尤其先生思慮清晰，就館編善本書目擇要講述各書源流及版本特色，娓娓道來，如數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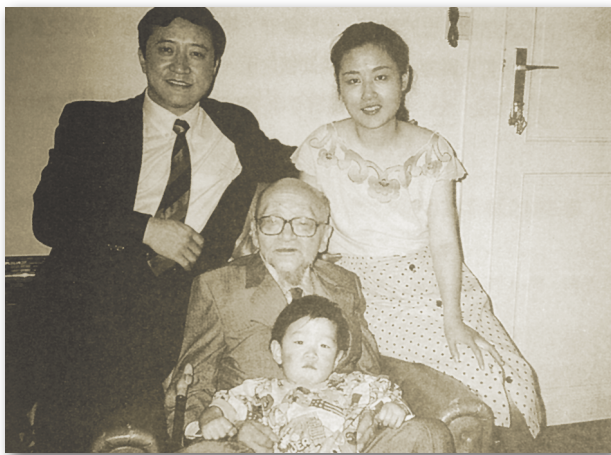
慰堂先生著述等身，曾於74年（1985）就其積稿百三十餘萬言彙編《珍帚齋文集》五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分為五卷：卷一為文化、藝術、博物館類，卷二為圖書館類；卷三為宋史與歷史類，卷四為宗教類，卷五為雜論類。據此可知其任職及生活之梗概。先前並輯印有《圖書與圖書館》、《訴信錄》、



《珍帚集》及《宋史新探》等專著，風行一時。

先生因對文化及學術之長期貢獻而迭獲殊榮。曾獲韓國成均館大學、美國聖約翰大學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羅馬教廷頒授聖額我略高級爵士、中央研究院選為第十屆院士、以及行政院頒發文化獎章，教育部授贈金質獎章等。各項表彰實至名歸，當非儻來之譽，文化界譽為圖書館與博物館事業之開創人與奠基者，實當之無愧。圖書館與博物館為廣義之教育事業，故蔣先生為當代偉大社會教育家，可稱當之無愧。

先生德配孫家宜女士滯留大陸，60年（1971）病逝於上海。有子三女三，除長子亡故外，均成家立業，長居大陸。



▲ 1989年七月蔣復璁先生與其孫蔣學鳴全家合影  
（圖：攝於《蔣復璁回憶錄》）

## 參考文獻：

- 昌彼得（1998）。蔣慰堂先生年表。在：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文集。頁3-18。  
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 黃克武（2000）。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振鵠（1998）。蔣慰堂先生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在：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文集。頁34-37。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 昌彼得（1998）。蔣慰堂先生與故宮博物院。在：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文集。  
（頁41-43）。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 鄭肇陞（1983）。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  
第1期。頁12-22。台北市：該館。
- 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故宮七十星霜。台北市：商務。
- 張圍東（2003）。蔣復璁－圖書館與博物館事業的守護神。在：圖書館人物  
誌(一)(頁37-47)。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 洪耀勳

1902  
~1986

——  
台灣西洋哲學教育的引介者

國史館協修 歐素瑛 撰文



## 出身東京帝國大學， 獻身哲學教育

洪耀勳，1902年生於南投草屯，為南投草屯洪氏望族的一員。父親洪清江，字抱村，曾任草鞋墩公學校教師、草屯街庄助役、信用組合理事、草屯街協議員等職。1917年8月，洪耀勳於公學校畢業後，赴笈日本求學，與同鄉張深切（1904~1965）一同住在礪川小學校教務主任長鹽老師家，後來，長鹽老師突然寫信給蔡培火，希望他們兩人搬離，令蔡培火十分生氣。經張深切和洪耀勳檢討原因後，認為應該是張深切弄破衣服要長鹽太太為他縫補、洪耀勳不慎弄破炭盆自行買新的回來充數、兩人私下聊過食宿費太貴等三個原因。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張深切對洪耀勳之評語：

「他是百分之百的書生，不談政治思想，不談日、台間的任何問題，認真讀書，很順利的考上了高等學校，經過東京帝大，曾任台大助教，七七事變後往北京，任師大和北大的哲學教授，現任台大教授，他如果沒有和我分離，繼續鼓勵我讀書，我相信我現在的環境會不同的。」

1925年3月，洪耀勳參加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入學考試，順利通過，進入哲學系就讀。台灣人與其同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者尚有醫學部的高天成、法學部的陳茂源，以及經濟學部的朱昭陽等。一般而言，留學東瀛的莘莘學子多孜孜於畢業後的就業問題，自然科學之外，競習法律、經濟、醫學、商業等科，間有依稟賦所近學習美術、音樂者，對於高深理論的哲學則少有問津者，洪耀勳實是少數的例外。之後，繼升同校大學院，於哲學一門造詣頗深。求學期間，日本學界左傾風氣盛行，尤以東京帝國大學最為激烈，教授多崇尚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學生亦深受影響。

1928年畢業後，洪耀勳返台任職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自副手、助手，而升任講師，前後長達十餘年。1928年哲學科設立之初，首先設立哲學與哲學史、東洋倫理學與西洋倫理學及心理學等三個講座。翌年，再設立東洋哲學、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共計五個講座，講座教授分別為務台理作、世良壽男、飯沼龍遠、今村完道及近藤壽治等。哲學科包含五個專攻科目：即東洋哲學、西洋哲



▲ 洪耀勳先生照（圖：郭博文先生提供）

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分工頗為細密；但學生極少。除了1942、1943年兩次大規模招生，分別招進15人和6人之外，每年招生名額不超過3人，甚至有不少年度沒有任何學生入學，呈現教師多、學生少的講座制特色。

當時哲學科有相當活躍的學會活動，包括哲學談話會、哲學會、心理談話會、通俗心理學講演會及教育學會等，其中，以哲學談話會和心理談話會為主，不定期集會，發表研究和討論，進行相關學術的交流和傳播活動。期間，洪耀勳曾發表不少論文。例如1931年10月24日洪耀勳於哲學談話會講演〈ヘーゲル精神現象學につきて〉（關於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1938年9月，於《哲學科研究年報》第五輯發表〈存在ト真理—ヌツビツゼノ真理論ノ一考察〉（存在與真理—ヌツビツゼ的真理之探討）一文，指出ヌツビツゼ認為真理自體始終存在，而純粹現實學的哲學具有二重本質，即在真理存在自體的前提下之全部事物。此一真理存在自體的靜的一面、動的一面及其辯證法的轉換理法的脈絡下有關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尤其哲學的現實性問題，係隨著此一辯證法的運用，才能顯現真理存在自體的哲學的絕對自觀。

值得一提的是，洪耀勳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本土論中，亦曾發表若干意見。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重新尋找台灣本土新文學的生命源流，不僅是當急之務，對台灣本土文學的發展來說，意義非比尋常，也最能凸顯台灣人建立台灣自主文學的動向。洪耀勳於〈風土文化觀—以台灣風土為基礎〉一文中，由反省台灣因地緣、自然因素而產生的特殊風土，來觀察台灣本土的特殊性。1932年，當《台灣新民報》獲准改為日刊時，洪耀勳即以一篇〈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縱談台灣的語言、民族及思想等問題，其以「歷史的、社會的」角度解構居於主流地位的日文和中國白話文，並認為台灣的民族精神不僅具有世界的普遍性，也具有當代的特殊性；然而，既要擁有普遍性，又能擁有特殊性，其過程並非模仿，而是來自於思想的批判。這是1930年代普遍存在於台灣知識分子心中的理想思考，從中可以看見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民族精神的期許，不僅超越了1920年代對「祖國」的懷想，更注入1930年代普羅大眾的思想主流，將語言和民族精神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凸顯其複雜的內涵。

另外，洪耀勳於1935年《台灣文藝》4月號發表〈悲劇的哲學〉。1930年代以後，台灣出現許多文藝團體，並創刊不少文學刊物。其中，1934年5月，張深切、賴明弘等人倡議，集結全台作家在台中市召開「全島文藝大會」，與會的作家詩人82人，同時組織「台灣文藝聯盟」，以「擁護言論自由、團結為文學奮鬥



到底」為目標，並於同年11月創辦《台灣文藝》雜誌，中、日文並行。該刊雖係台灣文藝聯盟的機關刊物，但並不強調主義、主張或路線，因此得以結合全島作家，共同創作，成為台灣文學雜誌多元典範的開始。洪耀勳因係張深切舊識，乃於該刊發表專文，以饗讀者。

## 貳 任教北京師範大學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華北淪陷，洪耀勳赴北平擔任北京師範大學講師、教授，後轉任北京大學教授。當時「台灣籍民」和日本人享有一樣的待遇，加以因日本「以漢制漢」的政策，凡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較容易覓職或謀得一官半職。因此，當時到北平的台灣人，有不少人擔任教職，例如任教北京大學的張我軍、蘇子衡、林耀堂、洪炎秋；任教北京師範大學的林朝權、林朝榮兄弟、洪耀勳、柯政和；任教北京藝專的張深切，以及任教京華美術學校的郭柏川等。

在北平期間，洪耀勳將籍貫改為福建閩侯。之所以改變籍貫，是因為當時北平是淪陷區，日本人將台灣人當作「二等國民」，認為他們雖然不如日本人，但是比當地人好，並要求這些「二等國民」為日本人效力。來到北平的台灣人不願為日本人利用，亦不願表明台灣人的身分，乃將籍貫由台灣改為福建或廣東，例如張我軍是台北板橋人，將籍貫改為福建南靖、洪炎秋改為福建同安、蘇子衡改為廣東汕頭等，洪耀勳也不例外，彼此間則互稱「蕃薯仔」。

戰後初期，滯留北平、天津的台灣人各約千人，分別成立台灣同鄉會組織。其中，「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於1945年9月9日在北平西單大光明戲院成立，現場一片歡欣鼓舞，出席者約500餘人，由梁永祿任會長，並推選梁永祿、洪標（即洪炎秋）、林朝榮、張我軍、張深切、吳敦禮、洪耀勳等7人為執行委員；陳天錫、蘇子衡2人為監察委員。9名執、監委均係抗戰期間留平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洪炎秋、張我軍、蘇子衡及洪耀勳4人皆任職於北京大學。同年9月11日，召開第一回執行委員會議，改推舉洪炎秋為主任委員、洪耀勳為事務委員、張我軍為文書委員、張深切為連絡委員、吳敦禮為調查委員、林朝榮為學務委員、梁永祿為宣傳委員等，以達成與政府各單位連繫，安排船隻讓滯留北平的台灣人返台。之後，平、津兩個同鄉會聯合成立「台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以加強會務運作。在聯合會之下，又成立台灣革命同難同志會、台灣省教育協進會、台灣革新同志會、新台灣建設協進會，以及台灣省旅平醫師聯絡會等5個團體組織，



互相協力，分工合作。

然而，同鄉會一成立，旋即面對兩項不利台灣人的事件。一是懲治台籍漢奸問題，台籍詩人、音樂家江文也等紛紛被捕入獄。二是「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的頒布，規定台灣人的私產和朝鮮人一樣，須依行政院處理敵偽財產辦法，先行保管和運用，凡能提出正確籍貫者，才予歸還，顯示其「台灣認識」的不正確。台灣省旅平同鄉會為改正社會視聽，乃於1946年2月15日創辦《新台灣》，作為機關刊物，由宣傳委員梁永祿負責刊務，迄同年5月1日，共發行4期。《新台灣》的內容，主要為平、津台灣人動態的報導、台灣歷史與現況，以及一些文學創作等。第一期的主要作者有洪炎秋、王桐齡、梁永祿（筆名非久）、張深切（筆名者也）、張我軍（筆名伍君）等。其中，張我軍特發表〈為台灣人提出一個抗議〉一文，呼籲政府應去除台籍漢奸污名及更正「處理台灣人產業辦法」中的不當規定等。第二期的主要作者有金文昶、曾慧明、鍾理和（筆名江流）等。其中，鍾理和發表的〈白薯的悲哀〉一文，係戰後鍾理和在北平發表的唯一一篇小說，描寫台灣自乙未割台至日本戰敗投降間所遭遇的命運。第三期的主要作者有林鷹、畢平、陳鴻勳、藕子等。第四期的主要作者除作品連載中的王桐齡、畢平、梁永祿外，尚有林當權、薛恩波、陳鴻勳等。

## 參 戰後任教台灣大學及私立延平學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1月15日，台北帝國大學接收完竣後，即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將相關講座分別合併，設置「系」或「科」，且將各學部改為「學院」，由若干科系組成，於是原文政學部乃區分為文學院、法學院，原文、史、哲三學科亦分別改為文學院下之中國文學系、史學系及哲學系。其中，哲學系以培養哲學人才，使其具備卓越思考能力、正確價值觀念、深厚人文素養為宗旨。1957年增設研究所碩士班，是全台最早成立的哲學系所，培養出許多重要的思想家。

1946年，洪耀勳自北京返台，先是獲聘為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並配給位於青田街的宿舍，與同系教授殷海光為鄰。其妻吳綉進為實業家吳淮水之妹，畢業於東京女子專門學校，擅長家庭經濟，曾任北平師範大學家政系及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兩人結婚時主婚人為林獻堂。接收之初，台灣大學為延續台北帝國大學之學術研究風氣，乃於各學系設置研究室，其中，哲學系分為中國哲學、西



洋哲學及心理學三個研究室，主持人分別是林茂生、洪耀勳及鄭發育。三個研究室中，以西洋哲學研究室成員最多，除洪耀勳外，尚有劉天予、曾天從、留用日籍教授淡野安太郎，以及講師許汝鐵、助教石朝桂、林素琴等，在此過渡時期勉力維持教學、研究不中斷。

1947年1月1日，洪耀勳升為教授，講授哲學概論、哲學導論及西洋哲學史、社會學等課程，使學生了解整個世界哲學的發展脈絡及哲學史研究在哲學探求上的重要意義等。當時同系教授尚有德國耶拿大學哲學博士許恪士、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吳康（敬軒）、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方東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范壽康、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出身專攻西洋哲學的曾文從，以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的殷海光等，可謂菁英薈萃。在其辛勤耕耘下，不但為教學與研究規模奠定堅實的基礎，且將西哲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實存主義（Existenzialismu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柏格森（H. Bergson, 1859~1941），以及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等理論，介紹到台灣社會，再配合對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的研究，建立兼容並蓄的優良學統。

另外，1946年9月正式對外招生之私立延平學院，為戰後台籍人士創設的大專院校，其師資幾乎全由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之台籍人士組成，除朱昭陽、宋進英、朱華陽、邱永漢等專任師資外，其餘師資多為兼任，尤以台灣大學教授居多，包括杜聰明、洪遜欣、林茂生、張漢裕、魏火曜、高天成、林宗義、陳茂源、曹欽源、陳成慶、徐先堯、蔡章麟、陳有諒、洪耀勳等，都是一時之選，不但教學認真且內容豐富。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有部分延平學院師生參與抗爭行動。3月20日，延平學院遭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辦理不善，且未奉准立案，二二八事件期間並有一部分學生參加叛亂，殊屬不法」為由，予以關閉，校長朱昭陽在林獻堂、游彌堅、劉啟光等人的說情下才得無事。學校被封閉後，所有的教員因此解散。

1950年6月，台灣大學文學院各學系共同出刊《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



▲ 洪耀勳先生著《哲學導論對話》  
（圖：國家圖書館提供。）

報》，由校長傅斯年擔任名譽編輯，主要刊載有關文學、語言文字學、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及哲學之研究論文，哲學系由洪耀勳、曾天從兩人擔任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翌年2月洪耀勳在第二期發表〈海德格哲學導論〉一文，以實存哲學家海德格之哲學思想中的實存概念（Existenzbegriff）為中心，說明實存哲學（Existenzphilosophie）係在歷史的、宗教的具體情形中所釀成的各動機、各人物、各淵源之匯通，加上其固有的東西所建立起來的哲學，進而闡明其原理、方法及內容等。繼於1953年12月出版的第五期發表〈實存哲學家卡兒·亞思巴斯〉一文，介紹另一實存哲學家卡兒·亞思巴斯（Karl Jaspers）有關哲學思想、立場及其主要哲學的概觀。卡兒·亞思巴斯為海德格之前輩，專研精神病理學和心理學及哲學的關係，不僅是一位醫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心理學者和哲學者，在其著作《哲學》、《理性與實存》、《現代之精神的狀況》等書中，皆有清楚的呈現。其後，此二文均收錄洪耀勳著《實存哲學論評》一書中。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校長在列席台灣省參議會報告台大校務後，猝發腦溢血辭世，全校師生哀慟不已。1951年4月8日民國39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上，洪樞、洪耀勳、蘇薌雨三位教授共同提案，將傅故校長在第四次校慶演說時提出，用以勉勵學生之「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訂為校訓，使得傅故校長之教育精神，得與台灣大學同垂不朽。

1960年，洪耀勳升任哲學系主任，講授存在主義等課程。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又稱為生存主義，是一個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強調個人、獨立自主和主觀經驗。在20世紀中葉廣泛流傳，海德格、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及作家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等是其代表人物。洪耀勳向來崇尚德國哲學，於是以此作為講授主題，對學生及往後台灣的哲學研究，影響甚大。例如洪耀勳曾推薦哲學系畢業校友、該系助教傅偉勳（1933~1996）報考美國夏威夷新設的東西文化學術中心，名列前茅。傅氏辦理出國時，洪耀勳以系主任身分，極力為其遭羅織的政治犯家庭背景澄清，使其得以順利出國深造。1963年春，傅偉勳學成返國，獲聘為台大哲學系講師，講授西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以及「英國經驗論」、「哲學問題討論」、「實存主義與現代歐洲文學」、「現象學的存在論」等課程，並將授課講義整理出版為《西洋哲學史》一書，係以現代哲學的觀點剖析自泰利斯（Thales）至黑格爾為止的西方哲學問題發展動向，且對各家各派的哲學思想提出批判，頗不同於過去純然蒐編既有哲學理論的歷史書，至今仍是國內西洋哲學史的經典著作。



一般視傅偉勳、孫智燊、劉述先及成中英四人為哲學大家方東美的「四大弟子」。事實上，傅偉勳自認除了受到方東美的影響之外，亦得益於洪耀勳所講授的西方哲學史、印度哲學史課程，從這兩門課程的學習中，將他引向對於世界哲學發展線索的關心和注意，並了解到哲學史的研究在哲學探求上的重要意義。他由此而進，閱讀了日譯本文德爾班（W·Windelband）的《哲學史教程》與《近代哲學史》等西方哲學史的名著，也讀過不少日本學者撰述的印度哲學的一流著作，諸如宇井伯壽的《印度哲學史》和《印度哲學研究》（六冊）、木村泰賢的《印度哲學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學》、《原始佛教思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與《大乘佛教思想論》等書，大大開闊了他的哲學視野，增長了他的學識與睿智。

任教台灣大學期間，洪耀勳亦指導哲學系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所指導之學生和論文題目分別為張瑞良：〈緣起觀〉、王志奘：〈老子哲學的研究〉、



▲ 洪耀勳先生與學生合影。（圖：趙天儀先生提供。）

楊樹同：〈罕普意義理論之研究〉、陳文秀：〈科學的語言與實在〉、郭實淪：〈沙特的存在論：「存在與虛無」的研究〉、楊政河：〈華嚴法界緣起觀之研究〉等。其中，張瑞良、楊樹同、陳文秀、郭實淪四人畢業後均獲聘為台大哲學系教師；但楊樹同於1973年6月因研究生馮滬祥的理則學期末考試零分事件，遭到學校解

聘，同時被解聘的還有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楊斐華、胡基峻、李日章、陳明玉、梁振生、黃天成、張瑞良、郭實淪、鍾友聯等十餘人，是為「台大哲學系事件」。此一事件，造成哲學系的師資陣容一度幾乎為之一空，教學和思想品質嚴重下滑，學術思想轉趨拘謹、保守，討論、批評的風氣亦為之式微，為台灣校園史上政治干預學術最嚴重的一次事件。

事實上，早在「台大哲學系事件」爆發之前，哲學系招聘師資之問題已令系上部分教師不以為然。其中，殷海光教授於1966年3月16日寫給洪耀勳的信中指出，哲學系師資中老輩即將萎謝，新輩又不夠健全，新陳代謝欠佳，以致哲學系



的情況猶如江河日下，脫離、癱瘓的現象已灼然可見。其原因在於選任師資時，往往連最低的標準都達不到，即師資必須要有追求真理的熱忱和致力學問的誠意之條件，但是哲學系選人距離這一標準似乎越來越遠，或對所教課程毫無把握及低度興趣，或對中國哲學並無學問上的努力。這些結果，實是16、7年來種種因素累積形成的，如再不整頓、不認真慎選師資的話，那麼不出5年，哲學系的光景將不堪設想，將來受害者無疑是青年學生，而辦理行政者，即系主任，對此似應負有較多責任，必須抱持求真才之心，並有識人之明，才能解決此一問題。

其次，殷海光也指出哲學系太過「瀟灑」，對於學生的功課沒有一定的「通過標準」，以致學生還未有足夠的基本訓練就東摸西碰，不但浪費時間，而且容易造成「地基不固」或「營養不良」的問題，一離開台灣這個小天地的人，便很容易看出這類毛病。雖然擔任行政者常有特殊困難和苦衷，但至少應明察辦理，保持最低的學術規格，尤其徇情不可害學術等。由此可見，哲學系務亟待改進之處不少。

對此，洪耀勳頗能虛心接受，對殷海光的為系舉才，亦不排拒。例如殷海光認為他的學生何秀煌、劉福增的邏輯比他好，乃極力向洪耀勳推薦劉福增到台大教邏輯，後來看到林正弘討論邏輯的文章不錯，又極力推薦林正弘。他們後來都成為台大哲學系的中堅講師。

## 肆 研究哲學暨西洋哲學史

洪耀勳之於哲學知識論專題之研究及西洋哲學史等，可說博涉、窮覽、鉤玄、探微，方法嚴肅，體系井然，洵非自矜奇想、浪漫從事者所能望其項背者。哲學之為學，最重理論，其對象是極為抽象的，故一般人多認為枯燥乏味，但又無法否認哲學實為一門與人生關係至為密切之學問。蓋哲學領導思想，思想領導人生，有正確的思想，才有正確的人生觀，有正確的人生觀，人生才有意義，才有價值，誠如洪耀勳在其《哲學導論對話》一書中所言：「要是你以愛好知識，想充滿你的心靈，在這方面哲學才滿足你知的要求，也可使你心定，感覺活著有意義，這便是哲學的無形的好處，其功德無量。」

然而，如何激起讀者對此艱澀枯燥學問的興趣，洪耀勳亦有其獨特的方式。其憑著幾十年豐富的教學經驗，深知如用平鋪直敘的寫法，等於填鴨式的排列，不能將學生或廣大的讀者包括其中，且可能更增加哲學的無味，反而引起讀者對



此學問的反感。有鑑於此，洪耀勳在撰述《哲學導論對話》一書時，乃採取對話的形式，在自序中指出：「要達到哲學導論的目的，對話形式可以發揮其好處。我們要顧慮到的，是讓學生也扮演主要的角色，有問有答，有疑難，有啟發等，以便問題的發展。老師站在領導地位，看學生反應如何，要做適當的措施，明顯論點，做批評和結論。對話要點在使談話者間發生共感作用，即心靈上的交通，各人所有的獨特狀況、問題等，能夠匯合起來，透過不同個性的別人來發見自己，成為自己。……（下略）。」

事實上，以對話形式來寫哲學，並不是洪耀勳所創。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早已用對話的形式寫過二十多篇對話錄，近世柏克萊（Berkeley）亦寫了三篇對話，足見對話形式是表達哲學的冥想最好的方式。洪耀勳任教台灣大學哲學系期間，每年開授之哲學概論或哲學導論等課程時，皆印發平敘體講義大綱給聽課學生，以幫助理解，並免去學生抄寫筆記的麻煩，但仍不夠理想。這些講義主要是按照授課計畫作成，有問題提要、講解、批判、結論等填鴨式的排列，大多為獨白的形式。不過因為發問者或聽講者並不在談論範圍，所以無法知道其反應和理解的程度，以致無法將其共感或反對等語句插進去。而對話形式是兩人或兩人以上的交談，可以設法使獨白式無法收到的效果放在談話裡，這是對話形式的第一好處。第二，可以使呆板的、抽象的內容顯得生動，以期收到更多的效果。此實為其主持台灣大學哲學教壇的經驗談。

《哲學導論對話》一書計分為二篇，第一篇為哲學以前；第二篇為知識問題。前者分別是什麼需要哲學、哲學和科學、哲學是什麼、怎樣去接近哲學，以及哲學底根本問題。後者為真理是什麼、真理規準、什麼叫做知識論、認識的來源—合理論和經驗論、直觀論、認識有效範圍或界限、認識的對象—概況、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等。值得一提的是，過去甚少論著談論科學和哲學的關係，惟洪耀勳在論哲學和科學的關係上，可說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哲學導論對話》一書對真理的規範，除做了非常詳細及有系統的闡明外，對於各家對知識論的意見，則有條不紊忠實地介紹，使讀者一目瞭然，將心中的疑問一掃而空。洪氏論述認識的起源、認識的對象及其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等，尤其精彩。

另外，洪耀勳又將其十餘年來在大學教授西洋哲學史的講義底稿，加以整理而提其要點編成《西洋哲學史》一、二冊，以利初學哲學史者閱讀。該書為關於現實的詮索，檢討各時代之各個學說，尤其是各哲學思想所以產生的歷史的、社會的背景，甚至對哲學家個人的生活環境、性格等，均有相當詳盡的說明，試圖剖析由古至今西方哲學思想如古希臘哲學、希臘主義的羅馬哲學、基督教神學、



啟蒙時代之哲學、批評哲學、浪漫派哲學及十九世紀哲學思想之變遷，以及各哲學思想所以相繼而起的事實的、邏輯的關聯等，不僅在敘述過去的哲學家想了什麼、作了什麼，更重要的是洞察歷史脈絡中的思想潮流和指示現代的思想的位置所給予的暗示和啟發等，以明瞭西洋哲學發展的軌跡。

1960年代台大文學院是引進西方思潮的重鎮，哲學系自不例外，系主任洪耀勳尤其不遺餘力，從邏輯實證論、分析哲學、存在主義，到現象學等，無一不透過教學講授和研究論著，向學生及台灣哲學界推介，受影響者頗眾。以其學生趙天儀為例，他認為自己所受的哲學教育較傾向西方哲學的體系，其中殷海光的邏輯實證論、羅素哲學、分析哲學及洪耀勳系主任的存在主義，都給予他不少的啟發與影響。以德國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為例，其向來被視為現象學方面的重要思想家。其現象學一般被稱為「價值現象學」和「本質現象學」，他認為對人的本質之誤解是當今世界危機的根本所在，於是了解人的本質問題乃成為謝勒一生所思索的問題，因此需要現象學中的「本質直觀」，由直觀本質來還原事物真實的價值。洪耀勳著《實存哲學論評》一書中專章介紹謝勒之哲學思想，乃是最早將謝勒哲學思想推介到台灣之學者。



▲ 洪耀勳先生著作。(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伍 結語

1971年洪耀勳卸下系主任職務後，趙天儀曾作詩〈寄情：杜鵑花季的重逢—致吾師洪耀勳先生〉一首，抒發對其間風風雨雨之無限感慨。其內容如下：

幾番風雨  
一陣冷來一陣暖  
當杜鵑花盛開的時候  
美麗的流蘇也盛放起來  
杜鵑花彩色繽紛，燦爛奪目  
而三月的流蘇卻堅持唯一的雪白

我們走過雨後的校園  
黃昏的暮靄充滿了魅惑  
逝去的時光已爬出了深刻的雋紋  
高瘦的大王椰依然臨風瀟灑  
臥地的韓國草依然蒼翠碧綠  
而我們的腳步又踩響了過往的足音

大學的夢是青春的呼喚  
社會的現實是殘酷而無情的爐  
我從激流中滑過  
我從暴風雨的黑夜中歷鍊過  
雖然路會滑倒，途上會遭遇泥濘的陷阱  
但我畢竟昂揚地挺身走過來了

把我們的英影拍攝下來  
把我們昔日的夢和歡笑捕獲下來  
大王椰不懂我們的幽默，依然神態自若  
韓國草也不懂我們的甘苦，依然閉目養神  
杜鵑花依然盛開，歡迎青春的壯麗和新鮮  
而鑲邊的流蘇以傘狀的雪白夾道佇立

幾番風雨  
我們又相逢於杜鵑花季  
且健碩硬朗地邁步於杜鵑花苑裏  
讓我們拾回已逝的悲歡  
讓我們再穩健地踏過這開濶的大道  
沒有落寞的悲哀，只有重逢的興奮與喜悅





## 參考文獻：

- 章子惠（1947）。台灣時人誌第1集。台北：國光出版社。
- 洪耀勳（1957）。西洋哲學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洪耀勳（1989）。實存哲學論評。台北：水牛出版社。
- 洪耀勳（1990）。哲學導論對話。台北：協志出版社。
- 洪耀勳（1932/1/30）。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台灣新民報400號。
- 思賢（1967/4）。洪耀勳先生的哲學導論對話評介。台灣風物第17卷第2期，頁79-80。
- 趙天儀（1982/6/15）。杜鵑花季的重逢—致吾師洪耀勳先生。笠，第109期。
- 殷海光著（2005）。殷海光書信集。賀照田編。中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李東華（2005）。論陸志鴻治校風與台大文學院。台大歷史學報，第36期，頁267-316。
-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1994）。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台北：前衛出版社。
- 朱耀源主編（2006）。不滅的暗夜螢光：承先啟後六十年的延平學院奮鬥史。台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 邱景墩（1996）。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頁99-137。
- 林義正（2002）。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台大校友雙月刊，第19期(2002年1月)。
-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主編（1998）。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
- 傅偉勳（1968）。西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



# 黃金鰲

1906  
~1997

——  
中等學校博雅教育的倡導者

前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李園會 撰文



政府播遷來台後，黃金鰲先生於1949年奉命接掌台中師範學校校長，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輝煌的一段。他在中師期間的幾項措施，至今仍為大家所津津樂道，包括了軍事化嚴格的生活教育；精挑細選敦聘名師任教；禮聘當代鴻儒碩彥來校演講；推崇中華文化、以儒家精神治校等。尤其邀請當代名人、學者、專家到校演講，場次之多，無人能出其右。學生受到的激勵，人格感化，以及提振學校研究風氣等，一直以來最為大家懷念。黃金鰲校長在中師服務11年，為中師奠下扎實的基礎。

1960年改派台中一中後，黃金鰲校長有鑑於高中的設校精神，以及台中一中學生之特質，乃推行「學生第一，老師至上」的治校精神。同時大力推廣「博雅教育」，讓師生自由結社，研究各方學說，一時之間，台中一中學風鼎盛，蔚為校園盛事，對於培育社會菁英人才貢獻良多。



▶ 台中一中-黃校長  
(圖：攝於台中一中校史室)

## 壹 生平

黃金鰲先生字冠宇，民國前五年(1906)生，安徽合肥縣人，為合肥縣望族。他自幼天資聰明，且極好學。中學畢業後，升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並獲畢業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學期間，曾於民國十六年(1927)代表師大參加第八屆遠東運動會，獲低欄第一名，三級跳第一名及高欄第二名。民國十八年(1929)參加華北運動會，又獲男子撐竿跳第二名。北師大畢業後。留校任教師大附中。這是師大畢業生的最高榮譽，因為當時師大附中乃全國首屈一指的中學，任教於該校的教師，都是出類拔萃的一時人選。

抗戰期間，黃金鰲先生隨政府退至後方，在四川受命籌設國立安徽第二中學，以安頓由安徽撤退到後方的中學生。後轉任桂林師範學院及西北師範學院擔



任教授。

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後，北師大復員，黃金鰲先生回北師大，擔任教授兼訓導長的職務。當時全國各地學生運動相當熾烈，唯獨北師大非常平靜，這完全得力於黃金鰲先生之貢獻。因此北平淪陷時，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特別派專機接黃金鰲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等學人出圍到達安全地區。<sup>1</sup>

民國三十八年(1949)七月，黃金鰲先生隨政府播遷來台，旋即受當時教育廳長陳雪屏之託，出任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校長。(1949~1960)

民國四十九年(1960)二月，奉調擔任省立台中一中校長。(1960~1967)

民國五十六年(1967)黃校長轉任省立台南師範專科學校校長。(1967~1972)

民國六十一年(1972)七月，黃校長自省立台南師範專科學校任內辦理退休。

民國六十二年(1973)，黃校長自公立學校退休後，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成舍我先生特予禮聘至世新擔任訓導長，至六十四年七月。(1973~1975)

民國八十六年(1997)四月逝世於台北，享年九十二歲。

黃金鰲校長終其一生，無論治事辦學，都以中華文化傳統思想的儒家學說為中心，為國培育很多優秀人才，堪稱是一代儒師，值得後人景仰和敬佩。

黃校長一生從事教育，在公務繁忙之餘仍讀書不輟，其在抗戰期間發表的著述均已散佚不存。現存者尚有十五篇，計有〈裴斯泰洛齊的教育精神〉、〈論語孟子與中國文化〉〈儒家為什麼創立倫理〉、〈我國師範教育宜融會書院精神〉、〈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展望〉等。<sup>2</sup>

## 貳 教育事蹟

黃金鰲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從未間斷。不過他在教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蹟，應該是從隨政府來台之後，受命接掌台中師範學校開始。當時他正值四十四歲壯碩之年，不管閱歷或學識都是人生最可以發揮的時候，而黃校長本身又儒雅嚴肅，廉潔耿介，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範。他到任台中師範學校之後，精選師資，創立制度，大力推動儒家文化，廣邀當時名碩蒞校演講，用中華文化的精髓涵養學生，為台中師範學校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也為國家社會培育優秀的國校師資和人才。<sup>3</sup>

1. 國立編譯館主編(民89)。教育大辭書(八)(351頁)。

2. 同註(1)，教育大辭書(八)352頁。

3. 王逢吉:台中師範學校軼事及人物誌，(3頁)。

擔任台中一中校長時，黃校長本諸高級中學是大學的預備教育，而台中一中則是中部地區首屈一指的高中學府，學生多以升入一流大學為職志，未來這些人都可能是國家的領袖人才或棟樑，於是提出「學生第一，老師至上」的治校原則。黃校長曾在一篇訪談中提到：「如果一個校長不信奉此一原則，那豈不成了校長至上？任何事情就可能只是為了配合校長想法在辦理，怎能有好的成果？」他同時在台中一中校園內推展「博雅教育」。影響所及，台中一中學風鼎盛，在他七年半任內，大學入學考試，台中一中就出了五位榜首。黃校長認為，那是因為他堅持此一原則之故。<sup>4</sup>

主持台南師範專科學校時，他以下列四個原則為辦學的方針：(一)知人善任、因事擇人，而不為人設事，(二)重視學術。除進行學術演講外，並繼續出刊學報。學風之盛，見於學生參加校際競賽時每能名列前茅。(三)愛護部屬。有功即歸功於任事者；有過則一身獨擔。(四)公私分明。嚴禁部屬干謁於私室。同時一本他一貫的儒師作風，重視儒家道統文化的發揚光大。民國五十九年南師紅樓整修，黃金鰲校長特地敦請總統府資政孔子第七十七代奉祀官孔德成親書「尊嚴師道」四字，刻在大理石上，置於紅樓正中央入口處，使師生朝夕惕勵自勉。<sup>5</sup>



▲ 黃金鰲校長於台中一中與大專聯考甲組榜首江偉龍同學合影（圖：台中一中校史室提供）

## 參 教育措施與貢獻

### 一、倡導嚴謹的生活教育

黃校長在中師的辦學理念，本諸師範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培育身心健全的國民學校優良師資。而國民教育為全體國民應接受的基礎教育，國民學校教師為全體國民的啟蒙老師，其一言一行，兒童均視之為楷模，影響至深又遠。故師範生在校期間的品德陶冶與生活教育至為重要。黃校長認為生活教育的重點，應在超脫平庸的生活，實現精神的生活，進而使生命的力量擴大，生命的價值提高。

4. 台中一中網頁(2007)。《時空長廊。光復以後蓬勃發展(1945-2000)》<http://www.tcfsh.tc.edu.tw/gallery/index.html>

5. 阿ken：1922年-台南大學紅樓(2007-10-19) <http://www.skyscrapers.cn/forum/archiver/?tid-67266.html>

至於生活教育的意義可以從下列三點來加以說明：<sup>6</sup>

### (一) 有效力的生活

效力是完成目的的一種力量，生活效力就是完成生活目的的實力，生命有沒有力量，先要看生活有沒有效力，所以必須要具備有效力的生活，才能保證生命是有力量的。我們在生活過程中，要隨時警惕，隨時省察，怎樣才不曠廢墜惰，玩愒歲時，要過一天有一天，應做的事則要過一年有一年的成就，這樣生活下去，才有意義。大禹治水，疏九河，淪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這種愛惜光陰，及時努力的精神，充分證明是有效力的生活，為後人歌頌不輟。陶侃亦曾以惜時勉勵世人，他說：「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人生只要能做到像孔子在川上感慨所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愛惜光陰，努力無間，生命雖短暫，仍然限不住生活上的成就。生活有成就的人，他的生命才會發出光輝和熱力，生命的光輝和熱力一經發出，則不致消失，而永恆的存留於人間。那就是說個人隨逐着整個生命的長流，而使精神永垂不朽，這便是有效力的生活的真義之所在。

### (二) 榮譽的生活

榮譽是一種實質，而不是一種形式。「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這類的思想是屬於虛榮，而不是榮譽。孟子所說：「仁則榮，不仁則辱」正是說明榮譽的實質和榮譽的價值，根據孟子這句話的意義，可為榮譽的生活下一註腳，即凡是為人類貢獻而生存的，就是榮譽的生活，完全為個人私慾而生存的，就是羞辱的生活。古今中外對榮譽的觀點幾乎是一致的，都把榮譽與生活看成是一起而不可分的整體，因之我說榮譽就是生活，生活應該是榮譽的，有榮譽就有生命，沒有榮譽就沒有生命。

### (三) 意志的生活

拿破崙說「難」之一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這是說明他對難的否定，也正表明他的意志。愚公移山也是不怕困難而憑藉毅力作持恆之進行者。國父的革命精神，更是基於堅強的意志，當時事工之辛苦艱難決非吾人所能想像。不過意志屬於理想的行為，需要在生活過程中繼續不斷的磨鍊，才能日益堅強，這就是所謂

6.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民92)。成長與蛻變—中師八十年(13頁)。

意志的生活。有人說獅子勇猛無比的習性，是由於牠成長在大沙漠中，常常得不到水喝，得不到食物吃的困難生活過程中鍛鍊出來的。就獅子來說，這就是牠的意志的生活，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偉人的意志的生活。普通人過的生活，都不外是感覺的生活，在生活過程中，一味的追求安逸與順適，殊不知人力可以勝天，征服自然的精神，正是產生於人類意志的生活中。人類若是放棄意志的生活，專營感覺的生活，則人類前途將不堪設想，故吾人對意志生活的意義，不可不審察與領悟。

總之，生活教育的重點在實現精神的生活，而欲實現精神的生活，則有賴於堅苦卓絕自我鍛鍊的素養功夫，他人無能為力。

至於生活教育的具體措施方面，黃校長對中師學生的生活要求，採軍事化管理，要求服從守紀律。新生於入學時，均須自備規格統一的木箱、工具箱與木凳，以求整齊劃一。並規定學生全部住校，生活作息非常有規律。飯前要整好隊唱軍歌；等大家就座，盛好飯菜，一聲令下，才一起開動。晚點名也要集合唱歌；就寢起床時間一致；棉被要求疊成豆腐塊；男女生之間不可私下交談。<sup>7</sup>

其次，嚴格執行各種考試，包括隨堂考查、月考、學期考試及畢業考試。除隨堂考試外，均採集中舉行，由教師審慎命題，嚴格監考，仔細評分。黃校長認為唯有如此，始能端正學風，提升學生程度，培養學生誠實守法的精神。

另外在軍訓課程方面，因應當時戰亂的時代背景，教官要求非常嚴格，每個動作均要求確實無誤，連女學生也要持槍操練。如此的管理方式讓學生養成了服從紀律的好習慣。

由於就讀台中師範學校的學生大都是來自農村的子弟，加上學校的生活管理嚴格，因此，學生難免給人留下土包子的印象。由謝武雄教授在〈那段土土拙拙的日子〉一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學生在嚴格生活教育之下，所展現純樸無邪的一面。

台中師範學校的學生在台中市，是有名的土包子學生，那時候男生進校的入學成績跟台中一中的錄取成績一樣，女生跟台中女中的錄取成績一樣高，但是到台中師範學校報到就讀的學生，絕大部分是農家子弟，尤其是一些較貧困的農家

7. 曾憲華：花香四溢實滿枝——普師生活拾憶(3頁)。



孩子，因為學校公費待遇，全校學生又全部住校，在統一制式的管理下，衣食住可以說都是取之學校，所以生活上可說是千篇一律。學生在衣著上，由於教官管教較嚴格，學生不可有任何的奇裝異服，黃色卡其制服，從上衣到褲子，都是規規矩矩的，很少有人敢把制服修改一下，就連女生的裙子也必須超過膝蓋以下，不可隨便剪短。學生到教室或出校門，必須穿制服外，還要戴帽子。男生頭髮是理平頭的，女生是道地的清湯掛麵頭，而且髮長不可過耳。所以那時候，在台中市區，看到穿黃卡其，戴平頂帽(無人敢摺)，走在街上還必須成二路縱隊的，那必定是台中師範學校的學生，不要說是學生可以分辨出來，連一般市民也都認得出師範生。不只如此，師範生上街，大多逛逛書店，偶而買本書，再不就是吃一碗蜜豆冰，很少到街上去消費的，所以一般店員只要看到師範生進店，大多不存有賣東西的意願，所以那時，全台中市都知道師範生很土。

尹蘊華老師在其〈一柱心香獻四願〉一文也說：

黃校長雙管齊下，一面整頓學風，一面提振校風。學生一律住校，剃光頭，服裝儀容，莊嚴整齊。每日旭日初升升旗典禮，早晚自習合計三小時。門禁森嚴，學生非特殊事故，不得出校門一步。週末假日，往往也有活動排列，學生常三數週才得回家一次。一時校風、學風大振。目前，各界蔚為國用的傑出校友，率皆當年關在學校三小時早晚自習，苦讀出來的啊。

## 二、激發學生淬勵奮發的志氣

黃校長辦學期許學生未來要成為能擔當時代重任的有為青年。除激勵學生努力求學外，並利用週會時間，邀請當代鴻儒碩彥來校演講，以激發學生志氣，使能取法乎上，知所做法。先後應邀到中師演講者有胡適、錢穆、吳俊升、徐復觀、溥心畬、杭立武、藍文徵、唐君毅、鄧萃英、楊公達、梁實秋、張研田、沈亦珍、孔德成、李慶、梁寒操、張其昀、蕭一山、羅剛、鄧昌國、牟宗三、傅秉常、何應欽、劉真、吳德耀、楊亮功、林致平等多位。<sup>8</sup>應邀到台中一中每星期週會演講的學者，如徐復觀、梁實秋、梁容若、蕭一山、趙麗蓮等皆為當時學有專精，或文史學界的大師，讓學生留下深刻印象。<sup>9</sup>

## 三、強調課外活動，推動文武合一教育

黃校長所主事的學校，不僅重視學生的學業，培養讀書風氣，學生在學業上

8. 黃金鰲(民69)。中師十年名人來校講學回溯。中師校友會刊創刊號。

9. 同註4



有很高的成就，而且重視各種學生課外活動，講演、話劇、音樂、舞蹈、游泳、賽跑以及各種的球類比賽都很多。在中師時遇到國定紀念日或校慶，學校就會舉行大閱兵、戰鬥訓練大演習。邀請有名的將軍當大閱官，例如：劉安祺將軍、周至柔省主席、劉玉章將軍等。在軍樂聲中，分列式隊伍行經司令台前，肅穆莊嚴，步伐整齊，氣勢雄壯威武。隨即軍事演習，炮聲槍聲中，操場變了戰場，情況非常逼真，震撼觀眾心弦，充分發揮所謂文武合一的教育。

校慶時舉行全校運動會的大會舞，可以說是一項創舉。由劉玉芝老師指導的大會舞，花團錦簇，婀娜多姿，不僅風靡全校，而且成為他校相繼模仿的對象。此外，更值得喝采的是當參與校外市區大遊行時，學校軍樂隊的表現最為突出，陣容完整龐大，稱得上是全市第一。

台中師範學校學生素質之優異，可以從對外比賽成績看出。光復後的台中師範學校是屬於高中程度，每次參加台中高中高職學生之作文比賽、演講比賽，都勝過台中一中、台中女中等頗有名氣之學校；而美術、音樂比賽之冠軍更非台中師範學校莫屬。至於對外的體育競賽更是不在話下，幾乎年年拿下台中市運動大會之總冠軍，連大學程度的農學院(現在的中興大學)亦望塵莫及。值得一提的是台中師範學校排球隊，曾在民國三十七、八、九年連續三年稱霸於台灣全省高中職校之排球比賽，連續三年比賽的選手皆是原班人馬，寫下全省高中職校排球比賽由同一學校之同一班級連續三年拿下冠軍杯之輝煌紀錄。<sup>10</sup>

#### 四、倡導博雅教育，鼓勵師生研究風氣

在台中一中服務期間，黃校長深刻以為一中的學生不應以升學成就為滿足，除課業外更需要課外的學藝活動來充實學習生活，以培養未來在各個領域的領袖人才。因之他特地在校園裡廣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所謂

「博雅教育」也就是讓學生可以在老師指導下組織各種研究學會，相聚講習，深入探討各方學問，藉以提高學術研究的風氣。這在當時的政治時空環境裡，不管結黨論政或結黨論學，其實是非常大膽的行徑，有可能因此引來牢獄之災。但是



▲ 台中一中-敬業樓  
(圖：台中一中校史室提供)

10. 吳雄仁：五十年前之中師生活。

11. 同註4

黃校長高瞻遠矚，認為教育像一中這種優質的學生，必須要有培養領袖人才的積極作為，「博雅教育」正是培養未來領袖所需要的教育。如此一來，活絡了整個校園的學術討論和研究風氣，而黃校長本身也是身體力行，勤於作學問，有學生指出有一次學生到圖書館要借《宋元學案》，圖書館的管理員告訴他那本書先一步被校長捷足先登借去了。<sup>11</sup>

其後由於台中一中的學生人數日漸增加，教室不敷使用，就增建一棟18間教室的麗澤樓。為什麼要取名麗澤樓呢？黃金鰲校長在麗澤樓記裡頭說，樓名取《易經》〈兌卦〉：「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期勉一中師生「君子相聚講習，傳遞不替，如雨澤相連潤，說（悅）之盛也。」黃校長治校推動自由學風於此可見。<sup>12</sup>

### 五、精選師資，禮聘專業教師

優良學風是必須經過長期孕育培養而成，而師資素養應是主要關鍵。黃金鰲校長在中師任內，嚴選師資，特別注重品德、學識與服務的熱誠。同時廣聘許多名流學者教授到校任教，使中師師資陣容非常堅強，例如膠彩畫家林之助老師、國畫大師呂佛庭老師、一代儒學宗師牟宗三教授的嫡傳弟子周文傑老師。當時的台中師範是儒家學術思想的搖籃<sup>13</sup>。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師範學校位階等同於高中階段，但以黃校長治校的方式來看，卻是以辦大學的方式在辦中學。一時間，中師的學生戲稱自己就讀的台中師範學校為「台中師範大學」。因為學校的老師們個個學識好，名氣大，教學認真。

黃校長出掌中師期間，曾先後聘請侯璠、劉求南、王孟仁、張崇賜諸先生為教務主任，張起鈞、張孚熙、劉世澤諸先生為訓導主任，陳紹鵬、高葆光、陳光棣、岳華、李常仁諸先生為總務主任，張明文先生為實習主任，劉世澤、陳寶秋兩先生為實習輔導主任，共同推行校務行政，都是一時之選。

黃校長認為，要辦好學校，必須禮聘



▲ 民國66年6月第一期的台中師專學報及中師學報創刊號（圖：台中一中校史室提供）

12. 同註4

13. 吳養春：回憶一代儒師-黃金鰲校長。(2007.07.08) <http://tw.myblog.yahoo.com/wu200620/article?mid=734&prev=762&next=702&l=f&fid=5>

專業的老師，因為師資水準高，學生程度自然提升。黃校長對於資深教授非常敬重，每逢年節都親自致送年糕，以示禮賢。<sup>14</sup>

### 六、嚴格考核教師的品德、學識與服務熱誠

黃校長接長台中師範學校後，對教員之聘請極為慎重，幾乎近於苛求。第一學期解聘教員十七人，為全部教員總數的三分之一。第二學期解聘十八人，其餘的雖予以繼續聘請，卻經過嚴格的考驗，每一學期結束後都有遭到解聘的可能，壓力之大，人人自危。大家莫不誠惶誠恐，全力以赴。擔心一旦解聘，則不堪設想，海天茫茫，真不知何以為稻糧謀矣？<sup>15</sup> 因此一旦獲聘，所有的教師不論那一門課程，不論為德、智、體、群，真正做到四育並重的教學，並使學生具備彈奏風琴、板書、繪畫、游泳、體操、演說、辯論等技能，是道道地地為培養一個未來的小學教師，所投注的一種教育。導師們更視學生如自己的兒女一樣關心照顧，因此，對學生人格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林見昌教授在〈中師〉一文中說：

台中師範學校當時的師資可說是一流的，不但學識好，而且為人師表的典範，對學生做到了身教言教。尤其是導師對同學的關懷照顧，循循善誘更是影響深遠，幾乎所有同學對導師的感懷是畢生難忘。<sup>16</sup>

### 七、設定專題講座，延聘專家學者蒞校講演，提升學術水準

在黃金鰲校長主掌中師任內，重視思想及學術的研究，特別聘請學術界學者、專家與政界顯赫名人蒞校講演，對提升學校的學術水準，還有對學生人格發展的潛移默化，都有極大的影響和幫助。黃金鰲校長在〈中師十年名人來校講學回溯〉一文中說：<sup>17</sup>

我在台中師範任內，自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至四十九年二月，前後廿一個學期，共舉行五十五次學術講演。主講人皆係名流碩彥，影響於學風，至深且鉅。今逢中師同學會為慶祝母校創校五十七週年，特發行同學會刊創刊號，用資紀念。個人欣慰之餘，謹將五十五次學術講演之題目，主講人姓氏，及講演時間，披露於同學會會刊之上，俾各級畢業同學藉此回顧一番，而生嚮往之心，幸何如之。至歷次講演之內容，雖皆留有完整之紀錄，因限於篇幅，不能舉述。所幸各級畢業同學在校肄業時，對此名流講學之舉，素極珍視而置重，各人皆留下深刻之印象。不難追數其梗概也。

14. 陳微毅：大學之道 誰來引路？(2002.07.30) <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lipo1/313.shtml>

15. 同註3，5-6頁。

16. 林見昌：中師，(3頁)。

17. 同註8。

18. 同註8，35頁。



黃金鰲校長擔任台中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中師十年學術講演一覽表<sup>18</sup>

題 目	主講人	時 間
師範生與中國文化	牟宗三	四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教育學的將來	吳俊升	四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民族主義與台灣	羅 剛	四十三年四月三日
我的師範學校生活	徐復觀	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鎮海會議的展望	杭立武	四十三年七月九日
從中國社會看中國文化	錢 穆	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極權民主與「和平共存」	楊公達	四十三年九月三日
畫論	溥心畬	四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孔子對人類的貢獻	徐復觀	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紀念孔子誕辰		
朱舜水	藍文徵	四十三年十月七日
聯合國制裁侵略與共產集團新侵略行動	楊公達	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人生三境界	梁實秋	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美國的自己作運動	張研田	四十四年元月十日
國校教師在職進修問題	沈亦珍	四十四年二月九日
台灣海峽問題	楊公達	四十四年三月十日
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	徐復觀	四十四年五月四日
現代師範教育趨勢	沈亦珍	四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儀禮著成之時代源流傳授及命名	孔德成	四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歐遊觀感	李慶	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聯合國與冷戰	楊公達	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最崇高之師範	梁寒操	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九十誕辰紀念		
象山學術思想的時代課題	徐復觀	四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新教育運動的新評價	吳俊升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戰爭邊緣的國際局勢	楊公達	四十五年三月五日
關於第二屆亞盟會議	杭立武	四十五年三月三十日
何謂自由	張佛泉	四十五年四月十日
民族文化之復興	蕭一山	四十五年五月十日
新文化的種子	張其昀	四十五年六月十日



兒童的情緒心理	胡秉正	四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遠東的危機	楊公達	四十五年十一月十日
有機物之處理與利用(西太平洋 國際環境衛生會議所討論之主要課題)	盛澄淵	四十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略說學問之生死關	唐君毅	四十五年十二月十日
論民族與民族性	羅剛	四十六年元月七日
中文的幾個問題	張瑄	四十六年三月卅日
體育的新趨勢	魏振武	四十六年四月十日
艾森豪主義與遠東形勢	楊公達	四十六年五月十日
中庸的作者及其思想問題	孔德成	四十六年九月廿八日
漫談東北	李錫恩	四十六年十月七日
旅俄見聞回憶片斷	傅秉常	四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從聯大看國際形勢	楊公達	四十七年元月十日
美國的科學進步與人民生活	李慶	四十七年二月廿六日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羅剛	四十七年三月九日
所謂高階層會議問題	楊公達	四十七年四月六日
論義務教育	鄧萃英	四十七年九月廿九日
台灣海峽問題的回顧與前瞻	楊公達	四十七年十月五日
世界道德與重整運動	何應欽	四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戰爭邊緣上的國際局勢	楊公達	四十八年三月廿三日
劉銘傳在台灣	羅剛	四十八年五月四日
出席國際科學會議觀感	林致平	四十八年五月廿一日
美國的師範教育	沈亦珍	四十八年十月廿一日
美國的衛生教育	佟世俊	四十八年十一月四日
赫魯雪夫訪美後之國際形勢	楊公達	四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當前亞洲高等教育問題	吳耀德	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音樂教育問題	鄧國昌	四十九年元月四日
怎樣做一個好教師	楊亮功	四十九年元月廿九日

當時應邀到台中師範學校講演的名人，除了上表所列諸大師以外，還有程天放、陳雪屏、劉季洪、胡適之、梅貽琦等大師級人物，因為不是專題講演，所以並沒有列入五十五場次的學術講演內。還有台中師範學校本身在校老師所作的專題講演，前後也有四十場次之多。



此外，為了提倡學術研究風氣，台中師範學校還特地出版《中師學報》，詳細刊載前述名人的講演內容，以及教職員們的研究著作心得，內容豐富而精彩，可讀性極高，深受學校師生的喜愛，也引起當時教育界和學術界的矚目。《中師學報》自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十日起創刊至民國四十九年一月止，總共出版五十期。除了出版《中師學報》之外，也成立文藝研究社、青年寫作協會，指導編輯校刊，邀請作家講演或舉行文藝座談會，培養出若干文壇上的名作家。<sup>19</sup>

王逢吉教授在其〈台中師範學校軼事及人物誌〉中也提到當時蒞校講演的名人的風采。

北京大學校長後任中央研究院長胡適之博士，講題為「孔子思想」，胡博士剛從美國回台灣，一派大儒風采。

香港新亞學院院長後來台灣定居的大儒錢穆先生蒞校講演，講題為「中國文化思想問題」。娓娓細讀如數家珍。

遜清王族溥心儒博士，講中國文化道德問題，並作畫及書法示範。當場揮毫，作品贈送師生作為紀念品。溥先生不僅留德習機械科學，也是「南北溥」之稱的著名大畫家，來台灣後任師範大學教授，道德修養重於繪畫。

清華大學校長後回到台灣任教育部長的梅貽琦博士，講題「為人之善，好為人師」，輕鬆詼諧，語多幽默。

北大校長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主席委員蔣夢麟博士，講題有關農村教育問題，鑠鑠沈毅，有領袖風度。

新儒家一代哲學宗師牟宗三先生，先後任台灣東海大學及台灣大學研究所，香港新亞書院中文大學教授，講中國哲學的特質，嚮永生動，易懂也易忘記。

中興大學及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徐復觀先生，講孔孟荀子思想及一個師範生的回憶等，徐先生主編民主評論月刊，立論精闢，氣勢宏偉。對當時的時政有諫言，震撼朝野。後去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擔任教授，曾自謙「半路出家」，徐先生為日本士官生，並參與國家機密。

著名大作家，師範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講題為「人生三境界」，梁先生是三十年代新月派文壇健將，曾與左翼文壇領袖魯迅筆戰。是自由主義作家，講詞至今不忘。

<sup>19</sup> 同註3。

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為東北教育界先進，講教育問題與戰時教育。是一位力行實踐，刻苦自勵的大教育家。

任卓宣又名葉青，名政論家，政治大學教授，講三民主義思想哲學，時任宣傳部長，曾經是著名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民國十五年北伐成功後所寫政論震撼論壇，為青年左派份子崇拜的偶像。後思想轉變成反共思想家，論三民主義有其獨特的創見。清「共」時期，幾遭處決。

中興大學農學院院長李慶博士，講考察歐洲戰後農業經濟復興問題，報告歐洲各國農村現狀，非常生動。

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五四運動健將，駐印度大使，講印度問題及斷交經過。羅先生的「新人生觀」為抗戰時期在中大的演講集，為傳世不朽之作，青年人的偶像。

國際問題專家楊公達先生，中興大學教授，講國際現勢及時事分析，內容多引用專家之言，也能頓開茅塞。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兼訓導長陳雪屏博士，講教育心理學。陳先生曾任青年部長，台灣省教育廳長，台大教授。與胡適之先生關係極佳，講詞條理分明如同上課。

名政論家何浩若先生，曾任政治部第三廳長、經濟學博士，講大學時代留學生活，饑寒交迫中苦修博士趣事。

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劉崇鉉博士講自由思想論，曾著「民主與自由」一書，介紹西方自由思想，極具啟發作用。

軍政大員蒞臨學校參觀講演的有：

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二級上將何應欽將軍，講抗戰八年之經過，詳實可靠，為歷史的見證人。他是北伐，抗戰名將，龍潭之役擊敗孫傳芳，建立國民革命軍成功的基礎。彪炳千秋，溫文篤厚，平易近人，儒將風範。

東北邊防海軍總司令、山東省主席、海軍上將沈鴻烈將軍，講華北抗戰經過，被中共八路軍「吃」掉，被逼出山東省。省民對他非常懷念，勤政清廉，與民共甘苦也。

警察總司令、台灣省主席黃杰上將，北伐勇將，長城各口抗日浴血大戰，名震全國。後大陸淪陷退入越南富國島，忠義不屈，保全大節，終於率領全軍返回台灣。國學有修養，尤善於對聯，黃埔系統的儒將之一。<sup>20</sup>

20. 同註3，30-34頁。



## 八、崇儒尊孔，發揚中華文化

黃金鰲校長在中師時的治事辦學總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推廣和發揚儒家文化，不遺餘力，其本身對儒家文化也有深入的研究。離開台中師範學校後，仍然很懷念在台中師範學校裡推動的儒家文化學風，於是就在台中一中校園內，籌組一個以研究儒家學說為主的“尚友學會”，群聚一些教授、學者及同好等，深入研讀儒家思想。吳養春先生在〈回憶一代儒師~黃金鰲校長〉一文中有清楚的敘述：

黃校長交待我籌組“尚友學會”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繼續做學問，發揚儒家文化。這是他一生的志趣，也是一生一世的理想。最初尚友學會創立，指導老師除黃金鰲校長外，尚有韋政通、陳問梅、周羣政、周文傑等教授。我在黃校長的指導下，擔任召集人，學員有：1.吳養春 2.沈秋雄 3.謝四海 4.林義男 5.黃溪南 6.蔡瑞圖 7.王讚源 8.林景淵 9.曾碧玉 10.張國箴 11.黃天成 12.方正盛。每週日一次聚會，在省一中的圖書館研讀儒家思想，每次定一主題，由一位教授擔任導讀，第一次會議由黃校長主持，並主講儒家思想與文化，緊接著第二週、第三週由韋政通、陳問梅教授主講荀子及老莊思想……。當時辦學、辦教育最禁忌的是學生聚會結社，黃校長為發揚儒家思想文化，竟甘冒可能丟官，甚至坐牢的危險，堅持學術思想自由，積極研究學問，發揚儒家思想，真是一代儒哲。<sup>21</sup>

## 肆 教育影響與評價

身為校長的人，他所影響的首先就是學校的校園氛圍、學生的學習風氣，還有沐浴其中受教的學生本身。黃金鰲校長在台灣主持過中師、中一中和南師三所學校。這三所學校都在黃校長任內期間培養出優良的學風，學生不僅認真讀書，成就個人的知識，也因為黃校長重視生活教育，更以儒家文化豐富校園，陶冶師生，對學生人格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在中師時他曾自稱辦學有二句話，那就是「教授治校，學術第一」。他尤其強調要尊師重道，重視學術及行政管理科學化。在主持師範學校的時候，就是以中國傳統思想儒家文化為中心，尊師重道，精選當代名師，為國培育具有傳統文化特質、最優秀的國小師資為使命，並使當時的台中師範學校儼然成為儒家學術思想的重鎮。

台中師範學校原本就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只有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才能獲得錄取，因此，學生入學後大都專心於學業。黃金鰲校長上任後規定學

21. 同註13

生一律住校，並用嚴格的軍事管理方式要求學生遵守校規，平時並規定不得不假外出，門禁很嚴，所以，學生都循規蹈矩，認真用功讀書，很少有機會在外面感染不良的社會習慣。



▲ 黃金鰲校長於台中師範時期頒獎情形  
(圖：台中教育大學校史室提供)

黃校長在每週週會，經常對學生講解「至聖先師」孔老夫子的「忠恕」之道，要學生畢業後，不但要做「經師」，更要做好「人師」。尤其在行為實踐方面更有具體的做法，比如在校區內男女生走路都嚴格區分，界線分明；課餘男女生更不可以隨便交談，期使每一個學生都陶冶成「堂堂正正的師範生」。<sup>22</sup>

因此，學生畢業後大都具有專業、敬業精神，久任教職，堅守崗位。在品德方面都是誠實、正直，守法守分，勤奮任職者居多。在工作當中亦多能追求新知，充實自己，提高教學效率。因此，形象普遍良好，成為社會的楷模。有不少資深教師更靠自己進修參加督學、校長、主任的甄試，擔任地方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工作，對國民教育工作的發展與改進貢獻良多。有一部份學生畢業後參加普通考試、高等考試，轉任行政職務與法官、律師、會計師等專門職業。尤其是參加法官與律師的高考或特考，成為台中師範學校畢業生所嚮往的目標，以致於考取的人數竟然僅次於台灣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成為法律界之美談。

有的學生畢業後想繼續升學參加大學聯考，不少以高分考上文學院、法學院、工學院，甚至於醫學院醫學系。由於師範生不但資質好肯用功，而且學校的老師們也鼓勵他們要不斷進修，甚至於有的老師要求畢業生訂定契約，沒有考上高普考或大學聯考不得結婚的。因此，據說有些畢業班考上高普考和大學聯考的比率竟高達百分之八、九十。這些人後來不論在教育界、司法界、行政界與工商界也都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蘇清守教授在〈普師生涯回顧〉一文敘述當時中師學生的讀書風氣說：

學生們的求知慾望很強，讀書風氣很盛，所讀的書籍包括課內的和課外的。前者為了分發和升學，後者是為了準備普通考試和高考檢定。當時師範學校的學生一律住校，每天有早自習和晚自習，讀書的時間十分足，但是對於求知若渴，準備校外考試的同學來說，仍然不夠。於是晚

22. 李銘秋(民72)。憶母校生活二三事。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創校六十周年改制廿三週年校慶特刊(116-117頁)

23. 蘇清守:普師生活回顧。

上熄燈過後，有的利用樓梯通道的燈光埋首苦讀；有的利用廁所角落的燈光猛開夜車，甚至有的利用手電筒在棉被裏頭看書。<sup>23</sup>

除了讀書風氣很盛之外，學生們的興趣也是多方面的，有人富於文采，有人長於議論，各有所長不一而足，卻同時能在某一方面期許自己有所成就，並能互相切磋琢磨。因此，當時畢業生離校之後均能繼續努力學業，修身養性，無論是否繼續深造或堅守教育崗位，或參加高普考檢定，在教育界、司法界、行政界與工商界方面均有相當的成就。據統計當時考取司法官的人數，僅次於台灣大學法律系，超過東吳大學法律系甚多。<sup>24</sup>

不過，師範生在嚴格的生活管理之下，也產生了一些弊病。因為在一律住校、門禁森嚴的生活管理之下，學生的生活往往與外界隔絕，容易產生見識不廣，度量狹窄，斤斤計較的個性。此外，由於生活單純，缺乏社交活動，以致於不但社會活動能力較差，作風也較保守，較沒有冒險開創新局的膽識，因此，師範生的言行舉止處處都會流露出「師範型」的特質。如果能夠在團體生活之中，多讓學生有自我管理的空間，課堂教學思想言論更開放更活潑一些，並讓學生多和外界接觸，增廣他們的見聞，則能破除「師範型」的窠臼，而成為胸襟更開闊，思想更自由，視野更寬廣的教師。<sup>25</sup>

上述的缺失，黃金鰲校長應該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離開中師到了台中一中之後，便提出「學生第一，老師至上」的治校原則，除了一貫的尊師重道外，更倡導「博雅教育」，學生可以結社講學，在這種自由的學風下，師生競合努力，蔚為中部首席學府的榮景。這對台中一中學風影響甚大。台中一中的〈時空長廊〉有如下的描述：

五十四年，黃校長接受專訪，認為一中在「Liberal education」這方面仍需努力，而非以升學成就為滿足，即使離開一中數十年，其慧眼卓識及深刻反思之處仍令人敬佩。……而每星期週會，則邀請學者到校演講，如徐復觀、梁實秋、梁容若、蕭一山、趙麗蓮等皆為當時學有專精，或文史學界的大師，讓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有的班級還會請校長與學者到班上演講。黃校長提倡自由講學與尊師重道的作風，對當時學子影響甚大。據校友回憶，當年校園南北皆種七里香，高逾人身，校園異常幽靜，圖書館附近尤多雅趣。其時班上有同學用筆合抄《王摩詰全集》，有的則讀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另有同學下課則相互辯論曾國藩之事功與文章，文風之盛，由課餘雜談鱗爪，可見一斑。當時一中生在高中階段，便有大學生作學問氣息者，所在多有。<sup>26</sup>

24. 同註3，12-13頁。

25. 李國會：台中師範學校畢業生特色。

26. 同註4。



## 參考文獻：

中師校友會刊創刊號（1980）台中市：國立台中師範學院。

台中師範專科學校（1983）。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創校六十週年改制廿三週年校慶特刊。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1993）。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李園會（1996）。光復後之台中師範學校。

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教育大辭書(八)。

國立台中師範學校編（2003）。成長與蛻變—中師八十年。



# 徐傍興

1909  
~1984

奉獻鄉梓的教育家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校長 涂順振 撰文



大將<sup>1</sup> 徐傍興博士，1909年(明治42年)1月29日，生於今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卒於1984年8月3日，祖籍廣東蕉嶺，為高屏地區客家六堆<sup>2</sup>極具影響力的菁英。

徐傍興早年畢業於高雄州立中學(1929年，今高雄中學)、台北醫學專門學校(1934年)，並於1944年榮獲台北帝國大學博士學位，是台灣光復後台大醫院第一外科首任主任(1945年)。

徐傍興先後開設臺北徐外科醫院(1951年)、高雄徐外科醫院(1956年)、並捐祖地及巨資創辦屏東縣私立美和中學(1961年)及私立美和護理專科學校(1966年，今美和技術學院)。亦為高雄醫學院(1954年，今高雄醫學大學)創校董事，中山牙醫專科學校(1960年，今中山醫學大學)之首任校長。終身奉獻醫學(療)、教育及棒球運動。他一生的貢獻，就如客家電視臺連續劇《大將徐傍興》的描述：

- ~因為他，點燃了窮孩子們的棒球夢。
- ~因為他，升學之路不再長途迢迢。
- ~因為他，窮苦的人得以從病痛解脫。



▲ 徐傍興照  
(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 前言

一位老病人報恩的故事<sup>3</sup> 「院長、夫人：謝謝！感謝院長和夫人在30多年前的照顧和幫助！……。」這是前些日子一位老先生，留在台北徐診所的一封感恩的信。

今年(2007年)4月4日中午，一位中年人攙扶著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來到北市甘州街的徐診所，此時正是休診時間，出來接待的是在徐外科服務已40多年的曾女士，這位訪客操外省口音，很禮貌地問：「這裡是不是30多年前在南京西路的徐外科醫院？」曾女士肯定地說：「沒有錯。」老人情緒有點激動地說：「我終於找到了！」老人接著又問：「院長夫婦在不在？」「您是說老院長徐傍興嗎？」「對！就是他們。」曾女士低聲地說：「他們都已往生了！」這時老人頻頻擦拭著淚水，站在一旁的中年人也掏出面紙替老人拭淚。老人情緒稍微平復後才翻開上衣，指著肚皮約15公分的疤痕慢慢地說：「大約30多年前，我的胃病幸經院長夫婦兩人的照顧才康

<sup>1</sup> 徐傍興博士生前身邊的人平常用日語稱呼徐博士「大將」，稱其夫人「參謀長」。

<sup>2</sup> 清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引起閩客械鬥，當時高屏地區客家人按地域組成民兵抵抗，而後客家聚落依此營隊組織演變為六堆，甲午戰爭割台後，成為抗日組織。

<sup>3</sup> 美和高中，《美和青年84期》，頁10。

復，那個時候我們的環境實在沒有辦法，如果不是院長夫婦仁心仁術，我當時可能已無救了。」然後他拿出一個標準信封袋，內裝10萬元及一封短信，拜託轉交給徐傍興院長的家人，曾女士一再婉拒，這時身旁的中年人才表明他是老人的兒子，希望能達成他父親一片報恩之心，才勉強收下。經徐傍興的子女討論之後，認為父親生前最重視教育，把這10萬元轉贈給他最關心的美和高中，當作校務發展基金。

## 貳 生平

### 一、家世

#### (一) 樂善好施及重視教育之祖德

徐傍興博士，先祖於1788年移民來台，落腳於今屏東縣麟洛鄉，勤奮墾殖，終於有成。祖父徐懷禮(字敬修，1838~1895年)，因見當年洪水氾濫，於1879年遷居於南鄰之內埔鄉美和村(距麟洛鄉約8公里)，並承其先祖勤儉開拓之精神，結合當地仕紳，開鑿水圳，以提高稻米產量。因待人誠信，經營有方，頗受好評，後又投資製糖、碾米、釀酒等產業，富甲一方，但富而不驕，反而樂善好施，有求必應，村民因感念乃稱頌他為「有應公」<sup>4</sup>。

徐傍興之父友祥公，承襲家業，並特別重視子侄教育，尤其是漢文教育，延攬當地秀才黃菊如、李福如等人前來講學<sup>5</sup>，更提供鄉親子弟免費就學，影響所及，使鄉里文風蔚起，而徐家子弟亦刻苦向學，成為醫師世家(徐傍興及堂兄弟、子侄等20餘人醫科畢業)。

#### (二) 良好的家庭教育及人格養成

徐傍興雖為獨子，但受其父友祥公身教、言教之影響，並無富家紈袴驕縱氣息，例如，徐博士出身地主家庭，稻穀收成後通常都寄存在碾米廠，有一天，徐博士的父親叫徐博士到米廠去折算現金，老闆多算了現金，徐博士未當面點清，就逕交給他父親，他父親發現多拿了錢，告誡徐博士：「做人不要佔別人的便宜。」吩咐徐博士專程把錢送還，並向米廠老闆道歉。徐傍興生前一再懷念母親之教言：「做善事、積陰德，必有好報。」<sup>6</sup>因此，「誠實、做善事」的家訓，正是他從小承襲的珍貴資產，深深影響人格發展及處世態度。

徐傍興深受父親重視漢文教育的影響，在啟蒙教育中，就已念誦《三字經》、《千家詩》及《增廣昔時賢文》等中國古典，奠定了深厚的漢學基礎。入

<sup>4</sup> 徐富興，《徐家近代史考》，頁9。

<sup>5</sup>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頁224。

<sup>6</sup> 美和高中，《徐傍興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徐博士傍興先生生平事略》，頁2。

公學校後開始看《三國》、念《水滸》、口吟〈關關雎鳩〉。又因小學放學後，必須牧牛，在田野中嬉戲、唱山歌，這種教育方式及成長經驗，造就了徐傍興多元興趣、崇高道德觀念及豪爽浪漫的人文情懷，「他曾在宴會中即興大聲朗誦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亦在中風之後還能吟誦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sup>7</sup>

唱客家山歌更是徐博士終身樂趣之一，根據美和中學前校長李梅玉先生口述，徐博士特別喜愛哼唱客家情歌，如「未曾來雨先起風，必定阿妹沒老公；未嫁女人看得出，乳姑會釘面會紅」、「欖樹開花花欖花，阿哥欖上妹欖下；掀起衫來等哥欖，等郎攬來就回家」等<sup>8</sup>，足見徐博士自然率真的一面。

另一方面，「也因他從小嗜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章回小說，不但養成日後愛護鄉土、關懷弱勢及講求義氣的胸懷。尤其在其興學、行醫、推展棒運及對政治人物的扶持中，「禮賢下士」、「仗義疏財」、「濟弱扶傾」等《三國》、《水滸》的處世謀略和智慧，處處表露無遺，尤其揚棄了草莽英雄的惡習，卻實踐了綠林好漢中重要的道德標準。」<sup>9</sup>

## 二、求學及婚姻

徐傍興博士，1909年(明治42年)1月29日，生於今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為二房邱華妹所生。1922年徐傍興自內埔公學校初等科畢業，隨即參加當時高屏地區首屈一指的高雄州立中學(今高雄中學)之入學考試，由於競爭激烈，從小又偏重漢文，日文基礎不夠紮實，因而連續二年均名落孫山，只好繼續在內埔公學校高等科苦讀日文，1924年高等科畢業，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考取高雄州立中學。

徐傍興頗有父祖風範，個性豪邁爽朗，就讀公學校時，便當要裝滿飯菜，母親以為他正在發育而食量大，其實他是分給一位貧困的同學；在高雄州立中學就讀五年期間，經常義助同學繳交學費，看到日人舍監欺壓臺籍學生，亦曾挺身打抱不平，其「大將」雅號即自此而來。1929年，徐傍興自高雄州立中學畢業，已年逾二十，由於幼年受古典文學之薰陶，本擬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專攻東洋哲學，再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部研究，但赴日應考卻鎩羽而歸。

<sup>7</sup> 同註6，〈徐富興，是師也？是兄也？〉，頁21-23。

<sup>8</sup> 王淑慧、蔡明坤，《大將風範—從關係人談生前的徐傍興》，頁49。

<sup>9</sup> 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曾貴海、賴士安，徐傍興先生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參與》，頁100。



返台後經二姐介紹，與鄰村今竹田鄉美崙村，正就讀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的邱壬妹訂婚，並得知邱壬妹對學醫者印象較好，又憶及高雄州立中學畢業前夕，校長吉川祐戒先生私下臨別贈言：「醫師收入較多，社會地位高，受日警干涉較少，就算考不上醫科，就去理髮師學校學做剃頭師傅，可以玩弄達官貴人的人頭於刀下」<sup>10</sup>，而且當時官界及企業界出路為日人壟斷，台灣人在文、法科方面之學習亦受日人限制，社會上也以醫生為高尚地位的職業象徵<sup>11</sup>。因此隨即轉而積極準備報考台北醫學專門學校，而一矢中鵠(1930年)，此項人生轉折他有詩為記<sup>12</sup>：

不作良相作良醫，這個心機那得知？皇天普照人情異，願與爾類慶有餘。

1931年徐傍興與邱壬妹結婚，婚後育有三子三女，長子徐旦鄰、次子徐於菟、三子徐齊鄰均為醫科畢業，六位內孫中有四人亦為美國名校醫學系畢業，現為美國執業醫師，另兩人分別為美國律師、基金經理人。

### 三、術德兼備之醫學養成教育

1934年，徐傍興以優異的成績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為更深入研究，毅然決然留校擔任助教兼附設醫院外科醫師，追隨外科主任竹林教授作研究。由於為人敦厚，做事認真，深受外科學權威澤田平十郎教授激賞，尤其當時師資陣容優秀<sup>13</sup>，使其對醫學知識及臨床經驗更加精進，遂於1944年以《台灣地方性甲狀腺腫瘤疾病之研究》論文，榮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奠定其外科學術聲望，並成為頗富盛名的外科醫師。因仰慕解剖學教授森於菟，乃將次子命名為「於菟」，以表憶舊感恩之情(另一原因：「於菟」為老虎別名，其次子生肖屬虎)。

徐傍興在嚴格的現代醫學教育下，逐漸塑造其理性思考、重研究、講醫德的精神。1902年台灣醫學會成立，並發行《台灣醫學雜誌》，不少台籍人士發表研



▲ 1931年（昭和六年）3月30日徐傍興與徐邱壬妹結婚紀念照（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sup>10</sup> 同註6，〈鍾秉光，徐校長二三事〉，頁34—35。

<sup>11</sup>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六堆歷史文化與前瞻·宋美盈，再論徐傍興與臺灣六堆發展〉，頁182。

<sup>12</sup> 同註11。

<sup>13</sup> 藥理學：杜聰明、衛生學：深下薰、解剖學：森於菟、細菌學：細谷省吾、寄生蟲學：橫川定、病理學：和氣嚴、生理學：裴島高等。杜聰明，〈回憶錄之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上冊，頁143-144。

究論文，從1935年至1943年，徐傍興個人或與其同仁合作，陸續在該刊共發表17篇論文，可見其研究之勤。當時醫學校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的至理名言「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負醫生的責務」影響所及，成為畢業生終身奉行的信念。之後追隨澤田平十郎教授，為人坦蕩正直，手術紀錄鉅細靡遺，研究積極嚴謹，而且「視病如親」，潛移默化中，徐傍興終生奉為圭臬<sup>14</sup>。



▲ 澤田平十郎夫婦（前排右二、三）戰後訪台與徐傍興（二排左二）家族合影（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徐傍興為病患手術後，通常會等病人穩定之後才放心下班，有一次，美和中學黃國忠老師（國中校長退休，現任美和中學董事）趁到台北出差之便，大清早到徐外科，看到徐傍興從醫院走出來，還以為他這麼早就上班，徐傍興卻說：「昨天晚上我當孝子，和閻王拔河比賽，最後我贏了！」，露出勝利的微笑，原來他徹夜守護一位老人病患，把他從死神中搶救回來。最近日本電視劇《小護士當家》，那位高樹醫生「視病如親」的精神，正是徐傍興的翻版。

戰後日人撤退，1945年11月，杜聰明先生奉命接管台北帝國大學醫部，並改名為台灣大學醫學院，徐傍興也接掌第一外科，由於以身作則及開明的風格，並積極鼓勵團隊投入臺灣風土病之一的甲狀腺腫瘤的防治研究，使戰後「對於甲狀腺腫瘤之外科治療，第一外科則具有權威性」<sup>15</sup>。



▲ 台北徐外科醫院，日治時代有名的蓬萊閣酒家（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 四、創設平民化、仁心仁術的徐外科醫院

##### （一）台北徐外科醫院

1949年以行政能力見長的傅斯年先生，接掌台大校長，極欲改革台大醫學院承襲的日治作風，尤其在駐院醫師的任用資格上，認為臺北醫專的教授資格有必要重新檢討，免不了使徐傍興與傅斯年間有所嫌隙。翌年，第一外科又連續發生破傷

<sup>14</sup> 王淑慧、蔡明坤，《第二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徐傍興和他的志業—以教育事業為例》，屏東縣私立美和技術學院通識中心編印，頁113。

<sup>15</sup> 耿殿棟，《傳記文學·悼念徐傍興教授逝世一周年》，第47卷第2期，頁25。

<sup>16</sup> 同註14，頁112。

風感染事件，徐傍興毅然負起行政責任，辭職離開台大醫學院<sup>16</sup>，也因此促使徐傍興改變初衷，計畫自行開業。

1951年3月，徐傍興在資金不足並向親友借調(12萬元，當時公務人員月薪約200元)的艱困下，在台北市長安西路140號，開設台北徐外科醫院，主治胃、十二指腸、膽及甲狀腺腫瘤疾病等，設備及規模簡單。然因平民化作風及高明的醫術(徐傍興曾有「胃切除手術從切皮至縫合只要40分鐘」的紀錄)，臺大醫學院外科實習生紛紛選擇徐外科見習，全省各地病患更是絡繹前來，院所不敷使用。於是在1956年底耗資375萬元(向銀行貸款近300萬元)買下日治時代有名的蓬萊閣酒家(台北市南京西路163號)，整修擴建為200個病床，可說是當時台北市最大規模之私人醫院。

## (二)高雄徐外科醫院

由於到台北徐外科求診來自南部及客家鄉親日眾，南北奔波十分辛苦，因此徐傍興構想在高雄設立一所四百多坪的徐外科醫院，並擴建為400床之綜合醫院，遂囑咐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取得醫學博士的堂弟徐富興先生，南下籌建高雄徐外科，於1956年8月15日竣工開業<sup>17</sup>。不久台北徐外科又買下蓬萊閣酒家，擴建經營，開創了徐傍興醫療事業的黃金時期。

徐傍興常優惠窮苦病患，經常經不起病患懇求，大筆一揮就批示「免費」，甚至還贈送車資讓病人回家，因為優惠病人過於頻繁，而使家屬及出納人員為難，因此他曾要無力付醫療費的病人，趁夜晚工作人員不注意時偷偷溜掉<sup>18</sup>，作法雖然可議，但不也因此而更加凸顯其悲憫窮困，關心弱勢的胸懷！

## 參 奉獻教育

### 一、慷慨贊助高雄醫學院創校

徐傍興時常提起「順天堂」百年之計，早有創辦醫學院培養人才的心願，因此台北徐外科創業有成之後，擬開設高雄徐外科醫院作為日後在高雄設立醫學院之附屬醫院。而1953年杜聰明自台大醫學院院長退休後，也擬籌組瀛洲醫學院，但苦無適當地點及龐大經費，適逢臺灣醫學會於1954年6月16日在台北召開理監

<sup>17</sup> 同註4，頁54。

<sup>18</sup> 同註8，頁8。

<sup>19</sup>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頁255-256。

事會議，會後杜聰明與徐傍興論及瀛洲醫學院設立之困難，杜聰明得知徐傍興也擬在高雄籌設醫院及醫學院而喜出望外，認為也許可以移師高雄與徐傍興合作<sup>19</sup>。高雄聞人陳啟川在得知其設校困境後，亦初步應允捐出高雄市私有地11甲，遂連袂至台北拜訪徐傍興，席間慨然應允捐出高雄徐外科建設預備金45萬元<sup>20</sup>，而讓在場之堂弟徐富興極為惶恐，憂心正籌建中的高雄徐外科建設經費要從何而來？

1954年7月11日，在高雄召開第一次籌備會，通過校名改為私立高雄醫學院，7月21日高雄醫學院在台北圓山飯店正式成立，陳啟川被推為董事長，杜聰明及徐傍興分別擔任常務董事和董事<sup>21</sup>，9月1日教育部核准招生，有828名學生報考，錄取61名，其中1人為原住民籍，首任院長為杜聰明。

## 二、領導私立中山牙醫專科學校邁入正軌

1956年台中市知名牙醫周汝川、周汝南兄弟捐出台中市大慶街一片水田，擬籌設牙醫學校。1959年私立中山牙醫專科學校(今中山醫學大學)董事會成立，創辦人周汝川被推選為董事長，徐傍興被推為董事，董事之一的謝振仁被聘為校長。1960年7月8日教育部核准立案，參加該學年度大專院校聯合招生，招收四年制牙醫科兩班。但九月間開學前，謝振仁卻因業務忙碌而不克就任，周汝川乃專程敦請徐傍興出任校長，起初徐傍興因自己非牙醫出身而予婉拒，經周汝川一再懇託，受其真誠感動，乃答應出任，但礙於牙科非其所長，台北徐外科亦業務繁忙，實際上校務運作由周汝川負責，周汝川體恤徐傍興台北、台中兩地奔波，致贈車馬費酬謝，因徐傍興婉謝，乃將其移作購買圖書及獎學金等，甚至還贈送兩台昂貴的顯微鏡予該校，而且還從台大醫院請教授來上課，鐘點費由徐傍興個人支付。周汝川每每憶及徐傍興當初不計報酬出任牙專校長的熱忱<sup>22</sup>。

1962年中山牙專增設四年制醫科，並改校名為私立中山醫學專科學校，徐外科醫院及醫師，也在徐傍興的支持下，積極支援中山醫專的教學與實習。1966年附設中山紀念醫院落成後，徐傍興只要南下台中，也隨時



▲ 徐傍興（前排右六）與中山醫專師生合影  
（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sup>20</sup> 同註4，頁54。

<sup>21</sup> 駱震郎，《高醫創校30週年》，頁97。

<sup>22</sup> 同註14，頁123。

幫助該院為病患開刀。筆者曾親聞徐傍興談論：當時中山醫專因修業僅四年，不能與一般修習六年的醫科學生一樣，取得醫師執照，在一次大專校長會議上，就中山醫專畢業生的處境，向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力陳：「教育部說沒有錯，考選部也說沒有錯，那就是我們老百姓的錯」，總統當場指示儘速解決。以當時蔣中正的威權，徐傍興大膽直陳，令會場氣氛凝重而尷尬。1966年教育部終於同意延長醫科，牙醫修業年限也改為五年。

1971年徐傍興因身體微恙(1969年輕微中風)等因素，正式辭去長達11年的中山醫專校長職務。他過世後，中山醫專校友經由募捐方式，在中山醫學院樹立銅像永遠紀念他，足見學生對其愛戴與感念<sup>23</sup>。

### 三、回饋家鄉，捐資興學

#### (一)為故鄉子女就學方便及提升升學率創辦美和中學

徐傍興有感於當年故鄉子弟，就讀高雄州立中學舟車往返之苦，早就想在家鄉設立一所完全中學，當時內埔地區只有內埔初中於1957年增設高中一班，絕大多數家鄉子弟須遠赴屏東、高雄等地就讀高中，尤其1960年大專聯考放榜，客家六堆子弟幾乎名落孫山，不但使地方人士憂心忡忡，徐傍興也聞之錯愕！因此故鄉教育界人士，連袂北上與徐傍興商議解決之道時，徐傍興即明確指出：「假如創辦一所具有師生宿舍的中學，並聘請優良教師任教，師生均能安心，毋需每日來回奔波，便可提升學生水準。」<sup>24</sup>於是立即指示堂弟徐富興著手規劃，準備在其出生地—美和村興建高中，當時親朋好友反對者眾，紛紛建議在台北或高雄設校，他卻獨排眾議，堅決回饋家鄉，造福家鄉子弟。

徐富興立即將位於竹田鄉南勢村之祖產一甲三分地，與謝家美和村的嘗田(祭祀公業田產)交換，其餘校地則由徐傍興祖地與謝家嘗田交換，並由徐外科出資收購鄰近毗連之零星農地，一共五甲餘，以「美和中學」之名申請立案。1961年3月3日，徐傍興南下主持動土典禮，6月4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公推徐傍興為董事長，徐富興、廖丙熔為常務董事，劉鳳昌、李添春、徐來興、謝煥文、邱日盛、徐邱壬妹、李喜祥、鍾璧和、李禮郎、蕭秀利等11人為董事，均為一時碩彥，其中醫師7人，屏東縣政府教育科督學鍾樂上為校長，所有建校經費(含校舍、儀器設備)均由徐外科支付。是年8月10日奉准立案，但教育廳卻只准設

<sup>23</sup> 同註14，頁124。

<sup>24</sup> 同註14，頁115。

初中部，校名為「私立美和初級中學」。

8月20日舉行新生入學考試，報名人數達1907人，僅錄取5班275人。然因在開學前夕，鍾樂上校長以健康因素突然辭職，董事會乃公推徐傍興為校長，董事長改由徐邱壬妹擔任，並聘時任屏東農校教學組長的溫興春先生為教導主任，以應校務順利運作。不過徐傍興身兼數職，實際上校務委由溫興春負責。

以徐傍興的聲望及號召力，當時薪水又為公立學校之1.5倍，感念眾多六堆客家有志於家鄉教育的青年，聘請了一批剛從臺大、師大畢業學有專精的優秀教師，陣容堅強，也因溫興春及全校員工的共同努力，次年招生報考人數近3000人。

然而徐傍興身兼三職，分身乏術，因此擬聘請同是內埔鄉出身，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理工科，時任竹南中學教務主任的李梅玉先生南下接掌校務，8月間徐傍興三次親函催促<sup>25</sup>，徐富興及廖丙熔等故舊亦動之以情，力邀請其南下，9月9日第10次董事會議通過校長案，自此李梅玉擔任校長長達12年。1964年教育廳核准自53學年度試辦招生兩班高中部，次年再次核准，正式設高中部，至此徐傍興為家鄉子弟的辦學理想初步達成。徐傍興逝世後先後由其長子徐旦鄰及次女房徐蕙英(前外交部次長房金炎先生夫人)擔任董事長。

## (二)培養美和青少棒、青棒隊奠定棒運根基

美和中學創校董事，多人因留學日本而愛好棒球運動，李梅玉校長早年亦為棒球捕手，有感於當年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棒球隊對抗之盛況，享譽日本甚至世界。又因1968年實施「九年國教」，受政策衝擊，屏東縣私立初中紛紛停止招生，只剩美和中學勉強招到3班，面臨生存危機，李梅玉亟思建立特色突破瓶頸，遂於1970年與董事徐富興、李瑞昌及廖丙熔等人，舉辦高屏地區客家六堆少棒賽，計畫選拔優秀球員保送美和中學就讀。

同年9月28日，代表我國參加世界少棒賽之七虎少棒隊飲恨回國，未能如願進入台北華興中學就讀，正感徬徨之際，由中央獅子會趙銘綱先生，建議時任高雄獅子會長的本校董事徐富興，設法收留培養，徐富興旋即召開獅子會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支付小國手一年份的伙食費三萬元，之後徐傍興也同意自初中至高中給予學雜費、食宿及服裝費全免，因此七虎八將(盧瑞圖、侯德正、黃永祥、

<sup>25</sup> 美和高中網頁，〈創辦人手稿〉。



李宗洲、黃志雄、許永金、陳富嶺、吳瑞雄)進入初中部一年級就讀，並聘請美濃鎮出身之臺電教練宋宦勳及美和護專體育老師林順松協助指導，此為美和青少棒隊成軍之緣起。未料半年後七虎八將有六人被嘉義棒球界某人士運作，轉入華興中學就讀，令人扼腕失望！

所幸徐傍興即時登報尋找本村出身的曾紀恩教練，曾教練感動之餘，為配合支援美和青少棒之訓練，乃特別申請將空軍棒球隊由台中空軍基地移地至屏東基地訓練，因曾教練與台中金龍隊(是年敗於七虎隊)教練蔡丙昌為舊識，即時透過蔡教練介紹楊清瓏等五名金龍隊球員轉入美和就讀(1971年2月)，並陸續吸收各地球員如徐生明等，人數達43人，分A、B兩隊，由曾、宋兩位教練加強訓練，參加自強杯賽而嶄露頭角。

1972年以初二學生為班底，參加首次全國青少棒賽，打敗華興隊，一舉榮獲冠軍，並勢如破竹榮登世界青少棒王座。從此30年間，參加全國選拔賽榮獲冠軍青少棒有17次，青棒有14次；以中華美和隊之名參加世界盃大賽，青棒亦有9次、青少棒有11次奪魁，為國爭光。早期美和與華興之戰最為激烈，尤其是楊清瓏每每在關鍵時刻打出再見全壘打，一棒定江山，氣走華興最讓人稱頌。而徐外科每年要支付數百萬培養經費外，其他熱心人士、企業界及政府贊助之功及歷任校長劉德明、林永盛，教練李瑞麟、王恩鵬等，苦心經營亦功不可沒，詳見美和高中網頁《棒球隊》，此不贅述。

1974年美和棒球隊首次贏得青少棒及青棒隊全國選拔賽雙料冠軍，旋又連戰皆捷，奪得世界冠軍王座，此時高雄立德少棒隊也稱霸世界，「三冠王」之美譽，使國人揚眉吐氣，奠定日後成棒、職業棒球之根基。今日國內各級棒球教練及職棒隊職員，以美和校友最多，可謂執國內棒球教育之牛耳，已故屏東縣長施孟雄先生，任內特別致贈紀念碑並題字「雄霸棒壇」，以彰顯美和中學對台灣棒球運動的貢獻。<sup>26</sup>

### (三)、重視女子教育創辦台灣第一所私立護理專科學校

美和護理專科學校是台灣第一所私立護理專校，依據當時美和中學校長李梅玉先生前口述，某日，徐傍興與同仁聊天，朱君億老師建議，以徐外科的背景及為鄉下女孩的升學、出路，不妨考慮設立一所護理專校，而撩起了徐傍興完成

<sup>26</sup> 同註25，〈棒球簡史〉。



「美和學園」的心願。因此在1965年2月9日在台北的一次晚宴上，徐傍興談起創辦護專的動機：一、配合政府政策。二、提高女子教育水準，尤其職業教育。三、繁昌並造福地方<sup>27</sup>。深得教育部長官認同與鼓勵，同時也獲得同席的高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之支持，允諾將來實科教學，高醫教授可予支援。次日，教育廳副廳長賴順生先生恰巧來訪，也極力促成。於是指示美和中學校長李梅玉兼護專籌備主任，著手籌設創校計畫，並設法籌措創校基金，估計起碼須600萬元，徐傍興並提供先前在美和中學南邊，向曾家收購之土地一甲餘，作為初步建校用地。同年5月由徐傍興號召地方醫界人士參與，當時響應出資成為第1屆董事的醫師有13人<sup>28</sup>。

9月14日教育部核准設校，9月19日召開第一次董事會議，公推徐傍興為董事長，校長為徐富興，隨即準備立案招生，然創校基金僅500萬元，資金不足，教育部又規定必須在10月底前完成招生，董事會乃決議延至明年招生，資金缺額先由徐外科墊付。次年(1966年)7月開始招收新生4班，12月第1棟校舍完成，初期極為克難，用餐及洗澡場地、設備均由美和中學支援。由於徐傍興在醫界人脈豐沛，吸引了一些名師支援教學，學生素質亦很優秀，成為南部女學生有志從事護理工作者的第一志願，入學成績甚至超過屏東首善的公立高中。

1975年3月，徐傍興接任美和護專第三任校長，自此台北徐外科業務交由其長子徐旦鄰醫師經營，南下專心辦理校務。當時徐傍興以校為家，日夜巡視兩校，並經常觀看棒球隊訓練。徐傍興生前曾一再語重心長地表明興建實習醫院的心願，然因諸多因素，董事會一再拖延而未能實現，是為遺憾！

## 肆 無私無我的教育精神

### (一) 愛護學生以學生為本位

徐傍興奉獻教育的精神，誠如幼兒教育之父—福祿貝爾之箴言：「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1961年3月3日美和中學校舍動土開工，所有經費均由其徐外科負擔，兩個月後，地基已完成，鋼筋林立，徐傍興南下視察，看到教室朝暮向陽，勢將影響學生學習，一聲令下，把地基挖掉，從頭開始，由東西向改為南北向<sup>29</sup>，所費40餘萬毫不吝惜。有一年開學日，他發現高三班級，各班均近60

<sup>27</sup> 同註25，〈徐傍興致李梅玉函〉。

<sup>28</sup> 同註14，頁119。



名，即令重編以50名為準。發現採光極佳的二樓教室當作圖書室，亦認為不可，即通知圖書室搬遷至樓下，把採光極佳的教室當作學生上課教室<sup>30</sup>。又一次辦公室佔用太多教室，把人事室、主計室及總務處集中一間教室辦公<sup>31</sup>。

徐傍興特別關心住宿生，他住在護專，卻在中學餐廳吃飯，目的在關心住校生伙食，尤其是球員的營養食譜，熱量價值，如逢比賽則特別加菜。1982年他獲知伙食團經營不善，盛怒之下，下令徹查，最後更動人事，處罰相關人員。

由其三媳婦謝純貞口述，可知其關心球員生活的程度<sup>32</sup>：

「我公公經常念念不忘他的棒球隊，……每當球隊來台北比賽，為了擔心他們營養不夠，也為了能夠就近照顧，就在近球場的地方(八德路)，購買公寓供他們住。每餐擺兩大桌，他還親自看著球員把食物吃完才離開，如果食物沒吃完或煮的不夠好吃，他就會要求廚師改進……。」

朝會時他很不喜歡老師滔滔大論，讓學生曬太陽站太久；師生如有爭端，他一定維護學生權益；為了校園寧靜，他當校長任內，除了上下課鐘聲外，不准許廣播，如有事要找學生，只好親自到教室<sup>33</sup>。

此外，他特別重視教師的品德，認為如果教育人員操守不好，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成長。1974年，他得知故鄉某中學校長長期向新進教師索取相當於一年薪資的紅包，立刻致函省主席謝東閔先生及教育廳許智偉廳長，痛陳此事，其中致許廳長函有下面一段話<sup>34</sup>：「……嗚呼人家(按：客語，我或我們)為故鄉教育，嘔盡畢生的心血，而某某校長卻在故鄉教育界橫行了將近二十年，大發其財天理何在？如果一般人民認為這等事乃今日教育界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又認



▲ 美和青棒國家代表隊凱旋歸國歡迎盛況  
(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 1976年美和青棒隊榮獲世界冠軍，回國後與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合影，前排由左一前教育部長蔣彥士、左二前省議員董榮芳(秘書)、左三全國棒協理事長謝國城、右二徐傍興、右三全國體協理事長黎玉璽、第二排右二教練宋宦勳、右三教練李瑞麟(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29 同註4，頁56-57。

30 同註6，〈陳誠富，德馨美和懷賢人〉頁59。

31 同註9，〈黃國忠，徐傍興博士的教育精神〉，頁106。

32 同註8，頁48。

33 同註8，頁32。

為這是國中校長的特權，而當作戴宗向宋江索取常例錢一樣看待的話，我也無話可說，唯有恨在心頭，將冷眼看螃蟹，看汝橫行到幾時而已。」可見其對當時的教育風氣及教育人員的敗德劣行，是何等的失望而深惡痛絕！

## (二)成功不必在我創造雙贏的胸襟

前述徐傍興慨然應允捐出高雄徐外科建設預備金45萬元，作為高雄醫學院之創校經費，充分表露了「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其堂弟徐富興對徐傍興的豪膽與慷慨，曾有讓他印象深刻的描述<sup>35</sup>：

「話說到高雄醫學校地已得到陳啟川的11甲土地，希望徐博士協力，說未畢，傍哥(徐傍興)即說：「……什麼人辦也是一樣，我將高雄徐外科的建設基金45萬元全數寄附(按：捐贈)」，此聲一出我嚇得魂不附體……高雄徐外科的興建正在就緒只待開工，我即對傍哥說：「今將45萬元全部寄附高雄醫學院，我們徐外科興建經費那裡來？」他卻從容而言，生意各人做，豆腐各人磨。他如此豪膽，如此慷慨，我何敢再言。」

關於此事，筆者曾親聞徐博士說，他之所以慨然應允捐45萬元給高雄醫學院，是因為擔心高醫因資金不足，而使陳啟川捐11甲土地之事變卦，可見徐傍興當時對醫學教育的關切程度。

美和中學成立後數年，潮州鎮也成立一所私立明德中學，美和中學新購鍋爐，明德中學校長林忠義先生知道後，親自拜訪徐傍興，希望轉讓舊的鍋爐，徐博士馬上就說：「我們同樣為地方教育在努力……就免費贈送給貴校好了」<sup>36</sup>。而當時同鄉的內埔中學也因設高中部，教室不夠，徐傍興也說：「美和中學要辦好，內埔中學也要好」，馬上就捐二間教室的經費15萬元<sup>37</sup>。美和中學與私立明德中學及縣立內埔中學在鄰近學區，彼此是競爭對手，但徐傍興卻認為是相輔相成的教育夥伴，這種無私無我，「創造雙贏」的觀念，何其宏遠偉大！



▲ 1961年美和中學動土後徐傍興站在一片水田上  
(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 今美和學園一角(美和棒球場與美和技術學院大樓)  
(圖：涂順振校長提供)

<sup>34</sup> 徐傍興先生致臺灣省教育廳許智偉廳長信函，未發表。

<sup>35</sup> 同註6，〈徐富興，是師也？是兄也？〉，同註4，頁20。

<sup>36</sup> 同註9，〈邱日盛，徐傍興博士在教育方面的貢獻〉頁142。

<sup>37</sup> 同註9，〈黃國忠，徐傍興博士的教育精神〉，103頁。

<sup>38</sup> 同註6，〈徐富興，是師也？是兄也？〉，頁21。

### (三)真實、自然、關懷弱勢的身教言教

徐傍興天性自然、樸實、善良，幽默風趣，從容優雅，而且不空談，凡事講求實際，他時常談到「耕田不離田，辦學不離校」、「為人必要三分蠢，辦學需有六分賢」<sup>38</sup>的觀念，這種身教言教，卻往往在潛移默化中達到教化的目的。美和護專創校初期，由於新建學生宿舍不足，他馬上將美和中學本擬興建董事長(徐傍興)宿舍的兩百餘坪校地，無償借給護專興建學生宿舍。因此，他擔任美和護專校長時，住在校長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一張床舖、一個簡便的衣櫃及四張籐椅等陳設。而美和中學至今也未再設董事長宿舍及辦公室，歷屆校長也承襲其儉樸之風，辦公室僅約10坪，幾年前有一位長官來訪，說是全國最簡樸的校長室。

有關其平日生活風采，下面有一段生動的描述<sup>39</sup>：

「剛來美和，校園裡有一位穿著寬大的褲子，每日手插在腰部，挺著肚子緩緩來回散步的老人，是大家所熟悉的。每當天剛亮，住校生坐在花園邊看書的時候，他就會緩緩地走過來，然後立定停下，向所有的學生行個舉手禮，宏亮的喊著「Good Morning」緊接著一陣嘹亮的回響「Good Morning」之後，他才把手指從眉間放下。……彷彿一位百戰沙場的老兵，也有點像學校看守校門和藹可親的老校工。……有一天早餐時，涂老師突然說：『你看，董事長來了。』啊，那不是每天早晨先向學生行禮的老兵嗎？

……白天，濃密的樹蔭下，是他真正上班的地方，幾張籐椅，每天為他搬進搬出，無論村裡的老友來閒話家常，或社會各界要人找他共商大事，都是那麼簡樸而風雅。……董事長平易近人，妙語如珠，老友來訪時，常是高談闊論，笑聲迭起，在重要的場面，人人正襟危坐，他卻毫不在意談諧如昔。……也許因他喜歡看三國演義，在性格上直爽而善惡分明，在為人處世上，正是『……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談中。』」

徐博士常以話家常甚至自嘲方式，勉勵學生。每年畢業典禮，一定用他當年考高雄中學三次才考上的經驗，期勉同學要有毅力、耐心及恆心。有一次旅北六堆大專學生聯誼會，高等法院庭長鍾德鈞先生(台北帝大第二屆二位臺籍畢業生之一)勉勵在場大專學生說，他每晚都要讀兩小時書。徐博士接其後說，德鈞先生是帝大畢業，絕頂聰明，每晚只要讀兩小時就夠，我則要四小時才能趕上。

他對美和中學師生講話，曾提到「三不主義」<sup>40</sup>：

「三、四年前，新生報選舉一百位名人，我恰巧是其中一位，新生報要我寫一篇關於「教導子女的方法」的文章，於是我提出我的「三不主義」：一、不遲到。二、不缺課。三、不遲歸。早上和晚上我一定和孩子共進餐，晚上孩子們在讀書時，我一定要到書房看一看他們，雖然不訓話，不教他們，但總要去一趟，這就是我教導子女的方法。這篇文章刊出後引起很多人反應……他們說：「……他們的長篇大論，都不及你的「三不主義」來的好。」

關懷弱勢及平民化作風，可說是徐博士的天性，口袋中一有錢就急著要施

<sup>39</sup> 同註25，〈曾焜宗，輝映在人間〉。

<sup>40</sup> 同註6，〈董事長的期許〉，頁4。

捨，記得他每次在美和護專領了一些津貼，他就會交代我們將錢分給廚工或社區需幫助的老人家，他一再地說：「這些人一定會把錢用到有用的地方」。這與最近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先生說：「錢要很多人用才会有價值」，可說是異曲同工的觀念。他當年堅決在窮鄉僻壤的家鄉創立美和中學，及收容參加世界少棒賽鎩羽而歸的七虎隊，就是這種關心弱勢，平民化的表現，以當時華興隊豐厚的資源而言，美和隊實難望其項背，但美和隊卻在堅苦卓絕中與華興隊分庭抗禮而「雄霸棒壇」，莫怪當時有人形容是「平民與貴族之爭」，有人談到他培養棒球隊，對國家社會貢獻很大，他卻說，他培養棒球隊並不是為了什麼「國家社會」的，而是打棒球須很多錢，這樣他的兒子才會努力經營醫院，其務實、務本的教育精神於此可見。

他喜歡音樂和運動，但學生時代只是參加較不花錢的樂隊打鼓、吹口琴、唱山歌、打網球及下象棋等，尤其三十多年前，他回「美和」之後，早晚均走六、七公里路，竟然在鄉下帶動走路健身的風氣，這也是徐博士對全民運動、平民化運動(他曾對身邊的一些人花費時間及金錢打高爾夫球頗有微辭)的另一種貢獻，此與當年副總統李元簇先生、省主席林洋港先生，利用假日登山健行一樣，透過媒體報導，使登山健行蔚為風氣，這就是所謂「政自小始」的道理吧，而教育又何嘗不是如此！

#### (四)小而美完整學園之理想

徐傍興的治校理念，自日治時代的求學階段開始萌芽，當時就讀高雄州立中學五年期間，顧及屏東鄉下至高雄往返通學不便，他選擇住校，而能有較多的時間專注於課業和運動，也有更多的機會培養團體生活及公共道德，因此希望把此優點落實在教育事業上，此即日後他創辦美和中學、美和護專時，亟思興建學生宿舍的原因。另一方面，他自高雄州立中學第三屆畢業，當年畢業生才66人，嗣後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也才73人，師生互動頻，學習效果佳，因此「小而美」的治校理念一直深植其內心，也影響其他董事，以美和護專為例，1971年董事會臨時動議，提議辦理二年制專科班，多數董事卻認為「不宜實施」而遭否決，從1966年首次招生至1984年過世前，只開辦五專部，共招生82班，平均每年只招4.3班<sup>41</sup>。

當年學校不多，徐傍興相當重視青年嚴重失學問題，認為「政府應盡力擴充公立學校，同時鼓勵私人興學，以確實有效的輔導辦法來提倡教育，否則無

<sup>41</sup> 同註14，頁122。

<sup>42</sup> 《中山醫學院創校25週年特刊·徐傍興，談青年的教育問題》，頁32。

<sup>43</sup> 徐和鄰、鍾兆玉，《世界冠軍美和青少棒隊》，頁256。



法迅速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多數亟欲求知的青年終身不能進入廟堂，嚴重損及國家進步」<sup>42</sup>。因此他積極響應政府獎勵私人興學的政策，而且認為：「子孫如不肖，則留下豐富之遺產，適足助長其為惡，今我捐出興學，則無人能予以揮霍」<sup>43</sup>。

1966年美和中學規模粗具，為配合設立高中所需設備，決定興建科學館，但向教育廳申請補助，最高才15萬元，其餘要學校自籌，徐傍興特別對其長子徐旦鄰說：「我們的財產是來自社會，現在我仍然要用之於社會福利，你自己也非常堅強，有獨立心，所以我再花幾百萬元來建校無所謂吧！我希望在我手裡建設完全中學及一所專科學校。更希望將來你們三兄弟能夠接棒建立一所「美和大學」，那些學園將是擴張到二崙溝(內埔鄉與竹田鄉交界)方面，是一個非常幽靜的大學園地……」<sup>44</sup>。

當年窮鄉僻壤的一片水田，歷經40餘年滄海桑田，如今已是萬千學子的學園，在春風化雨中，化育了千、萬人之靈秀，也為鄉土奠立百世文明的根基。而早期橫渡黑水溝來到屏東大武山下的先民們，何曾料想，曾經胼手胝足，披荊斬棘的蠻荒之地，如今已是書聲琅琅的巍巍鬢宮！有幼稚園、國中、高中、五專、四技及研究所，而美和技術學院正積極準備升格為科技大學中，將來增設國小，徐傍興完整的「美和學園」理想終將實現。

## 伍 結語

近年來，鄉土研究以徐傍興為探討主題的記載頗多，甚至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sup>45</sup>也以他為研究對象；最近客家電視台為宣揚其德行風範，拍攝《大將--徐傍興》連續劇；國立教育資料館《台灣教育人物誌》也將其列為教育經典人物，擬拍製簡介影片及略傳。正值徐博士百年冥誕紀念之際，更彰顯其典範，令人仰德感恩，追思景仰！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有句名言：「在沒有質樸、善良、真實的地方，就沒有偉大。」不啻就是徐傍興博士的人生寫照！他一生淡泊名利，只為這塊土地付出愛，而自然、質樸、善良、真實這些「天地之愛，人間的良知」，就是他留給我們社會最珍貴的資產，猶如他生前最喜歡的欖仁樹一樣<sup>46</sup>，雖非參天古木，卻也是枝繁葉茂，廣被著大地，正是昔人詠大樹：「但教能覆地，何必定參天！」

茲摘錄1984年8月30日徐博士追悼會輓聯三對，筆點其一生風範及追思：

一、美和高中校長林永盛先生暨全體師生敬輓<sup>47</sup>：

憶杏林泰斗傳道解癘名震天下功邦國

思泗水良師興學育才德馨美和懷賢人

<sup>44</sup> 同註43，頁321。

<sup>45</sup> 宋美盈，《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

<sup>46</sup> 徐博士及美和高中前校長李梅玉先生，每天早晚習慣坐在美和與護專交界的欖仁樹下聊天。

<sup>47</sup> 同註6，〈陳城富，德馨美和懷賢人〉，頁63。

二、美和高中前校長李梅玉先生敬輓(客家語)<sup>48</sup>：

放牛灌土狗<sup>49</sup>唱山歌講三國學醫懸壺普濟世  
辦學育英才興棒球論選舉搖旗鼓領眾人

三、屏東高中退休英文教師鍾孝上先生敬輓：

台灣史上最受人敬仰的長者有兩位一位是林獻堂先賢另一位是徐傍興博士

## 參考文獻：

- 鍾壬壽（1973）。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
- 徐和鄰、鍾兆玉（1972）。世界冠軍美和青少棒隊。台北市：明志出版社。
- 耿殿棟（1985）。傳記文學·悼念徐傍興教授逝世一周年。傳記文學，第47卷第2期。
- 徐富興（1988）。徐家近代史考。
-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頁（2007）。《<http://www.mhsh.ptc.edu.tw>》。
-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1994）。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 王淑慧、蔡明坤（2003）。徐傍興和他的志業—以教育事業為例。屏東縣私立美和技術學院通識中心編印，第二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
- 王淑慧、蔡明坤（2004）。大將風範—從關係人談生前的徐傍興。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 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徐傍興博士紀念館（2003）。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
- 宋美盈（2004）。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2007）。美和青年第84期。
-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2007）。六堆歷史文化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承辦。

## 訪談相關人士

- 房徐蕙英，徐傍興次女，現任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董事長。
- 徐雲鄰，前台北徐外科總務。
- 黃國忠，現任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董事。
- 曾紀恩，前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棒球隊總教練。
- 李的明，現任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董事。
- 王淑慧，私立美和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 宋美盈，《徐傍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作者。

<sup>48</sup> 同註6，〈涂順振，櫟仁樹下的追思〉，頁51。

<sup>49</sup> 客語：放牛(牧牛)，土狗(台灣大蟋蟀，藏於地洞中，孩童常用水灌之逼其出洞，炒食為佳餚)。



# 鄧火土

1911  
~1978

台灣水產教育的泰斗

前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研究員 楊鴻嘉 撰文



鄧火土博士從小學到大學之求學期間，均以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其苦學過程頗令人欽佩。在任何困難之中，均以勤耕精神，把握讀書機會。家境雖窮，但掌握千載難逢的讀書機會。成人後，達成當小學老師的願望，有了少年時貧窮的讀書經驗和升學機會，在當老師的十年期間，更加努力自修，而嘗試就讀大學的念願。過程中先行自修考取日本國家中等學校博物課之動物科與植物科這兩個很難考的檢定考試，繼而考取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畢業後順理成章成為中學老師，得以不再為了升學，勤讀書籍的壓力，專心任教於中學，約有五年的光景。1945年台灣光復後，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環境中，渡過了徬徨不定的中學老師生活約有四年，因為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後撤離的結果，造成各級教育人員的缺乏，學有專長的鄧博士被各地高等學校延攬為專任老師，最後轉任國立台灣大學，但因為沒有任教於大學的經歷，所以只好屈就講師。到1950年就任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所長時，他的教育工作才轉了一大變化。

主持水產試驗所的首要任務在於開發漁業資源和發展漁業，改進水產學術研究環境亦甚為重要，這個工作隸屬水產科學研究的領域，鄧博士因非水產科班出身的人物，一切必須從頭開始，蒐集水產文獻，以及國內外的水產科學資訊等等，天天不離水產圖書，孜孜不倦，研讀有關水產書籍與研究報告。一方面又兼任大學課程，栽培漁業高級人才等等，二十七年如一日，任勞任怨。因為把握閱讀的機會已成為習慣，逐漸博學廣聞，所務順利發展，桃李滿天下，對促進台灣漁業發展及對學術界有很大的貢獻。在當時台灣水產界服務的傑出年輕一代，不是他的門生，就是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幹部。台灣漁業能有今日的成績，水產試驗所的工作人員無可否認的有重大的貢獻。鄧博士將畢生精力放在學術上，再把這學術上的成就，貢獻給國家，成就了永恆事業。逝世後，台灣水產界譽為「水產界的泰斗」，其一生好學與敬業精神，可謂永遠令人懷念。



## 壹 生平

鄧火土博士字東山，彰化縣田尾鄉人，生於1911年1月15日。先生居長，下有四弟二妹，家境清寒，全賴父親經商為生。先生六歲時，舉家遷居花蓮，八歲時進入當地小學，每年成績均列前茅。小學畢業後，因家境清寒，需先就業，惟經師長激勵，父母始同意進入花蓮港的農業補習學校續學。在此期間，兼事日人家庭中之雜役，換取微薄工資，以維生活費用。而後，在臺灣銀行花蓮港支店長德末務先生家工作，德末先生因見鄧博士成績優異，工作勤勞，於是全力協助他完成學業。於畢業後，考入臺北師範學校，在師範學校三年期間，均賴德末先生之資助，使鄧博士終身不忘。1930年畢業後，分發至花蓮一偏僻小學任教，翌年2月與黃阿里女士結婚，婚後夫唱婦隨，生活美滿。1932年應中學動物科教員檢定考試及格，分發臺北市老松公學校擔任五、六年級理科課程老師。1935年，參加中學植物科教員檢定考試及格，1937年，考取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畢業時已經三十歲，即應聘赴北平的日本中學任教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返臺，最初奉命籌辦玉里初級中學，成立半載後，又應臺中師範學校任教。嗣後因臺灣大學之需要，又轉入臺大擔任講師，直至1950年為止。

1950年3月間，當時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廳長徐慶鐘先生，因鄧博士是動物學專家，商請主持水產試驗所業務，鄧博士以對水產並非專長，恐難勝任，徐廳長仍請勉為其難，經再三考慮後應命。

鄧博士擔任水產試驗所所長職務後，終日孜孜不倦，研讀有關水產方面之書籍與報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間為求充實水產學識，於1962年間前往日本京都大學進修，獲得農學博士學位，成為一位不可多得之水產專家。當時該所水產類藏書多達15,500本，其中大多均經鄧博士閱覽，重要處並以紅色筆註記，並蓋下職章，以示閱畢，可見鄧博士之博學廣閱。

鄧博士就任所長之初，僅有臺南、高雄



▲ 鄧火土先生(中間)於水產試驗所台南分所前與同仁合影(圖：楊鴻嘉先生提供)

二分所，後又陸續增加竹北、鹿港、東港、澎湖、臺東等五分所，規模日益擴大而完備，試驗船方面亦由原有之海馬、海豹等兩艘沿海性試驗小船，而增加海慶、海功等兩艘遠洋性試驗船，至於其他試驗研究設備等，亦均年年有所增加，鄧博士對水產試驗所所獻出之心力，實非筆墨所能盡述。鄧博士於1950年就任水產試驗所所長後，任勞任怨、日夜不



▲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圖：水產試驗所提供）

懈，以致健康情況日漸不支，於1977年12月16日退休，在其領導之二十七年當中，試驗所成績極豐，就其個人指導有成之貢獻，有推廣吳郭魚養殖、吳郭魚單性養殖、鱧草魚人工繁殖、鰻魚養殖及輔導外銷，並引導開發澳洲西北部漁場、西南太平洋漁場及南極洋漁場，對水產試驗工作貢獻至鉅，實可稱為水產界之導師。

鄧博士於任職水產試驗所所長期間，仍念念不忘以往之教學生涯，因此在此二十七年間先後兼任臺大、海洋學院、文化學院等大學兼任教授，以嘉惠在學青年。鄧博士之治學態度，尤其對於本身業務之專注，值得效法。1978年4月28日因心臟病逝世，台灣水產界譽為「泰斗」，實至名歸。

鄧博士在清寒家境出生，自從八歲就讀小學至大學畢業為止，均以工讀生完成學業，先後均有優異的成績。在小學、中學及大學等各級學校任教，熱衷教學始終不變，截至1950年主持水產試驗所後一直長達二十七年，其前半生創造的人生觀是不斷讀書並致力教書，以嘉惠在學門生，後半生是不斷吸收水產科學資訊，極力栽培高級人才，以利台灣漁業發展，貢獻國計民生，被譽為水產界「泰斗」，功在國家。

## 貳 勤讀的求學時代

1911年1月15日，鄧博士生於彰化縣田中鎮外三塊厝，在鄉下六歲時隨父母移居花蓮玉里鄉下，在那裡安頓一段期間後，又遷到公埔（今富里），最後到



了犁仔坑，離開那裡徒步一小時的地方有一個公學校，那時恰好八歲，即就讀公埔公學校一年級。一年下來成績優異，在期末得到了“布匹”獎品（當時布料通稱布匹，是貴重的獎賞。），令母親異常高興，略盡了為人子所盡的孝道。二年級時搬回玉里，就讀璞石閣蕃人公學校，成績名列前茅。到三年級時搬到馬太鞍（今光復）山胞村落，附近沒有學校，便失學了，鄧博士的父親把他送到花蓮由日人經營的德為商店當工友，負責為客戶遞送商品，但畢竟年紀太小，做得並不理想，終於被解僱。翌年重返玉里，再度復學時，同班同學都已升上四年級，因中間休學一年的關係，仍然被留在三年級，至六年畢業於璞石閣蕃人公學校。

公學校畢業時，父親的意思是要鄧博士做一個店員，賺錢添補家用，但因學業成績優異，經師長們力勸，父親勉予同意，進入當時的花蓮最高學府—兩年制的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離家時，母親把變賣金鐲的一些錢，塞在他手中，他偶而想起時，仍不免以熱淚洗面。

1925年4月就讀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該校是手腦並重的一所學校。九成的學生是經營農業的平地山胞子弟，當時一半以上的學生，利用每天早晚時間到官舍和商店去打雜，做些掃地、燒洗澡水等工作，一個月可賺上三、五圓，以供學雜費，以及三餐菜錢之用，白米則由家裡帶來。鄧博士經師長的斡旋，也參加了此種工讀的行列。二年的就讀期間，共換過三次工作，最後轉到了台灣銀行花蓮港支店長日人德末 務先生家中。一開始每天五點半左右就要起床做飯，主人一家人起來後，立刻要為他們摺疊蚊帳、棉被，接著要擦拭走廊和打掃庭園，然後清洗一大堆的衣服。他們用早餐的時候，鄧博士卻要把衣服晾曬，匆匆吃完早餐、洗碗後才趕到學校上課。一直到中午又回來吃中飯，吃完後，把碗筷放在水中又趕到學校。下午三點半左右放學後急忙回來燒飯，接著做些雜事，到了八、九點左右才有自己的時間做做功課，但總因疲倦的關係，翻開了書本不久即呼呼大睡。有一次被主人看到了，他親切地替鄧博士蓋上被褥，視鄧博士如己子之情，使鄧博士深深感動不已。在這樣繁忙的工作中，學校成績仍然得了第一名，所以鄧博士的一切，常被主人做教誨他孩子的榜樣。

1927年，苦學考取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後，有一位台灣總督府教育家寫了一篇短文，歌頌當時的台灣子弟中，已出現醫學方面的杜聰明、理學方面的鄧火土及其他一位（筆者已忘記）等三位有為青年為台灣人秀才。這個80年前的教育界美談，是1956年的某一天，由鄧博士帶著筆者同往台灣省立博物館圖書室查閱魚類文獻時，無意中介紹一本教育雜誌給筆者所看到的記錄文章。當時，鄧博士唸

著少年時的苦學時代，有著甚多感慨，而給筆者對學問的修行亦奮勉不少。

同年，鄧博士要從農業補習學校畢業的前夕，主人問他畢業後的出路，他立刻不假思考地回答：『希望能在銀行中當一個工友，在工餘要好好用功，參加教員檢定考試，將來立志做一個老師。』主人洞悉了他的意願後，立即向校長建議，讓他應考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當時師範學校的報名期間已過，承蒙校長的幫忙，特別准他補報，入學考試結果僥倖被錄取，心中的高興實在無法言喻，當天的花蓮新聞以「苦學工友考取師範」為題，大大地介紹了他的苦學經過。在就讀師範學校的三年中，可以說他日日都在準備中學教員的檢定，當然也不敢忽略學校的正課，而是更加努力的學習，所以，畢業時仍列為成績優異學生之一。

### 參 勤讀的教學時代

自從1930年3月，畢業於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後，開始在花蓮鄉里的一所偏僻的公學校，擔任二年級級任老師，翌年2月承蒙校長的慫恿結婚，時年二十一歲。其後承蒙台北州（包括台北市、海山郡、文山郡、七星郡、新莊郡、淡水郡、基隆郡、宜蘭郡、羅東郡及蘇澳郡等二市九郡）宇賀知事的幫忙，從鄉下轉到台北市老松公學校。那時候要進台北市的學校任教非常不容易，所以老松公學校的老師都是一時之選，優秀之人才。在這裡教學，時時要懷著競爭的態度，他擔任五、六年級的理科課程老師，對於教學認真盡職，以「瘋狂」兩字形容也不為過。同時並積極計劃參加中學教員檢定考試，自我砥礪，勤於讀書，經一年的準備，於1931年6月在台北市初試考取中學博物課動物科教員檢定考試，而赴東京參加複試及格；又於1935年在台北市初試考取博物課植物科教員檢定考試，再赴東京參加複試及格；1937年3月考取日本內地廣島文理科大學生物學科，而為了上大學辭掉任教八年的台北老松公學校教職。在日本就讀大學三年中，除了當家教外，也曾在廣島第二中學及吳中學兼課，所以生活上倒未發生困難，其追求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而經常閱讀的習慣和精神專心苦學，只為追求學問，詳如勤讀的求學時代，先後均無改變用功的志氣。三十歲時大學畢業，應聘前往北平日本人中學擔任一至五年級的生物課程教師。1945年10月



▲ 鄧火土先生於美國家中獨照  
(圖：鄧守信先生提供)



台灣光復，乃於翌年3月返台，續居住於花蓮水尾。台灣光復初期奉命籌辦花蓮縣玉里初級中學，創立後擔任首任教務主任並擔任博物學課程，不到半年，轉任台中師範學校生物教員，後又轉任國立台灣大學，惜因沒有任教大學的經歷，所以屈居講師，教授課程。

1950年3月23日，就任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所長後，在其漫長的二十七年間，仍兼任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系之講師，後來升等為副教授及教授之教職，所教課程依序為醫學院學生之醫學基礎動物學、動物學系漁業生物組（1954年秋季新設）之魚類學與浮游生物學等課程，並在台灣省立基隆海事專科學校（後來的台灣省立基隆海洋學院，即今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授魚類學，又在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教授魚類學等等，均在忙碌的公務上運用空檔時間善加閱讀，只要獲知國內外水產開發資訊，便樂以傳授各大學之授課學生。師範學校畢業後，得以擔任幼年時代盼望的公學校老師，仍不斷用功，相繼考取日本國家中學教員動物科與植物科檢定考試、日本廣島文理大學等，大學畢業後擔任中學生物教員，經時代的變遷，又轉任大學講師。如此，一連串不斷進階當上小學、中學及大學老師的過程，均得力於多年來勤讀的讀書成果，也造就了鄧博士能當上台灣省政府三級機構之水產試驗所所長，兼任幾所大學教授，其所得的上進機會，是蒼天所賜的恩惠。



▲ 鄧火土先生於大學任教時教學教材  
(圖：楊鴻嘉先生提供)



▲ 水產試驗所-早期基隆總所 (圖：水產試驗所提供)

## 肆 水產試驗所的所長時代

1950年初，承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徐水泉所長的好意，要延攬鄧博士為該所的應用動物系主任，彼時，台灣省水產試驗所的所長也空懸待補中，當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徐慶鐘廳長看到

農試所報上來的學經歷表時，似乎就有要他當水產試驗所所長的意思，即令晉廳面談。當時廳長問他懂不懂水產，知道不知道魚名，他答以不懂，但魚名如有不明瞭的，查了便可知道。就此一問一答下，廳長便下條子派他為水產試驗所所長。他衷心的感激廳長知遇之恩，懷著一片誠惶誠恐的心情，於3月23日來到基隆履任新職。他不願追憶當時的水產試驗所是如何凌亂殘缺，痛苦地面對這一項事實而焦慮：一個素無班底，對於水產陌生的他，將要主持這一個單位，這將是如何不敢想像的事。『從頭來吧！』就這樣默默地展開了他的工作，想不到這一來，竟度過了二十七年漫長的歲月。

幸運的是得到水產科楊基銓科長的幫忙，得以商借素以幹練著稱的田一安秘書協助毫無行政經驗的他，處理繁雜的行政事務。水產技術及研究人員則聘請到了本省人唯一畢業於大專水產系的郭欽敬先生，此外，從日據時代水產試驗場職員錄及水產講習所得來的畢業生名冊中，獲得名單後，親自拜訪聘請來所服務的也不少，再加上大陸來臺的水產界前輩參加本所陣容，使業務迅速地開展。

鄧博士主持水產試驗所後，在試驗研究體制上，比照大學，分別設置漁撈系、養殖系、加工系及生物系等四個研究單位，以利研究。各單位設一位系主任，從此按部就班，逐年編年度預算，加以補充試驗設備和栽培人才。水產試驗所前身是舊台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於1929年創設，1943年改制為水產試驗所，



▲ 早期海慶號試驗船 (圖：水產試驗所提供)

原有海洋課、養殖課及加工課等三個單位，曾經完成近代化漁業調查試驗，頗有成果，惜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美國空軍轟炸廳舍和試驗船，原有的高雄分所又被大陸撤退來台之聯合國戰後救濟物資漁業團體員工侵佔，鄧所長依法交涉而得於1950年6月間收回一半，復原高雄分所試驗業務。筆者有幸於該年9月1日在該分所就職學習魚類

學。經三年後再收回另一半之廳舍，高雄分所得以恢復加工試驗業務。

另有台南分所之五十甲魚塢，在屬於水產公司的時候，即已被租出去，與租戶及台南市政府交涉時，竟然遭遇莫大阻礙。鄧博士透過農林廳徐廳長會同台灣省政府漁業管理處陳保泰處長，為此事件拜訪台南市葉廷珪市長後，即刻批示

警察局執行收回。試驗船是海洋漁業試驗必須的工具，接任之初，僅有兩艘小型漁船—海馬號與海豹號而已，其他雖有一艘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417.59噸680匹馬力級「照南丸」試驗船，改名為「海儀號」試驗船，但該船在戰爭末期被美國空軍擊沈於高雄港第二十三號碼頭港底，經搶救浮上水面待修，筆者曾在該船管理約一年，因該船修復有所困難，鄧博士經報備拍賣，所得收入配合節省兩年試驗經費180萬元，挹注於新建一艘延繩釣及拖網兩用的遠洋新式試驗船，船長99.6呎，寬19呎，總噸級為137.88噸，裝有380匹馬力狄塞爾引擎，時速十海浬，最快時可達11.5海浬，航續力8,000海浬。該新船命名為「海慶號」試驗船，交由日本三保造船所承造，在建造期間並未派人監工，竣工時由鄧博士偕同該船新聘船長張希達先生（曾任基隆海洋學院教授，九十歲時逝世），於1954年2月間親赴日本三保造船所驗收，於3月6日，駛抵基隆港本所碼頭，同月23日舉行試航典禮，贏得了整個漁業界的讚許，當時的筆者，已從高雄分所調來基隆總所服務，並準備隨船出海。此次中國東海南端漁區實施首航試驗作業，準備於9月17日由基隆港啟碇出發，一行21員。10月16日駛抵高雄港濱町魚市場，同月24日返回基隆港，入港報關時獲知內人於22日下午安產長子楊重和君，很感謝鄧博士夫婦照顧待產的內人（因我們結婚後借住鄧所長宿舍一角），其後筆者協助鄧博士從事魚類學研究，先後達十年之久，其間經常乘坐海慶號試驗船出海工作，今回想起來，殊甚懷念。該船每年保養得很好，先後使用二十五年之久，1979年3月報廢，往日在中國東海南端、台灣海峽、中國南海、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奮鬥的足跡，令人難忘。



▲ 除役後的海功號試驗船,現設置於碧砂漁港展示 (圖:攝於基隆碧砂漁港)

由於海慶號試驗船屆齡報廢後必須建造新船相繼出海作業，政府當局批准預算，由高雄市民營的豐國造船廠於1975年9月間建造海功號試驗船竣工，船長56.60公尺，寬9.10公尺，深5.60公尺，總噸位711.5噸，主機馬力2200B.H.P，使用可變俵葉，最大航進速度13.5節，配有二部300B.H.P副機，經準備後於同年12

月24日由基隆港啟碇前往中國東海實施首航試驗作業。翌年之1976年4月26日從基隆港出航，前往南太平洋高緯度海域，即南緯43~48度之南極暴風圈外緣，從事深海拖網漁業技術作業及深海拖網漁場資源開發工作，於8月4日試驗結束，滿載而歸，前後共101天，調查海域距台灣6,000浬航程，筆者亦隨船出海工作，歷經巴士海峽之巨浪，赤道無風帶之酷熱及南極暴風圈強勁而嚴寒之惡劣天氣，總算幸運地順利達成任務，有關調查報告於1977年1月刊在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第28號101~112頁。1976年底，再次遠赴南極洋調查南極蝦漁場，不僅開創了台灣漁業的新境界，亦使台灣漁業擠進世界重要漁業國之列。



▲ 水產試驗所-圖書館書籍-鄧火土先生於封面上簽名  
(圖：水產試驗所提供)

海功號試驗船出海試驗活動範圍，遍及太平洋周圍沿海、印度洋及南極洋等三大洋，服役期間建立不少業績，因此，後來出任所長的廖一久院士呈報上級保留海功號免於報廢，將其安置於基隆市碧砂漁港做為永久性紀念，好讓遊客觀賞，參觀人士能藉此瞭解其艱困的歷史故事，相信對地方觀光業之發展也不無幫助。該地標距筆者住居

地之山海觀社區不遠，對經過多次隨船出海的筆者來說頗有親切感，經常可從車窗眺望其英姿，或就近注視自己投宿過的房間圓形船窗，想到去過紐西蘭沿海三航次，以及繞過澳洲三分之二沿海大航海等等，接觸海外文化生活之種種經驗至為懷念。我們能夠經常隨乘海功號試驗船，有好幾年大航海的生活經驗者，大家都會歸功鄧博士主持多年來的研究計畫之功勞。

上述大型試驗船調查研究計畫均關係著台灣遠洋漁業發展的前途，其年度經費占全所總經費之一半以上，可知試驗船之研究活動甚為重要，幸好其使命均已達成任務，且均未發生海難事故，其他尚有沿近海漁業之開發研究計畫也順利達成任務。同時，水產養殖方面也有亮眼的研究業績，有此好的研究基礎，始有今日的台灣養殖業名聞遐邇，在學術上、經濟上發揮莫大的貢獻。至於水產加工的研究，在任二十七年當中也有不少的成就，我們已經盡了應盡的義務，有關圖書與魚類標本的蒐集與購備也有令人滿意的茁長，尤其圖書方面已創國內外各機關、學者有關水產方面藏書的首位，實為喜愛圖書的鄧博士多年來之蒐集，魚類



標本之多，也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多數是靠鄧博士和筆者於每天清晨前往魚市場及海邊蒐集得來的，每一本書和每一件標本都有鄧博士的汗斑，退休後回想他二十七年來種種，真令筆者無限依依，懷念之情油然而生。



▲ 鄧火土先生於會議一隅 (圖：胡興華先生提供)

就任初期之水產試驗所已有台南分所與高雄分所等二個分所，經努力後又增闢鹿港分所、竹北分所、東港分所、澎湖分所及台東分所等五個分所，到退休以前，台灣東北地方的水產界曾向政府要求設立宜蘭分所，以利發展漁業的方案，鄧博士已有首任分所長的腹案，惜因客觀的條件，該案遂被胎死腹中，甚為遺憾。不過已有一總所七分所的大家庭，能夠埋頭苦幹，均有多方面的業績表現出來，鄧博士的指導方針係由鼓勵開始，包括升學和留學，以及參加普通考試與高等考試，有功者在年終考績時，給予甲等成績，並拔擢予以升等或升官，無功者多在平常時苦口婆心給予激勵。筆者曾有一天，因事隨著鄧博士經過漁撈系時，目睹一位年青人在桌上認真的看一本書，鄧博士問他在看什麼書？他說『準備考普通考試』，鄧博士說『好，要好好用功』，亦說『考完後，要好好從事研究工作』，後來該年青人不見了，可能已經考取後辭掉了，可以說在試驗所是讀書的好地方。鄧博士曾接任過高等考試典試委員多年，對教育很關心。鄧所長曾對筆者提起一點心事，因為有關行政人員處理公務時，有人馬上辦好，有人雖經努力而未能立刻辦好，經常看到有人輕鬆看報紙或與在座的同事聊天，有此情形時，可認為正在聊天的同事應辦的公務早已辦好了，並非怠工的現象，對他們應如何打成績分數？同此情形之下，有關研究人員就有所不同，必須觀其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始能定奪年終考績時要給予多少分數，但往往仍有深海遺珠之感。

台灣光復後，為了發展漁業，在漁業生物學方面一直缺乏高級研究人才，即由各方面委託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動物學系於1953年創設漁業生物組，翌年9月招考17名新生入學，鄧博士盡心兼課加以授業，同學們經四年畢業並服完兵役後，依序有廖文光、楊榮宗、鄭昭任、李盧嘏、陳登俊及後輩的劉元峰和劉錫江等同學，相繼來到水產試驗所服務，此一生力軍為台灣水產界盼望多年栽培出來的年青學士，一時頗為熱鬧，先以臨時工安置職務，並在適當時期報請政府提升



為水產技術人員，可惜因為當時的人事管理員不肯合作，鄧博士非常沮喪，各位同學在不得已之下，相繼出國留學去了，鄧博士和筆者頓時失去他們後，仍默默照常研究板鰓魚類，該批同學皆出國留學，大部分獲得博士學位，多位成為國內外大學教授，遠勝過水產試驗所的職位，後來的各屆畢業同學年年獲得博士學位者，大有人在。

鄧博士在忙碌的公務中，經常為了兼授大學課程所需之教學資料和圖案，每每需要筆者從旁協助，攜帶標本一同到大學授課，體會其認真授課的風範，尤其於1958年為筆者在台灣脊椎動物學中，首先發現盲鰻綱時，鄧博士講解的情形甚為精彩，筆者甚感光榮。不過在筆者的內心有些心事無所訴苦，就是天天和鄧博士在清晨採到的魚類標本，總是由筆者徒步攜帶趕上八點上班，鄧博士則有公務車服務上班，始終未曾要筆者隨車一同上班。為了準時上班，有時來不及吃早餐，天天上、下班各趕路20分鐘的路程，不算近，但在多雨的基隆苦了十年的光陰，實在有些疑惑，如今歲數大了，當時鍛鍊得來的健康，可謂妙極了。想到那十年的光陰，鄧博士是否因為公務車係主管專用車輛，抑是有何苦衷，不便給十年同甘共苦的筆者隨車上、下班呢？實在不得而知。

1953年12月底返回高雄結婚，翌年4月間（農曆3月2~4日）再回高雄接內人上基隆建設自己的小家庭，即借住鄧博士的宿舍一個小房間共同生活，鄧博士得以就近天天在清晨準時必來叫『鴻嘉：KOKA』敲門聲，我們便同往基隆魚市場採集魚類標本，上班後由筆者先作初步檢點，鄧博士則在日間利用上洗手間的機會溜進標本室與筆者作短時間的討論，但很多時候就會被不同工友送來急件公文、通知有外來電話、申請加班或出差等尾隨來到標本室要求批示，大家在所長室看不到所長時，習慣性地會轉來標本室找所長。在那個情形之下，我們的短時討論即刻被中斷，待全所的同事下班後，所長才有自己的時間安心地在標本室落腳，我們經常討論到夜深人靜才會下班，各自回到宿舍時，家裡的小菜已冷。如此一年365天，早晚相隨了十年，形影如父子，亦是一對學術上的難兄難弟。在多雨寒冷日子下的基隆夜間生活中，人家在五點下班後已在家裡休息時，我們



▲ 與櫻花鉤吻鮭研究人員合影 右一為楊鴻嘉先生 右二為鄧火土先生  
(圖：楊鴻嘉先生提供)

耐著寒氣和餓著肚子，繼續留在標本室埋頭研究工作，因此，經常會被嘲笑我們是一對「怪人」。然而，面對這樣的評語，都視其為讚賞我們對於研究工作的堅持。

1955年的某一天，筆者認為增加台灣新紀錄標本的調查研究方法，在學術上很難表現科學價值，建議應改變研究方針，鄧博士當場接受筆者的意見，而商定計畫一個專題研究，即擬定研究題目為「台灣產板鰓魚類之研究」，因此，更忙起來了，參考文獻由鄧博士蒐集，採集標本則由筆者跑台灣主要產地，基隆地區則由我們共同行動，研究成果逐漸增多，由1957年開始發表幾篇報告，並將其綜合為專題研究之第一報，刊於試驗所報告第三號（1958）。截至1960年發表七報時，得機會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第一屆甲種留學學金。鄧博士在準備出國期間，有一天發生一件莫名其妙的事，鄧博士一早來到標本室牽著筆者走到後面草坪坐下來，說：『家裡昨夜開了家庭會議，盛傳所裡有人將在我出國期間要推翻我的主管職位，心感草木皆兵，所以有人勸我應放棄留學的念頭，但家人已贊成出國，萬一失去主管職位亦在所不惜，你的意見如何？』筆者聽了原委後，表示應照常出國。他指著周圍的小樹說：『我們像那邊的小樹一樣，也要學其長大』，說著說著竟流下眼淚，真是一聲霹靂，嚇得六神無主，我們發誓應為「台灣產板鰓魚類之研究」繼續努力，乃於1961年7月中負笈日本京都大學留學一年。翌年9月6日即以“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hondrichthys of Taiwan”主論文，榮獲京都大學授與日本國家新制農學博士學位，稍後由總務課印好農學博士頭銜的新名片時，由工友通知筆者請上所長室，所長打開剛剛接到的名片盒抽出第一張給筆者，即說『所長的博士學位就是鴻嘉的博士學位』，我們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可是當時的所長內心正積埋著不滿心情，已經有幾位報社記者要來採訪台灣光復後水產界第一位榮獲農學博士學位之好消息。但是，不得了的事情發生了，當時的人事管理員正在阻擋記者們之採訪，在當時的威權時代，一位人事管理員擁有束縛台灣省政府三級機關首長之權力，荒唐極了。試驗所的人事任用情形鬧得雞犬不寧，這個不幸的事情已鬧了好多年。不過，鄧所長也不是省油的燈，省政府非常重視擁有博士學位的三級機關首長，多年來苦心所得博士學位之事情，在台灣確是很重要的新聞，如此好消息不能及時報導，其喜事之氣氛恐怕會被時間沖掉，時不宜遲，有某報記者在電話中提出建議，可由鄧博士託人寫稿投中部某報社刊載，此一重任竟交由筆者加夜班執筆，題曰「水產界傑出一博士」，重點為「溫故知新，學而不倦」與「為國爭光，後輩可鑑」，該唯一的報紙刊出後，台灣省政府方面有了動靜，鄧

博士乘機備文呈報台灣省政府人事處，申請撤換該位不稱職的人事管理員，過了不久，省政府遣派新任人事管理員到任，鄧博士認為仍然不適用，經重新再改派一人，始能按部就班，得以重新啟用研究人才，其後第二代、第三代、……。大學高徒相繼榮獲博士，順利地展開了研究計畫，平安主持所務。

可惜當時鄧博士已積勞成疾，他曾對筆者說，希望不要退休，願意死在研究室，惟天不從人願，經幾次入院療養中，竟於1977年12月16日被鄧夫人黃阿里女士擅自代辦退休手續，卸下水產試驗所所長職務。鄧博士不斷責備夫人之不是，惟鄧夫人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實有了此位賢內助，鄧所長才能無後顧之憂，專心作學問。

鄧博士自1950年3月23日主持水產試驗所以來，在忙中研讀水產文獻，致力發展漁業，又兼任幾處大學教授，栽培高級水產人才不遺餘力，二十七年如一日，他本人為台灣水產界首位獲得博士學位，鼓勵諸多門生留學獲得博士學位，桃李滿天下。1977年12月16日卸下職務前，台灣漁業之發達已聞名於世，水產經濟之發展，國內外皆已熟悉，這是歷年建立水產科學為基礎，開拓漁業實績所致，鄧博士不愧為台灣水產界的導師，功在國家。

## 伍 逝世

鄧博士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一年，竟日以繼夜完成304頁博士論文，並通過博士論文審查會之筆試與口試。於1962年8月中學成返回基隆港碼頭，在驗關時被海關人員查到真珠養殖成品規格的型錄，當時的真珠產品是國際上用來裝飾婦人的貴重物品，價錢非常昂貴，海關人員堅持要鄧所長交出真珠物件。鄧所長說：『那規格型錄是為台灣發展養珠研究時之參考所用，我絕無攜帶真珠物件。』海關人員不予採信，而命令鄧所長脫光衣服詳細檢查，結果查無其物。鄧所長返國，受到那麼無禮的屈辱，為他難堪。看到那麼枯瘦的身體，原來在日本完成論文時已罹患心臟病，日本醫師吩咐與人講話盡量要開朗，即由日本帶回來一本新版《人を笑わせる法》（教人會笑的方法）小書，筆者很愛讀那本書，後來覺得鄧博士講話逐漸詼諧，甚至被不知情的試驗所同事誤認所長講話似有發瘋現象，其實是要互相講笑話，期能減輕心臟的負擔。1974年醫師診斷發現他的心律不整，心跳微弱，馬上動手術在體內放置了心律調節器。1977年3月20日換裝了價值14萬元的新型心律調節器，鄧博士在病危之際曾告訴家人，他去世後，將還能用的體內調節器取出，送給家境清寒，與他患有同樣心臟病的有為青年，仍念念不忘以往之教學生



涯。1978年4月28日不幸辭世，享年六十八歲，榮民總醫院依照遺囑於5月6日取出尚可使用九年的調節器，遺愛人間，同月14日在台北市舉行公祭，行政院徐慶鐘副院長（1950年拔擢鄧所長時的農林廳老廳長）、經濟部楊基銓次長等各界人士，紛紛到市立殯儀館景行廳敬致最後的哀悼之意。至此，筆者在基隆朝夕相處十年的敬愛的研究同伴，畢生讀書人鄧博士與世長辭。

筆者與鄧博士相處十年期間（全年早晚和假日加起來可達20年），兩人皆未曾遇到嚴重的健康問題，而得以研究板鰓魚類多年。至留學京都大學期間，可能年事已高，且在留學上壓力不少，由往時六十年來終日孜孜不倦，苦學的讀書生涯日夜不懈，尤其後半生長期主持水產試驗所的重擔，遂積勞成疾，終因心臟衰竭，引起腎臟功能喪失逝世，其一生獻身於教育與研究學問的精神，永遠照耀人間。



## 參考文獻：

鄧火土（1978）。一個水產工作者的回憶。傳記文學，第32卷第4期。  
（1978年4月）1~8頁。

鄧火土先生治喪委員會弔文（1978/5/14）。鄧火土先生事略。

漁牧科學雜誌社特刊（1978/5/10）。敬悼水產界「泰斗」前水產試驗所鄧所長火土博士。1~22頁。

楊鴻嘉（1978/5/31）。鄧火土博士を偲ぶ。（日文紀錄稿件，未刊印）

楊鴻嘉（1980/4/28）。憶鄧火土博士。（中文紀錄稿件，未刊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資源服務網（2007）。鄧火土先生事略。1~7頁。

夏萬浪（2001）。魚類生態研究的勇者—專訪楊鴻嘉先生。

漁友280(39~43頁)；281(36~40頁)；282(38~41頁)；283(39~42頁)。



# 羅光

1911  
~2004

融合信仰與文化的教育家

輔仁大學校史室主任陳方中撰文





羅光校長有多采多姿的一生，他是哲學家、外交家，曾經擔任台南主教、台北教區總主教。教育家的身分對他來說，只是各種身分之一。但在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十三年半中，卻是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以後卓有建樹的時期。

羅光有其一貫的人生目標，其教育理念即來自於其人生目標。簡言之，在中國文化中實現基督信仰即其人生目標，而他在輔仁大學的教育理念也與此契合。故羅光提倡人格教育、愛心教育，重視學生的自由思想，在學校中倡導敬天祭祖。羅

光的教育理念，迄今仍在輔仁大學實踐。

## 壹 前言

羅光（1911~2004）生於湖南衡陽，一輩子帶著他的湖南鄉音說話。他字達義，號焯炤，都與其宗教信仰有關。「達義」是其聖名Stanislaus的音譯，「焯炤」則取基督是世界之光的意思。他在出生時，家中已有數代天主教信仰，是衡陽市南鄉陡陂町的小康之家。

在民國八十年時，羅光自憶其人生階段。他說：「我的八十年生活分成三大段：衡陽十九年，羅馬三十一年，台灣三十年。衡陽十九年，十二年在南鄉老家，七年在黃沙灣修院。羅馬的三十一年，九年求學，二十五年教書，十八年在駐教廷使館任教務顧問<sup>1</sup>。台灣的三十年，五年在台南任主教，十二年在台北任主教，十三年在輔仁大學任校長。八十以後的歲月，全在天主之中。」<sup>2</sup>羅光八十一歲退休後，長住天母牧廬，但仍在輔大及文化任教。1996年後頗為病痛所苦，多半時候在台北榮總病房中度過，不能說話，但仍能思想，寫作短文成篇，稱為《病榻隨筆》。2004年2月28日逝世於台北榮民總



醫院。

從信仰角度看，羅光是一個有清晰思想及深刻經驗的虔信者。如果按照一般世界的標準，羅光十八年使館教務顧問的工作，可稱之為是一位外交家，且在其人生中，有五十餘年實際參與並影響了中梵外交關係。他在台灣長時期擔任教區主教，所到之處皆有建樹，因此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教會領導者。自他1936年開始教學生涯後，六十年間著述不斷，主要以哲學著述為主，在學術界，大家公認他是一位著作等身、望重士林的哲學家。和前述各點相比，羅光教育家的身份，只是其多采多姿人生中的一個部分。

在這樣的理解中，本文擷取羅光人生中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十三年半的時間，以他治校的理念及作為，來說明他教育家的身分。有關羅光的研究，不假外求，《羅光全書》是最完整的資料，其中有各式各樣羅光的回憶及言論。因此本文性質多半只是編輯，羅光自己才是真正的作者。



▲ 《羅光全書》42冊  
(圖：攝於輔仁大學天主教文物館)

## 貳 羅光教育理念的淵源

羅光的一生最長時間是在從事「教」與「學」的工作。他前往羅馬傳信大學就讀，可說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聰明而虔誠的修士，但他仍只是在傳統中國天主教結構中。在這個結構中天主教是洋教，主教是外國人。湖南衡陽是義大利方濟會士的傳教區，外籍傳教士是主角，中國籍神職都是配角，更別提一般教友。選派中國優秀修士到羅馬傳信大學唸書，是第一位教廷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打破部分歐洲人不正確的種族優越感，證明在不同膚色下有相同的心智；另一方面也是在羅馬提供這些中國神



▲ 1931年著羅瑪傳信大學校服留影  
(圖：攝於《羅光全書》)

1. 羅光讀書至第六年晉升神父後，接任傳信大學中國文學教師，同時仍念神學，然後念法律。1943年中國與教廷通使，任教務顧問，同時仍在傳信大學授課，直至1961年被任命為台南主教。  
2. 羅光〈八十述往序〉《羅光全書》序，各冊前均有。

父的候選人，足夠完善的教育，使得他們回國後，能在立足點上與外籍傳教士平等。

在傳信大學中第一位給予羅光重大影響的人是于斌。觀察羅光的一生，于斌是他重要的仿效對象。于斌是傳信大學中國學生中的傳奇人物，他身材魁梧、儀容出色、成績優秀，他1924年來到傳信大學，1929年就在傳信大學教中國修生各種中國學問。羅光回憶說：「我去羅馬的時候大約有三十位中國學生。于樞機在神學班是中國思想，在哲學班教中國文學；後加易經，中國修辭學，我都去聽課。後來成立傳教學院，他又教授中國思想。<sup>3</sup>」羅光了解教廷培育他們的目的，是要他

們回到中國後能和外籍傳教士平起平坐，日後要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于斌不只是傳信大學中國修生的領袖，日後也是中國教會的領袖，因此于斌的學問、儀態、待人接物，都是羅光學習的對象。

剛恆毅是在羅馬培植中國修生的重要推手，他在1933年返回歐洲，1935年即擔任教廷傳信部次長，他是影響羅光的第二個重要人物。從1936年羅光祝聖為神父，並在傳信大學教書開始，直至1958年剛恆毅逝世為止，每週數次，羅光習慣性的向剛恆毅請示或求助。「所遇到的不是一位高級主管，而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父親，又體驗到是一位有原則的長上。<sup>4</sup>」羅光也回憶剛恆毅的待人接物：「剛公和我講話很簡單，有問有答，每事必有答案，決不拖延。……該講的話就講，不轉彎，不生氣。……教廷各機構早上八點到兩點辦公，下午休息。我下午到剛公住處，他住在傳信部大廈的一戶房間，下午他常坐在躺椅上看書或寫作。……他常對我說：『越事情忙的人，越能找出時間；越沒有事情的人，越找不出時間。<sup>5</sup>』」認識羅光的人就知道，他對剛恆毅的描述，也是他自己的寫照。

剛恆毅與于斌個人的表樣是形塑羅光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剛恆毅及于斌代表了一種時代風氣，可稱之為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思想。這種思想從雷鳴遠（Vincent Lebbe）發其端，中國天主教徒英斂之、馬相伯贊助、響應。雷鳴遠首先提及，愛國是中國天主教徒的權利，反對歐洲傳教士長期控制中國天主教教會，主張建立中國神職擔任主教的天主教教會。英斂之及馬相伯贊成雷鳴遠愛國



▲ 1961年5月21日在聖伯多祿大殿自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手中領受主教職（圖：輔仁大學校史室提供）

3. 《羅光總主教訪談記錄》，未出版，收藏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4. 羅光〈剛恆毅抵華七十週年〉《羅光全書》冊卅七，頁318。

5. 羅光〈亦師亦友〉《羅光全書》冊卅六，頁438-439。

主張，再提倡天主教教育，認為要提升教友及本地神職人員素質，特別是國學程度。他們兩人在1912年聯名向教宗上書，請求教廷在華北地區設立大學，此即為日後北平輔仁大學之濫觴。他們認為當時的傳教方式錯誤，因為傳教士未融入本地文化。反之他們以為利瑪竇、湯若望及南懷仁等，適應中國文化的方式是正確的，因為基督信仰是不反對任何文化的。當時剛恆毅來華就是在此種氣氛中，教廷給他的任務是祝聖中國主教，設立天主教大學，去除歐洲國家對在華傳教不當的干預。在這種思想中，剛恆毅要求各教區選派優秀修生到羅馬念書，于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于斌在1933年回國後，持續推動相關工作，在1936年並被教宗派任為南京主教。羅光則是于斌之後的佼佼者，在羅馬薰陶培養的過程中，他的各種意識就被逐漸的建構成形。

剛恆毅的思想在此種學習過程中，也就成了羅光的思想。羅光評價剛恆毅有三個重要原則：第一，專心宣傳福音事業。第二，專門研究天主教藝術。第三，愛護中國文化。<sup>6</sup> 這三點亦為羅光所珍視者。作為一位國籍神職人員，羅光和于斌等人一樣，都是主張自己愛國權利的。從其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他努力要使信仰與文化結合。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可謂是輔仁大學的思想核心，也是于斌、羅光等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羅光尊為師者還有陸徵祥、吳經熊等人。陸徵祥為中國外交界名人，曾任外交總長、國務總理等職。在比利時籍夫人去世後，進入比利時本篤會修院隱修。羅光曾數次前往拜訪，並做訪談。陸徵祥修道的動機之一是尋求孔子與基督相合之道，所以羅光不只從陸徵祥處習得外交內涵，也在這種文化相遇的企圖中得到啟發。吳經熊是第二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往駐教廷，目的主要是翻譯聖經。羅光上午在使館辦公，下午則協助吳經熊翻譯校閱聖經新約部份。羅光不只協助公務，家中雜務亦多予幫忙，但羅光回憶說：「我們兩人談話時，談家中雜務很少，談館務也不多；他把這一些事務都信記我。我們談話所談的，除譯經外，便是精神修養。」

由上所述，似乎羅光所長都是自外倣效而來，確然如此，但其實不盡然如此。每位各有所長，但亦有所不



▲ 羅光總主教晉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圖：輔仁大學校史室提供）

6. 〈懷念剛恆毅樞機〉《羅光全書》冊卅六，頁231-232。

足，羅光善於吸收眾人之所長，避其所短；集眾人之長而融洽之，則成羅光個人之學。由此而深入發明之，猶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有關融匯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羅光晚年曾比較自己與其他學者，他說：

「我不否認是老年人，但是絕不承認是守舊，更不承認是守舊的老迂闊。青年人大約不知道我是十九歲到羅馬留學，五十歲才來到台灣，在羅馬住了三十一年，生活完全西化，……所以不是土包子。我是要上攀胡適、俞大維、方東美、吳經熊一輩學者，學好了西洋的學術，再通中國的學術傳統，說適合中國民族性的話。胡適講考據而重儒行，俞大維講中庸而拜觀音，方東美講生生之道，吳經熊講靈修而重禪道，都實行融匯中西。真正一位中國學者，必定應能達到這種境界。」<sup>7</sup>

這些人都是羅光心目中的標竿，羅光知其長，取其合於己者，所要做的和這些大學者一樣，融匯中西。

## 參 輔仁大學第二任校長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第一任校長是于斌，他在大陸時期即擔任輔仁大學董事，參與了中國天主教教會絕大多數的重要事務。他嘗試於融合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他也了解輔仁創建的背景，因此在復校之初，他就訂出「真善美聖」作為在台復校輔仁的校訓。「真」是真理，以理智獲取，而大學主要就是求知之所。「善」是道德，教育過程中應培養人的倫理觀念。「美」是情感合理的、適度的表達。人生在世，基本上就在理智、道德、情感的三維向度中發展，而「聖」所描述的就是超越人世的、信仰的追求。于斌接著將此四個向度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的三個關係，所謂的「三知論」加以解釋。而融匯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于斌總結說就是「敬天愛人」四字，此四字無論為儒家思想或基督信仰都能圓融無礙。因此輔仁大學融匯中西的理論基礎，已經由于斌加以奠定。羅光扮演的角色是追隨者，但重要的是以此為基礎，加以深化、發揚、整合、創新。

羅光固然是謹慎的扮演追隨者的角色，但他日漸展露的鋒芒，愈益增進的學術及行政能力，卻使人不得不注意及他，很自然的將其視為于斌輔仁大學校長職務的接班人。在輔仁內部運作不順時，甚至外界有些流言蜚語，認為羅光有意藉著這個機會，成為輔仁大學的校長。為此羅光澄清說：「我從來沒有自動和輔仁大學拉上關係，別人卻拉者我走，造成外間對我造成許多傳說。<sup>8</sup>」第一次發生這樣的想法在

7. 羅光〈談青年輔導〉《羅光全書》冊卅六，頁429。

8. 羅光《生活自述》頁63，（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9. 有關此段過程，在拙作〈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一輔大易長事件〉有最詳細的說明《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2005年12月7日舉行）。



1970年，當時因為于斌任林棟擔任夜間部主任，及教育部要求輔仁大學改變組織架構事，且于斌當時已七十歲，教會內遂有人運作要求于斌辭職。中華教會內有學術聲望者，一為香港主教徐誠斌，另一為羅光；徐誠斌不可能放棄香港教區，羅光遂為于斌辭職後的受益者。

<sup>9</sup> 羅光說的很準確，在此事中，他沒有主動參與，他是被參與輔仁大學管理的耶穌會和聖言

會拉著走。教廷要求于斌辭職，引起中華民國教育部反彈，差點釀成外交事件，最後輔大董事會請于斌續任，於是才化解難題。第二次在1977年，因于斌年事更高，教廷乃請其退休，並指定羅光接任。羅光在交接典禮上這樣說：「我來接任輔大校長，不是我自動來的，更不是我要求或謀求來的。去年傳信部長羅西樞機和陶代辦問我願不願意接任輔仁大學校長，我答說不願意；不過，若聖座有意思叫我去，我會接受。」從1978年8月上任，到1992年2月卸任，羅光在輔仁大學擔任校長十三年半。

羅光自己對他所接任的輔仁大學有很清楚的描述：

「輔仁大學的組織是聯邦制，由中國主教團（中國神職人員）、聖言會、耶穌會三個單位組成。……這種制度在天主教會尚稱創舉，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備受主教們的喝彩。……當時三單位的每一單位有自己的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學校的全校教務、訓導、總務，只有名而無實。後來因教育部的干涉，全校的教務、訓導、總務三處，實際向教育部負責，三處的辦公處則分別設在三單位的校舍內。……學生要接洽各種事情，須往三單位教室跑。校長為和職員談話，職員須從三處的教室，在夏天炎日和冬天寒風下走來走去。董事會開會時，校長室也曾兩三次提議建築公共辦公樓，三單位的董事都以為要花三單位的錢，便答說不必要。我接任校長以後，體驗到沒有公共行政大樓的不合理，乃先籌款，不動用三單位的錢，後來尋覓建地，決定興建行政大樓。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我就任校長的次年，十一月五日，贈送名譽博士學位與西德赫夫奈樞機，並請為行政大樓（定名野聲樓）主持破土典禮。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日，驗收行政大樓野聲樓，集合校長室，教務、訓導、總務三處，夜間部，在同一大樓分層辦公。」

「我到輔仁大學任校長時，校長室只有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經營校長室和人事室業務。秘書長龔士榮神父已辭職，我邀主教團秘書長李震神父接任秘書長，李神父堅請劃清職責，秘書長只管學校三單位聯繫事務和諮詢委員會事務，位似普通副校長的位置。原先龔神父所管校長室和學校建築，學校公共經費等等事務，都不再管理。我乃首先成立人事室，再設立公共關係室，學校秘書長室，校長秘書室，校友聯繫室，最後設學校基金室。」<sup>10</sup>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羅光任校長的時期，輔仁大學進入組織化的階段，權責



▲ 1978年8月2號輔大校長就職典禮  
(圖：輔仁大學校史室提供)

10. 羅光《生活自述》，頁75-76。

有了更明確的劃分，基本上這是羅光的風格，也是其意志的展現。此後為了學生社團活動的需要，在1985年建成學生社團專用大樓焯炤館，1988年利用聖言會校旁購置的土地，建成綜合體育場。

在羅光擔任校長時期，輔大設立了藝術學院和醫學院。羅光對藝術學院的看法，基本上來自剛恆毅。他說：「輔仁大學為天主教大學，為國家培植人才，也為教會培植專才。在北平創辦以後，對中國天主教的繪畫藝術，曾經培植了一些天主教繪畫專家，以陳路加為首。在台北復校，輔仁大學注重哲學又關心神學，為教會學術在中華民國的思想界得有一席之地。為教會藝術，乃設立藝術學院。」<sup>11</sup> 1985年羅光為藝術學院破土。

醫學院的設置本來不在羅光的計畫之內，因為「醫學院的制度，可以超過一處小型的大學，經費的多，敵匹一座普通大學。…我沒有想設立醫學院，也不敢想籌設醫學院的校址和校舍。」後來因姚宗鑑副主教的籌劃，「我便著實考慮實際辦法，邀請教育部部長和衛生署主任座談，結論為輔大可以設立醫學院，但在近三年以內，不設立醫學系，僅辦護理系、公共衛生系、心理輔導系。經過了這一難關，先在主教團取得同意為設立的單位，後以不運用三單位經濟的條件，勝過聖言會的阻力，贏得董事會的批准。……」1990年的醫學院成立，1992年12月醫學院建築落成，其時羅光已卸任校長。

宗教系所的設立亦為羅光校長任內的大事。教育體系自民初以來即將宗教與科學對立，將宗教自教育內涵中抽出。影響所及，教會可興辦大學，但必須完全按照教育部的課程。輔大創辦之後即無法設立神學院，亦不准設立宗教課程。羅光上任後利用公私機會，和教育主管單位溝通，甚至為此舉行學術研討會，探討宗教教育的合理性及功用，終於在1988年獲得教育部准許設立宗教研究所，1992年羅光退休後宗教系設立。

除了學院系所之外，羅光亦以其所設立之學術行政機構及傳播媒體自豪。1980年他設立了「益世雜誌」，由輔大出版社負責發行。益世雜誌名稱來自《益世報》，是雷鳴遠神父在天津創辦的報紙，抗戰期間停刊；于斌在昆明、重慶續辦。遷來台灣後，「台灣天主教會和民間學人，常有恢復益世日報的呼聲，于斌樞機和我都不斷接到這種請求；可是人力和財力，都不能實現所請。」益世雜誌的設立「是想豎立一個中正的目標，以正確的思想來面對社會各種問題，不自誇大，實事求是，『正人心，息邪說，拒跛行』」<sup>12</sup> 不過辦一份雜誌仍需足夠稿源，編排亦頗費人力，因此在1987年停刊。1989年又發行羅光《益世評論》雙週刊，刊登短篇論文，對時事表達意見。「在不作人身攻擊，不反對天主教的大原則下，自由撰寫。」<sup>13</sup>

11. 同前，頁88，剛恆毅對北平輔仁美術專科的走向有頗多指導。

12. 羅光〈益世雜誌發刊辭〉《羅光全書》冊卅二，頁238。

13. 羅光《生活自述》，頁84。



羅光向來注意蒐集天主教文物及史料。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為能更了解鐵幕中天主教會的概況，羅光組織了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小組，後以此為基礎，成立「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在文物方面，羅光除蒐集各式祭披、聖經中文譯本，要理問答、聖像畫、歷史照片等，又蒐集有田耕莘樞機遺物，輔大原本即在龔士榮神父努力下，蒐集于斌校長各式物品，以這些文物為核心，1987年成立「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及「校史室」。羅光說：



▲天主教文物館所展示物品  
(圖：攝於輔仁大學天主教文物館-校史室提供)

「參觀學校的人，參觀學校的中心—行政大樓，拜會了校長和行政主管，知道今天的輔仁。登樓參觀校史館，得知輔大的來歷，乃有輔大全貌的觀念；在參觀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更明瞭輔仁大學的地位和使命。至於大陸教會的史料，則設有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史料館為收藏，不為陳列。」<sup>14</sup>

為協助學術交流的行政工作，羅光在1988年設「學術交流室」。成立於1989年的「中西文化研究中心」，為資助研究工作的機構，這兩個機構是日後研發處的前身。

1990年7月教廷駐華大使館的裴納德（Adriano Bernardini）代辦來輔大，向羅光示意當年準備繼任人選。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準備，1991年10月，裴納德又來輔大見羅光。羅光說：

「裴代辦繼續來出示教廷教育部通知輔大校長任命事，歸他們管理，不屬傳信部。且怕我不辭職，竟先任命狄剛總主教為總監督，我很不高興，乃向董事會辭職，又向教廷教育部辭職，並表明辭職即日生效。裴代辦乃來信緩頰，說明教廷教育部授我以榮退校長銜，……學校三單位議定聘我為終身講座教授，我乃聲明不領退休金，決定於2月2日舉行交接禮。」<sup>15</sup>

其時羅光已八十一歲。

羅光在1991年間自己寫了一篇寓言文章，說夢到自己到一座王爺廟參拜，王爺和他說話：「老頭兒，你竟不認識自己的老師？我曾教你把自己供做偶像，自己拜自己，教別人也拜你。」羅光答說：「大學校長我已經要退休了，外面開會我不去，應酬酒會我不

14. 同前，頁80-81。

15. 同前，頁223-225。

16. 羅光〈如夢初醒〉《羅光全書》冊州七，頁207-208。

參加，天主教慶典我常缺席，我什麼時候聽你教我做偶像崇拜。」王爺把羅光趕出廟，羅光出殿時撞到一個女香客，女子尖叫：「老頭兒，規矩一點。」然後又撞著一個老者，老者說：「年歲大的人，慢點走，看清路才走。」<sup>16</sup> 這篇寓言透露出羅光將退休前的心境，也表現出別人對他的誤解及提醒。可以論斷的是，教會主事者中，行政能力及學術能力，羅光的確是首屈一指的，雖已過八十高齡，羅光退休時還是有些惆悵。



▲ 民國75年10月2日羅主教主持清明節祭天敬祖大典  
(圖：攝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 肆 羅光的教育理念及其實踐

1978年7月18日，當時羅光已確定將接任輔仁大學校長，他在一場天主教中小學主任講習會裏講〈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可以代表他所思考包括輔仁大學在內的天主教學校的教育理念。關於天主教學校的教育目標，羅光先引述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會教育宣言」：

「真正的教育的目的，乃為培植人格，以追求人生的最後目的，同時，並追求社會的公益，因為人為社會之一員，及其成長也應分盡社會的職責。」（第七節）

「在一切教育工具中，學校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因為學校的使命為悉心培養學生的智能，發展正確的判斷能力，傳授上代所得的文化遺產，激勵價值意識，準備職業生活，在不同性格，不同環境的學生中促進友善相處，培養互信互諒的氣氛。」（第二十節）

「所謂天主教教育，不僅如上所述之培養完善的人格，其主要者乃為使領受聖洗的教育青年，逐漸認識救世的奧蹟……能按照具有真實的正義與聖德之新人的方式度私人生活。」（第九節）

羅光引述的三段文字，第一段是說明教育的目的；第二段說明學校教育的目的；第三段則是說明天主教教育的目的。

「就教育的普遍目的而言，主要是培育青年人的人格。人格的基礎是天生的。……每個人在這種天生的基礎上，建造自己的人格。……學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於教導學生琢磨自己的天生質料，以建造高尚的人格。」

為培育人格，應先給青年們一個崇高的模範。孔子為教門生培育人格，指示學生以『君子』作模範。我們天主教的人格模範乃是『基督』。……

天主教學校教育的目的，便在於培育青年人知道自立、自主，知道自立的範圍，習慣在適當的範圍內去活動。」

以人格教育為基礎，羅光認為教育的進一步目的是使學生了解生活的意義，也可說是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目的，當然是宗教的信仰；然而，不談宗教信仰也可以講人生目的。孔子、孟子常以自己負有建設倫理，以立己立人的天命。知道自己負有一種使命，就是生活目的。

人生的目的，乃是一盞明燈。可以照見各種學識和各種技術的意義。人生的目的又是一根繩索，能把學術和生活聯繫起來。給人一個生活的意義。」

在羅光看來，強調德、智、體、群四育的教育內涵固然是好的，但天主教學校的教育，是以人生的最高目的，統轄四育。而所謂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為基督作見證。羅光解釋說：

「此並非把學校變為宣傳宗教的機構，更不是把學校變成一座教堂。」

「天主教學校對於天主教學生，應該培育信仰的知識和實踐施以宗教教育，使學生『逐漸認識救世的奧蹟，能日益領悟信德的恩寵，能以心神以真理崇拜天父。』

對於非天主教的學生，應給他們良好的機會可以『認識救世的奧蹟』，而且更要在不信基督的社會裡，以事實作福音的見證。」

在此目標下，羅光認為天主教學校有如下之特色：

### 一、開放性

在學生的招收方面，天主教學校是開放的；在教師的聘請方面也是開放的，在思想方面更是開放的；接收當代的思想，保存民族的傳統，對於學生的錄取不分宗教信仰，絕不強迫學生參加天主教儀典。祇是在學生的心理上，給予走向福音的啟示。

### 二、富有福音精神的仁愛與自由

天主教學校素來以實行愛的教育為特色。校長和老師對學生常以愛為原則，尤其對於有問題的學生，常以愛去輔導。雖然懲罰在青年的教育上，有其重要性，然而，要使學生在受懲罰時，知道懲罰是出自愛心。

福音的自由，是人格的自由，是天主義子的自由，在學校的校規和教育的法令內，應容許學生有相當的自由，以培植學生之自動自發精神，這種自由應當是

17. 羅光〈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羅光全書》冊四，頁89-99。

健全人格的表現。目前我們的教育因著考試的壓力，學生常是被動地接受教育，缺乏思考的習慣，缺乏正確的判斷力。我們天主教學校要在精神方面鼓勵學生自動自發。

### 三、教師的身教

「我們要求教會的學校是培育人格的學校，我們必須要求學校的教師，人格高尚，品行端重，在目前師道衰頹的時代，我們的學校要尊師重道。為提倡這種風氣，最重要的一點，是老師們能自重。行為輕浮，不求仁義祇求利，思想不純潔的人都不可以在我們的學校任教。」

### 四、尊重民族傳統文化

「天主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宗教，所有信仰的思想及儀式，雖然因原在歐洲養成而又由歐洲向外傳播，帶有歐洲文化的型態，然而，天主教在每一個民族裡，是該民族的宗教，在思想和儀式上應該接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天主教是中國人的天主教，在中國人主管的教會，中國信友裡有了哲學專家時，便要使神學和教儀中國化。因此，天主教學校應特別看重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學生實行固有的善良倫理，實踐三民主義，培養民族意識，愛護國家和民族。」<sup>17</sup>

從1988年的另一篇名為「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的文章中，大致可以看出羅光教育思想是在同樣的氛圍中發展。他說：

「輔仁大學名為天主教大學，實際上在一萬五千多位的學生中，只有五百位天主教教友；在一千一百位教師中，只有一百五十位天主教教師。……在這樣的具體環境裏，為表現天主教教學的理想，輔仁大學乃有幾項教育原則。

- 一、學校是開放的：……
- 二、人格教育：……
- 三、愛心教育：……
- 四、自主教育：……

五、宗教輔導：天主教學生組織同學會，有要理班、歌詠團、聖經班、禮儀輔導。同學又組織醒新社和同舟社，邀教友同學參加，兩社各五百多位社員，從事校外的社區工作，協助盲人院和痲瘋病院的病人。

- 六、學術研究：一方面重視思想



▲ 羅光作畫情形 (圖：輔仁大學杜金煥修女提供)

18. 羅光〈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羅光全書》冊卅四，頁39-40。

教育，編印天主教思想書，供全校師生參考。一方面發展其他學校沒有的學系和研究所。以輔大私立學校的人力和財力，不能和國立學校在所有課目上競爭，但是選定我們學校所長而別校所短的學科，盡力發揮。」<sup>18</sup>

在這篇文字的前面四項與其1978年所設想的並無二致，並在各種不同的機會經常闡發。後兩項則是新的教育環境下的思想，有關於宗教部分，

經過反覆的溝通，教育主管機構對宗教的敏感心態減少，宗教也被接受為學術的一部，因此可以推動在學校中與宗教有關的活動。至於學術研究，則是因大學增加，彼此間的競爭也增加；私立學校在經費上無法和公立大學競爭，必須建立自己的特色。這兩項可用宗教教育及私立學校兩者來說明。

在前述羅光的教育理念中，宗教教育與人生的最高目標其實是同樣的事情，宗教信仰的精神貫穿教育，在羅光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是教育主管單位不理解。所以在宗教教育上，羅光的主要訴求是宗教教育的合理性。他曾從歷史出發加以考察：

「在民國成立以前，教會學校有宗教教育，民國初年教育部不承認宗教教育，國民政府的教育法令禁止在私立學校以宗教為正式課程，並且不容許學生參加宗教儀禮。

為什麼有這種事實呢？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天主教與基督教為侵略中國及中國文化的歐美帝國主義，再者，他們認為宗教是迷信，和現代的科學相矛盾。

但是，現在我們若問政府官員和社會知識分子，大家都不說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也不願說是迷信，然而卻又覺得宗教和教育不相關，不必在教育內有宗教教育，這是因為中國歷代對於宗教的觀念，祇知道人和神靈的關係，這種關係僅祇是求福免禍的關係。天主教和基督教則肯定宗教信仰為人生的基礎，包括人生的各部分，人生的目標和一生價值觀，都以宗教信仰而定，教育既為培養人格，便應該有宗教教育。」

他反對教育主管當局，長期不承認神學學位的做法。他指出神學院做為人文學科之首，不僅在中古時期，現在歐美許多大學仍然如此，即使在不信基督宗教的日本、韓國、印尼也都承認神學院的學位。<sup>19</sup>



▲ 民國75年6月18日烏拉圭教育部長來訪與其合影左二為羅光  
(圖：攝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19. 羅光〈宗教教育〉同前，頁322。

宗教教育問題在結構上，來自於教育主管當局對私立學校的管控與限制，這是羅光在從事教育工作後的經驗。1989年至90年間，立法院通過新的大學法及私立學校法。羅光認為：「新的私立學校法，第一不要冠以私立，第二不要偏於防患的消極精神。」羅光認為不要用「私立」，而要用民立，他也對教育部的「輔導」非常的反感，他說：

「所謂輔導，常把民間創立的學校，看成小孩，看成歹徒，嚴加看管，派來從沒有辦過大學的督學，按照法規條文，指專任教授人數不夠數目，他也不想民立學校的經濟不能和國立的學校相比；指出教外文的教授，外籍人數過多，他也不想教美文以美國教授，教西班牙文以西班牙教授，可以教得更好。

補助經費，一個富裕的政府應該樂於去做，使國民所受教育常是優良的教育。但為補助應規定明瞭的原則，不要由教育部隨意去獎勵，或者學校千方設法去追求。

……民立學校不是營利機構，是替國家辦教育事業，教職員的工作薪金，學校要付，他們的保險金和退休金，應該由政府負責。」<sup>20</sup>

基本上羅光認為政府獨攬教育權是有問題的。教育權是一種天生人權，屬於父母所有。他說：「無論在什麼制度之下，子女是屬於父母的，家庭為先天的組織，在法理上，在歷史上，先於國家；國家雖也是先天的組織，乃為補家庭之不足。」因此父母有為子女選擇學校的權利，私立小學及中學生抽籤的規定，就是對此人權的剝奪。不開放私立中學的設立同樣是剝奪人權。<sup>21</sup> 他認為政府應多支持私立學校，支持的辦法他不贊成用獎助的辦法，因為獎助金既少，分配的標準又很難達成，結果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就是生效，也造成好的學校繼續好，壞的學校繼續壞。」支持私校的辦法，首先是容許各系所按需要提高學雜費。其次是政府應訂定固定支持私校經費佔全年教育經費的百分比，「按照各私立學校的學生人數和教師人數和研究工作之所需，每年核發各校支助費，使學校安心訂立發展目標和計畫。」<sup>22</sup> 羅光的想法到今天為止，仍在私立學校和教育主管機關的拔河中擺盪。

羅光在就任輔大校長後所推動的「敬天祭祖」，頗能代表他的教育理念。敬天祭祖首先由于斌自1970年後提倡，但在輔仁大學內舉辦，則自羅光時期開始，他說：

「輔仁大學為教會學校，在教育方面須特別注意人格教育，在生活方面應培植學生有正確的觀念，……因此學校乃有禮儀週、教孝月，便也要舉行祭祖典禮，教學生愛家庭、重孝道。

彌撒為天主教唯一重大禮儀，社會也都知道天主教行彌撒，我們也就應該讓學生們見識見識。……可是教育法令禁止在學校有公開宗教典禮，我乃想在學校舉行祭祖，教育部不能反對，

20. 羅光〈新年談新大學法〉《羅光全書》冊卅七，頁112-113。

21. 羅光〈開放教育權導正教育風氣〉《羅光全書》冊卅四，頁145-147。

22. 羅光〈善用教育經費建立學術教育基礎〉《羅光全書》冊卅四，頁142-143。



祭祖前有彌撒，教育部也不能挑剔。」

「這項典禮，從我到校長任所後開始，已經舉行了十多年，學校同事中在開始時有許多人不同意，不贊成舉行彌撒，說是參禮多係教外學生，不懂彌撒意義，不守禮儀規則。但因我堅持，大家漸漸進入狀況，在我退休前兩年，大家都感到禮儀對學生很有意義。」

由於培養學生自主及愛心教育的理念，羅光相當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1980年代後期，各校學生運動盛行，輔仁大學現任校長黎建球有如下的回憶：

「一九八八年臺灣正值總統選舉，各界對改革之期望至深，乃集合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李登輝先生請願，頗有不達目的絕不中止的味道，大學生在這些請願活動中扮演了極為積極的角色，頗令各大學校長憂心。輔大學生當然也不例外，羅總主教乃在三月中去探望他們，羅總主教一方面和他們在一起，一方面也同時要求他們儘快返回校園，當時，輔大學生也很爽快的向校長報告：見到了總統，訴說了心願之後，就會返回校園。而學生們也真的如同所答應校長的就再三月二十一日返回了校園。」

第二年，一九八九年五月大陸天安門事件發生，臺灣的學生為聲援大陸的學運，群聚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學運期間羅總主教也曾經兩次親自去看學生，和他們坐在一起，支持他們，鼓勵他們，並聆聽他們的心聲，但也要求他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和 safety。他在任校長期間時時以學生為念，也對學生很有影響力。」<sup>23</sup>

1990年3月是台灣學運的最高潮，各校學生聯合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羅光也在3月20日前往探視，他似乎是一個沒有缺席學運的老人。在各種學生活動中，黎校長也認為羅光常是站在學生一邊的，他說：

「常有人說羅總主教的脾氣不好，很像一隻湖南騾子，而事實上他常常是對那些社會上、國家政策及法令上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上發火，特別是擔心學生權益受損時，他就會十分著急、生氣。筆者在任訓導長期間就曾有一次為了學生要求的活動，訓導處不同意，總主教站在學生一方，討論中，我們也不願讓步，就在言語中槓了起來，他在情急之下，拍著桌子堅持，我震懾於他的威嚴，也感動於他為學生爭取空間的愛心。」<sup>24</sup>

在羅光任校長之後，輔仁大學的導師制度漸有規模，羅光要學校的導師們放下身段，



▲ 民國77年3月30日羅總主教主持祭天敬祖大典  
(圖：攝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23. 黎建球〈羅光總主教留在輔大的風範〉《羅光主教思行傳》，頁3。

24. 同前，頁4。

採取溝通的態度。他也說明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一、任何的活動，溝通的模式是：可以，但是……，告訴學生該如何做？讓大家都可得到益處。

二、學生參與本校各級會議，凡是參加者皆可投票，無論是行政會議或是校務會議。

三、要有限制。不能妨礙同學求學的環境、不能作人身攻擊、不違背政策（因那是政治問題）、校外行為自己負責。

在那個學運狂飆的年代，羅光按照他的教育理念行事，舉重若輕的平安度過。

## 伍 結語

在眾多羅光的回憶性文章中，什麼最能代表羅光的教育家心懷？他的退休致詞是一篇經典，有系統的說明十三年半校長生涯中，羅光對輔仁大學在軟硬體上的貢獻。不過內容前文已大略述及，此處則想用另兩段文字加以說明。第一篇是《獻身五十年》，這是為紀念晉升神父五十年而做。在這篇長文中羅光引用孔子的話：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論語·述而篇》又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羅光說：

「我作一位大學校長，不是應該有這樣的人格嗎？」<sup>25</sup>

接下來羅光引用吳經熊所翻譯的聖保祿書信，這是當年他和吳經熊在羅馬字斟句酌的結晶。



▲ 輔仁大學天主教文物館-展示物  
(圖：攝於輔仁大學天主教文物館-校史室提供)

25. 羅光〈獻身五十年〉《生活自述》，頁253-254，寫此篇時羅光任輔大校長第八年。

26. 同前，頁254。

「聖保祿宗徒說：『吾欣然以柔弱為樂，庶幾基督之神德，能常寓吾身。吾為基督之故，凡肉體之柔弱，及一切侮辱、艱難、窘迫、困苦，皆所甘受。蓋吾之弱，正吾之所強也。』（吳經熊譯，致格林多後書，第十二章第九、第十節）主教乃宗徒的繼承人，聖保祿宗徒的生活規則，就是主教獻身的規則。我已七十五歲了，不認老也得認老，老則多病，老則精力疲弱，工作低微，心理上使奉聖保祿的生活規則為座右銘了。但是每天走在輔仁大學的校園裏，處處遇到輕鬆快速的腳步，眉開眼笑的青年面貌，我却又『不到老之將至云爾』。帶領他們走上人生正當的路途，可以『誨人不倦』。」<sup>26</sup>

在這篇文章中，羅光信手拈來，用了孔子和聖保祿的金句，描寫他擔任輔大校長的心態，這正是一位融合基督信仰與儒家文化教育家的自然寫照。他回憶起吳經熊是他敬佩的學者和長官，翻譯的新約聖經是文言文，由此延伸到兩千年的聖保祿，和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也都成了羅光學習的對象。學而後教之，也正是羅光教育家身分的實踐之道。

第二篇是一首不全合體例的古詩，在他自輔大退休兩年多後發表，由詩句中可以看出，即使羅光不完全承認，其實他最愛的身分是學者，他最懷念的角色是輔仁大學校長。謹以此文作全篇的結尾：

斜陽雨後樹多霧，課畢學子塞校路。  
講壇高論風消散，年輕情懷笑語訴。  
行政樓坐十四年，鬚髮銀白氣喘吁。  
種樹成蔭忙樹人，長望上天賜雨露。  
而今退休策杖行，校園綠葉隨腳步。<sup>27</sup>

## 參考文獻：

- 羅光（1996）。八十述往序—羅光全書。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剛恆毅抵華七十週年—羅光全書。冊卅七，頁318。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亦師亦友—羅光全書。冊卅六，頁438~439。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懷念剛恆毅樞機—羅光全書。冊卅六，頁231~232。

27. 羅光〈讀書—教書〉《羅光全集》冊卅七，頁474-475。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談青年輔導－羅光全書。冊卅六，頁429。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生活自述，頁63。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生活自述，頁75~76。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益世雜誌發刊辭，羅光全書，冊卅二，頁238。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生活自述，頁80~84。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生活自述，頁223~225。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如夢初醒－羅光全書，冊卅七，頁207~208。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羅光全書，冊卅四，頁89~99。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羅光全書，冊卅四，頁39~40。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宗教教育，頁322。
- 羅光（1996）。新年談新大學法－羅光全書，冊卅七，頁112~113。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開放教育權導正教育風氣－羅光全書，冊卅四，頁145~147。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善用教育經費建立學術教育基礎－羅光全書，冊卅四，頁142~143。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7）。獻身五十年－生活自述，頁253~254。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羅光（1996）。讀書－教書－羅光全集，冊卅七，頁474~475。
- 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黎建球。羅光總主教留在輔大的風範－羅光主教思行傳，頁3。
- 《羅光總主教訪談記錄》，未出版。



# 孫邦正

1913  
~2007

——  
淡泊寧靜的教育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研究所兼任教授 楊國賜 撰文



孫邦正先生，字友豪，安徽宣城縣人。自幼天賦聰明穎悟，學冠諸生。早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並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歷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教授及系主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暨教育學院院長。並曾任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對於中國教育制度之改進及九年國民教育之推行，諸多建議，貢獻良多。此外，對於教育學術活動的倡導，亦不遺餘力，歷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國際教育學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中國社會教育社等常務理事。

孫教授教學之餘，潛心研究著述，著作等身，所出版的書籍多達四十餘冊，論文約三百多餘篇。

## 前言：三不朽的教育家

孫邦正教授是一位當代教育家的典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堅守教育崗位，春風化雨四十寒暑，為社會造就無數教師，也為國家培養許多優秀社教人才，真是桃李滿天下，散播偉大的教育愛，芬芳盈杏壇，更為當代教育工作奠定良好的人師榜樣。

孫教授深感教育是真正百年樹人的工作，教育也是建國的根基，而教師就是建國的工程師。因此呼籲政府要重視師範教育，為國家培育優良的師資；積極倡導推行九年國民教育，為國家現代化奠定基礎；革新國民小學教科書內容，以適合兒童心理與需要；倡導社會教育與空中教育，為我國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基礎。尤其孫教授創辦社會教育學系，並主持系務，積極規劃教學與研究工作，長達二十年之久，禮聘名師，成就學生，奉獻教育，無私無我，正顯示孫邦正教授平凡中的偉大。



孫教授一生從事教育工作，誨人不倦，熱愛學生；著作等身，膾炙人口，遍布全國；尤其先生素以服務社會為職志，改造社會的勞績昭然若揭，為人稱道。先生生活一向勤儉儉約，樂以忘憂，具有淡泊寧靜的志趣，安貧樂道的精神，是先生「立德」的表徵。而先生於教學之餘，勤於研究發表著作，其下筆猶如行雲流水，深入淺出，易讀易懂，這是「立言」垂世的寫照。此外，先生「立功」於社會，培育人才，服務於人群，實踐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古訓。我們以立德、立言與立功，適足以描繪出先生為一位當代教育家的典型。

## 貳 生平事略

孫邦正先生，字友豪，安徽省宣城縣人，民國二年三月十八日生，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宣城地處風景秀麗，經濟繁榮，文風鼎盛，且以盛產宣紙而聞名，文化水準甚高。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為清朝舉人。先生五歲時到私塾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六歲就在祖父的教導下研讀論語、孟子，同時練習作文。十歲至十一歲就讀當地最著名的初級中學-皖南中學，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也埋下了日後獻身教育事業的種子。

民國十五年夏季，宣城發生流行的瘟疫，先生尊翁益卿公不幸逝世，先生的母親為此悲痛欲恆，亦於同年八月病逝。在父母雙亡的情況下，幸得祖父母及伯叔們的多方護持，方不致於影響到先生的學業。民國十六年七月先生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皖南中學。十七年春季考入安徽省立第四中學高中部，由於學業成績優異，每學期都以第一名獲得獎學金。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先生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當年八月，順利考進位於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當時中央大學名師雲集，諸如教育家艾偉、程其保、蕭孝嶸等先生，又如主講中等教育的汪懋祖先生，比較教育的孟憲承先生、羅廷光先生，教育行政的夏承楓先生以及教學法的趙廷為先生，這些名家學者，皆為一時碩彥。由於教授們的鼓勵，學生們經常在一起探究學問，辯論學術，先生常以圖書館為家，埋首鑽研，並將閱讀及研究心得，寫成論文，發表於教育雜誌，名揚文壇，甚得師生讚賞，奠定了日後研究教育學術的深厚基礎。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先生畢業於中央大學，同年八月，又考入中大教育研究所，該所由艾偉博士主持，以學科心理學的研究為主。先生在此接受嚴格的科學研究方法訓練，對後來的學術研究甚有助益。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畢業於中央大學教育研究所，經艾偉教授的介紹，前往陝西省教育廳擔任編審職務，負責陝西教育月刊編輯工作。同年十一月間發生西安事變，陝西陷於恐怖緊張狀態，局勢極為混亂，先生乃辭職返京。於是年十二月底受聘中央大學心理系助教。不久，發生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中央大學籌議搬遷四川重慶。先生乃回到家鄉安徽，應聘安徽省立徽州師範學校教導主任。後來日機繼續轟炸，先生乃決定攜帶家眷遷移大後方，進入四川重慶。一到重慶，幸得老同學的推介，應聘四川省立川東師範學校教員兼附屬小學校長。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中央大學設立教育研究所，由艾偉博士主持所務，決定找先生協助其處理所務工作，名義是助理研究員，先生得以繼續學習心理學的研究工作。民國三十年八月，經由恩師趙廷為主任的極力邀請，擔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專任教授。要之，在重慶這段日子，總計在川東師範學校一年，中央大學兩年、四川教育學院五年，剛好是八年抗戰的時期，先生過著顛沛流離的教學生涯，且物質生活相當艱苦，而先生亦能甘之如飴。

抗戰勝利後，學校復員，先生並未隨中央大學回到南京，而是應國立湖北師範學院之聘，任職教育系系主任。民國三十七年底，大陸赤燄遍地，情況十分險惡。先生突接到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先生及教務主任林本先生的聘書，毅然決然離開漢口，經廣州、廈門，最後安抵台北，結束了在大陸流離遷徙的教學生涯，開始為台灣的師範教育投入畢生的心血。

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先生一直任教於教育學系。民國四十四年八月經選派前往美國進修，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作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而先生的研究主題為社會中心教育的研究，使其日後與社會教育系結下不解之緣。

民國四十四年社會教育系成立之初，當時台灣師範學院劉真校長敦請劉季洪先生為社教系主任，後因劉教授轉任政治大學職務，故改請教育學院田培林院長暫兼一學年系主任職務。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先生由美返台，八月便正式接任社會



▲ 民國44年於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師生合照（左一為孫邦正先生）（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教育系系主任之職。社教系初創，又無常規可循，但先生認為社會教育系應有其獨自特色才能永續經營，經與田培林院長商議，決定先確立教育方針，根據方針決定分組，然後分組修訂課程，再依據課程需要延聘師資等幾個步驟進行改革。先生依據上述方針將社教系分為圖書館、新聞與社會事業等三組，開始對課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減少共同必修科目，接著針對各組的需要訂定分組選修課程，以培養學有專長的人才。由於三組各有專攻，而當時教師員額編制又受限制，因此先生決定在大一、大二多用專任教師，大三、大四多用兼任教師以解決師資受限問題。當時這三組的許多學者名流且有重大成就者，幾乎都被先生延攬到社教系任教。創系迄今已屆半個世紀，由於先生的用心擘劃，禮聘良師，認真辦學，營造和諧，淳樸奮進的學風，以致人才輩出，廣受社會大眾的讚賞有加，先生功不可沒。



▲ 師大退休前留影-第二排右三為孫邦正先生  
(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民國五十二年由於先生學驗豐富，望重士林，受聘兼任中央黨部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與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委員。當時這個委員會有五、六十位學者參加，不但管規劃設計、也管執行考核，權力相當大。委員會每月集會一次，每個委員每年要提出一個當前教育問題的中心研究報告，討論之後，發交各機關執行。因此，延長九年國民教育計畫，建立技術職業教育從職業學校到工業技術學院的一貫體系，擴大辦理推廣教育都是那時先生的傑作。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先生兼任師大教育學院院長，亦受聘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參與教育部各項政策之擬定，各項重要教育法規之修訂以及大中小學課程標準之修訂工作，無不竭智盡慮，力求允當。此外，對於各種教育學術活動亦能熱心參加，不遺餘力。先生德高望重，歷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國際教育研究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中國社會教育學會常務理事等。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退休，赴美與子女同居，過含飴弄孫的生活。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美因病逝世。

## 參 重要教育事功

### 一、呼籲重視師範教育，培育優良師資

先生認為教師的良窳，直接決定學校教育的成敗，間接影響國家社會的前途。若要培養優良的師資，必須振興師範教育。所以師範教育實為整個教育事業的命脈，而國家教育的成敗，當以師範教育為樞紐。至於談到師範教育的重要性，先生則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 從國家民族方面而言：先生強調國家民族的前途，繫乎國民素質的高下；而健全國民的培育，則有賴於健全的師資。這就是說明良師足以興國的道理，因此師範教育機構應是培養良師的搖籃，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二) 從社會方面言：先生認為社會文化的傳遞與發揚，社會事業的建設與革新，以及社會生活的改進，社會風俗的轉移，都有賴於教師的努力配合。所以師範教育就要肩負培養繼往開來，移風易俗的國民導師為任務。

(三) 從學校方面而言：先生一再強調學校表現優良與否，全賴學校教師的能力與是否盡職而定。倘若教師受過良好的師資訓練，且有高度的服務熱忱，學校的表現績效就會蒸蒸日上，受到社會的肯定。反之，教師若不能勝任，或不願善盡其職責，學校就無法辦好。西諺所謂：「有其教師，必有其學校」，可謂至理名言。由此可知，師範教育的良窳，足以決定學校教育的成敗。

(四) 就學生方面而言：先生也認為學生的品行是否端正、學識是否充實、身心是否健康，亦有賴教師的循循善誘，以及有效的教導而定。教師對於學生，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一言一行，往往為學生所倣效，所以教師必須接受嚴格的師資訓練，然後才能擔負起「人師」的重任。

從上所述，可見先生對於師範教育的關心，一再以學者的立場，為師範教育仗義直言，呼籲政府要重視師範教育的落實，以提高學校師資素質。因此，先生經常在各項重要教育會議中，或在重要報刊發表宏論，提供教育當局施政的參考指針。先生的重要論點及意見有1.確定師範教育制度使之在學校制度中成為獨立系統；2.限制師範生的入學資格，以利選拔優秀的份子；3.提高師範生的素質，以提高教師的水準；4.加強師範生的身心訓練，以培育健全的師資；5.嚴格規定教師的資格，以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6.注重教師的進修工作，以促進教育事業的進步。



## 二、協助籌劃推行九年國民教育，奠定現代化國家根基

民國五十六年政府決定加速推行九年國民教育，先生即被邀請參加籌劃工作，俾能如期於五十七年秋季開始實施。在籌劃期間，先生竭盡所能，熱心參與各項重要會議，提出建言，或負責相關課程的規劃，或師資培訓的協調與計畫工作，均能看到先生的蹤影。就個人記憶所及，先生認為欲有效推行九年國民教育，曾大聲疾呼政府要考慮經費、師資、學區劃分、國民中學分組和加強職業教育以及國民小學教育正常化等問題，甚獲得當局的重視。爰簡述如下：

### (一)經費問題

延長九年國民教育年限，國民中學學生人數，勢必大量增加。同時校舍設備、師資等也隨之增加。這些都需要經費的支援。據當時省市教育行政當局的估計，延長九年國教，三年之內約需經費三十一億六千萬。至於所需經費的籌措，先生認為可從開源與節流兩方面進行。

1. 開源方面：延長九年國教所需經費的來源，可從下列幾項籌措：

(1) 由中美基金負擔一部分，約六億八千六百六十一萬元。

(2) 在若干稅捐中附徵國民教育捐，本諸「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

(3) 獎勵私人捐贈。由於社會上熱心國民教育事業者頗不乏人，政府若能及時予以鼓勵，使其出錢出力，共同發展地方國民教育事業。

(4) 運用大眾傳播工具，造成輿論，勸導全省同胞節省每年用於「拜拜」的經費，募集起來，興建國民學校。

2. 節流方面：對於實施九年國教的工作，應當有周密的計畫，以免重複浪費。同時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任用真正的專門人才，主持其事，成效必佳；另一是訂定辦法，防止中飽，務使涓滴歸公。

### (二)師資問題

決定國民教育成敗的主要關鍵，在於師資問題。先生認為現在我們的問題，第一步是先甄選足夠的國中師資，來擔負起教導學生的工作；第二步是加強在職教師的進修工作。

#### 1. 教師的供應問題

由於延長九年國教，國中第一學年所需增加的師資約為六千人。這些師資除由師範大學可以供應一千餘人，其他則由省教育行政機關指定公立大專院校成立短期的「師資訓練中心」擔任此項訓練工作。若從長期供應著想，除擴充師大和師院的班級外，應當由教育部訂頒一項公私立大專院校培育國中師資的辦法，指



定公私立著名大學及專科學校，設置師資訓練部予以培訓，以應時需。

## 2. 提高教師的素質問題

未來的國中教師，責任重大，工作亦甚繁重。所以國中教師必須有教育專業的訓練，始能負起教導的責任。因此，先生特別呼籲政府當局必須建立在職教師進修教育的制度，在師大、師院及公私立大學內成立夜間部、暑期學校、函授部，並且運用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設置國中教師進修科目。凡未曾接受正規師範教育的臨時教師和代用教師，必須接受這種進修教育。如能依此原則推行教師進修教育，則國中教師的素質可望逐年提高。

## (三) 學區劃分問題

延長國民教育年限之後，必須劃分國中學區，使國小畢業生可以在本學區內的國中就讀，以免遠道通學，舟車勞頓之苦。同時要發揮社會中心教育的精神，使地方人士以全力支援本學區內的國民中學，來發展本學區內的國民中學。



▲ 中學課程改造原理  
(圖：攝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 (四) 國民中學分組問題

國民中學應否分組，學者各有不同主張。一種主張國中不必分組，另一種主張，是國中必須分班或分組施教，一組注重學術預備教育，一組注重職業預備教育。先生則主張要權衡利弊得失，國中階段似不宜採用呆板的劃一課程。除了共同的必修科目外，還應當依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設置二種性質不同的科目，一種是做學術研究和接受專門教育的預備科目，另一種是從農工商業職業的預備科目。如此一來，可以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先生的主張，的確高明。

## (五) 國民小學教育正常化問題

由於升學競爭和惡性補習的影響，嚴重地和國民教育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延長國民教育年限後，國小既不必為學生作升學考試的準備，自然可以使國小教育完全依照國民教育的目標加以辦理。因此，國小的校長和教師，對於本身所負的使命，若有正確的認識，且以最大的熱忱和決心，來完成其使命，國小教育自然會正常化，同時國民教育的目標，也一定可以達成。

## 三、成立社會教育系，培育優秀人才

先生一直認為社會教育、是全民教育，也是終身教育，其影響社會發展至為



深遠。尤其政府遷台以來，各種社教機構紛紛成立，各項社教活動也全部展開。諸如設立社會教育館、各縣市圖書館的增設、南海學園的建立，掃除文盲運動的積極推行，播音教育的擴充，教育廣播電台及教育電視台的相繼成立，職業補習學校的開辦等，均顯示社會教育事業頗有蓬勃發展的趨向。而其中較嚴重的問題為社教經費不足外，值得關心的問題，在於缺乏真正能夠辦理社教事業的專門人才。因此，在民國四十四年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時，當時校長劉真先生有感於社會教育的重要性，乃成立社會教育學系。先生接任系務後，認為應有創系的特色，尤其要配合社會的發展，分幾個領域來培養人才，以利推動社會教育。經過審慎研議與各方學者專家的智慧，於是決定成立圖書館、新聞及社會事業等三組，分別培養學有專長的社教人才。

先生相當重視三組課程的規劃，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減少共同必修科目，並針對各組的需要，加開分組選修課程，使各組學生學有專精。尤其先生訂定當時的辦學方針，作為社教系發展的方向：

第一，確定辦學目標，使學生深知對社會所負的責任，即早認識到社會服務時，該有的努力方向。

第二，安排適當的課程，使學生的潛力得充分的發展，尤其讓學生能感受到經由專業訓練後，對其後所擔負的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第三，注重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使學生能應付其所面對的挑戰，毫無懼怕。

第四，禮聘各界的學者專家，並要求老師嚴教、嚴於考核，更要求老師對學生要關愛，因之師生之間感情和諧融洽。



▲ 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後右一）與孫教授（前右一）合影（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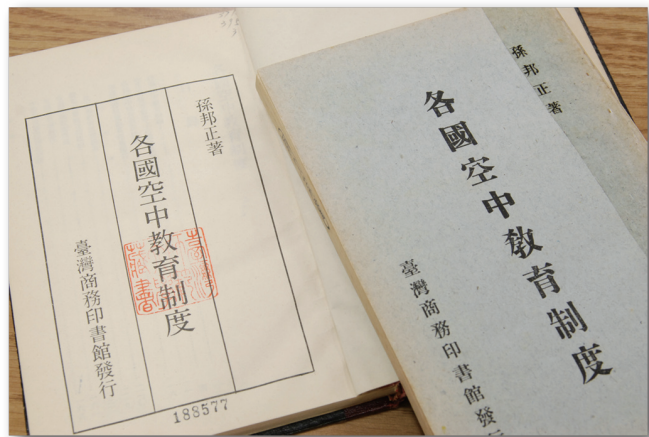
▲ 作者楊國賜（後右一）與孫教授（左一）合影（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由於先生的用心投入，苦心經營，使社教系逐漸滋長茁壯，甚至後來人才輩出，所培養的學生有擔任教育部部長、次長、圖書館館長、新聞報社社長、總編輯，知名的文教記者，社會保險的學者專家，以及大學校長、中學校長、大學教授以及中學教師等，也讓先生甚感欣慰！

#### 四、積極倡導空中教育，奠定空中教學成功的基礎。

由於先生勤於研究，常具前瞻的眼光，更能提出教育卓見，空中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先生認為空中教育是現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新方向，妥善運用廣播、電視和函授的方法，實施推廣教育，使人人有受教育的機會，使處處成為教室，使「全民教育、終身教育」的理想得以實現。因此先生極力推動利用現代電化傳播設備作為施教方式的學校體制，認為有其可行性。由於空中教育體制在歐美先進國已辦理有年，且成效卓著，更增加先生倡導空中教育的信心。

先生強調以空中學校作為教育方式之一，可以輔助學校教育的不足，且逐漸成為推廣教育的主要柱石。尤其先生更主張空中學校在教育上有二項價值，值得重視。一方面空中學校之目的並非取代學校教師，而是在協助及補充課堂中所沒有的教材，以擴大學校教師的工作效果。諸如可以擴大學生對於世界現勢的認



▲ 孫教授所著《各國空中教育制度》  
(圖：攝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識與瞭解；啟發學生閱讀、研究和思考的興趣，發展學生對於藝術的享受慾望和欣賞能力，以及防止學校教育的落後傾向，尤其是偏僻地區的學校，常以師資缺乏，教具不足，如利用空中學校的教育廣播和電視，可使鄉村中的學校，獲得更豐富的教材。另一方面，空中學校的目的，是在輔導社會成人進修，失學青年以及因健康受損的殘障者，得有進修的機會，以培養其生存技能；再者，利用空中學校有助於掃除文盲工作的進行，使失學的社會人士也有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

基於上述理念，先生乃於民國五十年代呼籲政府儘早成立空中學校，俾利提高國民知識水準，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政府當局採納先生的卓見，遂於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空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導其事，悉心規劃，

以示慎重。教育當局敦聘先生等專家學者出國實地考察，蒐集各國有關資料，縝密研究、廣泛商討，並完成「各國空中教育制度述要」的考察報告，長達八萬餘字。後來又參與台灣省立台北商業職業學校附設試辦「空中學校」的實驗工作。空中商校的實驗，事屬初創，在廣播與電視的效果，教材、師資及課程等各方面，均曾遭遇諸多困難，幸經先生等專家的努力改進，始克有成。先生於四年的實驗工作圓滿結束後，提出一份「空中學校實驗報告」，詳細說明實驗經過，並對我國當前空中學制問題，空中教學問題均有相當客觀的檢討，同時也提出八項建議事項作為今後發展我國空中教學的指針。尤有進者，有鑑於這所空中學校辦理成效頗著，所以先生勇於提議建請教育當局儘速成立一所盡善盡美的空中學院，早日建立我國空中教育體系，以全面提升國民素質，促進國家整體進步。

## 肆 以教師為榮

先生一生從事教育，是無數教師的教師。四十年的杏壇生涯，先生的經驗和體認是：教師必須秉持師道，自尊然後人尊，尤其重要的是，應視教育為終身事業，本著宗教家的精神奉獻。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謂「經師」是指教師的授業、解惑的工作；所謂「人師」，是指教師的傳道工作。因此，先生特別強調一個理想的教師，必須兼具「經師」和「人師」的條件。尤其要以做「人師」為努力的目標，要以「教學生如何做人」為主要任務，而不要只以「教學生如何讀書」為能事。做一個會教書的「經師」不難，而要做一個能變化氣質的「人師」，卻要在品格上刻苦的修養。古代所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其原因即在此。

先生認為真正的「人師」，其本身必具有偉大的人格，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之中，潛移默化，變化氣質於無形。這種間接的人格感召作用，比直接的道德教學的力量更大，這就是「身教者從，言教者訟」的道理。我國古代對於偉大教師所致的頌讚之辭，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淵讚美孔子的話）；「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朱熹讚周敦頤的話）；「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朱光庭讚程頤的話）等，多就景仰教師的人格而言。具有這種偉大人格的教師，才是真正的「人師」。這些話也是對先生最好的寫照。

在師道式微的今天，先生一再提醒教師們注意，教師要獲得社會人士的尊重，須先從尊重自己的人格及專業精神著手。所謂專業精神就是要有終身奉獻的



志願，也就是要敬業、樂業，同時要瞭解自己的工作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

由於教師生涯樂趣無窮，致使先生四十年樂此不疲。先生常說：「似乎沒有其他行業比得上做教師那樣富有樂趣。」先生也曾說過：「做教師不可為，但也最有為。」因為談名，教師無赫赫之功；談利，教師收入，僅夠溫飽。但做教師的人，永遠可以享受真摯的人情溫暖。尤其看到自己教出的學生成為健全的國民，或在社會上出人頭地，那種喜悅不是言辭的讚美，或物質的報酬可以得到的。

## 伍 以教學為樂

凡是聽過先生課的學生，都會有如坐春風般的感覺。先生在他的「怎樣教學」一書中的序文說到：「教學方法是一種藝術。善於教學的教師，好像春風風人，使人樂而忘倦；同時他能夠以人格感化的作用，使學生潛移默化，在不知不覺之中，養成高尚的人格。我們看到一個優良教師的教學，正如欣賞一幅名畫，行雲處流水，使人流連忘返；又好像欣賞一曲名歌，餘音在耳，嫋嫋不絕。」這一段話，實在就是先生教學生活的寫照。美國教育家克伯萊(E. P. Cubberley)將幹練的教師比做優雅的藝術家。認為教書與操琴一般，要能夠扣住人類的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心弦，給予刺激、安慰、與鼓勵。先生的教學完全達到此種境界，這是受教學生的共同感覺。

孟子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教學方法自須要有正確的原則。先生也大力主張：「教學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工作，絕非率由舊章，習成技巧，便可完成樹人的使命，而必須對於教學方法的理論和實際，加以觀察研究，時謀改進。」先生曾列舉新教學法的趨勢說：「今日的新教學法，與舊日的教學法，有顯著的不同點：第一，打破偏重知識教育的觀念，注重人格教育；第二，打破偏重書本教育的觀念，注重實際生活的經驗；第三，打破講授方法的限制，注重指導學生自動自學；第四，打破學科的界限，注重經驗的完整；第五，注重個別差異的適應；第六，注重群性的陶冶。

尤有進者，先生為了貫徹國民教育的使命，一再強調國民中小學教學方法必須予以徹底的革新。因此，先生撰寫了許多有關教學法的書籍，如中學教學法、怎樣應用新教學法、普通教學法、怎樣教學、教學法新論、國民中小學教學法革新問題……期能有效改進國內各級學校的教學法。我們期盼先生的卓見及語重心長的話，能為教育界同仁普遍接受，更希望各級學校的教學活動，能夠達到真正的「藝術境界」。



## 陸 結語

孫邦正教授本著宗教家般的執著，他本身除為教師的典範之外，終身奉獻教育園地，辛勤耕耘灌溉，數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榜樣。再者，孫教授為人誠樸，態度謙和，生活嚴謹，任事負責，教學時條理清晰，講詞精闢，深受學生愛戴。在教學之餘，孫教授仍孜孜不倦於著書立說的恆心與毅力，尤令人欽佩。總之，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上，先生充分表現了教育家的樂道精神，更是「經師」與「人師」的典範，說他「立德、立功、立言」，實不為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六四級甲班畢業紀念  
前排左四為孫教授（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 參考文獻：

- 沈 靜（1978/9/4）。春風化雨四十寒暑。大華晚報。
- 李雅卿（1980/9/28）。無數教師的教師。中國時報。
- 林振春（1984）。誨人不倦的孫邦正先生。載台灣省教育會編，當代教育家。  
台北市：該會。
- 林香葵（1976/4/27）。致力推廣師範教育的孫邦正。大華晚報。
- 馬 駒（1981/9/28）。孫邦正散播教育愛。中華日報。
- 孫邦正（1973）。各國空中教育制度。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73）。中國學制問題。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74）。國民中小學教學法革新問題。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78）。教學法新論。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82）。中國教育問題。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83）。國民教育論叢。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83）。現代教育論叢。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84）。九年國民教育的展望。台北市：台灣商務。
- 孫邦正（1985）。經師與人師。台北市：台灣商務。
- 盧蕙馨（1982/6/28）。孫邦正為教育出力從不後人。民生報。
- 盧中芳（1973/2/22）。孫邦正的治學三方向。中華日報
- 應平書（1978/8/31）。堅守教育崗位的孫邦正。中華日報。
- 顏文門（1978/9/28）。孫邦正杏壇四十年。聯合報。

中學教學法之改進  
中學教學法之改進  
中學教學法

# 高慈美

1914  
~2004

音樂教育的美麗音符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許瑞坤 撰文



生平

## 一、家世

音樂教育家高慈美，1914年誕生在南部岡山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西式音樂在台灣的萌芽與發展和基督教的傳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860年天津條約開放台灣為外國的通商口岸之後，外國的傳教士先後進入了這塊土地，其中較重要的有南部的英國長老教會和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除了教會活動的福音傳播之外，1876年巴克禮博士（Barkeley）在台南創辦的學校（即現今的台南神學院），將音樂納入了正式的教授科目，從此開啟了學校音樂教育的先河。基督教會遂成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民眾接觸西式音樂的管道。

高慈美的祖父高長（1837-1912）即是台南地區第一位正式受洗的基督徒，也是南部地區早期極為重要的傳道師。由於宗教信仰和注重家庭教育的緣故，高家先後孕育出了一批極為傑出的子女。根據統計，從高長之後的三代之內，共計出了十九位醫生、九位牧師以及七位音樂家，其中包括了台灣大學第一任的醫學院院長高天成，長老教會的牧師高俊明等，對台灣的社會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

高慈美的父親高再祝是高長的四男，父親原本安排他進入神學校就讀，但他反而選擇了從醫之路，在行醫之餘再全力從事於教會的服務工作。從他日後對於教會工作的投入和用心看來，這樣的抉擇似乎也沒有違背先人的意旨。

1910年高再祝從台南遷到高雄的岡山，自行開設建安醫院，同年和許翰明醫師的女兒許美結婚。此後十一個兒女相繼出世，家庭和樂而幸福。

高再祝醫師是一位極具國際觀的父親，他曾經期望自己的兒女們都能分別到不同的國家去接受教育，學習不同的文化。而他自己本身除了行醫之外，對於旅行、攝影、運動、園藝、音樂等都有很高的興趣。

高慈美是高再祝的二女，受到父親熱愛音樂的影響，從小就有機會接觸音樂。高家規定，十一個兒女每人都要學習一種樂器，因此可以說他們是一個典型的音樂家庭，在高再祝的四位女兒當中，就有三位後來以音樂為終身的志業。

## 二、求學過程

1919年，為了接受較為正統的日本教育，五歲的高慈美和大姊高智美一起赴日進入幼稚園就讀。1922年暑假返台省親，在回日前夕傳來東京大地震的消息，家人為了安全起見，決定先暫留台灣，當時因為岡山地區還沒有小學，高慈美於



是先是進入高雄的小學就讀，兩三年後才轉學回到岡山。在小學就讀期間，由於一口純正的東京腔日語，當時還深受日籍校長和教師的器重。

小學畢業之後，高家選擇讓高慈美前往日本下關的梅光女子學院就讀。這是一所聲譽良好的教會學校，對於學生日常生活常規的培育相當的重視。根據高慈美自己的回憶，這一段中學的住宿生活，對他日後謙恭的為人處事態度與堅定虔誠的宗教信仰都有很深遠的影響。

雖然從小就在音樂家庭的氣氛中長大，正式學習鋼琴卻是到日本之後才開始。在梅光女子學院就學期間，高慈美除了正規的課業之外，私下還跟隨一位英國籍的老師學習鋼琴，每週上課一次。這位英國老師的教學方法，高慈美在晚年時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老師從頭教我，先在桌上練手型，然後她叫我抬起手指，她說哪一種組合，就抬起哪隻手指，例如re、fa、do、mi…等等。把手放在桌面上，手肘要靠在桌沿，手型要擺好，手指要求獨立。」

三年級開始，在學校裡聚會唱聖詩的場合，偶而也擔任司琴的工作。她先後在1930年的學校聖誕節晚會和1931年的畢業音樂會中，上台表演鋼琴聯彈，深獲全校師生的好評。



▲ 於下關梅光女子學院就讀時期  
(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 高慈美（左二）與父親及同學合影  
(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從梅光女子學院畢業之後，面臨了未來學習方向的重要抉擇。由於高慈美從小在家庭生活中就接觸音樂，在日本就學期間也沒有間斷對於音樂的學習，於是決定接受蔡培火先生的女兒蔡淑慧的建議，繼續往音樂的方向去深造發展。經過一年的準備，高慈美順利地考上了私立的國立音樂學校，主修鋼琴，師事當時極富盛名的笈田光吉教授。一年之後，又



隨笈田光吉教授轉學至東京帝國音樂學校繼續學習。這期間，高慈美曾經在1933年，因為父親生病而短暫回到台灣。

笈田光吉教授早年留學德國，最擅長於演奏巴赫（J.S.Bach）和貝多芬（L.V.Beethoven）的曲目，高慈美從老師那裡學到了這些西歐作曲家的音樂精髓。除了主修科目之外，學校裡還有德文、視唱聽寫、樂理、和聲學、音樂史、合唱等專業課程，為往後的音樂學習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1934年，留日前輩楊肇嘉、高天成等人，在東京組成了「在京台灣同鄉會」，做為當時二千六百多位旅日的台灣人、留學生、眷屬等的聯絡中心。為了要讓台灣民眾能有機會接觸較為先進的音樂文化，「台灣同鄉會」邀集當時在日本學習音樂的留學生們，包括高慈美、林秋錦、柯明珠、高約拿、林澄沐、江文也、陳泗治、林進生、翁茂榮、李金土等人，組成了「鄉土音樂訪問團」，在台灣的經費支援和宣傳活動則由「台灣新民報」負責。當年的八月十一日開始，從北到南歷經十天，總共做了七個場次的演出。



▲ 1934年高慈美於鄉土音樂會上演奏  
（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台灣中部發生史上災情最慘重的大地震，死亡人數超過一萬五千人，房屋倒塌的有五、六萬棟。遠在日本工作求學的僑胞與留學生們，亟思對於自己的故鄉能伸出一臂之力。於是由蔡培火先生策劃，經過兩個多月的聯絡，邀集了一批留日音樂學生以及外籍音樂家共同組成「賑災音樂訪問團」，回到國內從事一連串的義演募款音樂會。這次團員的規模較前一年的「鄉土音樂會」更為龐大，包括了台灣的留學生高慈美、高錦花、林秋錦、林澄沐、林進生、陳泗治、陳信貞、李金土、高約拿、蔡淑慧、盛福俊以及國外的音樂家三浦富子、渡邊喜代紫、原忠雄、戈爾特、麥金敦、麥克勞思夫人等。

根據統計，這次的活動從1935年的七月三日開始到八月二十日為止，在台灣全省各地總共舉辦了三十七場的音樂會。北自基隆、宜蘭，南迄東港、屏東，東至蘇澳、花蓮、台東，足跡遍及大小城鎮，吸引了超過一萬五千位觀眾前來欣賞。透過悠揚的樂音，訪問團除了募款賑災之外，更直接撫慰了災民們徬徨無助



的心靈。團員們在交通不便的環境下日夜奔波，演出行程緊湊，日子極為辛苦。其中高慈美、陳信貞、高約拿、蔡淑慧等幾人更是全程參與，從無缺席。



▲ 1935年台中屯子脚於大地震後的慘況（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這一年返台灣參加「賑災音樂會」之前，五月二十日高慈美在東京的蠶絲會館參與了鋼琴老師黑柳的學生音樂發表會。在這場音樂會當中，她彈奏了兩首樂曲，分別是蕭邦的幻想即興曲作品六十六和李斯特的演奏會用練習曲。

1935年，高慈美結束了在東京帝國音樂學校的學業，原本有意追隨其他日籍同學到維也納去繼續深造，但是由於日本政府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已經全面展開，終於沒能成行，於是決定先返回台灣。

高慈美在1937年結婚之後，專心在家擔任家庭主婦的角色。1939年，由於先生李超然短暫赴大陸經商，她遂再度前往日本繼續深造，為期兩年。這期間除了到處觀賞音樂會之外，主要還是私下跟隨老師學琴。

### 三、居家生活

高慈美的童年生活可以說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氣息的薰陶下長大的，這對於她日後的人格特質有很深遠的影響。在日本就讀幼稚園期間，因為年紀還小，寄居在日本長老教會的伊藤長老家中，接受了妥善的照顧，並且接觸了最道地的日式家庭教育。

小學畢業那年，正好日本的梅光女子學院院長廣津來到台灣，由於教會的關係，高家決定讓高慈美到這所學校就讀。梅光女子學院位於瀨戶內海附近的一個山丘上，一些台灣的船隻常常在附近的港口靠岸，學校裡還可聽見商船的汽笛聲。遠從台灣來的學生大都住在學校的宿舍裡，過著嚴格而規律的生活。有關住宿生活，高慈美曾經這樣的回憶：

「宿舍裡的教育使我印象深刻，我覺得那裡的教育非常好。我們每個人都要分擔宿舍裡的清潔內務，一個房間裡住四個人，床在上舖，下面有置物架。每天我們五點半起床，起床後先做



每天所分配的清潔工作，每個人都要輪流。洗廁所、掃花園…；房間前有走廊，我們跪在地上，拿抹布滑過去，好像在玩一樣，樂在其中…。」

對於學校的制服，高慈美也有清楚的記憶：

「制服很漂亮，胸前有一個領帶，背後是方巾，一年級有一條槓，二年級有兩條……，領結的地方繡一個「梅」字，裙子是百褶裙……」

宗教信仰方面，根據規定，每天早上都要先做三、四十分鐘的禮拜才開始上課。宿舍裡，早晚也都有禮拜，每天都在晚禱之後才用晚餐。在校內還經常舉辦音樂會，合唱聖詩是必不可少的節目，由學鋼琴的學生輪流上台司琴。

從這些對於梅光女子學院的回憶看來，高慈美的高中生活應是非常愉快的，而他日後對於教會的堅定信仰，也都在這個時期開始確立。



▲ 下關梅光女子學院就讀時期於桌球室與同學合照  
右四為高慈美女士（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就讀音樂大學期間，除了高慈美之外，還有好幾位高家的親族子女也都到日本留學。當時在台灣的高級知識份子或是家境較為富有的人，通常都把子女送到日本深造。高家為了方便照料，在東京承租了一間房子，家族中幾位到日本唸書的子女就都生活在一起，並請一位日本人幫忙照料生活起居，因此大家雖然遠離家鄉，但是仍可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1935年高慈美在日本學成歸國，回到台灣，並沒有立即投入教學或演奏的工



作。經過朋友的介紹，在1937年和企業家李超然先生結婚。李超然的曾祖父李春生（1838-1924）是台灣北部第一代的長老教會家庭，更是當時很有名的大稻埕「茶葉之父」，因為經商致富，使子女們都有機會接受很好的教育。李超然就是先到上海讀了一年書之後，才到德國接受完整的教育。李高兩家的這門婚事，既是富有家族的聯姻，又代表著南北兩大傳統基督教家庭的結合，在當時曾經引起很大的注目，也是台灣基督教界的一樁盛事。

婚後的高慈美由於家境富裕，不愁吃穿，所以並沒有認真考慮將來要從事哪方面的工作。偶而在家練琴自娛，維持著對於音樂的喜好和彈奏鋼琴的技巧。由於公公不大喜歡鋼琴的吵雜，所以練琴的時間並不多。等到公公去世之後，開始在家裡指導幾位小學生，才又慢慢地回到音樂的園地。這期間比較重要的活動是1938年在台北公會堂舉辦了一場鋼琴獨奏會。

1939年先生李超然赴大陸經商，高慈美又到日本進修，兩年後歸國。之後除了專心從事家庭主婦之外，仍是以私人教授學生為主。1947年曾參與台灣文化協進會的音樂會演出。

1948年，高慈美應聘擔任教會學校靜修女中的音樂教師，開始了往後36年的學校教育生活。期間除了家庭生活與學校教育之外，因為家族企業的關係，曾擔任淡水純德女中的董事；退休之後更於1994年以80歲的高齡接任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公益事業團體台北仁濟院的常務董事工作，繼續奉獻於社會公益活動。

## 貳 奉獻音樂教育

高慈美從小接觸音樂，進入下關的梅光女子學院之後，開始正式拜師學習鋼琴，最終選擇進入帝國音樂學校就讀，決定以音樂作為終身的志業。在學成畢業的同時，也是她將所學奉獻回饋社會的開始。終其一生，對於台灣整體音樂發展的貢獻，可以分為社會音樂教育和學校音樂教育兩個方面。

### 一、社會音樂教育

高慈美的音樂活動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1934年的「鄉土音樂訪問團」以及1935年的「賑災音樂訪問團」。關於第一次的活動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在帝國音樂學校即將畢業的前夕，學校的師長要她到日本著名的貴族雜誌《主婦之友》去拍照，原本以為是畢業照的需要，沒料到幾天之後，竟將她的照片刊登在該雜誌的封面上，這件事在台灣和日本兩地立即造成了轟動。照片旁邊加註了四個字



「輝く麗眸」，意為「閃耀光輝的美麗眼眸」；封面的圖說大意为：「高慈美是台灣南部人，從下關的梅光女子學院畢業後，進入帝國音樂學校就讀，現在即將畢業。這次回到台灣演奏，相信對於台灣的文化水準會有很大的貢獻。」透過高慈美高雅而秀麗的外貌，鄉土音樂訪問團在成行之前，已經引起了日本國內外的矚目。

日治時期的台灣音樂文化，除了學校音樂教育之外，主要的活動僅有少數的私人音樂會，在此之前民眾對於西式音樂的認知大都是由教會而來，音樂表演的水準也參差不齊。高天成與楊肇嘉等人召集留日的音樂學生組成「鄉土音樂訪問團」，時間正值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前夕。1929年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的楊肇嘉一直對於台灣本土有一份很深的人文關懷，他希望藉著較為先進的西方音樂，可以對於台灣人們的文化水準有所提升，因此聯合了「台灣新民報」舉辦了這次的巡迴演出活動。楊肇嘉說：「通過『暑假返鄉鄉土訪問演奏會』的決定，予以後台灣文化之啟發上、人性之陶鑄上，有莫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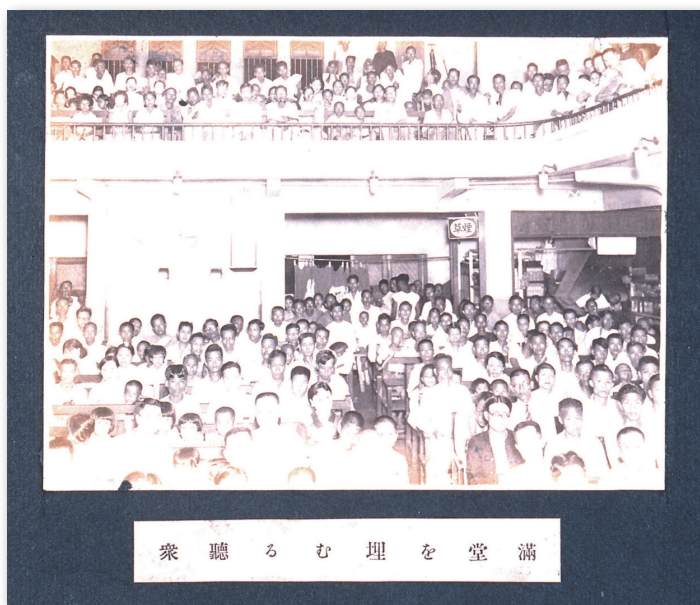
這次的音樂會活動對於台灣一般民眾音樂水準的提升有很大的助益。訪問團在八月五日抵達台北，十一日開始十天之內舉辦了七場音樂會，演出的城市包括：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整個音樂會的演出由楊肇嘉總負責，高天成則擔任「曲目解說」的發言人。「一連七處的演奏下來，使台灣社



▲ 1934年東京「台灣同學會」-後排右一林澄沐右二江文也  
前排右到左為高慈美、楊肇嘉、林秋錦、柯明珠（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會為之一大振奮。他們的琴韻歌聲不但陶醉了台灣人，也陶醉了日本人。每一處的演出參加的聽眾都是人山人海，其盛況雖不能說是『絕後』，但的確是『空前』了」。音樂會結束之後，在台灣新民報舉行了一場座談會，出席人士都一致認為這樣的活動很有意義，希望以後能常態性的舉辦，同時次數也可以增加。

高慈美在這幾場



▲ 1935年賑災音樂會聽眾滿堂盛況  
(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的音樂會中彈奏的曲目主要選自於她當時在學校上課的進度，一首是布拉姆斯的狂想曲第二號（Brahms: Rhapsody op. 2），另一首是蕭邦的華爾滋舞曲八十四之一號（Chopin: Waltz op. 84 no. 1）。談起觀眾對於這些音樂會的反應，高慈美說：「他們都非常高興，因為以往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鋼琴音樂吧！」可見得這次「鄉土音樂會」的舉行，對於台灣民眾音樂文化素養的提升已經達到了

初步的目標。

當時音樂會演出的會場還有一些趣事：由於八月的天氣非常炎熱，主辦單位又擔心電風扇的噪音干擾到音樂會的演出，於是在演出的舞台前面擺放了幾塊碩大的冰塊，靠著冰塊的融解來降低會場的溫度。這固然可以達到適度的效果，但是當冰塊融解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往往會突然崩塌下來，造成轟然巨響，引起台上演奏者和台下觀眾的一陣虛驚。

第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清晨，以台中清水為中心的大地震造成了全台15329人傷亡。楊肇嘉當時身處台灣，一方面全力進行搶救與撫慰傷患的工作，同時也積極地聯絡日本的台灣同鄉會發起各項募捐活動。有鑑於上次「鄉土訪問音樂會」舉辦的成功，在日的台灣同鄉會很快地再將音樂會成員組織起來，這次除了台灣留日音樂學生之外，更邀集了外籍的音樂家共同參與，團員人數將近二十人，遠較上次為多。回到台灣之後，「賑災音樂訪問團」從七月三日開始直到八月二十一日為止，短短的五十天內總共舉辦了三十七場的音樂會。所到之處計有：屏東、鳳山、旗山、東港、岡山、佳里、麻豆、鹽水、新營、朴子、北港、斗六、埔里、高雄、台南、嘉義、台中、彰化、員林、鹿港、北斗、田中、新竹、桃園、台北、基隆、宜蘭、蘇澳、花蓮、玉里、台東、羅東、淡水、南投、草屯、霧峰等，幾乎涵蓋了全省大小城鎮。以台灣當時遽逢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地



震災害，到處滿目瘡痍之下，交通狀況的困難可想而知。「賑災音樂訪問團」的成員不辭辛勞，儘可能地走遍大小鄉鎮，最主要的目的除了募款賑災之外，還是希望藉著悠揚的樂音，能夠撫慰災民們惶惶不安的心靈，使他們在精神的創傷上能獲得一些慰藉。高慈美不避長途奔波的辛苦，從頭到尾全程參與了每一場的音樂活動，愛心相當感人。

高慈美在這些音樂會中彈奏了李斯特的音樂會練習曲（Liszt：Etude），精湛的琴藝和幽雅的風度，風靡了很多的觀眾。從這些音樂會所演奏的曲目看來，在1930年代的台灣西洋音樂環境裡，已經是非常高水準的演出了。

回台定居的高慈美在1937年與訂婚多年的李超然先生結婚之後，雖然過著優渥的家庭生活，但是並沒有減低對於鋼琴的熱愛，除了教授幾位私人學生之外，隔年在台北公會堂還舉辦了一場鋼琴獨奏會，對當時音樂風氣的提倡，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 二、學校音樂教育

1948年起，高慈美走出了家庭，開始從事學校音樂教育。也許是信仰的關係，這年首先受聘於台北市的教會學校私立靜修女中，擔任「音樂專科鋼琴部」教師。兩年之後，接受了當時省立臺灣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前身）音樂系主任戴粹倫的邀請，轉任該系的專任講師。臺灣師大音樂系前身為設於1946年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二年制音樂專修科，1948年添設五年制科系，1955年改制為省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1967年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是臺灣最早的高等音樂教育學府，對臺灣後來的音樂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成立初期的師資陣容主要來自於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大陸音樂教師，少數的臺灣本土教師則都是留日返台的年輕音樂家，包括了最早進入該系的張彩湘（鋼琴）、周遜寬（鋼琴）、李金土（小提琴），高慈美在當時是全系的第二位台籍女教師，和張彩湘教授兩人在早期的鋼琴教學工作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根據高慈美的回憶，戴粹倫主任是在聽過她的鋼琴音樂會之後，由於欣賞她的才華，才和戴夫人專程到她家裡邀請到系上授課。在師大任教初期，語言的隔閡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高慈美本身生長於日治時期，接受日本教育，生活、學習都是以日語為主，臺灣民間方言則以台語或客語為主要的溝通工具，國民政府又以中文為唯一的官方語言，這對於教學工作的進行當然存在著不少的阻力。



所幸先生早期曾在中國大陸求學及經商，高慈美多少有些中文的聽、說經驗，再加上用心學習，很快地就學會這種新的語言。由於在師大音樂系的教學認真，表現出色，很得戴粹倫主任的賞識，正好那時戴主任的父親戴逸青擔任政工幹校（今政治作戰學校）校長，於是推薦高慈美前往幹校的音樂組兼課，仍然教授鋼琴。



▲ 與學生的音樂會（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政工幹校的學生都是公費待遇，音樂組學生的素質當然不能和師範學院音樂系的學生相提並論，但是高慈美仍然以愛心和耐心循循善誘的引導他們。在一次受訪的談話中，高慈美提到：「那些孩子雖說是公費生，也有程度很不錯的，只是有些樂器的因為年紀比較大，手也比較硬，當然不能和從小就開始學的學生相比」。對於每一位學生的上課進度和考試情形，高慈美都做了詳細的紀錄，這些記錄簿後來都做了妥善的保存。

高慈美除了教學之外，也經常參與學校的各種音樂會活動。師大音樂系從1951年開始，經常在校內大禮堂和當時的國際學舍舉辦不定期的音樂會，分別由系上的師生或與邀請的外籍音樂家聯合擔綱演出。從現在留存下來的資料中可以看到高慈美在一些場次中分別擔任獨奏或是伴奏的角色。可見得教學之餘，高慈美仍然執著於鋼琴的演奏興趣，對自己的琴藝不曾荒廢。

1958年高慈美在師大音樂系升任副教授，1970年升任教授。從1950至1984年退休為止，總共在台灣師範大學服務34年，培育出了無數的優秀學生，其中包括作曲家、音樂學者許常惠，作曲家蕭泰然以及後來任教於各大學的詹興東、鐘明昆、洪顯祖、蔡中文等。

### 三、社會音樂活動

高慈美從1936年返回臺灣，1937年結婚，到1950年開始擔任師大音樂系專任教師為止的15年間，除了在家練琴自娛之外，也曾私下收受一些學生到家學琴。



這中間包括了前總統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女士，以及一些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在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後，也會舉行小型的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鼓勵學生展現學習的成果。

除了鋼琴教育之外，對於一般的社會音樂活動，高慈美也經常熱心參與。先是1945年受聘為臺灣省交響樂團的特約鋼琴演奏家，不定期的參與演出。

1947年當時臺灣音樂界的菁英，共同籌組「臺灣音樂文化研究會」，參加的包括有張福興、李金土、高慈美、張彩湘、周遜寬、林秋錦、呂泉生、呂赫若等，大家定時集會，研討振興臺灣音樂文化策略。1952年起擔任淡水純德女中的董事，1957年獲選為中華民國音樂學會理事。從臺灣師大音樂系退休之後，更於1994年以80歲高齡出任慈善機構仁濟院的董事。

由於先生李超然是臺灣第一位留學德國的化工博士，經營事業有成，對於社會公益活動相當熱心。1954年率先創辦了台北市西區扶輪社，帶動了往後一批實業界人士競相仿效，各區扶輪社相繼成立。到了1982年，李先生更擔任國際扶輪社的區總監職務，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高慈美除了自身的鋼琴教育事業之外，在家相夫教子，協助夫婿投入各種公益活動，可以說是才德兼修，內外皆美的典型音樂教育家。



▲ 高慈美夫婦與前總統李登輝及夫人曾文惠女士合影（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 參 結語

臺灣自1895年甲午戰敗割讓給日本統治之後，原本由西洋教會系統培育音樂人才的形式，逐漸地由日式學校教育所取代。一些表現傑出的音樂學生也紛紛出國赴日留學，學成之後少數駐留日本，有的轉赴中國大陸，但是大多數都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貢獻所學，這些早期留日的音樂家對於台灣二十世紀的西式音樂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第一位留日習樂學生張福興於1910年返台任教，其後陸續有李金土、李志傳、張彩湘、周遜寬、高慈美、林秋錦、郭芝苑、呂泉生和蔡江霖等。這批學生學成返台時間大約在台灣光復前後，正好銜接了日人撤退離台之後



的教職空缺，幾年後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一批大陸音樂教師也隨著來台，這兩股勢力的合流，形成了臺灣四〇年代之後音樂教育發展的主要力量。

高慈美出生於富裕的基督教會家庭，家世背景優渥，從小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小學畢業後在父親的計畫安排下遠赴日本學習，先進入教會的梅光女子學院就讀，畢業後再考進東京帝國音樂學校，師事笈田光吉教授學習鋼琴。音樂學校就學期間因緣際會，兩次隨團返台，在舉辦的音樂會上展露鋼琴才藝，以音樂撫慰眾多臺灣觀眾的心靈。音樂學校畢業後隨即束裝返台，投入音樂教育的行列。先是以鋼琴演奏和私人傳授學生為主，1948年開始轉而投注心力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工作，與張彩湘、周遜寬並稱為臺灣光復後早期最重要的鋼琴教師。高慈美由於個人家庭教育極為嚴謹，為人處事嚴守分際，再加以對待學生極具耐心，從不疾言厲色，因此深受學生歡迎。更由於她儀態端莊，氣質出眾，在各種不同的公眾場合都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高慈美以她精湛的琴藝和卓約的風範，深耕臺灣音樂園地半個世紀，為二十世紀後半葉與世界音樂接軌的遠景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她，是一顆最美麗的音符。



► 中學時期獨照  
(圖：郭月如女士提供)



## 參考文獻：

- 楊肇嘉（1967）。楊肇嘉回憶錄。台北市：三民書局。
- 許常惠（1991）。台灣音樂史初稿。台北市：全音樂譜出版社。
- 許常惠（1995）。音樂史論述稿。台北市：全音樂譜出版社。
- 林淑真（2002）。張彩湘【聆聽琴鍵的低語】。台北市：時報文化公司。
- 孫芝君（2002）。呂泉生【以歌逐夢的人生】。台北市：時報文化公司。
- 吳玲宜（2002）。郭芝苑【野地的紅薔薇】。台北市：時報文化公司。
- 吳玲宜（2004）。台灣前輩音樂家群相。台北市：大呂出版。
- 陳郁秀（2004）。一首美麗的詩歌—緬懷前輩鋼琴家高慈美教授。樂覽第64期。
- 曾韋禎（2007）。台灣第一位女鋼琴教授—高慈美。新使者10月號。
- 郭月如（2008）。高慈美年表。未出版手稿。
- 顏華容（2008）。高慈美教授訪談記錄。未出版手稿。
-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2008）。前輩音樂工作者群像—高慈美。線上檢索日期：  
2008年8月21日。網址：<http://www.egretfnd.org.tw/senbai/>



# 鄧玉祥

1919  
~1997

——  
終身奉獻女子教育的園丁

前台北市立大同高中校長 何耀彰 撰文





鄧玉祥女士，山西省天鎮縣人，民國九年生，民國八十六年辭世，享年七十八歲。女士歷經北伐、抗戰、剿匪，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撤退至臺灣，即將一生奉獻給臺灣教育界，並先後出任花蓮女中、景美女中校長，最後於民國七十四年自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長任內屆齡退休。

女士辦教育時特別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也一再以「活到老，學到老」勉勵學校師生，自己更以身作則於退休後考取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並於七十一歲高齡獲頒哲學博士學位，開創了臺灣教育史的新紀元。

女士一生勤儉自持，安貧樂道，不忤不求。辭世之後，家無恆產，獨留藏書數筭。其淡泊名利、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一介不取的精神，實為從事教育工作者之最佳典範！

## 壹 生平

### 一、家世與求學

鄧玉祥女士，字遇相，山西省天鎮縣人，民國九年（庚申年）二月十一日生。父植公望重鄉梓，母杜氏勤儉慈愛。女士幼承庭訓，聰敏好學，具男兒氣概。七歲入縣城女子小學，未及一年，因逢戰亂，學校被迫停課，在家隨祖父讀書習字。三年後戰事平息，學校復辦，開始背讀「孟子」、「論說精華」、「論說模範」等書。小學畢業前，經學校選拔參加縣府舉辦之演講比賽，榮獲第一名，從此嶄露頭角，立志追求卓越，誓爭第一。小學畢業後，參加縣府小學教師檢定考試，獨占鰲頭，被教育局選聘為新辦之初級小學校長，因年僅十三歲，祖父認為年紀太小，不能擔當重任而婉拒<sup>1</sup>。

1. 參見鄧故前校長玉祥女士行誼，鄧玉祥女士治喪委員會謹述，民86年4月20日。



當時天鎮縣方圓數百里內沒有一所中學，母親看她喜愛讀書，拿出私房錢讓她到離家七百多里的綏遠歸綏去念省立農科職業學校。這所學校是四年制職業學校，且是男女合校，但全校只有三名女生。因要到中學讀書極為不易，又因男生多女生少，女士認為不能被男生看輕，所以讀書非常用功，成績也很好，每年都獲得省頒獎學金。課餘讀一些商務印書館出版萬有文庫的文學書籍，增加不少課外知識。此外她還特別喜歡閱讀偉人的傳記，深受那些偉人行事的影響，心理充滿對他們的崇拜，也更堅定了自己努力追求知識的決心。

初中畢業後，因成績優異，獲留校服務，擔任「生物實驗室管理員」。翌年夏，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女士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乃即參與戰時護理訓練，兩週後進入設立在綏遠的第七後方醫院擔任救護工作，不久隨醫院撤退至陝西。醫院傷患減少後，乃進入陝西安康國立第四中學插班就讀高二。高中畢業後，先後在蘭州、青海國立師範學校教書，民國三十二年考取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蘭州西北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系，為班上唯一女生。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遷回北平復校，女士隨校來到北平，並於三十六年夏完成大學教育，獲教育學士學位。

## 二、渡海來台

女士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時值國共內戰前夕，左派學生受共產黨蠱惑煽動，不時發動示威罷課，社會秩序紊亂，北平成無政府狀態。三十八年一月，北平淪入共黨手中。四月，女士毅然決然離開北平，沿途飽受共黨威脅，歷千辛萬苦、冒生命危險，經由天津、濟南、青島、上海抵達國軍防區廣州。後應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之聘，擔任教育系助教。民國三十八年底，因戰事失利，隨政府撤退至臺灣，開始人生新的一頁，當時女士年三十歲。

女士來臺後舉目無親，人地生疏。民國三十九年受聘為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師兼管理組長，一年後獲聘為省立基隆女中訓導主任，翌年重回臺北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民國四十四年接任省立臺北護理助產職業學校訓導主任，並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第一屆碩士班，於民國四十六年以優異之成績獲教育碩士學位。

## 三、出任花蓮女中校長

女士獲碩士學位後，原計畫赴美深造，經師大教育研究所田所長培林暨師大



劉校長真之推薦，出任省立花蓮女中校長，時年三十七歲。初掌校務，夙興夜寐、銳意興革，倡導讀書風氣，使高三學生參加四十九學年度大專聯考，創下了空前的成績。並積極擘劃校舍改建、愛護學生如子女，尤其對於原住民子弟照顧備至，為原住民爭取保送升學機會，建樹良多，師生感念至今。於四年半任內，創下多項第一紀錄，改寫了該校歷史。

#### 四、創設景美女中

民國五十一年，女士奉調臺灣省教育廳視察，兼省立臺北景美女子高級中學籌備處主任。以有限的三百萬經費，經其精心策劃、苦心經營，非特建校規模獨具匠心，對教師陣容之加強、學生素質之提高、教學設備之充實、教學方法之改善等工作，無不殫精竭力，以期達於至善至美之境。並在校內首創三民主義研究室、學生問題研究室、交通安全資料室、文化復興資料室等，開各校風氣之先。並於民國六十年獲教育局推選為特優教育人員，為當年獲選特優教育人員的唯一女性。女士前後在景美女中擔任校長達十六年半，使景美女中校譽蒸蒸日上，譽滿遐邇，成為台北一所知名女校。

#### 五、出長北一女中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女士奉調為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長。自接事後即兢兢業業、克盡職守，本著在安定中求進步、在和諧中求發展的原則，務期使北一女的傳統更光榮、歷史更輝煌，念念為教育而努力，時時為學生而奉獻。並以民族精神教育及綠化美化校園為首務，不數年就使這所以綠衣為標誌的綠園學



▲ 鄧女士與學生一同參與土風舞課外活動  
(圖：景美女中提供)

子實至名歸。多次主辦臺北區公立高中聯招，一次比一次完美。民國七十年暑期，女士率領北一女樂儀隊訪問美國及新加坡，敦睦邦交、文化交流，獲致極大的迴響。而北一女參加大學院校入學考試成績，由傳統的優異，進步到甲乙丙丁四組升學率均居全國高中之首，參加臺北市、臺灣區或全國性之各項學藝競賽，均



能獨占鰲頭，光在七十一學年度名列特優第一名或冠軍者，即達三十餘項之多，生活教育競賽亦每年都保持特優第一名。另在提升北一女夜校及補校升學率方面亦建樹甚多，在夜間部裁撤後，大力整頓補校，使補校每年資格鑑定考試都能全數通過，參加大學院校入學考試，每年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錄取率，凡此皆使北一女穩居全國高中龍頭寶座。更於臨退休之前，為學校爭取PU跑道經費，解決操場風沙、泥濘困擾，稍稍紓解北一女活動空間不足問題。



▲ 鄧女士與北一女中學生合影  
(圖：北一女中提供)

## 六、退而不休的生活

女士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屆齡退休，退休後以「讀書」、「寫作」與「服務」為生活重心。女士在提到其退休生活時說：「我現在過著絕對自由自在、如行雲在天、如流水在地的生活，更珍貴的是朋友和學生們對我的愛護和關照。我退休了，他們每年都替我慶生，我每年的生日幾乎都有七、八次的慶祝，真是感人」<sup>2</sup>。

另女士亦常與朋友、同事提到她在退休後做了三件很得意的事「一是收養了五隻大小不等的黑色流浪狗，二是為伯大尼育幼院七十多位孩子找到了院長，三是到輔大進修博士學位」<sup>3</sup>。女士在退休當年即申請到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旁聽，三年後再通過正式入學考試進入博士班就讀。女士所以選擇攻讀哲學，目的是要「藉著哲學來匡正社會風氣，提升社會生活品質，尋求心靈深處的安寧與祥和，創造一個真正富而好禮、榮而好義、足而好廉、安和樂利、到處洋溢一片溫馨的社會」<sup>4</sup>。為了貫徹「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女士用功勤奮、埋首苦讀的精神並不輸給年輕學生。為了研究證嚴法師的慈濟志業，還僕僕風塵來回於臺北、花蓮之間。經過三年悉心研究，終於在民國八十年六月，以「胡適之思想研究」論文及精闢見解，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時年七十一歲。女士在談及這一段歷程時，以感性的口吻說「我的博士論文通過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可是當中央日報首先披露消息後，我的電話就不停的響著，幾乎是來自臺灣的各個角落，接著聯合報也報導。六月十五日畢業典禮當天早上七時，中國電視公司共花

2. 鄧玉祥女士手稿，未發表。

3. 李家芸女士回憶，李女士當時擔任主任教官，後出任伯大尼育幼院長。

4. 鄧玉祥女士手稿，未發表。

了好幾分鐘替我宣揚了一番，尤其羅校長說我『勤勉好學、尊師重道』，但因為是日我一早就離家到輔大參加畢業典禮，未能親眼看到報導，是晚上回家後朋友胡玉梅先生打電話告訴我的。在畢業典禮上，羅校長也讚美了我，使我非常的榮幸。晚上華視也有我的新聞，真是令人喜不自禁！這幾天我成了新聞焦點人物，是我意外的喜悅，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悅。我將如何回饋社會大眾對我的愛護呢？值得我深深地考慮。我不能讓社會大眾對我失望，更不能讓社會大眾遺忘，我要盡最大的努力，為社會大眾做點什麼」<sup>5</sup>字裡行間充滿了興奮、雀躍的心情。又說「我的『活到老，學到老』，獲得『古稀博士』美名，為教育史開創了新紀元，也是我對歷史做了點事」<sup>6</sup>，喜悅滿足之情溢於言表。

女士自民國三十八年北平淪入共產黨手中，離家隻身隨政府撤退至臺灣後，即未曾與家人晤面，直至民國七十九年四月，才往香港會見分別四十多年的胞弟，並承諾每年捐錢為家鄉貧苦有志青年設立獎學金。八十年九月，並首途至大陸昆明參訪，本擬適當時機回鄉探親，不意天不從人願，於八十六年三月底中風引起併發症，經送市立仁愛醫院加護病房救治，延至清明節上午辭世，享年七十八歲。



▲ 鄧玉祥博士證照  
(圖：王大同先生提供)



▲ 鄧玉祥博士照  
(圖：何耀彰校長提供)

## 貳 思想見解與行事風格

女士出生於內憂外患的動盪時代，歷經北伐、抗戰與國共內戰，養成堅忍不拔的個性。女士自承「在敵人猛烈的砲火下，我不是置身在水邊，就是藏身於山中，忍著饑渴，受著風吹冷凍，抱著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日以繼夜的培養我的耐力，鍛鍊我的心志，充實我的能力」<sup>7</sup>。正因有此不凡的經歷，女士體認到國家民族強盛安定的重要，因此從事教育工作時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愛國教育。女士涉身教育雖始於初中畢業後，但以教育為終身職志、志業，應是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蘭州西北師範學院接受名師薰陶之時。當時正值抗戰末期，物資缺乏，女士勤儉持家、刻苦自勵的

5. 鄧玉祥女士手稿，未發表。

6. 鄧玉祥女士手稿，未發表。

7. 鄧玉祥撰，我與憂患，憂患與我，北一女青年51期，頁4-11。

精神，亦在此時培養完成，以致日後其思想見解與行事風格，都與她的出生背景與受教育歷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女士在擔任景美女中校長時期，談及訓導學生的著手點時，所提出的三個重點方向是：

「一、培養公德心：學生要關緊水的龍頭、扣好燈的開關、謹防打破玻璃、注重公共秩序、愛護花草樹木。

二、高度的責任感：所謂責任感即是忠勤職守、熱誠負責的態度，學生不容許有馬虎怠忽之行為、偷懶苟安之心理；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務以忠勤職守為訓。

三、強烈的愛國精神：有愛國精神才能明是非、辨義利，瞭解國家生命高於個人生命，國家的利益重於個人的利益」<sup>8</sup>。

仍是以勤儉、忠勤、愛國為重心，在在顯示受時代背景的影響。

而女士在評論當代學生時，認為「這一代的學生，被家庭保護得太好，從好的角度看，這是說他們比我們那時候幸福；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總覺得他們嫌嬌弱了一點，『溫室裏的花朵經不起暴風雨的打擊』，我總不希望我們這一代的學生變成溫室裏的花朵，而要接受大自然的考驗」<sup>9</sup>。因此女士特別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教育，尤其注重體能的培養。女士在綏遠讀初中時，即曾練過三鐵，還代表綏遠去青島參加第十七屆華北運動會；讀大學時曾擔任過籃球隊長。「因為熱愛運動，我的體能一直很好，這對我從事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其實，也不只是教育工作，我想做什麼工作都先得有健康的身體，所以我常勸自己的學生不可以讀死書，也不可以做書呆子，該放鬆的時候就放鬆，該活躍的時候就活躍，如果為了讀書而糟蹋了身體，那是得不償失的」<sup>10</sup>。因此女士在主掌每所學校校務時，特別重視體育活動，校慶運動大會時，都可看到女士矯健的身影川梭於會場之中。初任花蓮女中

校長時，花女傳統上有全校師生騎自行車到三棧溪郊遊活動，女士為了尊重傳統，在幾天前特別在夜裡一個人在操場上苦練，終能如期與師生一起完成壯舉<sup>11</sup>，由此可看出女士堅強的意志力了。

六〇年代，正是文化



▲ 台灣省立景美高級女子中學五十三學年度與全體教職員合影  
(圖：景美女中提供)

8. 鄧玉祥撰，我的訓導觀，景女青年012期，頁8。

9. 鄧玉祥撰，走過不平凡的時代，北一女青年49期，頁6-7。

10. 同註9。

11. 北一女退休教師劉菊枝女士回憶就讀花蓮女中時對鄧校長的印象。

復興運動大力推展的時代，女士時任景美女中校長，亦在報章上發表文章，暢談教育革新，茲濃縮摘錄如下：

「文化復興運動，首先應從革新教育做起，因為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是立國的根本，亦是衡量國家盛衰的天秤，教育興則國強，教育衰則國敗。因此教育設施，必須要能適應本國國情、傳統文化及社會需要，予以大力革新：

#### 一、教育政策問題

應即明定「實現三民主義立國理想」的教育政策，根據建國理想編定教材，確定制度，有計畫的培植各項人才，並使所培養的人才，皆能學以致用，並禮聘留居國外學人回國研究講學。

#### 二、待遇問題

欲改革教育風氣、使教育正常，則應速謀澈底改善教育人員之待遇，使其能仰事俯畜，而專心教育工作。改善之道，除提高待遇、解決住的問題之外，並應獎勵研究、鼓勵進修，使教育工作能不斷求新求行，以趕上日新月異的潮流。因此鼓勵教師研究進修，應與提高待遇同時並重。

#### 三、慎選校長、教師人選

校長、教師是學校的主體，有好的校長、教師，才能辦出好的學校、訓練出好的學生，所謂「有其師必有其徒」。但校長、教師不是官，而是人之師，身為校長、教師者，除具備法定資格外，尚須有豐富的知識、高尚的德行、進取的精神、仁愛的心腸、公正無私的態度。足為全校學生模範的品採之外，更要懂得教育工作是什麼，教育愛的精神是什麼，真正肯為教育而教育。惟實施九年國教之後，需要大量校長、教師，甄選之法，不外考試，考試僅能測其學識高下，無以察知其品行優劣。故不能單憑考試一法，應注意其真正意向，多方考查其言行、家庭背景、生活狀況、服務態度等，不容有半點疏忽。

#### 四、加強教育視導

我國教育視導制度實施以來，督學人員所作的工作，僅屬消極的視察與批評，缺乏積極的協助與輔導，不僅未收教育視導之效，而且成為教育病態之一。今後對於各級視導人選，應慎重選派，勿再使好作威作福者，榮任視導之職。

#### 五、行政分層負責，經費合理分配

省市各級學校校長，由教育廳局選派，校長應對教育廳局負責，教育廳局應對省市議會負責，如有不稱職者，應即撤換，平日應多使其在校專心校務，不必分心應付它事。

校長重要的職責，除選聘優良教師外，應佈置美好的教育環境，剷除不良的環境，使學生能在優美的環境中，潛移默化，自知去邪惡，遠奸佞，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因此主管教育行政當局，應廣為籌措經費，視各學校實際需要，預作合理分配，毋庸校長奔走爭取。對基礎較差學校，尤應多予資助，俾期各校齊頭並進，不再發生選校現象，而利青年身心均衡發展。

#### 六、加強教師人格教育，提倡尊師重道

應即加強教師人格訓練，樹立尊師重道風氣，使社會中保有一股清高神聖不可侵犯的正氣，使人人敬畏，有所師法。故師資訓練機構，應特別加強人格教育，養成奉公守法、安貧樂道、敬業樂群的教師精神。

#### 七、鼓勵中小學教師研究進修

教育不能落伍，教育必需要能新。要教育不落伍，教育工作者必需要能進取精神，鍥而不



▲ 鄧女士與北一女中樂儀隊合影  
(圖：李家芸教官提供)

捨的研究改進，教育始能日新又新。政府應訂定獎勵辦法，鼓勵中小學教師進修，以為革新教育的張本。如鼓勵投考大專夜間部及研究所，定期舉辦各科教師在職訓練，灌輸各科教師新的思想、新的常識，並規定各科教師在若干年內，一定要有研究報告或工作心得，作為晉升獎勵或汰除的依據。

#### 八、嚴防國中惡補出現

惡補腐蝕了國民小學的精神，也損傷了國家民族的元氣，現今國民中學階段必須嚴厲禁止惡補，並應廢止初三課業輔導辦法，以免滋生暗長。此外亦應通令各校教師，不得在學校附近私自設班招生，或參加補習班工作，進行補習以厚收入。

#### 九、提高研究生的待遇

希望能在國內視國家建設需要，有計畫的培植人才，大量增設研究院、所，以供有志青年深造，並提高其待遇，或准其兼職，使清寒才俊之士，有發展抱負為國出力的機會，不再為一己的生活或仰事俯畜之事而分心。這樣既可培植人才，又可留住人才，方能共赴國難」<sup>12</sup>。

此文完成於民國六十一年，其中有些觀念至今仍是切中教育病根。回顧女士成長與受教育之背景，當時對教育問題有此深刻認識、體會與建言，更印證了女士經常強調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中心思想。十二年後，即在北一女校長任內退休前一年，女士在北一女七十三學年度畢業特刊上，發表「一個教育工作者的體驗和自白」，充分闡述其教育理念，可說是將十二年前的文章更進一步的加以發揮，為女士教育思想之精髓所在。文首即開宗明義強調教育的重要性：

「一、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立國的根本、一切事業的基礎、更是百廢待舉的一把鑰匙，關係著國家民族的興衰、國力的強弱，和民生的樂利。是以教育興則國強，教育敗則國弱。

二、教育的對象是學生，學生則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可塑性極強，導之東則東，導之西則西；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需要教育，更需要好的教育，使之成材成德，蔚為國用。

三、教師則是根據國家的教育方針，執行國家的教育政策，運用適當的教材、適當的方法，教育學生，研究學問，培養品德，發展其潛能，使其認識自己，瞭解國家。故其任務不僅是傳道、授業、解惑，而必須貴能強化學生的思想，變化學生的氣質，鍛鍊學生的體魄，鼓舞學生的愛國情操。教師是掌握學生前途、國家命運的舵手，需時時不忘教育是國家興亡命運之所繫，



▲ 鄧女士於景美女青年撰寫文稿  
(圖：景美女中提供)

12. 擇要摘錄自鄧玉祥撰談教育改革，聯合副刊，民61年8月4.5.6日。



▲ 鄧女士與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合影  
(圖：何耀彰先生提供)

處處要想到教師是學生的楷模、社會的典範，故需以身作則，言必行、行必果，養成學不厭，教不倦，有教無類的胸懷、因材施教的耐性、視學生如子弟的愛心，把教育作為神聖的志業，心心念念的盡忠職守。故需不斷的進德修業，健全自己，克己復禮，忍辱負重，為教育克盡所能，為學生付出最大的心血，始可完成良師興國、教育救國的使命」<sup>13</sup>。

至於要如何完成良師興國，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女士也以身作則要求教師都能達成下列各項，茲擇要摘錄如下：

#### 「一、教師要和學生永遠站在一起

教師是學生的褓姆、學生的模範，要教導學生，更要保護學生，使學生在教師愛心教導之下、耐心的保護之下，得到充分、安全的發育成長。因此身為教師者，必需要時時守護著學生，和學生站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學生走到哪裡，教師就跟到哪裡，循循善誘，隨機教育，為學生做到最周延的服務。培養學生良好的習慣，正當的行為，使學生身強體健、活力充沛，並能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勤勉向學、力爭上游，以求出人頭地。

#### 二、嚴守學生秘密，維護學生尊嚴

教師處理學生問題時，須深察研判，瞭解學生犯意動機。如出於無意，或偶然觸法，應即視其情節予以改過遷善之機會。能原諒就原諒，需規勸即規勸，而且嚴予保密，以維護其自尊。對於屢犯之學生，如未被他人發現，則更應密勸其痛下決心悔悟前非、改過遷善，重新做人，以免沉迷不悟，日趨下流。如被人懷疑發覺，亦應設法予以庇護。更應本著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的意念，多予犯過學生改過遷善、力圖振作的機會，使犯過學生感於教師的守密愛護之恩，而洗面革心，立志向善。

#### 三、真誠的愛護學生

俗語云『嚴師出高徒』，意即嚴守師道的教師，必能教出高明的學生。但所謂嚴師，並不是苛刻、體罰，故意為難折磨學生，使學生無法忍受。而是真誠的愛護學生，快快樂樂的學習，無憂無慮、勤勤勉勉，有目的、有計畫的前進，師生之間呈現出一片樂融融的景象。師師生生相敬相愛，則師道何式微之有？

#### 四、嚴守為師之道

身為教師者，決不可敷衍了事、混時間。今日請病假，明日請事假，遲到早退，忙於私務；披著教師的外表，尸位素餐，甚至幹著利慾薰心的勾當，誤盡蒼生，真不知師德何在？良心何在？因此我大膽的呼籲，孜孜為利之徒，請即離開教育界。奉勸上課留一手，強拉學生到家補習，不顧學生身心疲勞的教師，趕快立即停止。還有不研究教材改進，而忙於編寫考試參考材料，強迫學生購買，請站在君子固窮的立場，收拾起圖利之心，救救學生，使他們身心健康，茁壯的成長發展。

#### 五、教師對學生要有信心

身為教師者，必定要有信心，把不好的學生教好，把不會的學生教會，更要把失敗的學生教成功！教師要很有耐心的鼓勵學生抱著堅定的信心，勇往直前。失敗了，站起來繼續奮鬥，絕

13. 鄧玉祥撰，一個教育工作者的體驗和自白，北一女青年53期，頁4。

不半途而廢，絕不向失敗低頭，則必能轉敗為勝，獲得如願的成功。是以對於失敗的學生，教師應多加鼓勵，多予安慰，使其恢復信心，再接再厲，奮鬥到底，不達目的，絕不罷休！成功是歸於努力者的，有信心，肯努力，則必定成功」<sup>14</sup>。

由上文可知，女士認為教育的成敗，關鍵在於教師素質的優劣。一位好教師必須能立己修德，學有專精、術有專攻，謹遵師道，盡忠職守，真愛學生，永遠和學生站在一起，與學生建立榮譽與共的感情，循循善誘，使愚者明之，弱者強之，意志不堅定者，堅定之，信心不足者，充足之，使學生鼓起勇氣，努力奮發，必可邁向成功之路。

綜計女士一生，自初中畢業從事教職以來，凡歷五十寒暑，始終兢兢業業、克盡職守，未曾離開過教職。即令退休之後，亦以「讀書」「寫作」「服務」為其職志，仍不脫離「教育家」本色。尤其「活到老、學到老」，勤勤勉勉、好學不倦的精神，更是值得年輕學子效法學習。欲論述女士一生豐富多采的行誼，本極為不易，筆者嘗試將與女士相關之文章、簡牘，爬梳整理，期讓讀者諸君認識這一位走過憂患歲月，始終堅守崗位、不改其志的大時代之教育家。吾人撫今追昔，更加深對女士無限的懷念，文末特以女士自述之一段話語，做為本文之總結：

「我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幾十年來，總是不離憂患，憂患也不離開我，使我嘗盡了人生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的滋味，也受夠了離鄉背井，流離失所淒慘的折磨。在日寇、共匪侵略奴役、摧殘蹂躪的鐵蹄之下，我不得不踏上流亡的征途，因而失掉美麗的家園，也失掉敬愛的爹娘！使我變成了世界上最孤苦無靠的人，也成了世界上地地道道的流浪孤兒！正因為如此，也養成了我孤軍奮鬥、獨立自主、自強不息、吃苦耐勞、奮鬥不懈的精神。能讀書時，我即手不釋卷，心不二用，踏踏實實的埋首苦讀；做事時，我是一絲不苟，奉公守法，堅守崗位，潔身自愛，一介不取，一介不予，勤儉樸實，任勞任怨，盡忠職守，負責到底，心中洒洒，無愧無作！我的足跡曾走過黃河流域、華北各地，也踏遍了大西北的雄關要塞，和江南的名山勝水。我愛祖國的錦繡河山，也想念大陸上的親朋故舊。我時時在整裝待發，只要反攻的號角一響，我即跳上反攻的航艦，衝過海峽的對岸，打第一仗，立第一功。將我有限的生命，獻給國家；將我最後的一滴血，滴在大陸的國土上，完成我落葉歸根的心願。憂患！憂患！憂患雖然緊緊的纏著我，我卻戰勝了憂患，並將憂患深深地埋葬！」<sup>15</sup>

14. 擇要摘錄自鄧玉祥撰，一個教育工作者的體驗和自白，北一女青年53期，頁6-10。

15. 鄧玉祥撰，我與憂患，憂患與我，北一女青年51期，頁4-11。

## 參考文獻：

- 典藏北一女百年特刊（2003）。臺北市：正中書局初版。2003年12月。
- 景女青年（1962~1978）。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出版。
- 北一女青年（1978~1985）。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出版。
- 鄧玉祥（1967）。自傳。
- 鄧玉祥（1972/8/4）。談教育改革。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摘自聯合知識庫。
- 鄧玉祥（1972/8/5）。談教育改革。聯合報13版，聯合副刊，摘自聯合知識庫。
- 鄧玉祥（1972/8/6）。談教育改革。聯合報13版，聯合副刊，摘自聯合知識庫。
- 蕭蕙茹（2002）。堅苦卓絕創景女---追憶鄧玉祥校長。摘自「錦繡四十」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四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出版。
- 鄧玉祥女史治喪委員會謹述（1997/4/20）。鄧故前校長玉祥女史行誼。
- 蔡純華（1997）。送別鄧校長。
- 黃通鎰（1997/4/05）。悼鄧玉祥校長逝世一週年。
- 王大同（2002）。關於我的母親。

## 《附錄一》

### ※門生故舊憶述（一）：鄧校長與補校

補校在學制上有別於日校的正規教育，是隸屬於社會教育的一環，招生對象只要具備國中畢業學歷，並沒有年齡的限制。上課也多利用日校學生放學後的夜間進行，上課科目與時數比日校少很多而且也沒有社團等課外活動，修習三年成績及格結業後，必須通過教育局舉辦的資格檢定考試才能取得高中畢業學歷。

民國67年鄧校長到任以後，發現補校所招收學生的年齡層有逐年下降的現象，學生結構也從社會上在職人士、家庭主婦、尼姑等多樣性轉為幾乎清一色的應屆國中畢業生前來報考。雖然在學業上的程度與日校學生相比仍有相當的差距，但人人卻都有強烈的升學意願。基於幫助這些大多有高中聯考挫敗經驗的青年學子也能順利考上大學，鄧校長下定決心力圖縮小日補校學生的程度差距，其具體作法是增加上課科目與時數；聘請最優秀的老師



▲ 鄧女士於早晨時在北一女中校門口與學生打招呼（圖：北一女中提供）

到補校任教<sup>1</sup>；高三學生改在白天上課<sup>2</sup>；成立學生輔導室<sup>3</sup>；創辦校刊<sup>4</sup>；強化班聯會的組織與功能<sup>5</sup>；增設學生社團<sup>6</sup>；加強舉辦校內各項競賽與活動<sup>7</sup>；讓補校學生也有代表北一女參加校外競賽與活動的機會<sup>8</sup>；這種種措施，激發了學生對自我的要求與期許，且除了使得補校學生同樣擁有蓬勃多采的高中生活外，也實質提高了升學的能力，結業後不但全數通過資格檢定考試外，也創下與師大附中不相上下的大學升學率。

鄧校長對補校學生的用心、照顧與愛護有了具體的成果，學生也深切感受到校長將她們的命運由婢女轉變為嬌女<sup>9</sup>的溫暖與喜悅。因此，她們這樣印記了幾乎所有學生校園生活的心路歷程。

「……懷著幾許羞澀的心情踏入綠園……度過每一個飛蟲滿室的夏夜，熬過每一個凜冽的嚴冬……從失望、挫折，由經驗、淚水中走過艱辛而漫長的成長路……同樣的學習環境，不一樣的學習科目與時數；相同的綠衫，繡上不同顏色的標誌……於是，悲傷的歲月不再黑暗，苦澀的心靈不再枯渴，茫茫的前程有了指標……讓我們知道，我們都是一塊待琢的璞玉……」

（北一女退休教師鄭昭雄口述、何耀彰整理）

#### ※門生故舊憶述（二）：振奇風骨卓坦率性靈真－感懷恩師鄧玉祥校長

每走到和平東路二段265巷巷子底那座濃蔭深深的院落前，總按捺不住著緊張與激動，按了門鈴，先是一陣狺狺喧騰的狗吠，接著一陣大聲的喝斥，紅色的大門開啟了，老師總是跟著拖鞋笑容可掬的迎了出來，也總是穿著那套學校發的舊運動服，要不就是一襲退色的舊旗袍，她老人家居家經常是節儉樸實不事修飾的。

坐在那不算寬敞近乎簡陋的客廳，聽著她娓娓追敘往事：少小時勤奮好學卓厲奮發，抗戰時獻身救國的豪情，流離逃難時黃河遇險，大學畢業時北京棄守的混亂局勢，歷經艱險顛沛，播遷來臺重獲自由的幸運，蕙路藍縷創辦景美女中的辛苦、欣慰與驕傲！在謝東閔副總統勸勉下接掌北一女中睽勉惕厲的心情，勤慎興革以及整頓補校的種種…片片段段，點點滴滴，沒有系統，隨興而談，但總是

1. 鄧校長新聘教師多擁有碩士以上學歷。

2. 補校學生常要提前到校，如果找不到空教室，就得利用樹下或活動中心階梯，將書包置於膝蓋上作為書桌，以進行加課或考試。

3. 七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獲准正式成立，是全國第一個補校學生輔導室。由於補校學生多有高中聯考挫敗的傷痛經驗，入學以後，又因作息時間與家人不同，易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大白天上學途中遭受異樣眼光也是一種負擔；到學校與日校學生的互動也是一種考驗；而綠色制服上的白色學號，更可能是難以承受的標誌，心理上比較脆弱與敏感，心理建設與輔導更顯重要。

4. 民國70年創刊，取名《迎曦》。

5. 週會邀請專家學者來校演講及養老院、育幼院的慰問等善行活動，均由班聯會一手籌辦。

6. 在沒有社團經費的情況下，相繼成立了跆拳道社、手語社、緞帶花社、羽球社、國樂社、中國結社、攝影社。

7. 北一女校慶各項競賽與活動外，另自辦民歌比賽、文藝創作獎活動……等。

8. 例如參加中等學校運動會；光復節慶祝大會及國父誕辰紀念大會的啦啦隊表演；校外國語文競賽等。

9. 同學之間曾有這樣的流言：日間部學生是親生女，夜間部是養女，補校學生是婢女。

那樣興致勃勃的回憶著，敘說著。退休之後，她比較寂寞，我有時會去探望她，陪她聊聊天，其實是聽的時候多，她老人家讀了萬卷書，行了萬里路，走過了苦難的大時代，七十多年豐富多采的生命裡，有多少令人感佩動容的故事啊！

印象中老師是一位典型的讀書人，讀書不忘報國，救國不忘讀書，她自敘從小就立大志有決心，勤勉好學，即使抗日戰亂中，她獻身救國工作，輾轉流離，始終沒有放棄讀書求學，避秦來台，擔任教職，生活安定，仍然不改夙志，考入〔師大教育研究所〕深造，苦讀三年，孜孜不倦，先後寫成《二程子教育思想》，《陸象山教育思想》，《王陽明教育思想》，探幽發微，細密清明。自北一女退休後，立即申請到〔輔仁大學哲學究研所〕旁聽三年，隨後正式考進博士班，在羅光大主教的鼓勵指導下，攻讀中國哲學，對老莊、佛學、禪宗以及宗教等多所涉獵研究，結業後撰成《胡適思想研究》一書，榮獲博士學位，那年她已七十一歲了。還記得大家為她慶祝的宴會上，特別獻給她刻有【藏脩游息忘食忘憂】的匾額一方，她開懷的笑著，笑得好燦爛，大家簇擁著她照相，簡直像明星一樣。學不厭，教不倦，活到老，學到老，她為社會樹立了最佳典範！

老師的個性爽朗熱情，對人真摯誠懇，每年校慶無論多忙，一定在校刊上寫篇文章，回顧學校一年來的發展，並親自題詞勸勉學生，數十年如一日；每屆學生畢業，她像嫁女兒一樣，在典禮上諄諄叮嚀，殷殷祝福，情動於衷，往往哽咽落淚，了解她的人都知道那絕不是行禮如儀的矯情，而是發自內心的不捨！她對學校教師，即使是學生輩，都一律稱「先生」以示尊敬，每年教師節，她就像辦喜事一樣張羅宴席，款待同仁！她樂觀積極，勇於任事，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學校裡對老師們的要求特別嚴，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氣質，使人凜然肅然，而私下接觸會感受她親切熱誠的慈藹！

老師一生廉潔自持，奉公守法，記得她離開景美女中時，學校同仁為感念她創校的辛勞，倡議為她鑄像紀念，並且要為她設立獎學金，都被她嚴拒，記得她的說法是：如果每位校長都立個像，學校會成何體統？至於獎學金，以後有需要時她自己會設置，不勞大家費心，她的堅持與狷介使人感佩敬重！在教育界，她以公正無私著稱，一般學校的經費往往都會不敷開支，而她負責的學校卻能節省公帑常有節餘，她的原則是該花的花該省則省！至於教師的遴選，她唯才是用，一封流暢得體的自薦信，或是有好口碑經人推薦，面談屬實後立即聘用，尤其對年輕人的拔擢獎掖，更是不遺餘力。

至於她自己的生活，也許是成長於苦難，她一向不喜奢靡，平日儉省樸實，



從不重視物質享受，從不穿金戴銀，穿著自然十分樸素，住的是公家宿舍，長年未曾修葺，客廳的沙發一用數十年，或勸她稍加整修，她卻安之如素，常以先賢顏回自詡，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誠如她自己所說，一介不取，一介不予，心中洒洒，無愧無怍！

古人談修身有云：

「泰山喬嶽以立身，明鏡止水以居

心，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這樣一位走過風雨，走過烽火，走過憂患，佼佼不群的奇女子，在悠悠無盡的時間長河裡，她的光熱燦耀，她的風姿岸偉，令人仰望，令人欽遲！

（北一女退休教師周良亭憶述、何耀彰整理）



▲ 鄧女士（左一）與北一女中樂儀隊參訪休士頓合影  
（圖：李家芸教官提供）

### ※門生故舊憶述（三）：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的鄧校長

鄧校長是在民國六十七年夏接掌北一女，我比鄧校長早一年在北一女代課，亟需獲得正式教職，經校內主任和老師的推薦，雖然我和校長非親非故、素昧平生，還是獲聘北一女夜補校老師的教職。面談時，當場下令要我兼任夜補校訓育組長的職缺，讓我有一個能近身觀察和學習的機會。

校長對教育行政觀察入微，上任之初，即提出「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直呼夜補校學生也是她的「嬌嬌女」，贏得學生一致的愛戴。每當週會校長蒞臨或離場時，學生掌聲如雷，「校長好」、「校長再見」的聲音響徹雲霄。校長常著旗袍，壯碩圓滿，露在旗袍下擺的小腿卻異常纖秀，走路時肩膀較少擺動，雙手下垂，兩掌向外平擺，學生私下暱稱她「企鵝媽媽」，愛敬有加。

校長與王法官結縭之後，抱養一對螟蛉子女，視如己出。同時她把這分親情母愛，推廣至校內同仁，在中正樓地下室開辦托兒所，勻出充足經費，在保育老師的照拂之下，「幼有所托」。中午午休時間，老師媽媽、爸爸們一個一個出現在托兒所，照拂小孩，餵飯午睡、絮絮家常；校慶運動會時第一個競賽項目便是托兒所小朋友的二十五公尺賽跑。看他們鼓動小腳、蹣跚賣力的演出，常成為會場上全場注目的焦點，每一位小朋友從校長婆婆手中接到糖果餅乾的興奮

之情，溢於言表。這些回憶是北一女粉筆生涯當中，最最溫馨感人的畫面，我們都深受其惠。常戲稱我們的子女都是在北一女混大的，都是「北一女校友」，從「全日托」到「半日托」，到最後「離巢而出」。

由於生性使然，謹守公私分際，我第一次獲邀到校長家作客的殊榮，是在校長退休之後。猶記得那天正值冬寒冷冽、長日將盡的傍晚，時至今日我還是無法形容當時的心情。按了門鈴，校長一襲家常服，笑容可掬，親自應門。我們穿過濃密陰暗的樹叢，進入低矮的日式平房，映入眼簾的情景，在在顛覆我的思維與想像。玄關左側是一座木製屏風，上面掛著一些中國結吊飾，一座三人坐的藤沙發，飽受歲月的洗禮，黝黑發亮；一座矮櫃，上面有一些照片、獎牌、擺飾，地面上鋪著藍白兩色的塑膠地板，一張簡單的長條形餐桌，上面擺著一座北方銅質炭盆火鍋，爐火燒得正旺，除了一盒盒牛羊肉片、粉絲、凍豆腐、大白菜之外，有一碟又一碟的沾料佐醬，其餘觸目所及，空空蕩蕩，與主人的身份地位相比，讓我產生一種不協調、非真實之感。主客均站著用餐。只見校長忙進忙出，除了加炭火之外，就是殷殷勸客，娓娓訴說一大早她如何「東市買肉片、西市買沾料」，還不忘買高高頭給我們嚐嚐，粗糲味同嚼臘，但校長似乎是思鄉情深吃得津津有味。面對著滿室熱氣蒸騰，飄著牛羊羶腥味的佳餚美食，我動筷的時間極少，卻讓我有更多的心思去挑動好奇的神經。我驀然發現校長的雙手乾枯瘦削，十根手指頭的關節處，均腫脹彎曲變形，我不禁發怔：這是一雙走遍大江南北、歷經磨難淬煉的手嗎？這是一雙從無到有擘劃草創的手嗎？這是一雙春風化雨執教育牛耳的手嗎？我深受感動。是的，不折不扣，那就是堅持原汁原味、不伎不求、教育領航的手。

第二次到校長家作客，我提早半天抵達，與同事在廚房洗菜，簡陋的廚房設備，與房舍非常搭調，水龍頭的出水量小得可憐，詢問之下，方才得知原因是老舊的房舍四周，盡是現代化的公寓大樓，日式平房沒有抽水水塔的設備，出水自是涓滴細流。爐台上一鍋麥片粥，已經不堪食用。我們擅自作主偷偷倒掉，心中油然湧起一絲不憫的情緒，想到她獨居在家（時大法官已辭世，嗣子大同服役中）乏人照護，還收容五隻流浪犬。每天大費周章張羅犬隻進食，而她卻自奉簡樸，「一簞食一壺漿」，怡然自得，不改其樂，居陋室，胸中自有丘壑，引經論史，暢談天下大事，與古人「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相互映照。巾幗不讓鬚眉，何等胸襟氣概！如果說古人「蘆花為被、荷葉為盃、漫看雲卷雲舒」是一種遁世的幽雅情懷的話，那麼校長這種「大隱隱於市」的現代顏回，又多了一種入世的



高貴情操吧！

對校長的生活面向和人生哲學有更貼身的觀察和感受，是在她退休之後，幾次星期假日的出遊當中，得到的具體印象。她永遠是一個最親切隨和的旅伴，而且玩得比我們起勁忘形，童騷十足：她可以坐在三峽白雞廟埧的臺階上，大啖豆乾滷味；飢腸轆轆在草嶺古道健行，一路上盡聽她嘟囔著「你們要餓死我嗎」的怨言；此外，她還是一個時髦的「追星族---哈雷彗星」，一行人躲在龍洞荒郊野外的草叢中，只為了向「它」出現在台灣最後一道身影說再見，但終夜凝眸，硬是看不到它的情影，最大的收穫就是摸黑把帶去的一大鍋香菇肉羹吃得精光。「望之也嚴，即之也溫」是校長最佳的寫照。有人說回憶是美好的，因為一切生命的黯淡與拂逆，都將離我遠去，而足資喜悅的情景卻歷久不絕，校長離開我們已十一年了，在時間的沖淡之下，褪盡傷逝的悲痛，爬梳生命的喜悅，我們最津津樂道的便是她陪我們重溫那一段屬於年輕人狂放不羈的日子，成為我們心目中校長永恆的拍板定照。

在浩瀚的生命之流中，每一個人各有其人生軌道，但是偶然與別人接軌，或擦身而過時，往往擦撞出一些生命的火花出來，這些火花成就出我與鄧校長之間的因緣際會，也成為我生命史上一頁彌足珍貴的刻劃與回憶。

（北一女退休教師黃素香口述、何耀彰整理）

## 《附錄二》

鄧玉祥校長大事年表

年月	大事紀要	備註
民國9年2月	出生於山西省天鎮縣	
15年	入縣城女子小學就讀	
21年	就讀綏遠省立農科職業學校（四年制）	
25年	初中畢業，留校擔任生物實驗室管理員	
26年	擔任綏遠第七後方醫院醫護工作	
27年	插班就讀陝西國立第四中學高二	
30年	出任國立青海師範學校教師	
32年	就讀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蘭州西北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系	
36年	獲教育學士學位，留校擔任助教	
38年5月	出任國立長白師範學院教育系助教（廣州）	



12月	渡海抵臺30歲	
39年	出任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師兼管理組長	
40年	出任臺灣省立基隆女中訓導主任	
41年	出任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師	
44年	出任臺灣省立臺北護理助產職業學校訓導主任 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46年	獲碩士學位 出任臺灣省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37歲
51年	出任臺灣省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籌備處主任兼校長 (57年8月改名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42歲
60年	當選臺北市特優教育人員	
67年	出任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58歲
70年	率領北一女中樂儀隊訪問美國、新加坡	
74年8月	自北一女中退休 至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旁聽	65歲
77年	考取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	68歲
80年6月	獲哲學博士學位	71歲
9月	赴大陸昆明參訪12天	
86年4月	辭世77歲	(陰曆 為78歲)



# 姚一葦

1922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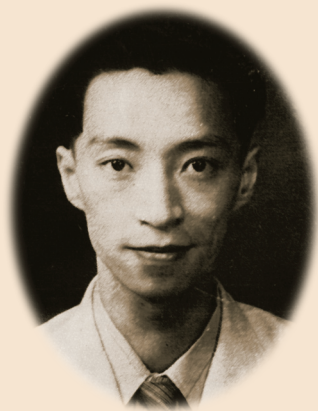
台灣戲劇教育的領航者

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系副教授 王友輝 撰文



姚一葦先生，本名姚公偉，祖籍南昌，生於江西鄱陽。1946年大學畢業後與范筱蘭女士結褵，共有二子一女。1983年其妻病逝，稍後再娶李應強女士相伴。1997年，先生因心血管疾病驟逝於臺北。

先生1946年渡海來臺，任職於臺灣銀行凡卅六年。1957年起，先後應聘至藝專、政工幹校及文化學院等校兼課。1982年自銀行提前退休，參與國立藝術學院（今台北藝術大學）建校籌備工作，並擔任首任戲劇學系主任兼教務長，奠定其臺灣戲劇教育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圖：姚海星女士提供）

## 序 終身的教育信念

姚一葦先生在大學時期所寫的〈後臺斷想〉<sup>1</sup>這篇散文裡，他描述了在廈門大學唸書時，參與話劇演出，在後臺的心情：

你們這戲劇的拓荒者，你這不可輕侮的力量，你們要創造什麼就創造什麼，你們前面是這樣一條輝煌的路——雖然是充滿雜草與蘼蕪的，雖然是被別人歪曲過的，而你們是可以清除它們的，只要多用一點力氣。

透過這樣一篇帶有浪漫精神的短文，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戲劇創作的基本信念，更可以了解後來在1980年代規劃、舉辦「實驗劇展」，以及創立國立藝術學院戲劇學系時的觀念和理想。

在他生前居住的興隆山莊書房門口，掛了一幅藍布門簾，上面的題字是拓印自魯迅家訓書法：「橫眉冷瞪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正是這樣的精神，建立了

1. 姚宇，《聯合文學》第一五二期，110～112頁，1997.6。



姚先生在臺灣現代戲劇教育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事實上，他對戲劇的熱情，不僅奉獻在戲劇教育蕞路藍縷的開創之中，更表現在劇本創作和戲劇及美學理論的著述上。

同時，姚先生對臺灣教育的貢獻不僅僅在於戲劇方面，也不僅僅限於學院之中，其在戲劇、文學、美學和藝術批評的實踐，以及推動戲劇展演、躬親文學雜誌編輯等面向之中，更展現了社會教育無遠弗屆的力量，使他成為臺灣當代文學、藝術發展脈絡中，極為重要的導師與舵手。

## 「姚一葦」的幕啟與幕落

姚一葦先生，本名姚公偉，祖籍南昌，1922年生於江西鄱陽。十六歲時隻身往吉安中學就讀，旋即遭遇戰亂隨校遷徙，後考進廈門大學電機工程系，因個人志趣及課業壓力，於二年級時轉至銀行系。廈大因避戰火而搬遷到福建長汀，先生再度隨校遷移，以校為家。1946年年初大學畢業後，隨即與同校的范筱蘭女士結婚。姚先生於該年九月一日先行渡海來臺，十月一日便任職於臺灣銀行任辦事員，次年將妻與子均接來臺灣，後共有二子一女。

卅六年台灣銀行的任職，成為他「安家」的重要支柱，但是姚先生的「立業」卻不在銀行，而是開啟於1957年，藝專張隆延校長邀約的一場戲劇演講，從那時開始，姚先生白天在銀行任職，假日及夜間便展開他在臺灣專業戲劇教育的默默耕耘。在銀行任職時，因為家庭經濟沉重的負擔，姚先生不求升遷，但求溫飽，枯燥的辦公生涯中以讀書為樂，曾利用公餘時間翻譯馬克吐溫小說《湯姆歷險記》，1953年由正中書局出版時，王夢鷗先生為他取名「姚一葦」，從此對外開始以此為名。

1980年六月初，姚先生生命中最重要伴侶范筱蘭罹患了乳癌，歷經多年的治療，1983年一月十七日凌晨，范筱蘭病逝。范筱蘭對姚先生而言，是生命中第一個看重他的知己，婚後三十八年的生活，他可說完全依賴妻子的照顧，妻子病逝後，他面臨了有生以來最嚴酷的生命考驗。

1983年十一月，姚先生和同為藝術學院同事的李應強結為連理。這段婚姻，對他而言，或許永遠是一個極為困難、無法也無需解釋的決定，續弦的妻子並無法取代范筱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至少讓他在茫然無措的鰥居生活中，找到一個可以說話、可以照顧他生活起居的人。1992年三月，他在接受口述自傳的訪問中表示，他的決定是一項冒險，所幸他沒有看錯人，再婚的生活對他而言，



是成功的。

1992年，他正式從國立藝術學院退休，但仍在研究所裡授課，每週仍要風塵僕僕地從木柵搭車，一路顛簸到關渡，繼續他無法放下的教育志業。1993年，姚先生便因心臟缺氧幾乎暈倒，在接受導管擴張手術後仍偶有頭暈的現象，血壓時高時低。病癒後他曾經表示，他不畏懼死亡，但是，他害怕自己因為中風成為一個沒有行動能力、無法思考的無用之人。

1997年四月五日，姚先生七十五歲生日當天，他完成了生前最後一篇文章〈被後現代遺忘的——觀《英倫情人》抒感〉，文中充分表露他對人間摯愛真情的感動，同時，他接受了《聯合報》副刊的專訪，對自己的一生所學做了評比：「劇作第一、理論第二、散文第三、翻譯第四、舊詩第五。」

同時，他苦口婆心地提出閱讀及創作的忠告：「想到要做就馬上去做，『當下 writing』，這是相當重要的。……還有一點就是，不要被這個時代迷惑了，從前那個貧困的時代卻有著豐富的文學，現在大家都富裕了，希望不要反而讓文學衰亡了……」殷殷與創作者共勉的他，不曾被時代所迷惑，自始至終都堅持著文學藝術的古典理想，但是，死神的腳步去而復返，終究強將他的人生大幕急促拉下。

1997年四月八日下午，姚先生上完他在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的最後一堂課，爽朗地向學生道別，表示第二天他只是要到臺大醫院做例行的檢查，揮一揮手，他轉身將身影留在關渡的山丘上，一步步走向漸漸黯淡的暮色。

由於血壓仍不穩定，四月十日，他經醫生建議再度進行心導管手術；午夜，在心臟血管中植入支架、原已手術成功，卻因為突發性心肌梗塞，陷入深沉的昏迷，長達十一個小時的急救，二度動手術仍然迴天乏術，四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卅二分，姚先生的人生大幕遽然落下，面對給予他一生熱烈掌聲的至親、摯友、學生和同人們，曾經與他在人生旅途一同走走看、所有相識與不相識的觀眾們，他，甚至來不及謝幕！

## 貳 學校戲劇教育的實踐歷程

從1949年國民政府退居臺灣以來，反共與恐共的情結，以及歷史的錯綜複雜糾結成金科玉律的「反共抗俄」意識形態，它以有形無形的力量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並且主導了整個時代的文藝創作。由於外在形勢的逐漸改變，以及韓戰後美軍第七艦隊的協防臺灣海峽，使得臺灣本島不安定的恐慌漸趨穩定；經濟上，「三七五減租」等等的制度的實施也使得尖銳對立的土地問題稍得改善，紡



織業、製鞋業等的輕工業開始形成，整體而言經濟情況逐漸好轉，社會也漸趨穩定；再加上留學生的出國與回流，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潮逐漸被介紹到臺灣，對傳統價值產生一定的質疑。前述種種原因交互影響之下，臺灣社會在文學藝術上也開始了本質上的改變。

這是如《筆匯》、《現代文學》等文學性雜誌得以創刊的歷史背景，在此同時，國民政府似乎也意識到「戲劇」在政治運作上的重要性，因此從1951年起，陸續有政治工作幹部學校（簡稱政工幹校，亦即後來的政戰學校）、國立藝術學校（亦即後來的藝專，現在的臺灣藝術大學）、文化學院（亦即後來的文化大學）等校成立了戲劇相關科系。戲劇成為臺灣正規藝術教育中的重點學門，固然表現出政府意識到放任不如主導的強力手段，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多少具備了培養戲劇人才的用意。

姚先生歷年曾受聘任教於藝專、政工幹校和文化大學等校，爾後更一手創建了國立藝術學院戲劇學系，由其教學經歷中，便可一窺臺灣戲劇專業教育的發展脈絡。

### 一. 藝專授課時期

1955年，臺灣成立了第一所「國立藝術學校」，設有影劇、國劇和美術印刷三科，最初校長由賀翊新擔任，1957年，由張隆延繼任，學校並正式遷入板橋校址上課，1960年之後改制為「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一般稱為「藝專」。偶然的機會裡，張隆延在公路局車上知道台灣銀行裡有一位戲劇專家姚一葦。於是，張隆延便親自拜訪姚先生，後來更邀請他到學校做一次演講。姚先生自訂了一個演講題目：「幕」，專講舞臺上升起落下的那一塊布幕。演講結束後，張隆延對著臺下的師生們說：「這是第一幕。」

之後，姚先生戲劇人生的大幕果然升起，憑著那一場演講的測試，張隆延先是聘請他第二學期到學校代課，新學年開始，姚先生便接到「教授」的新聘書，公餘時間到藝專任教。姚先生從此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也因此漸漸為人所知，埋下了後來從事戲劇教學和劇場活動的許多因緣。

### 二. 幹校授課時期

就在姚先生走出銀行，意外地步入戲劇教育領域的時刻，正巧也是臺灣大專院校戲劇教育開始草創的時代，張隆延對他來說，是一個關鍵人物，而後一手提拔姚先生的，更以人稱「曼老」的李曼瑰莫屬。



李曼瑰，早年曾經在燕京大學研究中國古典戲劇，又曾留學美國，從事編劇工作，在大陸時代即活躍於戲劇界；到臺灣之後，她更以其親密的黨政關係和立法委員的身分，先後成立了許多戲劇社團，到處奔走募款地致力於推動戲劇的演出，她並且毫不忌才地拔擢新人，甚至設法送年輕人出國深造，可說是愛才惜才的戲劇愛好者。早在在1962年三月，曼老擔任政工幹校影劇系系主任，便力邀姚先生，以專車接送他到幹校上課。在幹校除了戲劇系之外，姚先生還在補修學分班中開課，所開課程都是「戲劇原理」和「現代戲劇」兩門課，例如痲弦、趙琦彬等人都是那個時代的學生。

### 三. 文大授課時期

1963年，當時的文化學院成立了戲劇系，李曼瑰擔任創系系主任，次年便再邀姚先生利用週六下午的時間，到文化戲劇系開設「西洋戲劇史」，研究所則是利用晚上開設「美學」課程。1965年則是請他在文化藝術學門戲劇組開課，當李曼瑰出國訪問期間，便請他代理研究所戲劇組主任之職，1966年，姚先生正式擔任戲劇組主任，和李曼瑰、張隆延等人共事，這段期間，除了授課，大部分戲劇組研究生的論文都是由姚先生指導的，這些研究生也多半成為後來台灣專業戲劇教育學府中，極為重要的教師或創作者。

1966年，便有文大藝研所的研究生們，開始利用晚上時間到姚先生家裡，隨著姚先生「私塾式」的授課方法上課。在學校裡，姚先生是一個不苟言笑，甚至上課都不會討好學生地講笑話的嚴肅老師，在家裡，顯然較為放鬆，儘管講課的態度依然嚴謹，但是空間的不同總是讓他卸下了威嚴。據目前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任教的陳玲玲表示，在姚先生家裡上課時，學生可以喝

▼ 1977年於文化大學講課  
(圖：姚海星女士提供)



茶、喝咖啡，吃著師母所準備的小點心，休息時甚至師生一起抽煙、天南地北地聊天。這樣書香燈影的情境，對姚先生的許多學生來說，都是極為深刻的記憶。

#### 四. 國立藝術學院的創建

1983年姚先生的妻子范筱蘭因病去世，姚先生面臨生命中最殘酷的考驗時，國立藝術學院的創辦，彷彿成為他「活著」的重要理由之一，他以「嚴父慈母」的姿態，對辦學嚴格把關，對師生慈祥照顧，填補了他白天大部分的時間，就像當年東渡到臺灣，隻手建立一個家一般，他成為戲劇系的大家長，開始了他戲劇教育的歷史責任。

1979年二月，行政院決定籌設一所培育藝術創作、展演及學術研究人才之獨立院校，草擬「國立藝術學院建校計畫綱要」，十月廿二日正式核定成立了國立藝術學院籌備處，由鮑幼玉主持，後來並擔任建校後第一任院長，同時最早聘請了汪其楫加入籌備工作。那時姚先生仍在銀行上班，鮑幼玉兩度到銀行看他，後來在1982年春天，正式邀請他擔任戲劇系的籌備主任。

面對猶如要在沙漠中培育綠苗般的創系事務，以及接踵而來的人情說項，求好心切的姚先生因而憂心忡忡無法安眠，曾一度萌生退意。最後，仍是那一股對戲劇的熱誠，以及對戲劇教育的使命感，使他全心全意投入建校創系的工作。

1982年，國立藝術學院正式成立，姚先生擔任首任教務長並兼任戲劇學系主任。七月一日，國立藝術學院在大學聯考的同一天，以獨立招生的方式，展開臺灣大專院校藝術專業教育史上的新頁。

姚先生辦學的理念是人才第一，第二是設備，第三才是房子，他創辦戲劇系有幾個從籌備之初即有原則：

第一，要創辦一個真正的「劇場系」。所有劇場演出的十八般武藝都必須能夠親自動手完成，因此，場地、設備和訓練都是必要的條件。

第二，要維持劇場的專業訓練。師資除了學歷，還必須具備專業執行的能力，他認為，沒有好的老師，一切的劇場理想皆成泡影。因此他竭盡所能，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地在國內外到處打聽，網羅專業人才加入教學的行列。

第三，要堅持五年制的特殊學制。他認為，中國現代劇場及劇場教育體制固然源自於西方，但是，中國戲劇仍有固有的傳統，甚至自成一個表演體系，為了得以學貫中西，並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劇場體系，他認為四年的課程對學生而言負擔過重，因此主張以五年的學制完成教育養成。



第四，要實施獨立招生的入學考試制度。他認為劇場系的學生應有「別材」與「別趣」，不能只會唸書，而應該在劇場各部門具有特殊的天賦，並且要能對劇場工作「著迷」，而大專聯考依照分數分發的制度，所招收的學生在素質上、興趣上恐怕都將無法滿足劇場系的需求，因此主張獨立招生，並且加強術科考試。

國立藝術學院以一個新成立、毫無知名度的學校，特立獨行的方式招生後，出乎意料之外地有許多人報考。二十年多後，回首檢驗姚先生當年高度理想化的堅持，對比國立藝術學院成立之初所培養、後來加入臺灣現代劇場的畢業生們，他這一樹覆蓋繁花的綠葉，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苦心，畢竟是開花結果了。這一切，如果沒有姚先生人文氣質中高度浪漫的前瞻和信仰，大刀闊斧的理性開創格局和胸襟，一個理想的藝術教育空間，將不可能在新時代將要起步的臺灣藝術教育界成為事實。

後來，姚先生已屆退休年齡，交出了系主任的重擔之後，他仍然關心系務的發展，當年氣盛的老師們為了系務爭論不休時，他總是不急不徐地冷靜分析、發表意見，而成為戲劇系辦學的最高指導原則。

## 參 社會文藝教育搖籃的推手

姚先生除了學校教育的貢獻之外，在社會教育部分也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尤其是在社會戲劇展演、文學刊物編撰，以及聯合、中時和自立等報系所舉辦重要文學獎的評審上，都可見其奉獻心力的痕跡，堪稱為臺灣近當代整體社會文學、藝術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舵手。

### 一. 推動實驗精神的劇展

1977年，在俞大綱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姚先生曾經以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戲劇組，包括了陳玲玲、詹惠登、于玉珊、石光生、曾西霸……等研究生為班底，對外公開徵求演員，演出了他自己創作的劇本《一口箱子》。其中，參與演出的演員則包括了後來在臺灣現代劇場中名聲響亮的李立群、金士傑等人。

他在《一口箱子》演出特刊中曾這麼寫著：「……我們這次的演出屬於實驗性質，但是所謂實驗，絕不是一時的興之所至，而是在一定的學術基礎上，經過慎密的策劃、思索、集中許多專業人員的智慧和能力，和融匯許多不同的意見，而後建立藍圖、再按照藍圖逐步施工……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戲劇的成長，一定要經過許多人自各種不同的角度與方式從事實



驗。……實驗並不表示成功……但實驗的勇氣與精神卻是成功的基礎……」

這一系列以「實驗」精神做為標竿的演出普遍受到好評，然而其意義更在於開啟了學術界以嚴謹的製作態度和方法，結合社會同好參與劇場演出的先例，這也正是後來姚先生創辦國立藝術學院所遵循的重要信念之一。

1979年，姚先生接任了李曼瑰所創立的「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當時，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所舉辦的演出活動中，以「世界劇展」和「青年劇展」最為重要。不甘心只是因循舊路的姚先生，便透過這個組織，在總幹事趙琦彬的協助下，以一年三十萬的有限經費，具體實現了他在劇場中的夢想，臺灣現代劇場的新枝，在老幹上冒出了蔥綠的嫩芽，也敲響了幕起的一聲鑼。

1980年開始，姚先生廣邀劇場的老少同好積極籌備，一連五年舉辦了「實驗劇展」，在讓參與者沒有票房壓力、創作自由的理想下，臺灣現代劇場開始了新的生命。對於這個實驗性的演出活動，他的觀念相當明確，首先，演出必然是帶有實驗性質的新創作品，其次，一定要賣票，一方面為有限的經費找到活水源頭，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在觀眾中建立「買票看戲」的觀念。同時，為了吸引媒體的注意而擴大影響力，他主張集中演出力量，以劇展的形式在臺北南海路的國立藝術館推出。

姚先生戲劇文學與劇場結合的理想，在「實驗劇展」中具體實現了，期間演出了三十四齣新創的作品和兩個世界名劇，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配合著社會威權時代的鬆動，它帶動了年輕人投入現代劇場演出的風氣，戲劇不再是一個僵化的、森密不可碰觸的禁地，儘管「……『實驗劇展』並沒有能夠對社會乃至於文化起多大的決定性作用，它呈現出來的成果，也僅止於劇場觀念的自省，和劇場藝術的開花，留下一些



▲ 1977年《一口箱子》演出 劇照為男主角李立群  
(圖：姚海星女士提供)

為識者津津樂道的優秀作品。但是這些作品依然有其劇場的價值和藝術上的成績，在形式上不但打破當年的傳統，提供了一個新的劇場視野，同時，作品中對人生所提出的看法也有其完整的見解……」<sup>2</sup>。

在「實驗劇展」中的創作者們，或深造或繼續留在劇場中，有許多人成為1982年創立的國立藝術學院主要授課教師；而1986年之後臺灣現代劇場的蓬勃，與五屆實驗劇展的舉辦，更有著不可割裂的歷史因緣。

## 二. 文學欣賞與批評的奠基

1959年，王夢鷗曾邀請姚先生到政治大學演講，因而認識了政大中文系的尉天驄，不久尉天驄便邀請姚先生為其所創編的雜誌《筆匯》寫稿。姚先生陸續寫成〈論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和〈戲劇動作〉兩篇文章，從此，他開始接觸到臺北藝文界例如許國衡、劉國松、莊喆，以及陳映真等人，他們都有著熱愛文學藝術、懷抱浪漫理想的傲氣和呆氣，相聚時往往分享彼此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夢想和創見。

第二年，姚先生在未掛名主編的情況下，接下了《筆匯》雜誌的實際編務工作，從1960年八月起，《筆匯》的編輯在他的參與下，以專號的形式，陸續推出了獨幕劇、詩、電影、批評、小說、現代繪畫運動等等專號特輯，在臺灣現代文學藝術的啟蒙階段，開啟了一扇探視西方文學藝術的窗口。

1961年十一、十二月最後兩期合集出版後，《筆匯》終於因為經費的短絀，結束了它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的浪漫夢想。

《筆匯》雜誌對姚先生而言，不僅僅是編輯事務的參與，更重要的，他無意間為自己創造了一塊發表自己觀念與想法的園地，成為《筆匯》重要的寫稿人。繼《筆匯》之後，《現代文學》也創刊了。《筆匯》醉心於當代、強調當代的反叛性，其刊載範圍除了文學之外，廣及戲劇、繪畫、電影和現代詩，而《現代文學》基本成員大部分來自臺大外文系，雜誌內容則是以介紹西方當代文學作品為主，西化的程度也是遠大於《筆匯》。

1961年底，《筆匯》停刊之後，姚先生又回到了上班、教書的簡單生活，第二年，王文興因為《現代文學》規劃中的「史特林堡專號」而找到了姚先生，他於是為《現代文學》寫出了〈史特林堡與現代主義〉，文中從史特林堡作品風格

2. 王友輝，〈臺灣實驗劇展研究（1980～1984）〉，刊於《藝術評論》第十一期，頁197～220，2000.10。



的衍變、對戲劇思潮及舞臺風尚特質的影響、個人生命歷程與作品的交互影響等等角度，指出史特林堡的創作開啟了戲劇的現代主義大門，同時更直言史特林堡乃是一個「內省型」的作家，其作品挖掘出個人經驗的內心世界，創作者的生命其實與作品已經合二為一。

這個對於作家「內省型」與「非內省型」的對比分類，後來姚先生在1965年發表的〈論風格〉中有進一步的闡述，而將之歸納為探討藝術品風格形成的四種面向之一，不但是《藝術的奧祕》整本書中的主力章節，事實上也形成了姚先生分析諸多劇本的重要切入觀點之一，同時更顯示出他對自己劇本創作上的自我認知和期許。

1963年，白先勇和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都已經大學畢業，他們所創辦的《現代文學》面臨了無人可以維繫的窘境。白先勇在出國留學前夕，將姚先生和余光中、何欣、水晶等人請到了家中，以「託孤」的心情要將《現代文學》的編務工作交給他們。於是大家決定在1963年六月起，雜誌改為季刊。幾經波折，最後是由一葦和余光中、何欣三人掛名顧問，實際上則擔負起《現代文學》的編輯重任。姚先生等三人接任後，在彼此共識之下，做了幾項重要的決定，其一，三人共同拉稿、輪流主編；其二則是將雜誌改為以創作為主，翻譯為輔；其三，完全不考慮商業性，歡迎各類獨特、新奇的作品；其四，不做消極的、破壞性的謾罵，只重視創作；其五，各類文學作品一視同仁，尤其強調希望能有戲劇的創作；最後，希望將雜誌推廣到社會，而不要侷限於同人之間而已。

從這些決定中，不難看出姚先生在文學藝術上的理想，他曾在〈我與現代文學〉一文中寫到他在主編第十九期時，收到來自各方的稿件，內心的愉快和興奮，不可名狀：

我感到我們的文學真的要起飛了，文學的時代已經到臨了。我們得要好好的愛護它，培植它，讓它開花結果。

這樣的心情，其浪漫和後來一葦推動「實驗劇展」時，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三個人的合作關係只維持了一年，余光中在一九六四年秋天赴美，便



▲ 1991年於家中書房（圖：姚海星女士提供）

僅由姚先生和何欣兩人負責。1966年後王文興返國，姚先生便將棒子徹底交還原主。可是，姚先生與《現代文學》的緣分仍然未盡，儘管主編幾次更替，他也不再過問編輯之事，卻仍然陸續供稿。《現代文學》1973年一度停刊，1977年復刊後第二年年底，姚先生又臨危受命地獨自接下主編工作，五年二十期過去，直到復刊號再度停刊為止。

事實上，1966年，將《現代文學》編輯工作交棒還給王文興之後的姚先生，似乎又按捺不住缺乏挑戰的日子，當尉天驄集合了陳映真、劉大任、七等生、黃春明等人，準備再辦一本文學雜誌而找上了他時，他欣然同意開始了《文學季刊》的撰稿和編輯工作。

1967年，當他主編《文學季刊》時，向王禎和邀稿，王禎和寫出了〈嫁妝一牛車〉，姚先生自陳，當他看到了這篇小說，不懂臺語的他連看了幾遍，笑到眼淚都流下了來，認為是真正的「鄉土文學」而極力推薦刊登，登出之後引起不少批評和討論，姚先生便請這些《文學季刊》的年輕人們到家裡吃飯，之後，姚先生便會坐在半新半舊的籐椅上，攤開寫滿娟秀小字筆記的紙張，以討論古典文學作品的嚴肅態度和美學理論的方法開始開講，仔仔細細地將小說拆解分析，而由許南村（陳映真）記錄下來，寫完之後再交給姚先生校改。這次的經驗，不但拉近他和王禎和等《文學季刊》同仁的感情距離，也為姚先生找到一種「寫」文章的另類模式，後來又有第二篇，是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由施叔青記錄。陸陸續續的，姚先生的文學批評便由此開始。對這批六〇年代在文壇開始起步的年輕文學創作者而言，姚先生永和竹林路素樸的家，是他們真正走入文學的課堂，也是小說欣賞與批評的學習開端。

在姚先生中年早期參與編輯的《筆匯》、《現代文學》和《文學季刊》三本文學雜誌中，不涉政治，只談文學和創作，除了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之外，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乃至於後來的施叔青、李昂、黃春明等人，他們早年的重要小說也都是在這三本雜誌中嶄露頭角的。姚先生從此時開始，以用不完的精神力，如老圃園丁般呵護著幼苗，他至死不渝地堅信「文學不死」的信念，或許孤獨，或許寂寞，但是後來這些幼苗一株株都卓然有成，成為臺灣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花異木。

由於姚先生在文學批評的獨樹一格，他自1977年起，陸續擔任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以及自立晚報百萬小說文學獎等的評審，對於文學獨到的品味



與嚴謹的批評態度，挖掘了如駱以軍等優秀年輕小說創作者。姚先生在晚年曾經自比與風車巨人爭戰的唐吉哥德，雖然老矣，卻仍願意執起生鏽的長矛，騎上瘦馬，為文學繼續奮鬥，這樣恆久熱情的姚一葦先生，正是如陳映真所寫，「在暗夜中掌燈，讓荒蕪開出花朵」的真正推手。

## 肆 理論著述的苦心耕耘

姚先生一生除了劇本的創作之外，極為重要的是他在戲劇理論、美學以及藝術批評的論述，然而以姚先生個人來說，他並非從理論起家，而是先成為一個藝術的愛好者，接觸了藝術之後，才開始從作品中歸納整理出觀念，進而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在戲劇與文學的領域中，姚先生尤其重視劇本乃至於文學的創作，認為藝術的理論是從創作中延伸整理出來的，因此他後來自我評比一生所學時，說自己「劇作第一、理論第二」的重要原因。

以姚先生在學院中講授的課程來看，其「劇場藝術」是將戲劇放在劇場的演出情形中來探討，而不是孤立在戲劇文本中談論的；「戲劇原理」則分為戲劇本質論、戲劇形式論以及悲劇論、喜劇論講授。另外，「高級美學」則從美學方法論開始談起，將哲學的美學和科學的美學做為方法論的兩極，形成思辯美學和實驗美學兩個論題，接著討論遊走在兩極之間的許多美學方法；其次，便是「美感經驗論」，他從感覺出發，探討人類的直覺、知覺、想像、感受、統覺到最後的結論；最後，便是「美的範疇論」，這是從抽象的美學過渡到具體藝術的探討，換句話說，是將藝術的實體置入美學的觀念中加以討論。

姚先生不但課堂上教學嚴謹認真，在教學備課上更是高度的自我要求，他透過教學的過程，一點一滴撰寫講稿，爾後才逐步整理成書，因此備課的過程其實正是他形成理論架構的思考過程。

除了課堂上的講授之外，姚先生在他所參與編務的《筆匯》、《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季刊》等文學雜誌中所撰寫的戲劇或美學的文稿，後來或多或少被補充修改，甚至重寫，而成為日後出版為專書之重要基礎，也都表現了其長年以來，在戲劇理論和美學上的思考歷程，早年出版的《戲劇論集》、《藝術的奧秘》、《美的範疇論》等戲劇理論與美學的書籍，都是如此經過時間淬煉才逐步成書的。

事實上，開始撰寫這些論文時，一葦並沒有寫成一本書的想法，他只是憑著當時的感受與直覺，找到一個感興趣的問題便鑽研下去，然後因為雜誌出刊的需



要而寫成文章。這種「無所為而為」的態度，毋寧是一輩從事文學藝術理論及創作的精神。

姚先生在理論上的著述方式其實是和他身處的環境有關的，當姚先生初始教學時，戲劇教育是一片荒漠，還處於開疆闢土的年代，不但有觀點具分量的中文書籍極少，更遑論教本了，因此姚先生決定自己編寫教材，他一字一句地將上課的講稿寫下來，上課時對照著講稿解說，再加以補充相關的劇本資料。由於他是自學出身，大學以來不斷地廣泛閱讀劇本，對劇本的熟悉程度使他善於舉例，聽他所講的課，理論觀念整理自不同的書籍以及他個人的創見，例證則是靠著他驚人的記憶力，以及在書上畫線的習慣，言簡意賅地將所有的劇本情節對照理論逐一講解。

儘管平日銀行的工作忙碌依舊，他仍然充滿熱情地將每一門課的講稿書寫下來，這樣的習慣一直延續不斷，每教一門課，最後總是會寫成一本厚厚的教學講義，幾年下來，更是夾滿寫在便條紙上、日曆紙背後的新增資料；泛黃的紙張，密密麻麻記錄著日積月累的閱讀和思考成果，透過這樣的思考，更逐漸建立起他在戲劇和美學理論上的架構。

1959年，姚先生在《筆匯》雜誌所發表的〈戲劇的動作〉，以亞里斯多德《詩學》（Poetics）中所論述的動作觀為源頭，架構出西方戲劇理論的脈絡，並旁徵中國戲劇理論家李漁《閑情偶記》中〈論主腦〉的觀點，而成為姚先生後來成書的《戲劇原理》主要架構，也是他在戲劇理論上重要論述的開端。1961年六月，他再撰寫〈戲劇的時空觀〉在《筆匯》連刊三期，以西方戲劇發展史中，時間集中與時間延展等兩大時空處理傳統，闡述戲劇時空處理在戲劇形式上的重要性，而形成《戲劇原理》一書中，「戲劇形式論」的基礎。

1991年起，姚先生在大學、研究所兩度當他學生的王友輝紀錄之下，利用暑假期間，以在家私塾口述的方式，將他一生戲劇理論的心血結晶《戲劇原理》整理出版，這本從亞里斯多德《詩學》出發的戲劇理論，為當代的臺灣劇場，留下了一本具有完整思想體系和脈絡、深具歷史意義且幾乎堪稱唯一的戲劇理論書籍。

1993年，姚先生又逐篇完成了《審美三論》一書的各個篇章，還興致勃勃地在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裡開講了「藝術批評」這門課，他原先的理想是希望藉由跨所的研究生共同切磋，將1972年曾經講授的美學批評觀念，增補晚近蒐集的新資料，以全新的面貌重新檢視他思考已久的美學批評概念，後來，姚先生再



將此講稿由王友輝整理，交由三民書局出版。

當《藝術批評》修訂完成付梓的同時，他又開始計畫將他多年閱讀分析經典劇作的心得，在家以「私塾」的方式口述講解，他希望王友輝能夠再次將這些對於劇作重要的評論觀點紀錄下來。

1997年二月寒假期間，這門最後的「私塾」課程在只有兩位學生的情況下開始了；三月三十日，講課後的休息時間，李應強端出姚先生最歡喜吃的烤蕃薯，他開心地像個孩子，邊吃邊讚歎烤蕃薯是天下美味，也邊規劃要開始找家出版社談出版計劃。黃昏的暮色漸漸籠罩了四周，他炯炯的眼神在漸漸暗去的暮靄中顯得光亮異常，未來似乎充滿了喜悅和希望，但是，那堂課卻是姚先生在家私塾的最後一堂課，姚先生意欲留下他評比戲劇文本的《名劇分析》，卻成為不可能出版的遺憾。

## ⑤ 枝葉茂密成蔭的一代導師

姚先生一生藉由文章的書寫將思考付諸於文字，表現出文人以文章淑世的信念，姚先生畢生未從事任何政治性的活動，但是他春風化雨、提携後進，甚至以創作和學術研究，親身見證了1960年代以來臺灣文學藝術的發展，他的影響力恐怕比任何一位在政治環境中位極高官的人都來的重要而實際。「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的魯迅遺言，對他而言，的確是終身奉行不踰。

姚先生終其一生，無所目的溯源書海而能出入古今、無罣無礙，檢視其一生多面向的成就，自然不能忽略他自學出身的事實，他終其一生著作等身，計有劇作十五種，除了二十二歲那年所寫的第一個劇作《風雨如晦》從未發表之外，其餘劇作均已集結出版，部份劇作並有英、日、德、韓等多國語文翻譯；除此更有學術論著七種、散文及評論五種、翻譯小說兩種，以及為數頗為可觀、從未公開發表的古典詩詞。姚先生自身極為重視劇本文本的創作，咸認為理論來自於創作，因此他自評一生所學而認為「劇作第一，理論第二」，是他重要觀念所在。

他在1979年，擔任中國話劇演出欣賞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在趙琦彬等多位學生的協助下推動「實驗劇展」，一如他編輯《筆匯》、《現代文學》、《文學評論》等文學刊物，以及擔任聯合報、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的文學獎評審時，提携年輕創作者一般，鼓勵了許多年輕人投身於劇場的展演與創作，發掘了後來台灣現代劇場眾多的創作與教育人才，更是他在學院之外的教育奉獻，為九〇年代以後蓬勃的臺灣現代劇場活動奠定了相當深厚的基礎。



無論是在藝術領域尚待開發拓墾的戒嚴時期，或是經濟奇蹟、全面民主化引領台灣邁入國際大舞台的解嚴時期，姚先生以不忮不求的處世態度，自學完成戲劇與美學的論述；以文學雜誌的編輯，建構自己和他人理論和創作的書寫舞臺；以五屆實驗劇展的推動，奠定臺灣現代劇場的發展契

機；以別材別趣的教育理念，成就一所劇場學系的理想付諸實現；他理性與感性兼具、古典與現代互容的智慧，令他擺脫自己的創作窠臼、創新格局；思想中的湖海寬廣，讓他能夠處濁世而傲然，而他虛懷自惜的人格特質，不僅在人前終究能夠不留污跡，更恰逢其時地在臺灣戲劇藝術教育的領域中，成為一位可以從多個角度研究、樸素篤實卻札根深厚、枝葉茂密成蔭的一代導師。



▲ 關渡元年與人偶合照（圖：姚海星女士提供）



## 參考文獻：

- 王友輝（2003）。姚一葦。臺北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 姚一葦（1968）。藝術的奧祕。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
- 佛洛伊德著，符傳孝、賴其萬譯（1972）。夢的解析。臺北市：志文出版社。
- 姚一葦（1975）。姚一葦戲劇六種。臺北市：華欣文化事業。
- 姚一葦（1977）。詩學箋註。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
- 姚一葦（1977）。姚一葦文錄。臺北市：洪範書店。
- 姚一葦（1978）。美的範疇論。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
- 姚一葦（1979）。欣賞與批評。臺北市：遠景出版社。
- 俞大綱（1979）。戲劇縱橫談。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
- 李曼瑰（1979）。李曼瑰劇存，第四冊。臺北市：正中書局。
- 張之傑編纂，戴月芳、羅吉甫主編（1980）。臺灣全記錄。臺北市：錦繡出版社。
- 姚一葦（1984）。戲劇與文學。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 姚一葦（1987）。我們一同走走看—姚一葦劇作五種。臺北市：書林書店。
- 俞大綱（1987）。俞大綱全集。臺北市：幼獅文化。
- 姚一葦（1988）。戲劇論集。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
- 姚一葦（1989）。欣賞與批評。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姚一葦（1989）。戲劇與文學。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魯迅（1990）。且介亭雜文末編。臺北市：風雲時代出版社。
- 薛化元主編（1991）。臺灣歷史年表 終戰篇 I II III。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姚一葦（1992）。戲劇原理。臺北市：書林書店。
- 姚一葦（1994）。X小姐·重新開始。臺北市：麥田出版社。
- 馬森（1994）。西潮下的中國現代戲劇。臺北市：書林出版公司。
- 姚一葦（1995）。戲劇與人生。臺北市：書林出版公司。
- 姚一葦（1996）。藝術批評。臺北市：三民書局。
- 邱坤良、李強編（1997）。劇場家書—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演出實錄。臺北市：書林出版社。
- 初安民總編輯（1997）。聯合文學一五二期。臺北市：聯合文學雜誌社。
- 紀念姚一葦先生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1998）。臺北市：中華戲劇學會。
- 陳映真主編（1998）。暗夜中的掌燈者。臺北市：書林出版公司。



姚一葦（2000）。姚一葦戲劇六種。臺北市：書林出版公司。

王友輝（2000）。臺灣實驗劇展研究1980~1984。藝術評論十一期。臺北市：國立藝術學院。

2000第三屆華文戲劇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華文戲劇的根、枝、花、葉。臺北市：中華戲劇學會。

釋惠敏總編輯（2002）。關渡20。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莊永明總策劃，晏山農等著（2002）。學術台灣人。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白先勇（2002）。樹猶如此。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影像紀錄及網站：

陳傳興攝錄。姚一葦口述自傳。臺北市：1991~1992。

姚一葦學術網網站。《<http://yaoyiwei.tnua.edu.tw/>》。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 III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 -- 初版.--臺北市：教育資料館，民97.09

面：公分

ISBN：978-986-01-5092-6(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教育人員 2.臺灣傳記

520.9933

97017787

##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 III

發行人：王世英

編輯委員：伍振鶯、吳文星、吳清山、郭生玉、黃炳煌、溫明麗、歐素瑛  
(依姓氏筆劃排列)

執行編輯：林威志、陳惠玲

出版機關：國立教育資料館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8樓

電話：(02) 2351-9090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九十七(2008)年十月

版次：初版一刷

電子出版品說明：本書同時登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網站

網址：[www.nioerar.edu.tw](http://www.nioerar.edu.tw)

定價：新台幣540元(含DVD光碟)

排版者：倉頡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電話：(02) 2763-1001

印刷者：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55-5282

展售處：有限責任國立教育資料館員工消費合作社

電話：(02) 2351-9090

教育部員工消費合作社(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電話：(02)2356-6054

五南文化廣場(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http://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王東山律師

本館保有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含DVD光碟)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本館同意或書面授權

圖書GPN：1009702228

ISBN：978-986-01-5092-6

光碟GPN：4509702123

視聽編號：EB-CD489

隨書附「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III」DVD光碟(光碟與圖書不分售)



## 國立教育資料館

<http://www.nioerar.edu.tw/>

電話：(02)2351-9090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8樓

E-mail：service@mail.nioerar.edu.tw

ISBN：978-986-01-5092-6



9 789860 150926

GPN：1009702228

定價：540元(含DVD光碟)